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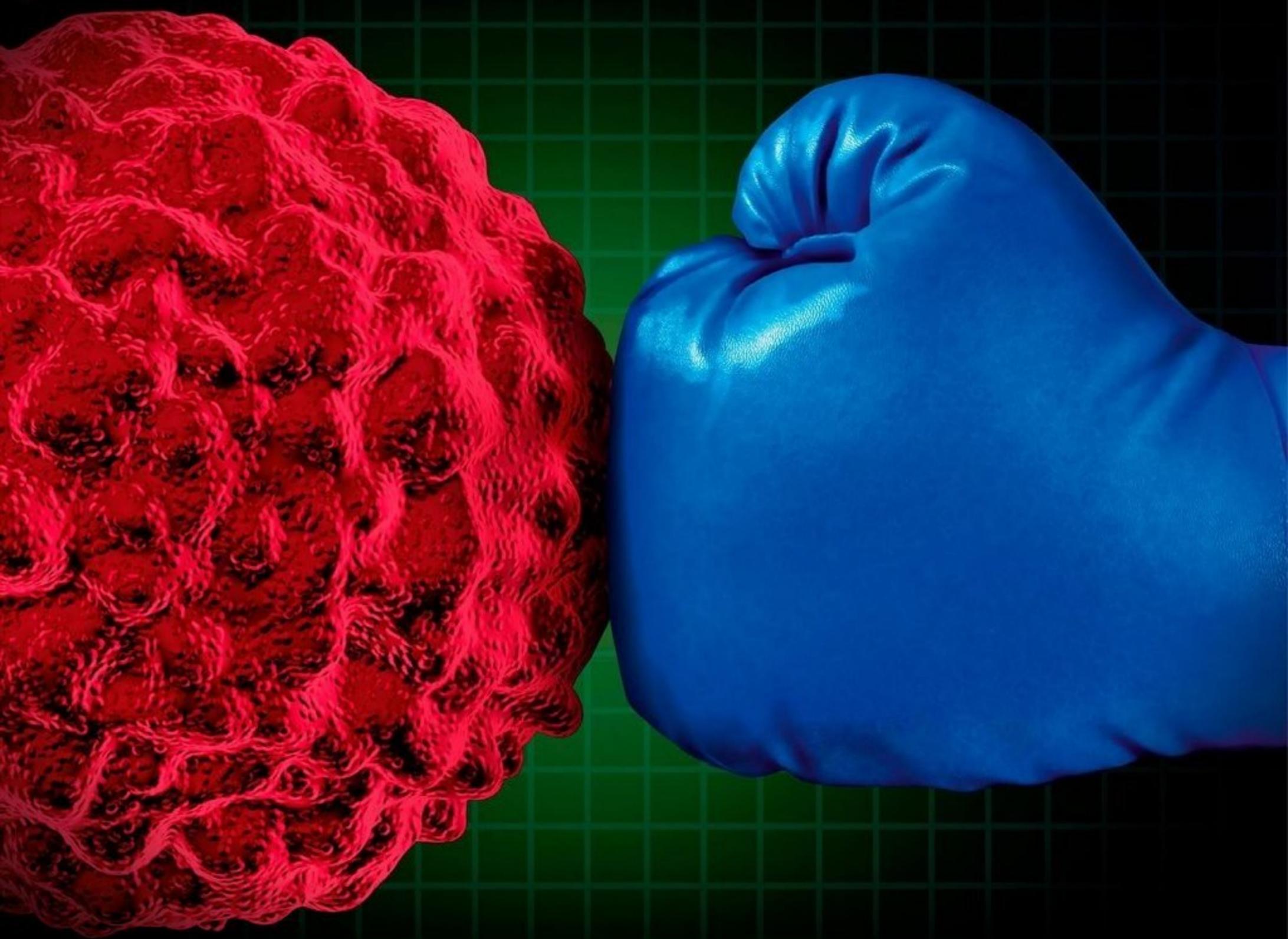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7.10.23
2017年第43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如何面对癌症
中国病人跨境就医调查



959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生生不息，因你行动



WWF微信



WWF微博

实际上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现在加入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WWF在全世界拥有500万名志愿者以及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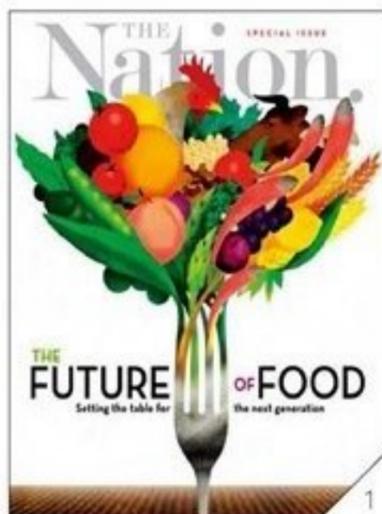
在中国,WWF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37年间我们在中国的项目领域由最初的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明镜》(德国) 2017.10.14

马克龙与“重建”欧洲的决心

在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独家专访中，他谈论了上任五个月的感觉和变化，并说明未来在欧洲发展上的计划，以及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良好关系和未来法德之间的合作发展。马克龙表示要“重建”欧洲，建立新的机构并简化繁琐程序，努力维护欧洲式的价值观：将民主与市场经济、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统一起来。马克龙坚信现代政治应该重新发现一种象征意义，重建宏大叙事，即他所谓的“政治英雄主义”。



《国家》(美国) 2017.10.30

1 未来的食品体系

在全球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各个时代都充满不确定性。近十年来，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再次呈上升趋势，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各地粮产区，大食品公司在第三世界偏远地区增加加工食品销量而引发食品安全与健康争论，与饮食相关的疾病死亡率也在上升。一份未来健康报告显示，未来的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超重和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恰当的、可持续的食品体系？

《旁观者》(英国) 2017.10.14

3 技术和权力的较量

特朗普成功入主白宫，社交媒体功不可没。如今 Facebook 这家科技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平台。这种互联网“垄断”亟待打破，由此两大斗争正在逼近：一是关于网络中立的问题，无关内容和价值，所有数据是否应当被视作一致；二是技术公司是否该对其平台上出现的内容负责。人们将见证技术和权力之间的较量，哪一方会占据上风还不得而知。

《时代》(美国) 2017.10.23

2 好莱坞性侵丑闻事件

电影大亨哈维·韦恩斯坦性侵女星的丑闻近日被曝光。长期以来，很多女演员在韦恩斯坦的侵害下最终都选择了保持沉默，揭露这种行为需要巨大的勇气。韦恩斯坦垮台后，更值得关心的是曾经的受害者。社交媒体上有人表示难以接受《莎翁情史》等经典电影的污点，但拒绝电影本身是对受害者的惩罚，这些女性在受胁迫后所表现的坚强态度和出色工作更加令人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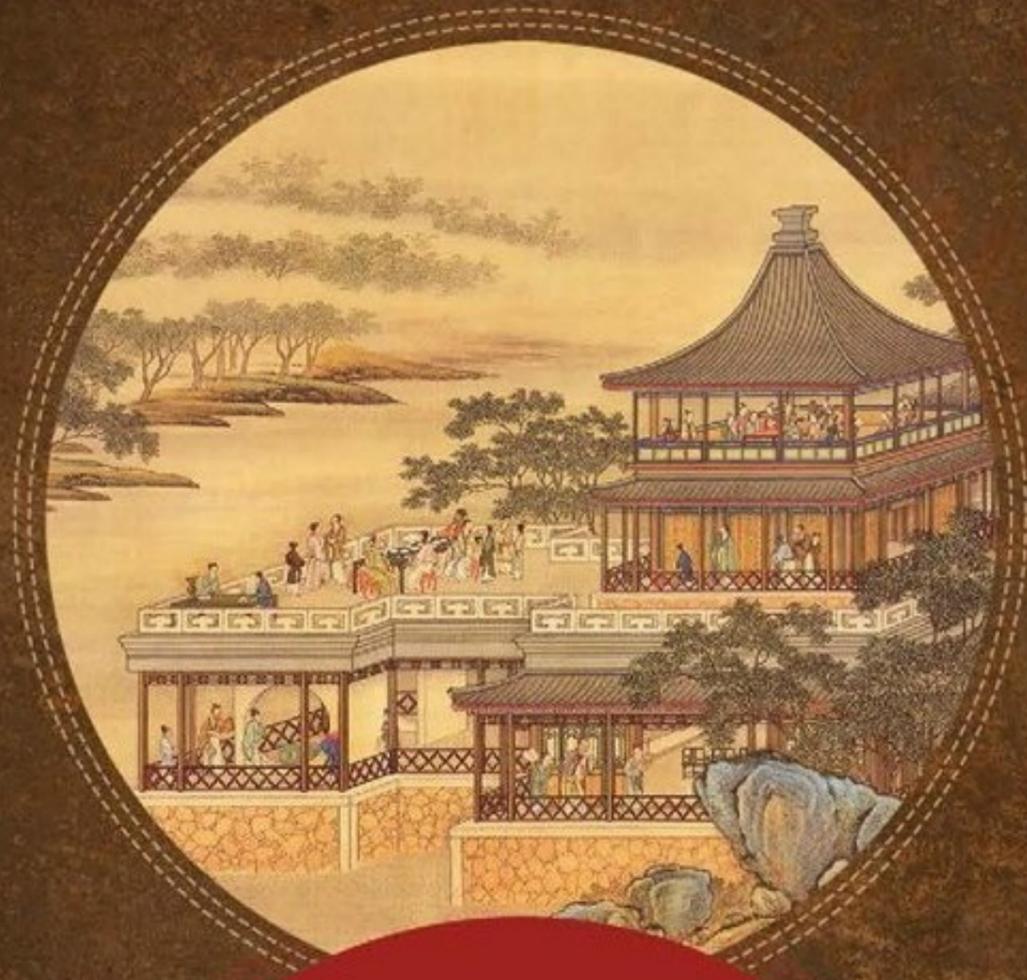
《新科学家》(英国) 2017.10.14

4 睡眠不足会导致阿兹海默症？

目前全球有约 4400 万人患有阿兹海默症，这个数字在持续增长，并且研究表明，患者的睡眠时间都普遍不足。睡眠紊乱不仅是阿兹海默症的典型症状之一，睡眠质量也是判断将来是否会患上该病症的要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差，尤其是“非快速眼动睡眠质量”，这种深度睡眠有助于人将记忆锁定在大脑，不易遗忘。



耀世珍藏



经典大宅

霞公府

邻紫禁城 居王府井

售楼热线: 010-8500 9999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霞公府街3号 北京饭店北侧

物业管理 / CBRE 世邦魏理仕 X京房权证东字第086155号



P30 封面故事

如何面对癌症

中国病人跨境就医调查

- 34 赴美治癌，疾病之下重构身份意义
- 50 去香港看病
- 64 病人自述：改变那些我能改变的事

P86

保护藏羚羊，盗猎之外的威胁



P126

“王牌特工”与平民英雄



社会

- 时事：伊核事件，大国利益与中东格局 74
- 热点：收集种子的人 80
- 热点：保护藏羚羊，盗猎之外的威胁 86
- 热点：罗斯高：何为中国农村教育真问题 92
- 逝者：高莽：内心有光的人 100
- 教育：儿童创新教育：在山林和城市 104
- 人物：建筑师李虎：激活城市 108

经济

- 市场分析：“一代人一遇”的美国税改 72
- 商业：“超级玛丽”为通用汽车定调 114

文化

- 话题：性、谎言与好莱坞的男性权力 116
- 收藏：蓬皮杜里的中国新收藏 120
- 电影：“王牌特工”与平民英雄 126
- 戏剧：《罗丹》：俄罗斯人最擅于制造戏剧性 130
- 时尚：荣宅百年，一座楼与一座城 132
- 时尚：“绷带裙”，好品位，坏品位 140

- 科技：抗击慢阻肺：陌生的全球第四大死因 144
- 思想：耶鲁哲学小历史 150
- 书与人：想象的力量 152

专栏

- 邢海洋：石油人民币 16
- 张斌：苏格兰足球要向冰岛学些什么？ 148
- 宋晓军：伊核风波 149
- 朱伟：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 (1) 156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43期，总第959期，2017年10月23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o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WWF

3 · 霞公府

17 · 三联全媒体

63 · 生活周刊

99 · 瑞尔齿科

103 · 松果生活

147 · 三联中读

159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IWC万国表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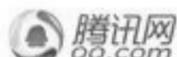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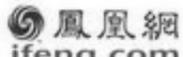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
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改变世界的人

虽然获得诺贝尔奖，会一夜之间改变这些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的生活状态，甚至命运，但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更重要的始终不是奖项本身，而是他们是如何让这个世界进步，从而变得更好的。这个社会总有人不愿趋同世俗而选择寻觅内心不变的真理，他们渴望用自己的真知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诺奖”，也是在提醒我们，该抬头看看这些人，看看这个世界新的面貌。

(@张浩莹)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传销之毒

近日，网上曝光了几起大学生因传销被骗最后丧命的事件，看了之后触目惊心，让人叹息，但总觉得传销离自己很遥远。

前几天，在小区散步时，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岳父从河北被同事骗到广西加入传销组织，他得请假带着其他亲戚去解救岳父出来。当我问他怎么被骗时，他说传销组织说投资7万元，一年后能变成百万。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碰见我，我询问他岳父情况，他说他们去了当地，报了警才把岳父解救出来。钱是别想要回来了，人能出来就不错了，还说因为面子问题，这事让我保密，别外传。

昨天，给老家打电话，亲戚告诉我表哥也去搞传销半年了。不但他自己被骗去了，连女儿女婿也被他骗去干传销，把一岁多的孩子扔给老人照顾。传销组织也说投资8万元，一年后收益100多万。表哥家里父母年迈，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平时他在家附近打零工，双亲生病住院全靠他照顾，这下他跑远地干传销，父母病了谁照顾成了大问题。更麻烦的是女儿婆家人千里迢迢跑去叫儿子儿媳回家，都不回，当初说去当地开超市公公给的钱被他们全交给了传销组织，根本没开超市。这事之后，婆家人只要碰见表哥的父母就很生气，骂他们教子无方，把自家儿子也害惨了。听电话里的情况，貌似他们进的还是新式的传销组织，和有的控制人身自由的不一样，可以和外界联系，帮助所谓的公司推销化妆品，根据推销量才返回上交的钱。

我跟母亲谈起此事，母亲说

老家另一个亲戚前几年也是被学生骗去外地干传销，后来他弟弟跑到当地找警察才把他带回家，还问我：“传销是违法的，怎么没人管啊！”对此，我无言以对。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起前几年播的一部电视剧里，一个女孩父亲为了警醒被传销组织洗脑的独生女而跳楼自杀的情节。原来以为只在电视中出现的传销桥段，如今却切切实实地发生在身边。这一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北京 宝妈

新“久病成良医”

因为患慢性肝硬化病情加重，头些日子，朋友老常的妻子需要住院进行治疗。据老常的一位在医疗行业工作的亲戚说，省城一家医院治疗这方面的疾病效果非常好，所以，老常决定听从亲戚的建议，去省城的那家医院为爱人治疗。可就在老常准备动身的时候，亲戚却又提醒他，按照我们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规定，凡在本县参保的人员，必须在当地的医疗部门住院治疗。如果病情严重，需要到上级医院或外地医疗机构就诊，必须要有当地医院的转诊证明。否则，在外地医院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当地劳动保险部门将不予报销。

因为就在不久前，老常家族中就有一位亲人同样因为肝硬化，在当地人社局所指定的这家医疗机构住院没有治好而离世。因此，对于当地人社局所指定的这家当地医院，老常和家人一直讳莫如深。老常本不想在当地医院治疗，但肝硬化患者的治疗费用不菲，为了可以享受住院报销政策，老常只

好去当地那家医疗机构开具转诊手续。可当老常将情况说给当地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员后，工作人员却以“这种疾病我们有把握治好”为由，一口回绝了老常的要求。为了尽快治疗，老常没有办法，只好让妻子在当地医院住下来。

然而，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7天后，老常爱人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还出现了肝硬化腹水和消化道出血的情况。老常几次找到相关治疗大夫提出转院的要求，但都被当地医院的大夫以“调整治疗方案”为由而婉言拒绝。正当老常一筹莫展的时候，同病房的一名在当地医院经常住院的病友给老常指出了一条“生路”。

据这位病友介绍，根据他住院期间所观察到的患者治疗情况来看，肝硬化病情像老常爱人的这种严重情况，的确应该到医疗水平更高一些的省城医院诊治。但一般来说，患者不到肝昏迷（肝硬化病情的最后阶段）的程度，当地医院是不会主动提出让病人转院的。不过，如果患者的家属私下向所在科室的相关负责人员“意思意思”，那就完全可以不必等到病情发展到那个阶段再去转院。

老常心领神会，无奈地接受了那位病友的指点。果不其然，仅仅用一张几百元的购物卡，老常当天

便顺利地拿到了转院手续。在负责医生的指导下，老常拿着转院手续，又在当地人社局盖完章，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当初准备就诊的那家省城医院。

值得欣慰的是，在省城那家医院住院不到一个星期，老常妻子的病情便很快好转。吃一餐，长一智。出院后，我去探望老常爱人时，老常庆幸中又流露出遗憾的表情，向我说出了他们在省城住院期间，另一名病友向他们推荐的“良策”。据那位病友讲，像老常爱人的这种情况，也可以直接去当地的人社局办理相关手续，而根本不必去当地医院，直接去省城医院住院治疗。当然，这里面也有“工作”要做，不过，从对病人的治疗角度上来看，这种方式更有利且便捷。

对于罹患重症的患者而言，疾病本身已经让患者及其家人心力交瘁，但相关部门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无疑让患者及其家人雪上加霜。可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久病成良医”，据老常说，住院时间久了，在和形形色色的病友交流的过程中，能“学”到不少就诊的方法和技巧。通过从病友那获得的这些信息来看，老常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应该不是个别现象。

山东临清 卢长平

更人性化的公共设施

7月底的一天上午，我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某航空公司的班机，登上舷梯时，太阳当头照，有40来度高温，人们挤拥着向上走。有的用手掌遮阳，有的拎衣袖遮阳，有的扭头快走避阳，为的是早进机舱凉快，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有伞有帽。

到日本茨城机场时，北京时间大约12点，茨城的气温本来就比上海低好多，下舷梯时，没有想到，舷梯两旁（两边）都用蓝色的塑板挡着，上方也是用塑板盖着，且一直延续到安检航班楼门口。走在这样的长廊里，给人丝丝的凉意和舒爽。

我到过茨城机场多次了，有一次在飞行中途，恰遇一男乘务员，手持表格征求我和妻子对航班服务态度满意与否的意见，我们异口同声说满意。我就趁机说：“天这么热，太阳这么厉害，舷梯的一边若能用简易的挡板挡一下，乘客登机时就不会晒到火热的太阳了，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他点点头，嗯了一声，没有答复。妻子等他走后对我说：“可能不属于他们服务的范围吧。”没想到几次飞行后，茨城

机场的舷梯做出了改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小建议起了作用，但至少在服务细节上，他们始终在完善。

8月底，日本的天气也很热，我们到伊豆旅游。到一景点，有观光塔，约有四层楼高，本来又热又累，不想登高望远了，女儿对我们说：“既然来了，就上去看看吧，机会难得。”没想到，一进塔门，就有一股凉气袭来，很是舒服，原来封闭的玻璃外墙内，安装了空调，任游客上下楼梯，都不会感觉到热和累。这使我想起，2012年炎夏，我们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登观光塔，大概也是四层楼高的样子，全在日光照射下，一览无余。登塔的人们争先恐后拥挤着上楼梯，本来很热的天气和体温，又倍增了温度。我现在才想起来，若能搞成是封闭式的，或简陋的封闭式的，安装几台大电风扇，当然能安上空调更好，那该多好呀！

在旅游景点的很多公共设施安排上，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人性化小改变、小设计，并不耗费太大成本，却既方便了前来旅行的人，又能温暖人心，这无疑也是城市印象的加分项。

江西鹰潭 李庚道



英国 | 玩具

一年一度的圣诞采购季即将到来。10月12日，英国百年老店哈姆雷斯(Hamleys)公布了今年圣诞十大热门玩具。图为一个女孩抱着十大热门玩具之一——互动式仿真泰勒玩具虎与玩偶合影。





英国 | 粉钻

(右图) 10月13日, 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展示即将拍卖的 37.3 克拉稀有粉钻, 估价 2000 万~ 3000 万美元。



印度 | 纪念

(左页上图) 10月13日, 印度金奈的当地学生用身体拼成前总统卡拉姆头像, 纪念其诞辰 86 周年。卡拉姆于 1963 年开始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从事航天技术研究工作, 被称为印度的“导弹之父”。

越南 | 泄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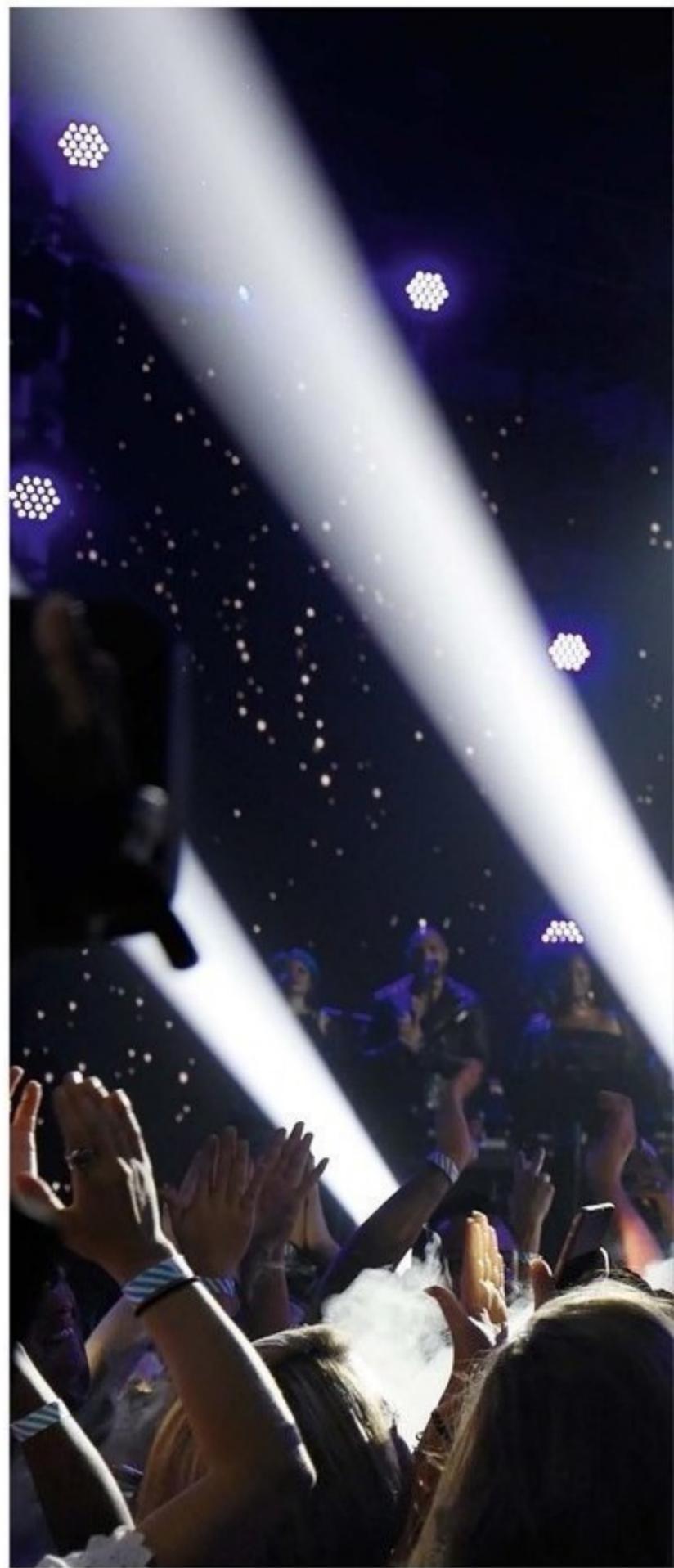
(左页下图) 10月12日, 位于越南和平省的和平(Hoa Binh)水电站开闸泄洪。据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 连续几日的热带低气压带来的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已导致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 37 人死亡, 另有 40 人失踪。

洛杉矶 | 公益演唱会

(右图) 10月14日, 歌手格温·史蒂芬妮在为飓风哈维(Harvey)、艾玛(Irma)和玛利亚(Maria)灾民募捐的公益演唱会上表演。多位明星参加了这次活动。

美国 | 水上帐篷

(下图) 美国一家户外设备公司近日推出新品漂浮帐篷, 可以圆梦水上露营。这款产品名为“浅滩帐篷”, 基座是一个充气浮筏, 顶部和侧面使用钩环设计。





石油人民币

文 / 邢海洋

随着“厉害了我的国”深入人心，乐观情绪在蔓延。而人民币的强势回归也迎合了这种情绪，下一步，作为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支付媒介，人民币是否能顺势取代美元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商品出口国，中国若每次进口石油都用人民币，海外国家购买中国货也直接付人民币，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中介费用必定降低了。问题是，这就是传说中的石油人民币吗？

石油美元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那时的经济特征是滞涨，没有增长且恶性通货，当其时，OPEC经过长期努力从七大石油公司中夺回了石油资源的主权，借着“赎罪日战争”后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的禁运，油价从10美元一桶瞬间涨到了40美元一桶，石油这个原本廉价的工业血液从此昂贵起来。而作为全球货物贸易中最为重要的商品，与之结伴当然是美元的选择，也是美元继续畅行全球的保障。

但石油美元并不是美联储可以凭借一纸命令实现的，而是海湾产油国自然而然的的选择。石油禁运前，OPEC每年的石油收入不过200余亿美元，石油危机后就飙升到了上千亿美元，巨大的石油贸易顺差才是“石油美元”产生的主要原因。时隔40年后的今天，海湾国家这笔石油获利已经高达近万亿美元。海湾国家既可以把这笔财富按欧元保存，也可以按日元储备起来，究竟如何使用，还看国际货币市场上谁的货币最受欢迎、哪种货币更保值。

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够保值增值创造财富，海湾

国家靠卖石油就发了大财，其社会结构围绕着石油建设，早不是实现工业起飞、创造就业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所谓“资源的诅咒”。海湾的钱必定回流到购买他们石油的国家，这些国家才是建立在燃料动力上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在工业化国家中具有主导地位，美元是流行于全世界的硬通货，故而这些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是生产、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双方关系并未因OPEC垄断了石油供应而起很大变化。就如同山西的煤老板一夜暴富，可他们并未在当地消费，而是把子女送到海外，在北京买房，他们因煤获得的大量资金早转化为北京地产商和海外教育机构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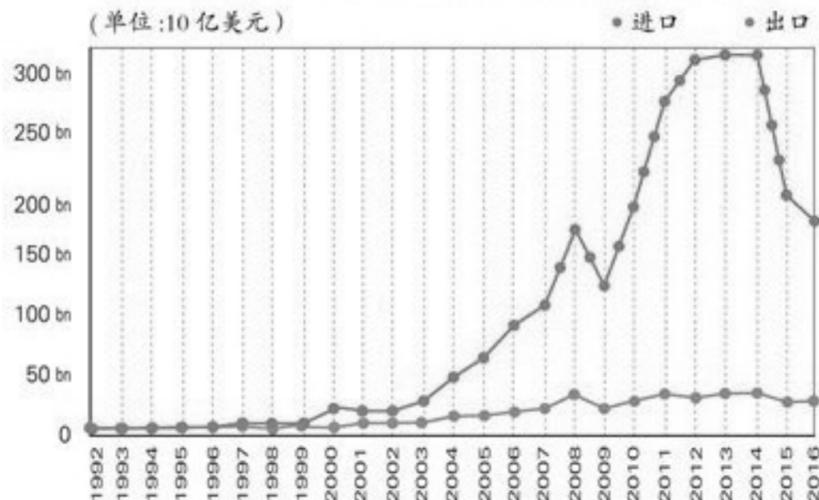
当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东亚国家先后成长为世界工厂，进口海外原材料加工制造成工业品再行销海外，石油美元的循环才真正变得复杂起来。东亚国家与美国的交易，类似赊销，美国人借银行的钱购买海外商品，形成了消费负债链条，这个消费债务链条的顶端是美联储印刷钞票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国债。中国人把商品销售到美国产生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可是生产商是无权处置自己账户上的美元的，他们需向国家结汇，从而形成了最多时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国家为了外储的保值增值，又购买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把赚来的钱借给了美国消费者。这一国际经济“铁三角”的结构中，石油美元凸显了其对美国经济的意义，如果产油国不接受美元，中国也就没必要囤积如此多的美元，美国人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变得脆弱了。

如今的产油国早没有了当年，甚至三年前当油价上百美元每桶时的威风八面，而美国除了开采页岩油和页岩气，还开始出口原油。2015年产油国石油美元18年以来第一次从金融市场流出，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从国际资本循环的角度，石油美元已经是“负能量”了。尤其是考虑到清洁能源的大方向，产油国锦衣玉食了几十年，恐怕得靠“典当”家底生活了，此时哪儿还有石油美元？

不久的将来，中俄间的石油贸易即将启用人民币或卢布结算，美元作为大宗商品交易中介的使用量势必萎缩，可人民币的国际化还要看海外留存的人民币是否能更自由地存贮、使用和兑换，还需资本账户更多自由化的努力。■

1992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出口贸易额统计图

(单位:10亿美元)



生活在碎片时代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节气



新知 WISSEN





栏目插图 | 范薇

全民教育

2010～2017财年，好未来营收从4.75亿元增加至71.71亿元，净利润从0.97亿元增加至8.04亿元。业绩支撑下，新东方股价自2015年开始持续上涨，至今涨幅为3倍多，今年以来上涨超一倍。民办学校最近两年在港股上演了集体上市潮，总数已经达到8家。所谓用户有痛点的地方，就有市场，大市场藏着大利润。据统计：10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普通小学数量下降了近17%，优质教育资源愈发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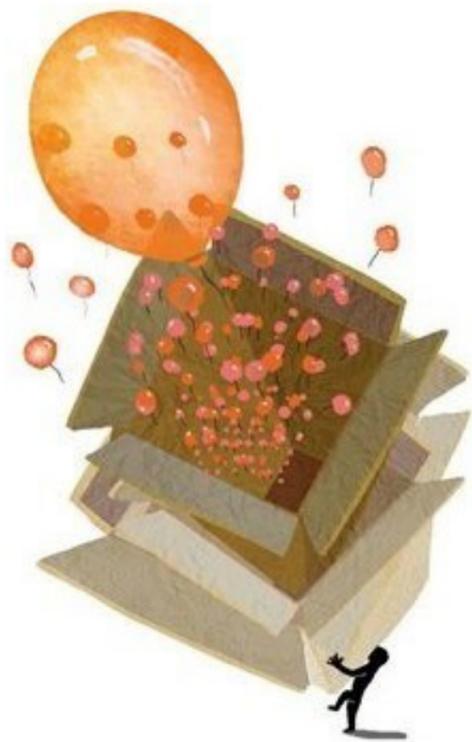
三线地价

今年来三线城市房价大涨，其背后是土地价格的涨幅远高于房价。据德意志银行统计，从2016年一季度至今，中国土地出让价格上涨88%，与此同时，中国房价增速仅约为26%。在靠近一线、二线城市的三线城市（卫星三线城市），土地价格上涨了约60%；其他三线城市，地价上涨了37%。三线城市承载了中国57.4%的城市人口，61.5%的新建房屋以及59.2%的GDP，不过人口和经济增速都在放缓。

首席财务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还是一名成功的投资顾问。自美股2009年3月的牛市开始以来，他提供建议的基金涨幅比标普500指数多了近一倍。塞勒曾表示，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可以帮助找出那些此前遭到了严重打击、但正在显示出复苏迹象的公司。信号之一是内部人士的购买活动，尤其是当首席财务官突然将持股量提高了一倍时。





快递涨价

离“双11”还有整整一个月时间，中通、韵达先后宣布涨价，快递公司憋着大赚一笔。早在9月20日，快递协会就举办了“双11”物流动员会，动员会预测，今年“双11”期间全行业的快递处理总量将达到新的量级，超过10亿件。纸箱涨价，可快递只运输纸箱。快递公司解释涨价是因为人工成本上涨。近两年，派件费一般控制在1.5元至2元/票，即使上涨也不显著。毋宁说，两家“垫底”公司利用“双11”把利润率向上提。

“上车盘”

香港人把人生第一次置业叫作“上车”。上任百日后，特首林郑月娥规划的“首次置业上车盘”终于有了眉目。其宗旨就是加大力度帮助比较有力的公屋住户循置业阶梯上移，腾出单位给有需要的市民。一个方法是大量增加为公屋人士特设的“绿表置居计划”，让绿表人士用可负担的售价购买，由租客变为业主。未来的新建公营房屋，将以更多的“绿置居”取代出租公屋。

交叉销售

一则题为《一年100亿？揭秘“携程”坑人“陷阱”》的旧文突然发酵，将携程送入舆论风暴。尽管携程为用户提供了取消购买打包产品的选择，但由于取消选择的入口颇深，多数用户在购买过程中很难察觉。一两年间，机票代理费用进入“零佣金”时代，渠道的销售返佣被取消，票务代理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OTA（线上旅行社）开始对“交叉销售”，也就是“机票+酒店+旅游”的一站式营销寄予厚望，可实际操作却未免初级。



“机器换人”

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18年，中国制造业机器人采用率将增长150%。安信证券称，2017年是我国智能制造奏响主旋律的关键一年。比较近年来创业板、中小企业板、新三板和科创板智能制造板块不难发现，智能制造板块毛利率仅低于创业板，高于其他两个板块，毛利率每年都在稳步提升。近3年，智能制造板块研发投入逐渐增加，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速。



当海水失去了咸……

随着近年来格陵兰岛冰盖加速融化，大量淡水注入到其周边海洋中，令海水的咸度持续下降。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自然·科学报告》上发出警告，这一趋势可能会对当地渔业收成和欧洲，乃至全球的未来气候产生深远影响。对过去13年中收集到的卫星数据和海水测量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研究者发现，在这期间，监测区域的海水表层咸度下降了百万分之一点五，这会影响到众多海洋生物和鱼类赖以生存的浮游藻类的生长，从而导致渔业减产。此外，对维持欧洲暖冬至关重要的湾流的走向，也会随着海水咸度变化而改变。

好消息



长寿之道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小组分析了60多万人的遗传信息及其父母寿命记录后发现，控制体重和继续学习对于延年益寿极其重要。对于超重者来说，体重每增加一公斤，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两个月。而在中学毕业后每多接受一年教育，预期寿命几乎也就会随之增加一年。



竞争之益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歌德的名言原来也适用于果蝇世界。发表于《动物行为》上的研究指出，当每一代雄性果蝇都需要花费心思、主动出击才能获得交配机会时，其110代的子孙在各种遗传性状上都要显著优越于那些一切都被安排好、永无打光棍之忧的对照组的后代。

坏消息



胖墩儿世代

谁说地球是平的？如果从地球人体型来看，明明是在变得越来越圆嘛。发表于《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余个国家的儿童体重数据后发现，从1975到2016年，全球儿童肥胖率增长了近10倍，现今6%的女孩和8%的男孩是大胖子，而40年前的数字不足1%。



奶爸的神话

别再艳羡所谓的“外国超级奶爸神话”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了52对家有幼儿的双职工父母后发现，在休息日，当妻子忙于照料孩子打理家务的时候，丈夫却平均有101分钟的时间花在放松娱乐上，而当丈夫做家务时，妻子的闲暇时间只有49分钟。

走路跟体育运动或有组织的比赛或其他需要全套难看的氨纶面料运动服等可恶的运动不同，是生活中更为高雅的追求之一，是伟大的智者和深邃的思想家都喜欢的消遣方式。狄更斯经常在午后或晚上走上 20 英里（或者说 4 万步），令人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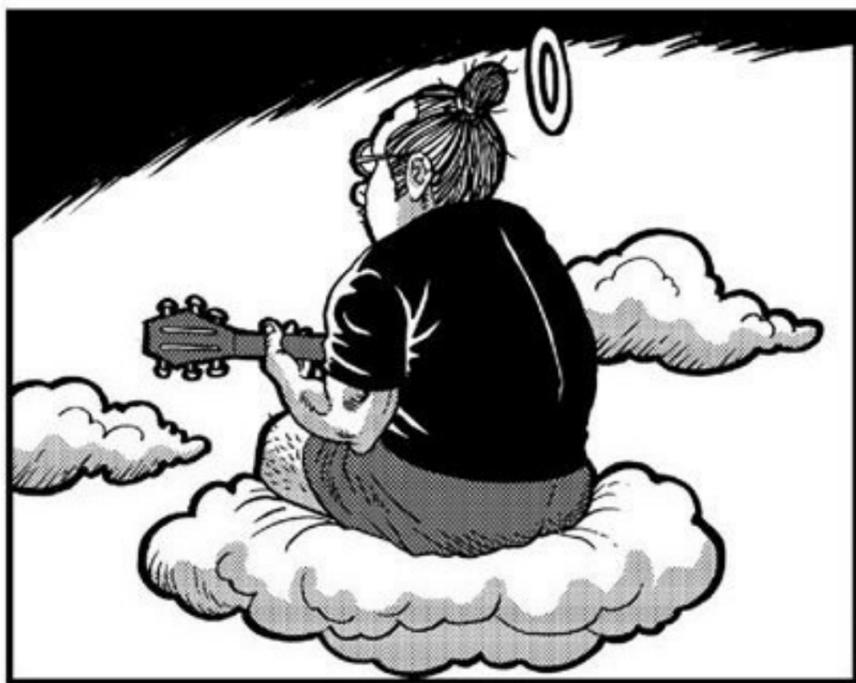
——《金融时报》时尚编辑乔·埃利森谈计步器的使用

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哈罗德·布罗姆，《经典悲歌》

福柯翻来覆去，变换语气说的无非是一回事：当心，凡事并非看见的那样，本质与表象恰好相反。他喜欢把看上去是黑的说成实质是白的，看上去是白的说成实质是黑的。他的观点并不能带给我新的信息：在摄影中，底片不管是正片还是负片，信息量是一样的。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亦近，亦远》



(山神 图)



现代主义实验就像许多架在跑道上疾驰的飞机，这些飞机逐个起飞、升空，然后很快摔了下来。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飞机根本没有坠毁，而是飞入了 21 世纪，并在数字时代全速飞行着。立体主义飞机赋予了我们把交互界面那零七八碎的外观理论化的工具，超现实主义赋予了我们把神游和白日梦总结起来的理论框架，抽象表现主义飞机又为我们拥有的无处不在又一团乱麻的网络提供了隐喻。

——美国艺术家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
数字

5.18
米

《纽约时报》说，自 1890 年以来，世界第一高楼的高度平均每年增加约 5.18 米。从统计学角度而言，这意味着 1 英里（约 1609 米）高的大楼将于 22 世纪中叶建成。世界十大最高建筑中有九座位于亚洲。

4.5
%

根据美国出版商协会的数据，美国的电子书销售去年下降了 17%，印刷书籍销售收入则增长了 4.5%。美国的消费图书行业正在稳步增长，2013 到 2016 年间营收增长了约 5%。

1.93
万吨

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旗下数家工厂多年篡改部分钢、铝和铜制品的出厂数据，冒充达标产品出售。这些产品随后被用于汽车、火车、飞机的制造，受到其产品问题影响的公司数量达到 500 家。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神户制钢供应给客户的涉嫌造假的产品包括约 1.93 万吨铝制品、约 2200 吨铜制品。

延误

文 / 波斯湾最南面

图 / 谢驭飞



出差狗的乘机定律里有一条“躲得过超售，躲不过延误”。以我的切身体验来说，延误在半小时内叫幸运，一小时内是正常，两小时则是忍忍，四小时？延误险的羊毛薅到了。所以每次坐某航京沪早班机，落地后收到“飞常准”那句“您乘坐的航班比原定时间提前13分钟……”我甚至会心生忐忑：这航班是提前了，会不会客户那边变卦了？毕竟能量守恒嘛。

我都差不多忘记在没有飞常准、航旅纵横这一类APP之前，我是怎么知道自己搭乘的班会延误的，但是，毫无疑问，从飞机延误这事学到的第一个重要词语是“待定”。在登机口看到一块公告板，歪歪扭扭地用油性笔写着“某某航班因某某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中文博大精深，这“待定”二字叫人丧气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次临时出差去厦门，那天北京下雨，T2航站楼里到处是人，坐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脸上都挂着一模一样的神情：“待定。”我的航班从下午3点待定，而后到晚上7点，最后夜里10点多飞，到达厦门的酒店已是凌晨1点。据说这还算是额头亮的，我的一位同事某次上海飞北京，待定了半天，后来航班被取消，那会儿已是夜里11点，就是想转高铁也已经没有了。

飞机延误最常见的原因是天气。去年夏天我带孩子去哈尔滨避暑，那天北京蓝天白云没有雾霾，哈尔滨负责接机的朋友发微信说：“这边天气特别棒，你们日子选对了。”可是我们从早晨6点出发，下午4点20分才到哈尔滨太平机场，中间经历了飞机推出，又滑回，有乘客要下机，空姐发餐食，滑出，加油，等待，又有乘客要下机等等。据说那天整个东三省都被波及，而这一切是一只叫“航路天气原因”的怪兽造成的。另外一只常见的延误怪兽叫流量控制。碰到天气怪兽，你无可奈何，不能打只有躲；碰到流量控制，据说是可以打的。打得好了，你的航班就可以排队靠前甚至插队。但甲之利器，乙之煞气。我常去的一个论坛有人发过一个哀怨的帖子，他很有先见之明地买好了延误险，也被明确告知预计会延误四个小时，妥妥地坐等延误福利，结果他的邻座是一位要客，叫秘书长打了个电话，于是航班延误一个多小时就飞了。他说一点都不开心！

有时延误其实是为了更安全地飞行，比如机械故障这个原因。现代航空业的技术发展，使得飞机相对其他交通工具而言更安全；但飞机要么不出事，一出事就是触目惊心的惨烈。所以每次看到机械故障，我比较心平气和，因为“安全抵达比永远无法抵达要好”。

我的偶像

文 / 中读用户 @ 鸭子

图 / 谢馥飞



有的令人喜，有的让人震惊，有的温暖是支撑物，有的只能用来仰慕……这是小B总结自己的偶像时分的类。他们各个不同，又全部归一。

吴吞、野孩子、万晓利、李志、胡德夫、小河、老周、张慧生、郭初阳、魏德圣、宫崎骏、村上、河合隼雄、张老六、朱赢椿、原研哉、1900、久石让、先锋书店、798、麻雀瓦舍、城市之光、新青年书店、越读馆、隔壁酒店、城门口……

手风琴一定是张玮玮的，鼓点就是郭龙的好，口琴差不多就是万晓利，苹果电脑只能属于变幻多端的小河，黑色眼镜的左小，穿着运动裤的吴吞，长发又温和的朱赢椿，粗老嗓音的胡德夫，先锋书店的十字架，垃圾站旁边的城市之光，偏僻的麻雀瓦舍……

大学四年小B感到狂躁焦虑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平庸？害怕平庸就是害怕自己将来一无是处，害怕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活过的痕迹。为了避免平庸，小B使劲地谈恋爱、跳舞、通宵、逃课、游走、看书……直到小B在路上一一遇到这些人。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小B，本来小B的生活与工作两点一线，他们渗透进来后，带来了异次元的空间。好像种子在地里深埋着，它不仅自己酝酿、成长，还改变了土壤。

这些偶像们都是些没长大的男孩儿，带着好奇的眼光在这个世界四处乱逛、乱闯，带着非做

点坏事不可的冲动，带着就是不要被框住的野气，带着就是不要按常理出牌的意愿。他们又细腻又充沛，又激荡又安静，把他们看到、听到、感受到的融合到他们的骨子里，用鲜血喷涌的方式开放着他们的生命。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凯鲁亚克的这句话被不同的人唱、演绎、书写、吟咏、延伸……他们拒绝被固化，不要长成像大人一样的石头；他们不断翻滚，拒绝标签。这是小B被偶像吸引的原因，骨子里小B希望自己也是永远长不大的男孩，是眼神清澈的少年。

“活法林林总总，死法种种样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剩下来的唯独沙漠，真正活着的只有沙漠。”村上书里的这句话曾让小B深感平凡人等之无奈、不甘，但现在小B对这句话有了新的注解：沙漠之下有甘泉。以有限接近无限，小B的偶像们提供了这种可能。

“一切谷类的本质意味着麦子，一切宝藏的本质意味着黄金，所有时代的人们意味着人类。”中世纪的圣贤麦斯特·埃克哈特说的这句话可以作为小B新的出发点和归宿，活着的目的不是吃喝，而是成为人类。偶像的存在源于他们的精神，那种精神成为甘泉。

想到这里，小B继续走上了搜集偶像的道路，无限接近他们，秉承他们，成为一个人，以一滴水的姿态汇入人类。■

腰之妖

文 / 莫幼群

图 / 谢驭飞



猪肝、猪腰、猪肚、猪大肠，这猪家“四小生”各有各的风流，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肌理和韵味。大体上说来，猪肝、猪腰的好处在于“嫩”，但肌理上又有较大的区别：嚼猪肝如嚼柔软的金沙，嚼猪腰如嚼细腻的银冻；猪肚、猪大肠的好处在于“韧”，但肌理上同样有所差别：嚼猪肚如嚼肥厚的棉石，嚼大肠如嚼致密的织锦……“四小生”曼妙地在你的舌尖跳舞，谁跳伦巴谁跳华尔兹，绝不会弄混。

细究起来，在“猪家四小生”中，腰子是最精神的一个，或者说最性灵的一个，性灵到了甚至有些女性化的地步。你瞧，猪肚和大肠都软塌塌地摊在那里，是烂醉如泥般的酣卧；猪肝稍好，但也是散漫得失了形，是午后慵懒的小睡；唯有腰子，总是很抖擞又很矜持地坐在那里，保持着自己的那个形。

要说这腰形，也的确是大自然的杰作。例如腰果、腰芒之类，不仅外形好看，有着曲线美，而且好吃，味道独特。反正我是认为吃腰果较之于吃花生米，多了一重视觉享受，而凉凉的腰芒握在手里，也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爱买下水的人都知道，腰子是最紧俏的，得赶早，去迟了可就没有了。我好几次路过肉摊，只见大把的猪肝还躺在那里，而腰子已乘黄鹤去。有一回，实在想吃，便问摊主，摊主拎起一挂肥肉，只见一片白花花油腻腻深处，还藏着一只玲珑的

腰子，摊主说太忙，还来不及“下”，但若早下，也就早给人抢走了。言下之意，是大大便宜我了。

我则自认为是人品爆发，算是不枉费我常年爱“腰”之一片苦心。赶紧买下，顺便再买了一根大葱。大葱和腰花乃是绝配，似乎非得高挺憨厚的山东大汉，才能衬托乃至激发出绝世妖姬的美，并且稍稍抑制一下后者的风骚之气。

还有一种吃法，更加简单。就是烧一锅排骨汤，再将两三只腰子扔进去煮熟。捞出来单吃，则可享受到腰子最本真的原味，以及最独一无二的肌理。当然，火候不太容易把握，有时太嫩，有时又太老，可见烹饪之事实在复杂。老子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可不是把治国往简单里说，而是往复杂里说啊。

据说腰子能补肾，这其实没有太多科学依据，主要还是源于国人象形般的思维模式。还听说有“一小撮人”原本就长了三个甚至四个肾脏，比平常人要多一至两个，而这些人精力特别旺盛，因为他们比常人多了一至两台发动机。不知此说又有多少科学依据。

30多年前，日本围棋界有“二枚腰”之说，是形容旅日台湾选手林海峰的。原因是他对弈时特别顽强，特别坚毅，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常常上演在困境中逆转的好戏。“二枚腰”乃相扑术语，意谓有两腰，永远不会被摔倒。

当然，此腰非彼腰。但林棋手这样的人，等于有了四个精神上的肾脏，也算是人中之妖了。■

酒鬼的深情

文 / 寇研
图 / 谢馥飞



酒鬼作家蛮多的，这个名单可以列老长。但貌似没有哪个作家比得上雷蒙德·钱德勒，既自己嗜酒嗜得要命，又异常热衷在小说里写酒。钱德勒的所有故事，平均每两页，准会出现喝酒的场景。说“场景”还不对，像是故意设计的情节，钱德勒笔下的酒，绝非道具，就跟他的人物必须说话、睡觉一样，他们也必须喝酒。

所有的人，在干着自己该干的事情以推动故事发展，如杀人、隐藏罪行、打架、赌博、混黑社会等等的同时，都在干另一件事，喝酒。酒吧吧台一大早就有醉眼迷离的酒客，布满灰尘的房间里的怨妇长年以酒浇愁，被杀的倒霉蛋死时地毯上会有好几只空酒瓶，这些自不待说，警察局的警长在办公时间，时不时会把酒瓶从抽屉里拖出来，偷偷灌一口。侦探菲利普·马洛呢，从他出场到小说结束，往往酒不离身，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总有一瓶威士忌，走到哪喝到哪，包括开车办案、跟踪。若你要提出酒驾的问题，我觉得钱德勒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

因为钱德勒对“有事没事来两口”的嗜好，酒在他笔下也获得了种种神奇的疗效，包治百病和各种情绪。高兴来两口，不爽来两口，热了来两口，冷了来两口，困了来两口，饿了来两口，胃疼来两口，想清醒一下，那就在咖啡里兑点威士忌，休克了，那就灌两口，保证立即就活蹦乱跳了……

但酒鬼的行径不仅仅只有可笑，也有一种

别样的深情，那是和清醒的世界决然不同的。钱德勒也将这种酒后的迷离、悲悯甚至温柔赋予他笔下的人物。只是这种深情，更多时候是包裹在一种拽兮兮的、西部硬汉式的满不在乎中，就像杀了人，故意吹一吹枪管以显示自己的超然，似乎那是男人世界的规则，流露内心情感，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其中的著名代表便是村上春树自称“四十多年间，我一有机会就会拿起这本书，重新读一读”的《漫长的告别》了。

一个只有几面之缘的酒鬼，在一起喝过一些酒，他身上的某些特质打动了菲利普·马洛，危机时刻的求助，马洛揽下来了，尽管为此进了看守所，挨过打，私家侦探的执照也差点被吊销；酒鬼朋友死了，马洛冒着报界大佬、黑社会、警察厅等几乎是整个世界的威胁，为他昭雪。萍水相逢，然后一诺千金。但钱德勒在小说里树立了一个典范：怎么吊儿郎当地讲一个格外深情的故事。

也许，酒鬼钱德勒唯一没有刻意掩饰自己深情的一次，是年长他十八岁的妻子的离世，他写道：“三十年又十个月零两天的日子里，她是我人生的光明，是我全部的野心。我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不过是温暖她双手的那把火。除此以外，我别无其他要说的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抱枕机器人

日本公司 Yukai Engineering 推出的 Qoobo，看起来是个点缀一条毛尾巴的椭圆形抱枕，当用户像对待猫那样抚摸和拍打 Qoobo 的时候，它的尾巴就会做出相应的摇摆。即便把 Qoobo 放在一边，它仍会随机摆动和卷曲尾巴。虽然它看起来像只猫，不过尾巴的运动程序是综合了猫和狗的表现而设置的。



准备好应急包

美国设计师 Archie Archambault 根据 FEMA（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给出的 72 小时应急包内容建议，开发了这款名为 OkieDokie 的应急包。简约统一的设计风格确保人们即便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也能迅速找到应急物资。

智能救生圈

O-Drone 是一款可以遥控巡航到溺水者身边的智能救生圈，在不工作时可以散落在海边。其水中行驶速度犹如游艇一般，一旦溺水者触碰到 O-Drone，就会自动打开压缩气体罐给救生圈充气，使其迅速变成一个常规救生圈。





树形灯

三位设计师把从烧毁的热带雨林中获取的木炭制成树形灯泡的一部分，它同时是一个美丽而苦涩的警示，为了提醒人们每年有 7800 万英亩（约 29.5 平方千米）的热带雨林被摧毁。

山水画加湿器

MONG MONT 是一款山水画框加湿器，将传统电器和壁画结合，给空间环境增加美感。加湿器的水箱置于画框内山景背后，通过特殊材质挥发水分从而增加环境湿度，同时画框底部有数字显示当前湿度。



凹形表盘设计

荣汉斯 FORM 腕表的凹形表盘搭配压花浮凸的方形分针增添了读时的三维立体视觉效果。皮质表带边缘与小时数字时标构成鲜明对比，又与分钟数字时标颜色呼应，后凸表壳衬托出平滑的表面设计，提升了佩戴的舒适度。

儿童牙刷

配色明亮的智能牙刷 Benjamin Brush 看起来就像是积木玩具，内置的扬声器会在刷牙时播放一首两分钟的曲目，旨在通过给刷牙加入仪式感和游戏感，让小朋友不再抗拒。它同时提供更适合婴幼儿的圆形刷头及普通的矩形刷头，让小朋友在长大后也能使用。





多用途灯

Marset 品牌“圣托里尼”多用途灯灵感来自渔船灯，玻璃灯罩和聚碳酸酯灯头结构可以按任意顺序和方向排列，形成不同外观以及吊灯、壁灯或落地灯等不同用途。

玛瑙戒指

意大利 Pomellato 珠宝品牌的 Ritratto 系列玛瑙戒指，纵向切割的玛瑙戒面从绿色渐变成白色，形成色彩朦胧的薄雾效果。



先爱自己

Coach 与演员、歌手赛琳娜·戈麦斯 (Selena Grace) 合作设计的限量版 Grace 手袋混合彩色小牛皮和麂皮绒，黑色真皮挂饰上还刻有戈麦斯手写的一句话“先爱自己”。





哥白尼天体球

江诗丹顿艺术大师系列哥白尼天体球 2460 RT 腕表，表盘上根据蓝伯特圆锥投影法绘制了北半球视角的大陆地图，中央饰有手工雕刻的粉红金太阳脸。

调色板

西班牙家居品牌 &Tradition 的“调色板”桌是受亚历山大·卡尔德的动力雕塑启发，每张桌子以不同的高度平衡着不同的形状及材质，构成均衡统一的整体。



蓝边甜品盘

葡萄牙著名瓷器公司 Vista Alegre 新系列 Folkifunki 中的甜品盘，蓝边围绕的瓷盘中间绘制着受葡萄牙民间文化启发的图案，上面还点缀了黄金装饰。

鲨鱼椅

Kristalia 品牌的“鲨鱼”椅以聚氨酯椅面结合实心榉木或欧洲橡木椅腿，它的名称来自椅子后部的“翅片”，也就是椅座和支架之间的连接部分。



如何面对癌症

中国病人跨境就医调查





一位母亲陪着患病的儿子在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住院

文 / 吴琪

癌症是一件沉重的铅衣，披到谁的身上，他的人生就会骤然出现一个休止符。只是多数健康人，听不到来自疾病王国沉重的呐喊。

即使病人同意接受采访，真与他们面对面时，我收起了一个记者穷追不舍提问题的架势，至少先安静地陪他们一起等待诊疗，尽量避免一个健康人带给病人的压力吧。9月中旬，波士顿秋意渐浓，千里迢迢从中国赶来治病的癌症患者，谁没有一个迫不得已又惊心动魄的疾病故事呢？他们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公寓里，平均2~3周到医院一次，接受治疗或是与主治医生见面沟通。

波士顿的长木医学区（Longwood Medical Area）高楼林立，这里汇集着世界顶级的医疗机构、医学院和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癌症专科医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加斯林糖尿病中心、哈佛医学院、哈佛牙科学院等等。

每天清晨或深夜，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公共交通已经搭载着往来于长木区的医护人员或医学院实习生。医学行业是个苦差，在波士顿凌晨的大巴上，那些穿着浅蓝色、浅紫色工作服，困意明显的年轻人，就是个生动的写照。

除了治疗美国病人，这里也是世界级重病或疑难杂症患者的聚集地。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实际上属于同一家医院，癌症研究所专攻癌症，但是癌症病人的不少治疗在布列根和妇女医院进行。

医院国际部的主任凯琳·霍华德告诉我，由于世界各地的病人增多，他们在2000年设立了国际部。2016年，医院接待了来自120个国家的3200多名国际病人，人们来这里看神经疾病、糖尿病，接受心脏手术、眼科手术……其中有将近800名国际病人前来治疗癌症。从医院的角度来看，大病治疗早已是消费全球化的一个例证。

国际病人的需求持续上涨，医院目前正在扩建，霍华德说他们唯一的担忧，是市中心的土地太少，扩建后也满足不了病人需求。中东病人在过去20多年里，是波士顿地区人数最多的国际病人，他们基本来自富裕的石油国家。如今中国病人的群体仅次于他们，并有超越之势。多数中国病人来到这里，是寻求癌症的治疗。

医院的建筑规模庞大，进入大楼内部后，人们总会感觉穿梭在一个巨大的层层叠叠的迷宫里。这或许正像癌症对于个体的寓意——一场一眼望不到头的战役。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步踏出去，将会导向怎样的下一步。癌症王国层层叠叠的铺设，对于每一个病人来说，都需要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耐心，为自己画一幅尽量精确的

疾病地图，一步一步带领自己去收复被癌细胞占领的身体失地。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敦，坐落着过去16年中有13年排名全美第一的癌症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这座从1941年开始建立的癌症中心规模庞大，它和周边其他得州顶级的医院构成了著名的医疗城。MD安德森癌症中心有着2.1万多名员工，这些员工说着90种语言。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标志，是在“cancer”这个黑色单词上面画了一根鲜艳的红线，表示要将癌症彻底消灭的决心。国际病人中心的负责人玛莎·科尔曼向我提到，去年他们接待的3000多名国际病人中，有400多位中国癌症病人。从2015年开始，中国病人占到医院国际病人的第一位。我在休斯敦采访期间，一些中国病人正在谈论着，既然中国病人数量越来越多，可不可以拧成一股绳，在治疗费用上跟医院谈一个不错的折扣？

中国人出国看病的背后，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寿命增长，我们迎来了癌症高发期的现实。2017年全国癌症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368.2万例，死亡病例222.9万例。其中，肺癌、胃癌、肝癌、结肠直肠癌等，在新发癌症病例和死亡病例里，都是主要类型的癌症。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被卷入到痛苦茫然的抗癌战争里。

在人类历史的阴影里，癌症作为一种致命的疾病，至少在暗夜里蹲守了2000多年。美国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形容癌症——众病之王、恐怖之君。人类接连战胜了中世纪的瘟疫、19世纪的肺结核，待到20世纪中期，伴随着人均寿命的显著提高，癌症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瘟疫”。

它源于人体内某一单个细胞的生长失控，这种增长由突变引发，“煽动了”无限制的细胞生长。癌症不是某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疾病的集合。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癌症”，正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基本特征——细胞的异常增长。

100多年来医学高速进展，但癌症依然是对人类乐观情绪的深重打击。直到最近十几年，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研发出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等，人类对抗癌症的武器库里，有了外科手术、放疗、化疗之外的强力武器系统。

每一次癌症新药、新疗法的突破，都让一部分被死神逼到墙角的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自己能抽中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张“彩票”。也只有这样的时刻，一个

病人会深切地意识到：作为个体的命运，与他所处时代医学的前沿发展，原来联系得如此紧密。癌症的暗箱里，领军的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们，一次次顽强地试图推开大门，让光芒从缝隙里照进去。疾病不分国界，对抗癌症的每一点进步，都将是我们的福音。

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顶级的医疗资源，一度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想过的事情。2011年，商人蔡强偶遇一个去澳大利亚做脑瘤手术的上海人，他从中看到了中国人跨境医疗的需求。蔡强与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医疗服务机构，第一年却只有两个客户。一年多后，合伙人黯然退场，“我们不幸找了一个13亿中国人都没有需求的行业”。蔡强学物理出身，他觉得只要存在一个高电位、一个低电位，两个电位之间就会产生电流。“发达国家的医疗是不是比我们领先？这是关键！只要领先，就一定有需求。中国人可以出国旅游、出国留学，遇到癌症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考虑出国看病呢？”

出国看病的需求，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迅速增长。如今蔡强和他的团队，一年为上千名中国病人服务，其中70%以上的病人是癌症患者。早几年选择这条道路的中国病人，基本上都是癌症晚期，已经被中国的医生“判了死刑”。最近两年，癌症病人的情况更加多元，有些病人处在癌症早期或中期，也有了出国治疗的打算。

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癌症也是美国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疾病重负，人们并不愿意过多谈起。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先驱人物的一再推进下，癌症才在美国成为一个显著的公众话题。疾病不只是一种个人命运，它有深刻的社会性。美国人开始质问：我们能动用这么多资源将人类送上月球，为什么不可以集中力量来攻克癌症？

有着献身精神的医学研究者，政治活动家，那些催人泪下的癌症病人的痛楚、家人的无望经历，这些加在一起，掀起了席卷全美对抗癌症的潮流。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终才促使美国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癌症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癌症研究中心，用各种形式保证大量癌症研究经费的投入以及改革医学院培养肿瘤医生的方式等。癌症并不是患者个人痛苦的呼喊，它是整个社会动用资源发动的战斗。

癌症的难以对付，在于它是一种系统性疾病。美国对癌症发起立体战斗，正是从医疗技术层面到公共卫生制度层面，系统性地对抗癌症。

系统性地对抗癌症，可以明显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肺癌为例，“你知道吗？今天全世界的吸烟

者里边，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著名的癌症专家查尔斯·鲍尔奇告诉我。今天的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都上升到了癌症的第一位。我国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显示，中国肺癌死亡率在过去30年间上升了465%，而肺癌在美国过去25年的发病率降低了25%。这与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直接相关，再加上最近十来年，新药新方法相继问世。美国2015年把肺癌的早期筛查纳入了医保，随着早期筛查的普及，肺癌的死亡率还将进一步显著降低。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月28日签署总统备忘录，设立以副总统拜登为首的“白宫抗癌登月计划特别小组”，呼吁通过全国性计划永久治愈癌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2016年拿出1.95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2017财年白宫要求国会批准为此投入7.55亿美元。人类登月是一项历经困难、长期坚持的重大项目，对抗癌症的努力亦是如此。癌症一旦攻克，将毫无疑问改写人类的历史。

就在不久前的10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癌症治疗专项重点攻关”。他说道，我们已经在“上天”“下海”等重大项目取得不俗进展，还要进一步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攻克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难题。“一些发达国家早在数十年前就提出要破解癌症发病机理，‘攻克癌症’，如今已经见到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而我国目前的癌症治疗水平还与这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从现在起，我们要迎难而上。”这背后对应的，正是我国目前癌症发病率235/10万，死亡率为144.3/10万的严峻现实。“癌症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到美国治疗癌症的中国人，因为各自病情的不同，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少数人因为在生命末期进入了免疫疗法的试验组，体内所有癌细胞神奇消失；有些人找到了新药或者获得了新的治疗方案，癌症进展控制得不错，从而进入了一场持久战；也有病人在美国的治疗并不理想，无药可医后黯然回国，还有病人客死他乡。蔡强说，根据他们公司的统计，到美国治疗癌症的病人，受益于新药的患者只占到17%。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受益于新的治疗方案，它是美国多学科会诊制度带给病人的好处。

这些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中国早期留学西洋的人，打开了一扇寻求世界顶级医疗资源的窗。这里边既有患者个人战胜疾病的渴求，也有他们在疾病王国里，感受另一种制度和文化如何面对重病与死亡的努力。■



家人朋友的陪伴，对癌症病人至关重要

赴美治癌，疾病之下重构身份意义

文 / 吴琪

疾病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它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性。当中国癌症病人到美国求医问药，他们看到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如何面对癌症与死亡，如何在挽救生命的同时，重构病人的身份意义。

“为什么偏偏是我？”“我能做什么？”

“为什么是我？”

这几乎是每一个被确诊患癌的人，首先会提出的问题。当一个人被重病从日常生活抽离出来之后，疑惑往往占据头脑：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它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发生？在这些疑问得不到解答的时候，惶惑会一次次将人拉入深渊。

肖春丽坐在黑色轮椅里，瘦小的体态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乳腺癌夺走了她的头发、一侧乳房、体重和行走能力。58岁的她戴着黑色的鸭舌帽，面部因为脂肪的流失变得干瘪，反而衬得眼神特别明亮。重病之下，人似乎能穿透日常生活层层叠叠的琐碎，看到真正与命运紧紧咬合在一起的东西。她对自己所患的疾病，有一种自我探知的本能。如果说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她希望在倒下之前能弄清楚：敌人是谁？

9月中旬，美国波士顿的天气凉了起来，肖春丽的丈夫老廖执意让她换了件厚一些的外套，他用轮椅推着肖春丽，从租来的公寓出发，10分钟就走到了著名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

波士顿医疗区的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各栋大楼由廊桥连接着，仿佛一个复杂的分子结构。看得出医院尽力为病人和家属营造出轻松的气氛，比起传统医院，它更像一个现代化的商务大楼。大厅里，志愿者穿着正装，优雅地弹着钢琴或竖琴。走廊的墙壁上画着大幅颜色极为艳丽的昆虫与鸟儿。穿着淡蓝色或淡紫色、白色工作服的医护人员忙碌而有序地穿梭，几个大型快餐厅永远热闹，为不同用餐时间的人们提供着服务。

“我在老家医院治病的时候，医生觉得我是个‘刺头’，我是那种特别喜欢问‘为什么’的病人。问得多，医生很烦，说我服从性不好。”肖春丽曾是一家公司的财务主管，做事情条理清晰，遇到不懂的事情喜欢探知。她对自己的身体一向关注，2005年乳腺癌第一次找上身的时候，由于癌症没有发生转移，外科医生切除了肖春丽的一侧乳房。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她与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从医学上来说，如果癌症病人治疗后，5年内身体里不再有癌细胞，就叫临床治愈了。

这10年里，肖春丽是一个时常感谢命运的乳腺癌幸存者。当2014年癌症复发时，一家人再次被命运狠狠地打了一闷棍。早已驱赶走的恶魔，这次发起了更加凶猛的进攻。肖春丽在惶恐中查询着网上流行的各种说法，越看心里越乱。

疾病带来的问题，既是病人的个人处境，又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承

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癌症作为人类的苦难经验，它实际上向病人和相关的社会群体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偏偏是我？”这是一个关于挫折和困惑的问题。

“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如何处理和控制的问题。

但是在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上，肖春丽都感到很无助。她被心爱的家人围绕，她有医生可以联系，可惜这些都不能完全解答她的疑惑。自我意识体现的顽强活力与她那日益虚弱的身体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肖春丽既被癌症带来的生理变化折磨，也被疾病给她带来的身份问题而痛苦：作为一个完全与正常生活隔断联系的病人，她如何构建自己新的身份？她在健康王国里形成的求真求知的精神，为何在疾病王国里完全行不通？

2014年夏天，肖春丽住进了医院，准备开始新一轮放疗化疗。但是在治疗开始的头一天夜里，她被十年前放化疗的痛苦记忆吓住了。一向理智的她，做出了别人看来极不理智的决定——连夜逃离医院。接着她寻求了一年的中医治疗，疾病没有得到控制。当肖春丽不得不再次接受放化疗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脑部，然后又毫不留情地转移到了肝和肺。

肖春丽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一次急救中，救护车上的抢救人员慌乱中弄折了她的左腿。医生让她不要动，说免得引起癌症的进一步扩散。她不得不卧床，有时候还需要在床上大小便。对于一个习惯了健康并且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来说，她对此深感羞辱。

虽然身体日渐虚弱，她仍然是那个眼神明亮的人，去看医生前，会在纸上写一串问题提纲。医生从来没有好好解释过。肖春丽有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我在接受治疗的同时，癌细胞却在接二连三地转移？如果这种药物不起作用，你们能否会诊一下，看看还有什么药物呢？

面对疑问，肖春丽的主治医生轻描淡写反问了一句：“都病了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们对转移没有心理准备吗？”

这一句看似没什么错的话，却深深激怒了肖春丽与丈夫老廖。他们已经与这位医生认识了十来年，2005年肖春丽手术后的放化疗，就是在这位医生手上做的。



(马烈摄)



1



(菲源摄)



(马烈摄)

3

4

当我在波士顿与肖春丽见面的时候，她回忆起几个月前医生的这句话，仍然难以释怀：“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疾病进展了，难道是我们的错吗？我就该治不好了吗？”在另一个层面上，她和丈夫也被这句话隐藏的另一层含义吓住了：医生放弃了治疗她的信心。或者说，他很早前就认为，肖春丽是救不了的。

那种等死的感觉带给她的是愤怒。疾病自己组建了一个王国，癌症是其中庞大的部门，它跨越人类的种族和国度，将越来越多的人吸纳在无边的黑

箱里。美国医生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里，写一个33岁的美国作家，在患癌的最后阶段，他躺在床上对来探望的社区医生描述说：“愤怒、震惊、难以置信、悲伤——它们是每天的一部分，而且没有特定的次序。有某种‘非我’在我体内，一个‘它’正在噬啃全身。我被一个杀手侵入，我正在死亡。”

病床上的肖春丽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她不甘心就这样等死。她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种行医者：愿意进入患者的生活世界，倾听他们的苦痛，帮助



(崔晓宇)

2



(崔晓宇)

5

他们弄清楚痛苦的意义，协助他们应对疾病的重担。

正巧在这时，当地医院里一位在美国进修过的医生私下问老廖：“如果你家经济能力还不错的话，要不去美国试试？”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本来人们看病，遵循的是就近原则。大病临头、身体虚弱得起不了床的人，反而要去千里迢迢之外的国度治病，听起来似乎不合常理。对一个家庭来

说，这显然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决定。全家人既对异域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担忧，也对治疗费用和治疗效果心里没底。这家人得具备最基本的条件：能承担治疗费用，能有家人长期的陪伴。这意味着全家资源向病人的进一步倾斜。在做出艰难的决定之际，家人或病人往往还有一层难以说出口的犹豫：怕病情恶化，病人死在了异国他乡。这对遵从“落叶归根”的中国人来说，将是又一重的打击。

2017年的夏天，肖春丽和老廖在权衡过后，来到了陌生的美国。接受我的采访时，两人已经在波士顿待了两个多月。在等待和医生见面的半个小时内，老廖细碎地唠叨着肖春丽每天的饮食和运动情况：“昨天除了饭菜，她还吃了半个水果，喝了一瓶酸奶。她拄着拐杖在房间里走了十来分钟，我拍了个小视频发到家人群里，家人可高兴了。”他像细心养育婴儿的父亲一样，健康成年人最为普通的能力，对肖春丽来说都是很奢侈的事情。

待到肖春丽见医生，我才明白了老廖细碎唠叨的意义。虽然美国医院的氛围轻松有序，但是对于每三周见一次医生的癌症病人来说，这是他们又一次面对重要消息的时刻。两人心里都紧张，老廖的唠叨是在缓解这种即将面对的压力。

病人和家属首先被护士领进一个单独的小房间，等待着医生进来讲病情。72岁的保罗高挑挺拔，一头白发，黑框眼镜。他今天穿着黄绿色上压着灰色暗格的整套西装，扎着一个粉蓝色的领结，在习惯穿着深色套装的医生群体中，这种打扮显得活力十足。

从保罗推开门的一刹那开始，肖春丽的眼睛就牢牢盯住了他的脸庞。她悄悄琢磨着保罗的表情，由此来猜测：他是要给我宣布一个坏消息，还是一个好消息呢？

保罗礼貌地和房间里每个人一一问候，除了他熟悉的肖春丽两口子外，房间里出现任何新面孔，他都需要仔细问清楚。因为在美国，病情是病人的隐私，医生需要确定每一个进到房间里听病情的人，都得到了病人的许可。

保罗打开电脑，一边看着肖春丽昨天所做的各项检查的结果，一边让一旁的翻译问肖春丽：“你最近的感受怎样？哪里疼痛吗？有不舒适的感觉吗？”他要宣布的是一个好消息：肖春丽这次肿瘤标志物的指数是249，比3周前检查的330要低，比起她两个月前刚来时500多的数值，更是下降了一半。“这是

1. 外科教授查尔斯·鲍尔奇，美国癌症治疗“多学科会诊”的推动人

2.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国际团队，每年为几千名国际病人服务

3. 位于美国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建筑群庞大，这里有21000多名员工为病人服务

4.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内部为病人提供的休闲区

5. MD安德森癌症中心也经营酒店，为外地病人服务

最重要的指标，说明你正在用的药物起了作用。”肖春丽昨天的验血结果不错，CT的检查结果也显示肿瘤稳定地在缩小。她的体重甚至增长了1斤，晚期癌症病人能够不掉体重，就是个好消息。老廖高兴地掏出手机，把肖春丽学习走路的小视频给保罗看。

肖春丽已经不在纸上写问题提纲了，因为她关于自己疾病的一大堆困惑，在第一次和保罗见面的时候，就得到了耐心的解答。那一次保罗用了一个半小时与她交流。根据肖春丽的病情，保罗组了一个包括神经内科、疼痛科、放射科和肿瘤外科医生一起的团队，来综合研究诊疗方案。所以肖春丽打交道的，实际上是以保罗为主治医生的整个肿瘤治疗团队。

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为何肖春丽不能走路。外科医生检查后发现肖春丽左腿的问题并不严重，不需要手术。放射科医生也认为，她的左腿不需要支持性的放射治疗。保罗请来的骨科医生检查后，发现肖春丽的骨头愈合得不错。“你为什么不走路？”在医生们看来，如何让一个病人尽量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不是被限制在轮椅、病床上，对病人的意义十分重大。

医生们一致推荐肖春丽去见理疗科医生，尝试康复训练。2个月后，肖春丽确实可以拄着一根拐杖慢慢走路了。这种变化对于一个2014年以来就没有走过路的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肖春丽难掩兴奋的情绪，她觉得之前被肿瘤一点点无情剥夺掉的东西，似乎又在慢慢地找回来。

让肖春丽恢复走路能力的同时，保罗治疗方案的重点，是寻找对肖春丽有效的化疗药物。医生们有不少药物可以选择，但是对于每一个病人，是用单药还是组合用药、什么剂量和什么组合搭配在一起会有最好的效果，都是医生需要考虑的。

在美国用的第一种化疗药物，对肖春丽的肿瘤没有起到作用。保罗及时地给肖春丽换了一种药，现在的检查结果肯定了药物的效果。保罗又仔细询问了肖春丽的身体感受，然后告诉她：“既然这种药物效果不错，给你带来的副作用又很小，那我们就继续用这种药。”

这次见面，肖春丽关注的是要不要考虑进临床试验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是一个科研力量雄厚的机构，每个月同时有几十上百个临床试验组开放着。医生的武器库里既有各种成熟的治疗方法，也有不断更新中的各种试验方法。保罗告诉肖春丽，

现有的成熟药物对她起作用，就先用成熟药物，以后再考虑参与临床研究。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Any questions？”）每一次见面，医生最后都会问上这么一句。只要病人有疑问，他们就继续解答。这让肖春丽感到安心：“这儿医生是鼓励病人提问的，我想问的基本都得到了解答，焦虑感减少了很多。”

对病人权利的尊重，不仅是医生的责任，其实也是全社会对病人独立人格的尊重。病人到美国看病，意味着必须独立地面对医生。有些中国病人家属在了解情况后，因为害怕病人知晓病情，而放弃了赴美就医。这在美国医生看来十分不能理解，对于一个癌症病人，“家属做了所有关键的决定，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是在医学界工作的”。

以病人为中心，医生权力的让渡

肖春丽碰到的保罗医生，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特例。他是美国用培养精英的方式，从医学院大量培养出来的医生之一，是一种成熟体制为病人批量生产的专业照顾者。医生的个体可以性格显著，但是当他们进入职业身份，他们会规范化地运用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医学武器，帮助病人抗击疾病。

身患癌症的人，对于自己的疾病，总是希望知道得更清楚一点。正是为了让病人对自己的疾病和处境有更多的了解，美国肿瘤医生悉达多·穆克吉花费多年的业余时间，写下了探索癌症历史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在临床上，他总会碰到病人问起：我们在抗癌战争中，处于何处？我们是如何达到目前的治疗水平的？这场战役，我们能打赢吗？有些病人问起：“我愿意继续治疗，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在对抗的敌人是什么？”

在写书的过程中，悉达多·穆克吉很多次被专业人士问起，到底该怎样给这本书结尾？因为人类对癌症的认知仍然有限，它很多时候都无法被摧毁；另外新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医学界对抗癌症的战斗，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中。

这也正是临床肿瘤医生陷入的困境，当整个时代都无法彻底破解癌症之谜时，他们也无法为病人所有的疑问，提供满意的答复。

美国著名化疗师威廉·沃格洛姆曾说到道：“那些没有经过化学或药学训练的人，可能不会意识到治疗癌症到底有多难。程度几乎像是要找到一种溶

剂，它既可以溶掉左耳，又能使右耳完好无损。癌细胞与其前身正常细胞之间的差异，竟是如此的微小。”正常细胞和癌细胞成长和生存之间的联结，远比之前想象得紧密：恶性肿瘤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获得营养而壮大。

在这种境况下，如果医生把自己塑造为无所不知的神，医生的形象终将倒塌——他们不是问不倒的，他们也有不知道的信息，也有无能为力之时。就在四五十年前，当“医学中心论”占据美国的时候，“二战”后日新月异的医学进展使得医生们一度陶醉于自己的权威，进而轻视病人的感受。哈佛医学院教授阿瑟·克莱曼在《疾痛的故事》里，讲述了在他早年行医的过程中，感受到病人得不到同情和理解的痛苦。“根据我的经验，对慢性病的心理治疗，总归只是一种哀悼或安抚。”但是在医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没有多少医生有足够耐心，愿意给予这种哀悼或安抚。

对于癌症的治疗，美国人一度被乐观情绪所主导。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一个接一个的化疗和手术试验在降低晚期癌症死亡率面前宣告失败，悉达多·穆克吉观察到，“因此这一代外科医生和化疗专家，在无法治愈患者的情况下，转而开始学习照顾病人的艺术”。对病人给予情绪上的安抚，耐心听完他们的倾诉，尽力解答他们的疑问，这原本是一种古老的谈话艺术。当医生们重新捡起这门古老的艺术时，他们发现，这是行医者所具有的神奇而有效的工具。

“倾听病人，他们是对自己疾病的最好讲述者”，重新成为西方医生重要的信条。让病人知晓疾病、参与治疗，医生在对病人权力的让渡过程中，反而将自己从信用危机中解放了出来。它传递给病人这样的信息——我们所处的时代，对癌症的认知还很有限。从癌症的发病机理到治疗方案，有些谜题已经破解，有些还是一头雾水。医生所能做的，不是扮演万能的治疗之神，而是在自己所知的范围内，尽力带着病人往前摸索。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内科肿瘤医生张建军向我说道，美国医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我们面前没有一个水晶球，能确切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

这样的信念也重新划分了战线——癌症是敌人，医生和病人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在各种已经和未知的风险中，共同作战。

医学院的培养重新让医生们意识到，疾病不是

美国一流癌症治疗中心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每年会在全美5000家医院中评选最好的专科医院，其中就包括美国癌症治疗中心的排名。MD安德森、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纪念斯隆凯特琳、梅奥诊所等是美国长期排名靠前的癌症治疗中心。

1 丹娜法伯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成立于194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癌症专科附属医院，美国联邦政府指定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除了对新一代的医生及专家进行培训，提高高危地区及医疗水平低下地区的公共医疗水平，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同样致力于在全美及世界范围内宣传先进的治疗方法及科学新发现。就成人肿瘤的治疗优势而言，丹娜法伯在全美处于领先地位，其儿童肿瘤的治疗成绩更是历年来全美排名第一。在癌症基因定位治疗、癌症免疫治疗、癌症内分泌治疗、癌症生物治疗、癌症疫苗等临床方面，丹娜法伯均是世界领军水准。

2 MD安德森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始建于1941年，是世界公认的权威肿瘤专科医院，是1971年美国“国家癌症行动”计划指定的较早的三个综合癌症治疗中心之一，也是目前39个肿瘤医学会指定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之一——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不仅是世界一流的癌症诊治中心，也是专业的癌症研究中心。

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年投资超过4亿美元进行医学基础研究，并且拥有数量众多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NCI)资助研究项目。中心目前拥有10个NCI优势研究项目的资助，包括：脑瘤、胰腺癌、乳腺癌、膀胱癌、前列腺癌、白血病、卵巢癌、子宫内膜癌、肺癌和黑色素瘤。

3 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梅奥医学中心于1863年在美国创立，它是以不断创新的医学教育和世界领先的医学研究为基础，建立起全美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医疗体系。

梅奥由三个盾牌组成的标志代表了梅奥的核心价值，即通过临床服务、教育、科研的综合发展，为每个病人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梅奥全体员工对患者秉持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您”的态度，并奉行着团队力量大于个人的集体精神，使得就医者不仅享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医生与团队，更感受到可信赖与人本主义的医护氛围。

4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私立癌症中心。作为美国最好的癌症中心之一，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是美国41个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指定的综合癌症中心之一。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对每个病人与每种癌症的特殊性有着高度的认识，因此对病人采用个性化治疗方案，并利用新型改进后的基因筛查方法实现了个体化用药。

(整理：张栋琳)

丹娜法伯的癌症治疗团队



医生团队包括主治医师、临床肿瘤学医师、放射肿瘤医师、精神病医师等8名医师；
护士和医师助理团队包括执业护理师、肿瘤科护士、医师助理；
专业支持团队包括临床社会工作者、专职教士、咨询专员；
其他团队成员包括行政人员、药剂师、物理治疗师等等。

此外，丹娜法伯的支持性团队的构成也十分全面和专业：



(余静寒 整理)

简单的个人经验，它是相互作用和沟通的，有深刻的社会性。“作为一名肿瘤学家，你对一个人生命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照顾癌症患者是一项巨大的特权。但是，你要动用你工具箱中配置的一切法宝，包括情绪上的、心理上的、科学上的、流行病上的。你得利用实验室科学、历史、临床试验和姑息治疗。”

作为中国病人来说，在选择去美国之前，往往有着艰辛的求医经历。当他们在美国获得医生团队的尊重和关怀时，格外感激。55岁的袁鹏是一位在深圳奋斗多年的企业主，他2015年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时，癌细胞已经在腹腔内发生了几处转移。他形容整个家庭迅速坠入了“绝望的迷雾”，暗夜中行走于悬崖边。

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癌症降临，每一种癌症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对癌症一无所知，却需要马上做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我的前列腺癌是该接受手术还是放疗化疗？先做哪些治疗？在哪里做治疗？”

癌细胞在袁鹏体内快速扩散，这是一场与恶疾的赛跑。本来刚刚查出癌症时，国内医生就建议袁

鹏做手术。但是手术需要切除前列腺和肛门，袁鹏身上需要挂上袋子来实行排便和排尿的功能。他和妻子都接受不了“身上永远挂着一个尿袋、一个尿袋”的尴尬境况。

像众多癌症患者一样，袁鹏急切地试图获取权威的信息。他和妻子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北京上海著名的肿瘤医院几乎跑了个遍。在一个个好不容易才挂上号的门诊里，“满房间都是人，都是渴求的眼神，教授们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够呛”。教授们花在他身上的时间最多几分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可是几分钟就被人宣判了命运，告诉我能治还是不能治”。专家们给出的治疗方案很一致——先用放化疗缩小肿瘤，然后接受手术。但是袁鹏的癌细胞对放化疗都不敏感，肿瘤仍在扩散，没有外科医生愿意给他手术。“这不就是相当于给我‘宣判死刑’了吗？”

袁鹏慢慢明白了癌症病人面对的处境：必须在两害之中取其轻。患病后不可能什么都不失去，每一种选择，似乎只能试图减少损失。

2016年7月，袁鹏和妻子、儿子到了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第一次与医生的见面，就大大缓解了他的恐惧。医生团队在研究了他之前的治疗历史、疾病信息、身体检查结果后，给予了他整个团队讨论形成的医疗方案——他仍有几种化疗药物可以试；如果化疗药物控制肿瘤的效果不理想，他们也有一定的把握给他做手术。主治医生是一位希腊裔的医生，在见面时耐心倾听袁鹏的感受和想法，一一解答他的疑问。

袁鹏觉得医生向他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面对他目前的情况，医生的武器库里还有弹药。如果所有成熟方法不管用，还可以从临床试验中为他寻找办法。这也是多数中国病人到美国治疗后的感受，由于美国的新药和新疗法多，一种疗法失效后，医生可以给病人继续治疗的余地比较大，所以不会轻易给病人“宣判死刑”。

多学科会诊——治疗癌症的关键

中国不少癌症病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查出癌症后，不知道怎样求医更科学。有些癌症病人首先想到的是手术，于是去找外科医生治病。但是做完手术后，外科医生不再与自己发生关联，病人不知道接下来该找谁继续治疗。



2016年8月30日，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白血病患者亲吻妻子

北京一位肿瘤内科医生曾向我描述说，有时候外科医生以为他们做完手术后，癌症病人就给治好了。可是这些病人复发后，就不去外科了，他们转而去内科医生。不同科室的医生只是参与病人的一部分治疗，病人在跌跌撞撞中艰难做选择，往往事后为早期的医疗决定感到后悔。

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对于中国的多数癌症病人来说，没有一个医生对他们的治疗过程负责到底。病人就像在打一场没有指挥官的战役，他的每一步选择意味着什么，疾病在他身上可能会怎样发展，模糊不清。从医学发展的角度来说，癌症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治疗过程，如果医生没有条件稳定地追踪病人，也很难为科研有效地收集数据。

外科教授查尔斯·鲍尔奇年约七旬，他个头不高，但精力充沛、笑声爽朗。鲍尔奇教授十分善于体察人的情绪，是美国那种把“领导力”体现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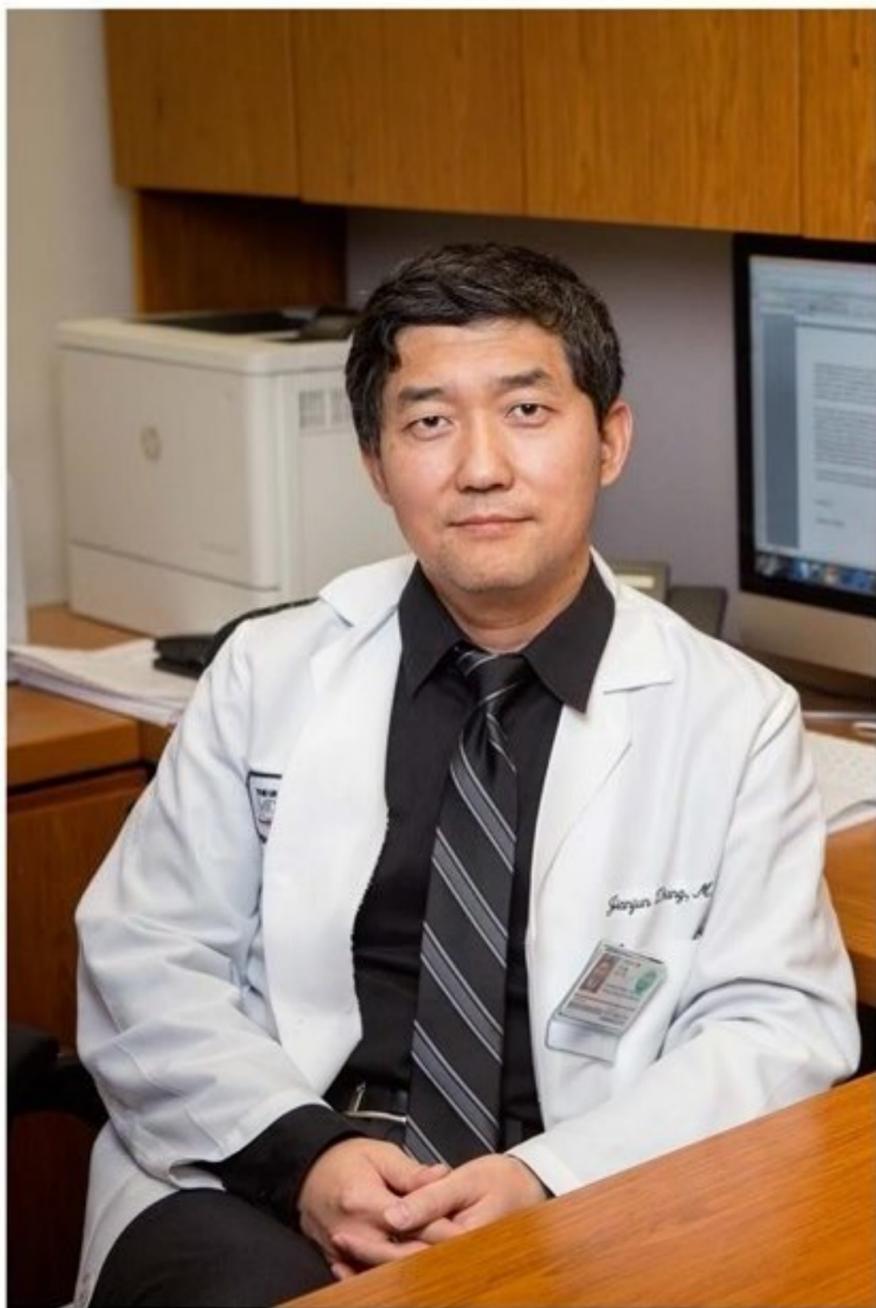
的乐观主义者。在MD安德森接受我的采访时，他十分乐于向我分享自己25年前作为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副总裁，如何领导改革的事情。如今他与中国的一些医院联系紧密，向中国医院输出自己管理医院的经验。

美国一流癌症中心如今普遍实行的“多学科会诊”制度，正是20多年前始于MD安德森的经验。鲍尔奇说道：“如果你以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思路来管理一家医院，你会注意到哪些关键点？首先就是考虑如何以客人为中心，对不对？那我要做到的，就是以病人为中心。”

鲍尔奇注意到，一个个病人带着重疾之身，在一个诊室里好不容易脱下衣服、躺下让医生做检查，过一会儿又得穿戴整齐，奔向下一个检查室，然后再次艰难地躺下。“我们做过统计，平均每个病人一天下来要在医院里走几英里的路，这多么不友好！”



(马彦博)



(马彦博)

左图：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胸部肿瘤放疗主任张玉蛟教授

右图：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头颈部肿瘤助理教授张建军

鲍尔奇教授说：“我们在想，是否可以换个做法？病人就待在固定的诊室里，我们不同科室的医生来轮流进出，为他们服务！我们是健康人，做到这点很容易。病人是我们对抗疾病的合作者，这点我希望他们能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感受到。”

于是他们用管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思路，来重新组合医院里的资源。医院里音乐环绕、设施齐全，配备着图书馆、小礼拜堂、纪念品商店、餐厅等等。医院对病人的照顾，体现在各种细节中，比如医院停车场为病人准备了轮椅；每一个卫生间都有编号，病人需要紧急帮助时，能准确报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墙上贴着癌症幸存者分享的真实故事；医院为癌症病人和家属熟悉治疗环境所做的导览和介绍，等等。还有一些癌症幸存者志愿来医院服务，为病人演奏音乐、或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鼓舞病人。这一切，使得癌症中心看起来是一个充满着人情味的医疗场所。

但是在所有这些变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医生资源的组合。医生们形成一个发挥各自特长的团队，共同为病人服务。这个团队里有不同梯队的医护人员：

每一个具体的病人，由固定的护士负责，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对病人陪伴到底。

上层的医生团队，根据病人的病情，将内科肿瘤医生、外科肿瘤医生、肿瘤放疗医生等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针对性的医疗小组。病人的治疗方案确定之后，根据方案再定下主治医生。病人的疾病历史、医治情况、身体情况、治疗愿望，整个团队里的医生都会知道，他们会在综合考虑多项因素后制订方案。

病人有可能先后去外科做手术、在内科做化疗、到放疗科做放疗，但是每一个阶段的治疗结束后，他都会回到他的主治医生手中，根据多学科会诊的方案接受下一步治疗。病人治疗后出现的副作用，也会由这个小组的医生，从各自的专业来给出控制



副作用的意见。

鲍尔奇医生说：“医疗小组达成统一意见的好处，是病人不会糊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医疗团队的意见很一致；但是如果有明确的意见分歧，医生也会一并提供给病人参考。而很多中国病人在国内感到不安的，是去到不同医院，医生的说法不一样；见不同科室的医生，医生的方案不一样，病人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在医生和护士之间，MD 安德森医院还有一种被称为“中等照顾者”的群体，她们的收入处于医生和护士之间，权限范围也在两者之间。她们本科毕业后在专科学校里接受2~4年的培训，这比培养一名医生的成本低很多。她们帮助医生做好资料收集、病例整理、病人情况追踪等各项辅助工作，以便精英阶层的医生把时间花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多学科协作，使得医院治疗病人的资源得以整合，成本下降，效率反而明显提高。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胸部肿瘤放疗主任张玉蛟教授告诉我说，这种多学科合作，与美国医学院培养医生的方式密切相关。在美国，治疗癌症的所有医生统称为“肿瘤学家”(oncologist)。在肿瘤学家的群体里，又细分为肿瘤内科医生、肿瘤外科医生、肿瘤放射医生等等。这些医生在大学毕业后，首先接受医学院4年的学习，然后是3~8年不等的住院医师培训。所以一个肿瘤学家是经过长年培养得来的，这才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基础。

MD 安德森还开创了按照人体部位将医院划为不同科室，比如头颈部癌症、胸部癌症、肛肠科癌症……这样每一个医生都能专攻某几类癌症，外科肿瘤医生更是专攻某一个部位的癌症，以便成为“超级专业者”，在不同的领域可以深耕下去，钻研得更精细。

张玉蛟向我提到，他们为一个胸部癌症病人设计放射方案，要花近1周的时间。他们团队首先定位病人接受放射的部位，再将肿瘤附近的健康组织勾画出来，然后在机器上验证，每一步的工作都非常精细。“身体不同部位对放射的耐受不一样，肿瘤大小需要的放射强度不一样，周围健康组织的耐受力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肿瘤医生来说，永远需要在彻底清除肿瘤和保护健康组织之中，寻找微妙的平衡。“放射强度小了，

癌症的权威信息来源

当人们患上癌症时，往往对自己的疾病感到措手不及。准确的信息对于病人来说至关重要，美国有一系列关于癌症的组织、协会，为所有病人提供了准确、不断更新中的癌症信息，是非常好的信息来源渠道。

1 美国癌症协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www.cancer.org

美国癌症协会的前身是由15名生理学家及商人在1913年5月23日建立的“美国控癌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Control of Cancer, 简称ASCC), 1945年改名至今。

协会建立之初，尽管美国当时每年已有7.5万多人死于癌症，但社会对于“癌症”这一概念在公开场合的提出仍然十分保守，出于恐惧与否定，有关癌症的信息无法与世人见面。因此，有别于其他主张对癌症研究进行募捐的非营利性组织，美国癌症协会自创建以来的首要任务即是唤起民众对癌症的关注。所以协会一直致力于普及癌症知识、追踪癌症研究和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是大众获得正规癌症信息的可信赖渠道。

2 关于“临床试验”的政府网站

www.clinicaltrials.gov

ClinicalTrials.gov网站是由美国卫生研究所(NIH)下属国家医学图书馆运作的一个注册库，是国际上能符合ICMJE(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原则最大的临床试验注册库，收录了全球由国家拨款或私募经费资助的各项试验目录的研究方案与研究对象招募信息，对国内外注册用户均不收费。创建该库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那些患有致命性疾病的患者找到愿意参与的合适试验项目。在此基础之上，该库的用途逐渐丰富：除了确保公众对目前正在开展或既往已开展项目的了解，同时还可为研究人员、期刊编辑人员和审稿专家提供一些解读研究结果所需的背景资料；通过完整罗列各项临床试验的目录清单，可提示研究人员对当前尚未发表成果的课题加以注意。

3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NCI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致力于鼓励和支持癌症研究中的新发现并促进其应用，以期使癌症在不远的将来变为少见而易治的疾病。1971年国会通过的国家癌症法案修正案以法律形式保证了NCI的权威和职责。

NCI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国家癌症研究计划”的执行，采用多元化的运作模式，其内容包括相关人员培训、健康资讯传播、拟定探讨癌症致病原因、进行早期诊断和临床治疗的计划以及关注癌症病人的康复等工作。

4 中国抗癌协会

www.caca.org

中国抗癌协会是在金显宅、吴桓兴、金家瑞、张天泽等教授的倡导下，于1984年4月28日正式成立的。中国抗癌协会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肿瘤学科国家一级学会，是亚洲地区抗癌组织联盟(APFOCC)理事单位和七个常务理事之一，同时也是国际抗癌联盟(UICC)的正式会员，并与美国ASCO(临床肿瘤协会)、AACR(癌症研究学会)、ACS(化学学会)建立了良好的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抗癌协会的活动包括开展肿瘤学术和技术交流、开展防癌宣传、普及肿瘤科学知识，开展肿瘤学科继续教育、对外交流等。

(整理：张栋琳)

杀不死癌细胞；可是强度大了，会给健康组织造成不必要的永久伤害。”所以他们慢工出细活，一台机器平均每天只治疗30个左右的病人，“明明需要慢火炖上一天才能好喝的汤，你非要1个小时就喝上，质量是不能保证的”。这里给每个病人的放射方案都不一样，也正体现了精准医疗的含义。

由于医生分工精确，病人也得到了更好的对待。比如患了头颈部癌症的病人，在做放疗之前，放疗医生要求他们必须先看牙医。因为一旦口腔有炎症隐患，放疗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病人需要拿到牙医的同意书，才能接受放疗。有的病人因此不得不拔掉十来颗牙齿，但是从病人治疗癌症的通盘图景来考虑，拔牙的代价更小。

像中国病人肖春丽和袁鹏感觉到的，医生团队能够给自己画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治病图景，也是受益于医生的通力合作。

袁鹏去年夏天在MD安德森接受化疗后，肿瘤控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到了10月份，主治医生在和团队里的外科医生讨论后，建议袁鹏接受手术。袁鹏同意了医生的治疗方案，“想想在国内，我的情况没有找到愿意接手术的医生，能有医生愿意做手术，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出乎袁鹏意料的，是他的手术由MD安德森的三个外科团队接力进行——泌尿科、肛肠科和整形外科。在手术之前，三个外科团队的医生分别与袁鹏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沟通。“每个团队的医生都给我详细讲解手术思路、操作过程，他具体负责哪个环节，他操作的那部分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大致需要多长时间，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是什么。然后医生让我提问，一直问到我没有任何问题为止。”袁鹏在2017年1月做的这台手术，三个外科团队前后花费了11个小时。有意思的是，最后出来的账单，也写明了每个团队的手术操作时间和具体费用。半个月后去复查，医生打印了一份十几页的手术报告给了袁鹏，还给了他一个光盘，里边存了袁鹏的治疗记录。

在手术之前，MD安德森的医生就给了袁鹏详细的手术后恢复期间的指导，比如：手术后身体会感觉时冷时热，这是正常反应；手术后30~45天，尿道不会再出血了；肛门切除后的部位尽可能做运动，在1~2年内会有麻木的感觉，之后麻木感消失。激素药物本来在手术后可以立即停用，但因为袁鹏已经服药1年了，医生怕他立刻停药身体有不良反应。所以他在手术后逐步减少激素药的药量，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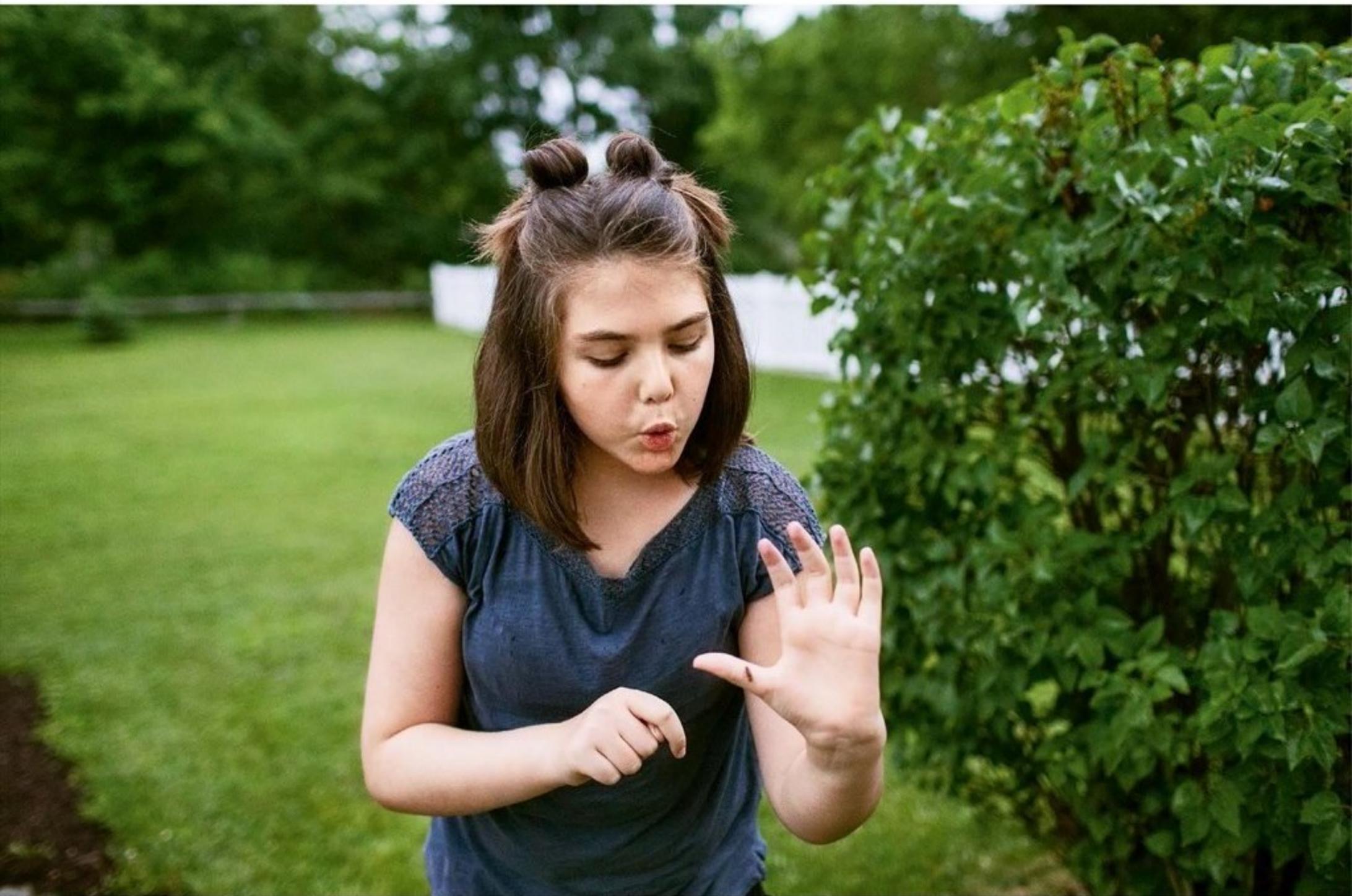
左图：2013年，美国女孩艾米莉·怀特海德和父亲。艾米莉是世界上首位接受CAR-T疗法的儿童白血病患者，并奇迹般痊愈
右图：2017年7月6日，12岁的艾米莉像同龄的女孩子一样活力十足

半月后完全停药。而且每个医生交代注意事项后，都会伴随另外一句嘱咐：“一旦有任何新情况，随时发邮件或打电话来问，不要有任何犹豫。”袁鹏说，手术后大半年了，当时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隔多长时间身体会有什么反应，都一一应验了，“所以我心里不慌”。

2016年秋天，袁鹏刚到休斯敦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尿管，穿不了裤子，只能用一件大衣服围住腰部。肿瘤使他的腹部经常疼痛，大多数时候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我眼下见到的袁鹏，手术半年后回到休斯敦复查，他看上去气色不错，像正常人一样自如地走动。这也是在美国不少四期癌症患者给人的印象，“看上去不太像个病人”。

新药新疗法与巨额花费

今年夏天，四十出头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的肖志文通过医疗中介机构到达波士顿时，病情已经非



常危急。常规的治疗对他失效，肖志文的主治医师推荐他进入了 CAR-T 临床试验组。寻找在中国没有获批的新药新疗法，或者是参与到美国尚处于临床研究的新药新疗法，正是一部分中国晚期癌症患者赴美医疗的目的。

CAR-T 是使用嵌合抗原受体 (CAR) 技术的 T 细胞疗法，操作人员将患者血液中的自体 T 细胞分离出来，对其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嵌入一种被称为“CAR”的细胞表面蛋白质。当操作人员将经过改造的 T 细胞回输患者体内时，这些 T 细胞就像装有自动巡航系统的定时炸弹一样，在体内追击并杀死癌细胞。作为最前沿的免疫疗法，CAR-T 的治疗思路是重编患者自己的细胞来攻击致命的癌症。

MD 安德森的助理教授张建军介绍说，所有临床试验的前提，是医生和研究者们并不知道试验中的哪种方法更好，这样医生不存在道德上的压力。比

如理论上证明了用 B 办法比 A 办法更好，A 办法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临床试验希望证明 B 办法是不是更优。入组的病人即使分到了对照组，也会获得标准化的治疗，不存在对照组的病人耽误治疗的情况。

神奇的好运降临到了肖志文身上，他于 6 月 28 日接受抽血，7 月 27 日回输血液，仅仅 9 天之后，颈部巨大的肿瘤消失了。待到 8 月底，医疗团队发现肖志文全身已经找不到癌细胞了。肖志文说：“美国医生说话都是靠数据的，比较谨慎，他们说完全看不到癌细胞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太激动了，医生们也高兴得互相拥抱。”医生让肖志文 9 月和 10 月各再做一次 CT 检查，如果还没有查到癌细胞，就可以当作治愈，高高兴兴地回国了。

巧合的是，就在 8 月的最后一天，美国 FDA 批准了第一个 CAR-T 疗法的药物上市，这也是全球首

款 CAR-T 疗法获得批准。诺华公司生产的这种名为 Kymriah 的药物是一种基于细胞的基因治疗，在美国被应用于治疗 3 ~ 25 岁的难治性或复发性的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患者。2012 年，美国 7 岁女孩艾米莉·怀特海德差点被白血病夺去生命，她在垂危之际接受了试验性的 CAR-T 疗法，成为世界上首位接受该疗法的儿童患者，并且奇迹般痊愈。如今艾米莉已经 12 岁了，CAR-T 终于作为治疗儿童和年轻人的白血病的疗法上市。

肖志文接受的 CAR-T 疗法，是尚处于试验性阶段的，用 CAR-T 对付淋巴瘤。丹娜法伯研究所的血液病专家大卫·费舍尔教授告诉我说，CAR-T 疗法的副作用控制是个难题。血液回输病人体内之后的一周，副作用可能会非常严重，比如严重感染、神经毒性、全身性过敏反应、急性肾损伤等，大约有 1% ~ 2% 的病人会死于这种副作用。研究者对造成这些副作用的原因还没有弄清楚。所以目前只有大型医院才能开展这项研究，这是因为大型医院综合应对副作用的能力比较强。肖志文这样神奇的治疗效果，目前还只属于少数幸运的人。

对于在美国求医的中国病人来说，即使新药和新疗法能起到作用，昂贵的花费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比如刚刚获批的 CAR-T 药物 Kymriah，定价为 47.5 万美元。每位患者的 CAR-T 治疗需要完全定制，从收集免疫细胞，到实验室基因改造，再到回输给患者，整个过程十分复杂，治疗成本也高昂。按照制药公司诺华的说法，美国有资格使用 Kymriah 的患者，大多数有医保、医疗补助或联邦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对于没有购买医保的患者，该公司将提供额外的经济帮扶计划。如果患者在 1 个月的治疗后没有效果或响应，将不用支付治疗费用。但是对于自费的中国患者来说，不仅要支付昂贵的药费，还要支付治疗期间其他的费用，药费以外的费用一般也高达一二十万美元。

在波士顿接受 PD-1 治疗的叶明，原本是一位肠癌患者。几年的治疗消除了他肠上的癌细胞，但是仍然发生了几次脑转移。在国内做过伽玛刀后，他在又一次发生癌症脑转移后用上了 PD-1。叶明说他 2 年前在香港使用 PD-1 的费用是每针 4 万元人民币左右，现在到了波士顿，这一针的费用相当于十来万元人民币。美国医生有时候会体贴地提醒中国患者，如果诊疗方案里的药中国内地已经上市，病人可以选择回国治疗。像叶明注射的 PD-1，香港的

费用显然便宜得多。叶明经济条件很好，他更愿意在美国接受全面的照顾。

“国内一些四期癌症患者来美国治疗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完全理解，四期癌症意味着什么。”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瘤放疗主任张玉蛟说，除了少数新疗法带来的神奇效果之外，四期癌症在今天仍然意味着不可治愈。病人希望生存下去，就一直离不开治疗。一种药物失效之后再换另一种，一直到无药可用。这对于自费的中国患者来说，意味着极高的费用投入，且很难预知这种花费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北京夫妻蒋娟两口子在休斯敦待了 2 年，更加深刻领会到四期癌症对于一个家庭的考验。蒋娟今年 52 岁，5 年前就查出卵巢癌转移。在 MD 安德森中心的两年治疗，使得蒋娟的肿瘤进展控制得不错。“但是如果要继续治下去，我一是担忧对我有效的药物还剩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经济花费。我目前接受的都是成熟疗法，还没有用特别贵的新药，我们在这里的医疗花费将近 50 万美元，还不算租房吃饭等生活费用。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还会花多少钱。”

袁鹏在接受手术半年后，回到 MD 安德森复查。正如医生手术前就担忧的那样，他腹股沟有一处因为手术刀难以进入，仍有癌细胞残留。医生重新给他做了活检，发现他的肿瘤发生了变异，并且出现了脑部转移。医生团队开始给他出新的治疗方案，他又进入了下一个治疗周期。

蒋娟两口子发现，这两年向他们打听到美国治癌症的中国家庭越来越多。但是“打听的人多，真正过来的很少，毕竟费用太高，而且家里需要抽出一个人来长期陪伴”。

不过到美国治病的中国人基本上都发现，他们进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节奏。在波士顿治疗肺癌的刘飞四十出头，他的事业在过去 20 年间飞速发展，与他所处的中国快速上升期一样，每天都让人兴奋。“一大早走在路上，哪个人不拿着电话嗷嗷叫地谈事情？”他很少能有空回家吃饭，基本都在忙于工作和应酬。

很多中国病人一开始都不习惯美国医院的节奏，两三周才见一次医生或接受一次治疗，“这在中国一栋大楼都修好了”。病人和家属要面对大量的空余时间慢慢消磨。MD 安德森国际病人中心的负责人玛莎·科尔曼向我提到，中国病人总是一来就问，有没有“绿色通道”？她会告诉他们：就算总统来

了，也照样需要排队。病人眼里的慢节奏，在医生们看来是一种团队合作和精细诊疗的成本。MD 安德森有 21000 名员工，但是医生只有近 1000 名，背后有大量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在为病人的临床治疗、临床试验服务。

在美国治病时间久了，病人们多多少少也适应了这样的节奏。除了绕着公园散步，也会去图书馆、美术馆、教堂逛逛。刘飞感慨地告诉我说，9 月份因为飓风要来，佛罗里达州上百万居民大撤退。长长的车队安静等候撤离，基本没有发生加塞、吵架的事情。“我感到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尊重，是基于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我觉得来美国看病，对我是一种自我教育。”

回想起决定来美国前，几乎每个家庭都为即将面对异域文化而担忧。多数病人没有想到的是，本来他们认为如何对待个人疾痛，是一种基于风俗文化的经验，但是他们反而在遥远的异乡，被一种看似陌生的经验照顾，得到了奇异的安抚。这使他们在个人生命担忧之际，内心反而激发出温和的感激之情。

我想起 9 月 20 日，我在休斯敦跟随一位叫老赵的病人去复查。他原本是肠癌全身转移的患者，但不幸的是，老赵在治疗肠癌的过程中得了急性白血病。当他的白血病终于快治好了，他要接着进行肠癌的检查和治疗。这次是他在白血病治疗告一段落后，第一次回来肠癌医生这里。医生告诉他的是个坏消息，肠癌发生了进一步转移，他需要接受新一轮治疗。

老赵不到 60 岁，像个老派的中国人一样，严肃地听着医生讲述病情。在见面快要结束时，他站起来跟医生握手告别，突然，他微笑着让翻译问医生：“上次你说要到中国开会，你的中国之行怎样了，你喜欢中国吗？”

这位 40 岁出头的印度裔医生感到有些突然，但是立即满怀感激地看着他的眼睛说：“谢谢你记得问起我的中国之行。上海不错，我更喜欢西安。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记得问起我！”一个重病之人，在刚刚遭受又一个打击之后，仍然带着微笑，关心着他的医生。两个东方人在这个西方国家的诊室里，让人看到了，疾病超越国界和文化经验，重塑着它的价值。☑

（为了保护病人隐私，文中所有病人均为化名，感谢他们接受采访）

要不要赴海外就医？听听专业人士建议



张玉蛟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瘤放疗主任

病人到海外就医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同癌症阶段的病人都可以考虑海外就医。

- 1 早期癌症病人到海外就医，可以减少误诊率。美国治疗手段先进，治疗的副作用相对小，病人得到的人性化关怀好，这样能最大限度提高病人的治愈率。目前处于癌症早期的中国病人，到海外治疗的人数很少。
- 2 中期癌症患者需要综合性的治疗手段，这个时期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比早期大。发达国家的医疗可以提供优秀的综合团队、优化的组合治疗，并且对副作用的控制比较好。
- 3 中国的晚期癌症病人，是目前赴美就医的主要群体。处于这个阶段的病人，如果常规放疗化疗和靶向药物都失效，生命状况还不危重的话，我建议：1) 可以考虑到美国尝试新药和新疗法，毕竟美国上市的新药，中国会晚好几年才上市，病人等不起。2) 积极参加临床试验，美国的各种新药或新疗法如果到了临床试验阶段，都有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病人情况符合的话可以放心参加。

我不建议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赴海外就医：

- 1 经济基础不雄厚。美国的治疗费用，数倍于中国的癌症治疗费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费用一般比美国稍低，但总体比在中国治疗昂贵。我不建议病人倾家荡产到海外进行治疗。
- 2 已经生命垂危的病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这种情况下不建议病人做长途旅行。



张建军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
头颈部肿瘤助理教授

- 1 国内没有获批的新药或新疗法，对于病人所患疾病又有明确疗效的，可以考虑到美国治疗。比如 PD-1、PD-L1、免疫疗法等。在国内常规的治疗方法都已经失效的病人，如果美国有合适的临床试验能够参加，可以考虑赴美治疗。
- 2 癌症尚处于早期，但是病人的疾病需要多学科会诊的，这方面美国有优势。
- 3 在病理诊断上有疑问的，像一些罕见病如肉瘤的类型有 150 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病理诊断非常重要。很多地方的病理医生，碰上诊断肉瘤的机会很少，而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一年诊治的肉瘤病人，占全美国的三分之一。在治疗罕见病上，顶级医院体现了它的规模优势。

（文 / 吴琪）

如何向癌症患者提供帮助

医生与患者

中国不少家属害怕病人接受不了打击，因此向癌症患者隐瞒病情，并且要求医生也配合隐瞒病情。但事实上，向癌症患者隐瞒病情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大多数患者的主观愿望，反而有可能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

癌症一经发现，医生应当亲自告诉病人。有些时候，当医生与病人及其家属一起交谈，病人会有一种安全感——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在独自面对癌症。但是也有人喜欢独自与医生交谈。

美国早在1973年的《患者权利法案》中就强调了患者对其知情同意权的主体地位：“患者就与疾病有关的诊断、治疗、预测及危险性等信息，享有知情权；对于看护、治疗有接受权或拒绝权；在被充分告知后，有亲自判断利害得失之自我决定权。”

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当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基于行业规定，通常大多数医生会向病人如实告知诊断结果、处理意见和治疗前景。从一开始就保持真诚的态度，会为医生、病人、家属和朋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建立基础。这也是考虑到坦率的谈话可以帮助病人为未来的治疗做出更好的选择。护士常常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医生的意思，同时，她们也是理想的信息源。

亲人和朋友

当你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患了癌症，并开始和你谈论这件事，你会转换话题吗？你会保持沉默并担心说错话吗？并非只有你一个人如此，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当与患者进行沟通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倾听。试着去理解他们的感受，并不要轻易做出评价，或者改变他们的想法或行为。试着把你自己的伤感和恐惧放到一边，让他们知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与他们谈话。还有一种情况：他们现在并不想说话。那也没关系，你只需要随时准备好去倾听就可以了。

下面是一些可能有效的沟通建议：

- ① 让他们主导谈话。如果他们想说，你只需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认真地听对方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 ② 学着适应沉默。有时沉默令对方感到更舒适，并能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
- ③ 保持眼神交流。这会让你的朋友感到你真的在身边，并且在用心聆听。
- ④ 不要随便给建议。当你不能感同身受时，很难给对方一些好的建议。这时候提问或者聆听就足够了。
- ⑤ 如果你感到想哭泣，坦诚地告诉朋友。你可能需要暂时离开，直到你不需要你的朋友安慰你为止。
- ⑥ 得了癌症的人通常不想总是谈论疾病，这会让他们觉得他们唯一的身份就是“癌症患者”。你们可以谈论一些其他有趣的事。
- ⑦ 尽可能多地与朋友相处。如果你们过去经常玩纸牌或者一起看电影，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呢？不要把疾病的影响看得太轻，但是也不能过于保护。
- ⑧ 鼓励其他朋友和亲人去看望病人。也许他们愿意帮忙跑腿、做饭，或者照顾小孩。如果他们无法上门探望，请他们写信、发邮件，或者打电话。
- ⑨ 持续探望病人。把你的朋友列入你的每周计划当中。癌症可能是一段相当孤独和隔绝的经历。你的朋友不会总是主动求助，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可以帮助到他们。



与癌症患者沟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倾听

⑩ 最重要的是，做你自己。不要总是担心你做得对不对，你的言行举止都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如何谈论死亡

当治疗无效时，一些癌症患者必须面对他们即将死亡的事实。这对患者本人及其周围的人都很可怕。你的朋友可能会被疼痛折磨、卧床不起或者感到十分困惑。看着你所关心的人一天天枯萎是件很困难的事。

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仍然是你能陪在朋友的身边。他们甚至会在有人陪伴时感到孤独，因为周围的人并不能体会他们心中的滋味。

许多人会不知道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这是人们面对癌症时的共同难题。一些人想要谈论死亡过程——他们想知道可以期待什么。一些人想确认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们的愿望可以实现。比如，他们想确保他们不会依赖医疗设备而存活。另一些人想知道他们会怎样死亡，并且问：“当我死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

要为这些问题和顾虑找到合适的答案，寻找临终关怀的专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不知道某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人。”这些专家会指导你和你的朋友想清楚生前遗嘱、预先指示，并且告诉你们，当死亡不断靠近的时候，可能发生什么。

若有需要，可以尝试联系以下机构：

美国癌症协会，他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提供服务。官方网站：www.cancer.org，联系电话：1-800-227-2345。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LWPA），2013年6月25日成立，是由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正式登记注册的公益社团组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航天中心医院、中国医学论坛报社、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为发起单位。网站：<http://www.xzyzy.com>，电话：010-85323040。



1



2

去香港看病

主笔 / 袁越

最近几年内地患者出境看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提供了一种镜鉴，可以观察我们的医疗产业在思想观念、制度设计、人才培养和经济投入等方面的现状。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

中环是香港最繁华的街区，高耸入云的写字楼一幢挨着一幢，密不透风。从冠君大厦4层的一扇窗户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著名的皇后大道中。这条被写进流行歌曲中的著名马路是中环地区的主干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开得飞快，对于熟悉北上广深市中心行车速度的国人来说，简直快得不可思议，好在玻璃窗的隔音效果非常好，把室内外分隔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来自浙江嘉兴的53岁的彭菊芬女士此刻正坐在窗边的一把躺椅上，默默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兴高采烈地展示刚买的运动衣。彭女士自己也是一身运动衣打扮，只是因为香港室内空调开得太足，上身多加了一件外套。她肤色黝黑，身材微胖，神情略显疲惫，除此之外看不出任何异样，不会有人知道她是一位晚期肺癌患者，而且已经和病魔斗争了5年。

这是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长条形大开间，用布帘子隔出了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每个空间里都放置了一把躺椅，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原来这里就是香港综合肿瘤中心的化疗室，彭女士正在打点滴。同屋还有好几位病人也在“吊水”，这是香港人的说法。奇怪的是，那几位患者无一例外都是一个人来的，没人陪伴，其中一位中年男人一边“吊水”一边看报纸，一副很悠闲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在做化疗的癌症病人。



3

1~3. 香港综合
肿瘤中心

“香港医院对病人的照顾非常好，管理方式也很人性化，所以香港本地患者都是一个人来吊水，吊完就走，不像内地，吊个水还要住院，一大帮亲戚朋友轮流请假陪床，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开心不起来。”彭女士的大儿子鲍家龙对我说，“以前我妈在内地做化疗，一个疗程三天，天天在医院里吐。在香港只要来这里吊两小时水就可以回旅馆了，即使要吐也是在旅馆里吐，这一点让我妈感觉舒服很多。”

鲍家龙还告诉我，同样的化疗药，以前他妈妈一直对化疗有抵触情绪，现在好多了。

鲍家龙补充道，“像癌症这种病，前期当然是药重要，但到了后期，病人的心理健康更重要。没有好的心态，病人是会被吓死的，香港医院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对病人照顾得非常得体。”

彭女士的情况绝不是个案。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来香港看病的内地病人都对香港医院的人性化服务印象深刻。比如，上海一家跨国公司的中方雇员李歆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他岳父几年前第一次去香港旅游时突发急性肺炎，被当地导游送到了荃湾港安医院。一开始老人家非常担心自己人生地不熟，看病会很麻烦，没想到那家医院把老人照顾得

非常妥帖，甚至专门为他配了名普通话翻译，他有任何问题都会立即得到医生护士耐心细致的回答。

当然了，李歆事先花了72块钱为岳父买了份医疗保险，否则的话，当他们接到4万多港元的账单时，对香港医院的好感度一定会打些折扣。同样，鲍家龙虽然才31岁，却已是内地一家私营企业的业主，经济状况不错。作为一名孝子，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为母亲的治疗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医疗本质上就是拿钱买命。同等条件下的两个病人，谁出的钱更多，换来的命往往就更长。但是，医疗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不会允许大量穷人因为出不起钱而选择在家等死。比如香港实行的就是全民医保政策，每一位香港永久居民都能够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涵盖范围非常广。

不过，和全球其他一些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的公立医院同样面临着医生短缺和床位紧张的困境，非急诊病人经常需要等很久的时间才能看上病，于是一些有钱的病人就会选择去私立医院看病。比如彭女士所在的香港综合肿瘤中心和李歆岳父就诊的荃湾港安医院都属于私立医院，



(张超摄)



(张超摄)

上图：香港综合肿瘤中心的医务总监潘冬平

下图：在香港综合肿瘤中心看病的彭女士与家人

只不过后者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私立医院，有教会背景。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均采用这种公私结合的医疗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看病方式。但是，公私结合要想做得好，无论是公还是私都必须很纯粹才行，混杂在一起就会出问题。比如香港的公立医院不但覆盖面广，而且医疗服务的质量也是全球领先的，香港的人均寿命之所以能够排在世界第一位，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与此同时，香港的私立医院收费极为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医院能够雇用到非常优秀的医生，医疗服务的质量甚至更高。

与此类似的就是城市交通管理。任何城市，普通居民的基本交通需求都必须得到满足，高端人群的特殊出行需要也要被照顾到，但大城市土地资源有限，两者必然产生矛盾。香港的做法就是投入重

金发展高质量的地下轨道交通，以此来满足大部分居民的通勤需求，从而把路面道路让给那些追求快速和舒适的高端人群。与此同时，香港的私家车牌照税和油价都非常昂贵，交管部门对路面交通违章的处罚也极为严厉，这才造就了皇后大道上的高车速。相比之下，内地的很多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不足，私家车管理不善，交通法规执行不严，所有人都在同一条马路上抢道，最终谁也快不起来。

于是，像彭女士这样的病人，走上了跨境医疗这条路。

好医生和差医生

为了不影响同屋的其他病人，鲍家龙在肿瘤中心的会客室接受了采访，为我详细描述了他母亲的治疗经过。

原来，彭女士是在2012年6月被诊断出肺腺癌的，由于被发现时已是3B晚期，她被好几家医院判定最多只能活3个月，并拒绝接收。走投无路的鲍家龙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肺癌权威丁嘉安教授，后者终于答应帮忙。由于肿瘤已经超过了5厘米，暂不适合手术，彭女士在丁教授的建议下先在肺科医院做了两次化疗，成功地将肿瘤缩小到了2厘米以下。然后，当年已是74岁高龄的丁教授亲自站上手术台，为彭女士切除了肺部肿瘤，原定两个小时的手术只用了40多分钟就完成了。

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对这段描述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彭女士的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内地患者早已习惯了托关系找名医，甚至连普通的感冒发烧都要去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连夜排队挂专家号。说起来中国内地的人均医生数量并不算少，但由于不同医院的医生水平相差太大，导致好医院人满为患，好医院的好医生更是整天疲于奔命，分配给每位病人的时间少得可怜。内地医院的就诊环境和医生的服务态度之所以屡屡遭人诟病，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出了问题自然要改。2017年4月8日，北京市启动了一项旨在推广分级诊疗的改革措施，从100天后公布的数据来看效果不错，三级医疗机构门急诊量下降了12.7%，二级医院诊疗量下降了4.9%，一级医院及社区的门急诊量上升了10%。北京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解释说，新的措施使得北京地区三级医院门急诊量和基层医疗机构的门急诊量基本相当，大约各占40%。三级医院下降的门诊量，基本上转移到了基层医疗机构。

与此同时，不同职级医生的接诊量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后副主任医师门诊人次下降了10%，主任医师下降了22.7%，知名专家的门诊人次下降了15.2%，这说明患者更加慎重选择专家号，让专家能用更多的时间接诊疑难重病患者。

北京一直是中国内地医疗水平最高，同时也是医生水平最均衡的城市，改革相对容易。其他中小城市医院的医生水平参差不齐，和大城市三甲医院相差太大，分级诊疗就不那么容易推广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信息闭塞交通不便，这个差距所导致的病人聚集效应还不明显，如今这两个障碍都不存在了，二、三线城市的患者往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愈演愈烈。

相比之下，香港那地方本来就小，再加上香港全盘照搬欧美的医师培训系统，使得香港医生的水平较为平均，病人的分流远比内地做得好。

“香港医生的业务培训和资质认证是由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的，不但标准统一，而且非常严格。”香港综合肿瘤中心的医务总监潘冬平教授对我说，“内地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这样的机构，基本上都是各家医院自己培训医生，好医院和差医院培养出来的医生质量差别会很大。”

众所周知，医生大概是培训时间最长的一种职业，欧美国家想学医的人一般都要先在普通大学读4年本科，成绩优异的才能报考医学院，毕业后也不能立即当医生，还得先去正规医院实习若干年，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获得行医执照。如果想当专科医生，还得再去专科医院实习若干年，最终拿到行医资质后就可以挑选医院了。中国的培养体系很不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直接报考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某家医院，然后基本上一辈子就在这家单位工作，所有的培训和升职考核主要在本单位进行，标准参差不齐。

“香港的专科医生在培训期间不会只待在一家医院，而是必须在很多医院轮转，这样就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科室的医生，便于培训生们博采众长。”潘冬平对我说。

潘冬平是肝胆胰外科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在肝癌手术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他告诉我，肝脏在解剖上可以分为相对独立的8个区，他在做肝癌手术时都会把肿瘤所在的那个区全部切干净，尽量减少癌细胞残留的概率。另外，他在做肝癌手术时尽量不输血，因为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手术时或者手术后1~2周内输血的话，会导致病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增加

癌细胞扩散的风险。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会在切肿瘤之前先把连接肿瘤和健康组织的血管一根一根地结扎起来，然后再把肿瘤切掉。这么做病人出血很少，一般都不必输血。但是，据他观察，很多内地医生都是只把肿瘤尽快切除就完事了，出血多了就输血，这些做法都会增加肝癌复发的概率。

“我自己做肝癌手术一天最多安排两台，因为如果医生把肿瘤搬来搬去的话，也会增加癌细胞扩散的风险，所以我都尽量不用手去直接接触肿瘤，而是在周边一点一点地切，很费时间。”潘冬平对我说：“据我观察，内地医生的工作量太饱和，经常是每人每天要做4~5台手术。他认为内地好医生的手术实在太多、压力太大了，几乎照顾不过来。如果中国的卫生部门能够出台一个全国性的肝癌手术指南就好了，可惜目前还没有。”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教授告诉我，内地没有手术输血会增加癌细胞扩散概率的说法，但真正的肝胆专科医院在做手术时也是会尽量减少输血的。不过，很多中小城市的医院没有专门的肝胆外科，而是统一到普通外科做手术，水平就参差不齐了。

中国卫计委肯定也意识到了医生质量不均衡的问题，于2014年初颁发了《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制度的指导意见》，建议到2020年时，中国所有新进岗位的临床医师均要在符合资质的医院接受“规培”，合格了才能行医。如今这个项目已经试行了三年，效果怎么样呢？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明告诉我，效果确实有，但问题也不小。

“刚从医学院出来的学生缺乏经验，必须通过规培学习如何跟病人沟通，以及临床诊断和病例管理等等相关知识，否则是没办法独立行医的。但是，现在大多数医院都把规培生当廉价劳动力使用，他们平常的工作就是帮医生写写病历，帮病人写写遗嘱什么的，真正的诊断和治疗工作是不让他们做的。再加上目前评价规培生水平的方式就是考试，他们只要会考试就能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大多数规培生缺乏学习的机会和动力，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刘明对我说，“比如北京医院的规培生一般会在我们泌尿科轮转三个月，我一开始问一个问题他们不懂，轮转结束后再问还是不懂。”

曾经做过医生，现为一家跨国药企临床试验部门负责人的郑劲草博士告诉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部分原因在于内地医院受到人事编制的限制，没法给医生安排足够多的助手，于是医生们每天都



手术治疗一直是癌症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手术的操作水平越来越精细

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写病历等文案工作上。规培生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医院都特别想获得规培资质的原因，质优价廉的劳动力谁不想要啊？

有意思的是，刘明和郑劲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内地医学院学生素质下降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的医学院还经常能招到尖子生，但进入90年代后每况愈下，尤其是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学生质量更是直线下降。更糟糕的是，学医不再是优秀高中毕业生的首选专业之一了。据报道，1977～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高考状元中仅有1.31%选择了医科，可2016年22个省的36位高考状元当中更是没有一人选择医学。相比之下，香港在过去的5年里诞生的27位高考状元当中有16位选择读医科，2017年的6位状元更是全部选择学医，两地差异极为明显。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内地的医患关系不佳，医生普遍得不到尊重，工资收入也和劳动付出不成比例。相比之下，美国的医学院一直是最难进的学校之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医生收入高。香港也类似，比如潘冬平原来在公立医院工作，年薪已经有数百万港元了，如今他功成名就后跳出来单干，年收入已经可以达到数千万港元的水平，是

内地同级别医生的几十倍。

美国英联邦基金会主席、卫生保健政策专家大卫·布鲁曼瑟尔 (David Blumenthal) 博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伦 (William Hsiao) 博士曾经在2015年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撰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医疗政策的利弊。因为药品和医疗器材必须和国际接轨，价格没法定得太低，政府真正能够压低的，就只剩下医生和护士的劳动力价格了。

与此同时，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却又远远不够，目前大部分医院的国家拨款只占其总支出的十分之一左右，这就使得中国的医院必须自负盈亏，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还要承担赚钱的压力，其结果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以药养医”。但是，这个做法某种程度上反而推高了医疗价格，并使大量资质优秀的学生放弃学医，进一步降低了医疗服务的质量。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考察中国刚刚试行了三年的住院医师规培制度，不难发现这实际上相当于进一步推迟了医学院毕业生拿高工资的时间。如今中国大城市的生活费用直线上升，规培生大都处于25～28岁这个年龄段，不少人要开始考虑养家糊口的事情了，规培阶段的低收入让他们没办法把心



香港已成为内地患者跨境求医的选择之一。图为香港市区街景

思都放在学业上，培训效果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欧美国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还不错呢？这就要看医疗保健领域的投入力度了。中国内地目前的医疗投入只占GDP的5.5%左右，欧美国家普遍是中国的两倍，美国的这个数字更是高达17%。这个数字高不一定意味着医疗服务质量就好，但这个数字太低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生命归根到底是有价的，这一点在彭女士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进口药的快与慢

鲍家龙认为，那些医院之所以不愿意接收他母亲，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医生的考评制度不合理，而她母亲已是癌症晚期，医生怕影响自己的名声。潘冬平告诉我，如果一名香港医生严格遵照治疗指南行事，那么即使最终没能治好病，责任也不在医生，这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香港在医疗指南方面做得比较好，很多细微的步骤都有严格的规定，医生只要照着做就行了。”潘冬平说。

一直关注内地医疗系统改革的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博士认为，内地的医疗规范化做得还是不错的，治疗指南也是尽量和国际接

轨，只是因为很多新药内地没有进口，或者医保报销目录上没有涵盖，导致内地医生只能选择其他治疗手段，这才导致了治疗效果的差别。

彭女士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手术之后彭女士又接受了当时内地医院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医疗服务，包括2个化疗疗程和28个放疗疗程，以及一种专门针对EGFR基因突变的肺癌靶向药物吉非替尼（Gefitinib，商品名易瑞沙）。可是，她体内的肿瘤还是于2015年11月再次复发，这让她处于无药可用的境地。所幸鲍家龙的父亲早年经商时认识了一位香港商人周国启，周先生患有肝癌，在香港经历过多次手术及药物治疗后康复，遂成立心安医疗顾问有限公司，专门为赴港治病的内地患者提供服务。在这家公司的帮助下，彭女士首次来到香港治病。

“去境外治病确实比较贵，但钱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教育程度往往更重要。”周国启对我说，“鲍家龙曾经在英国留过学，知道国外的医疗服务是什么情况，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吧母亲送来香港。”

彭女士到港后立即被送往香港肿瘤中心接受DNA检测，医生在其肺癌组织中检测到了T790M突变。当时美国FDA刚刚批准了一种专门针对这个癌

基因的第三代靶向药物奥希替尼 (Osimertinib, 又名 AZD9291, 商品名泰瑞莎), 就连香港也还尚未注册, 于是肿瘤中心依照法律向香港医务卫生署实名申请特批进口。

香港的医药政策基本上是紧跟欧美的, 一种新药只要在两个以上的欧美国家获批, 香港一般都会在一年内批准进口。如果在这一年内有人急需使用这个药, 香港医务卫生署还会根据医生提出的申请特批提前进口, 彭女士就是这项人性化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就在等待泰瑞莎进口期间, 彭女士还在香港肿瘤中心接受了肿瘤免疫治疗, 服用了刚刚获批的 PD-1 抑制剂欧普迪沃 (Opdivo), 6 个疗程做下来疗效明显, 癌胚抗原 (CEA) 由服药前的 103.5ng/mL 降至 6.28ng/mL。

肿瘤的免疫治疗是一种全新的抗癌手段, 美国 FDA 早在 2011 年就批准了全世界第一个基于免疫疗法的抗癌药, 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批准任何一种免疫治疗药物进入中国, 中国的癌症患者要想吃到这种药, 仍然只有出境求医这一条路可走。

“免疫疗法最有效的适应症就是黑色素瘤, 内地每年新增黑色素瘤病人至少 1 万个, 香港只有 300 个, 所以内地对这种药的需求量比香港大得多。”肿瘤中心的临床部门主管张宽耀医生对我说。

张宽耀是彭女士的主治医生, 彭女士在香港的所有治疗方案都是由他制定的, 泰瑞莎的特批申请也是张医生负责的。就在申请书递上去两个多月之后, 也就是 2016 年 2 月, 泰瑞莎到港, 彭女士成为全亚洲第一个吃到该药的癌症病人。



(张宽耀)

“经常有内地病人带着检查报告通过心安医疗公司找到我视频会诊, 如病人的内地医生同意的话, 我是可以开药给他的, 但因为法律不同的原因, 不能快递, 病人只能来香港取药。”张宽耀对我说, “另外, 肿瘤靶向药大都非常新, 我建议起码第一个疗程在我们这里做, 如果出现副作用的话我也可以及时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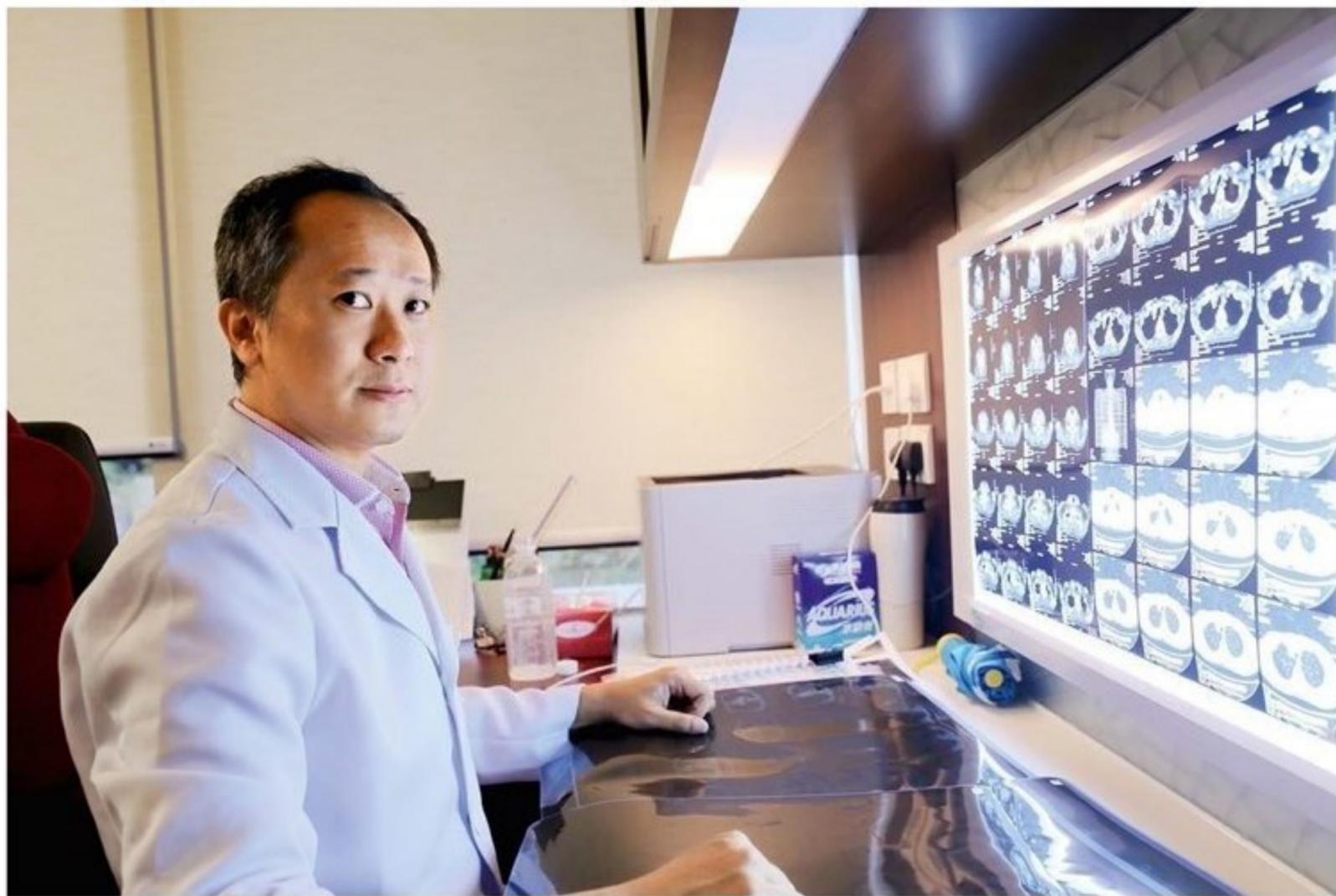
服药 10 个月后, 张医生为彭女士做了 CT 复查, 发现彭女士的肺部肿瘤又有增大增多的迹象。为了减轻采样活检的痛苦, 张医生把彭女士的血样送到美国, 用当时最先进的血液活检技术做了基因检测, 发现肿瘤中的 T790M 突变已经消失了, 证明泰瑞莎确实起了作用。肿瘤之所以再次复发, 除了 EGFR 突变尚未完全消除之外, 又检测到了 HER-2 和 BRCA 这两个新的致癌基因突变。所幸香港早已有了专门针对这几个致癌基因的靶向药物, 于是张医生又为彭女士制定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 同时使用三种抗癌药, 包括针对 HER-2 突变的曲妥珠单抗 (Trastuzumab, 商品名赫赛汀)、针对 BRCA 突变的奥拉帕尼 (Olaparib) 和针对 EGFR 的易瑞沙。

2017 年 6 月, 张医生又根据最新的基因检测结果再次改变了治疗方案, 采用力比泰 (Alimta)、卡铂 (Carboplatin) 外加一种新的肿瘤免疫疗法 (PD-1 抑制剂 Keytruda) 联合治疗。目前彭女士病情稳定, 已经比当年内地医生的预言多活了 5 年。

彭女士的这段经历很可能就是未来癌症治疗的常态。因为持续不断的基因突变使得大部分病人体内的癌细胞都有不止一种类型, 这就是癌症为什么那么难治的原因。但是, 只要科学家们能够不断地研制出新的靶向药物, 就能将各种不同的癌细胞控制住。换句话说, 未来的癌症将会变成一种慢性病, 医生将根据病人肿瘤组织的基因型决定用什么药, 不行了就再换一种。一名癌症病人到底能活多久, 很大程度上要看新药研发的速度是否跟得上基因突变的速度。

对于内地病人来说, 他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能不能及时地吃到新的抗癌药。目前中国内地的新药审批速度非常慢, 一种新药平均需要等待 8~10 年才能获批进入中国。据统计, 目前全世界已有的抗癌靶向药当中, 获批在中国上市的仅有 29%。其结果就是, 美国的癌症患者 5 年生存率已经提高到了 66%, 中国目前仅为 31%。

癌症治疗除了用药之外, 还有放疗和微波消融等物理疗法, 这方面内地也落后了很多。比如, 潘



左图：香港肿瘤中心的临床部门主管张宽耀医生

右图：香港肿瘤中心专门负责钇-90放疗技术的放射科部门主管杨国伟教授

冬平早在 2009 年就在香港开始尝试用微波消融技术治疗肝癌，这个方法只需把一根针插入肝脏，通过它来发射微波，把周围的肿瘤细胞杀死。这个方法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因为创伤小，对于一些身体虚弱，或者已经发生肝硬化因此无法动手术的病人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我曾经向内地同行们介绍过这项技术，但据他们说，由于某个权威对手术切除法的坚持，内地一直未能引进。”潘冬平对我说，“其实这项技术全世界早就在做了，但在内地却因为一个学术权威说的一句话，起码晚了 5 年。”

好在内地医学界明白过来了，终于引进了这项技术。相比之下，钇-90 放疗疗法的遭遇就是个悲剧了。众所周知，放疗一直在癌症疗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因为放射性不好控制，放疗对健康器官的损伤比较大，限制了它的使用。欧美科学家在 20 年前发明了钇-90 放疗技术，把这种放射性同位素做在玻璃或者树脂微球里打入肿瘤组织，这些微球的辐射范围只有 2 厘米，不会伤及无辜，所以对某些条件特别合适的病人来说效果非常好。香港

的医院几年前就已开始做了，但中国内地一直未获批准。

“钇-90 放疗的一个缺点就是技术上太过复杂，需要很多部门的专家一起协调合作才能完成。”香港肿瘤中心专门负责这项技术的放射科部门主管杨国伟教授对我说，“这个疗法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太贵，做一次要花几十万港元。”

确实，目前几乎所有的癌症新疗法，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放射疗法，价格都居高不下，原因在于这些疗法的研发费用都非常高，厂家如果收不回成本的话是没有动力搞研发的。维持新药的高价格，从长远来看对癌症病人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样一来普通病人就只能指望医保了。问题在于，中国内地的医疗投入本来就不足，医保一直处于缺钱的境地，很多新药都未能进入医保目录。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内地不应该那么快就批准新药进口，反正老百姓也吃不起，应该等药价降下来了再批。但这个理由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先不说医疗道德问题，事实上目前已经批准进口的癌症靶向药物大多数都没有进医保，内地病人一直

都是自费吃这些药的。对于不差钱的孝子鲍家龙来说，他是不在乎花钱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母亲的生命更重要。因此，内地批或者不批这些抗癌新药都不会影响医保，不批的话只会把彭女士这样的病人逼到境外，繁荣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市场。

需要指出的是，来香港看病的人并不都是冲着新药去的，还有不少人看中的是香港医生的诊疗技术，下面这位病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医疗技术的好与坏

香港肿瘤中心的会客室里有台电脑，专门安装了开电话会议必备的三角麦克风，方便医生进行远程诊疗。采访完鲍家龙之后，我又目睹了一位来自广东东莞的病人和香港医生之间的远程诊断过程，因为双方都讲粤语，交流毫无障碍。

东莞大致位于广州和香港之间，病人去这两个地方看病路上所花的时间都差不多，而东莞又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有不少财力雄厚的高端患者，于是心安医疗顾问公司在东莞市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专门接待那些打算去香港看病的病人，叶丽娟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叶女士今年50多岁，身材中等，从各方面来看都很正常，谁也不会猜到一年前她曾经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没有吃饭，差点死掉。下面就是她的故事：

差不多一年多前吧，我感觉肚子疼，就去东莞的妇幼保健医院看病，医生说我这是子宫腺肌症，给我开了米非司酮，一天3次，一次8片。我吃了一个多月，不但疼痛未减，而且月经停不下来，血止不住了。那个医生又给我开了止血药，结果吃到

第二个月肚子还是疼，只好去了东莞最大的人民医院，那里的医生给我拍了片子，说我的肠道血管又出了问题，便从大腿上的血管打药进去给我通血管。就这样通了20多天后我终于感觉不怎么疼了，医生这才让我出院。

没想到回家后不久我的肚子又开始疼起来，人民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病就是这样的，让我忍一忍就好了。我忍了3个月，实在疼得受不了了，还是决定去医院看看。因为上两个医院都是西医院，吃的都是西药，所以我决定去看中医，就去了东莞中医院，打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因为我肚子疼得不行，吃什么吐，医生只能通过胃管给我灌中药。我就这样插着胃管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什么东西也没吃，靠输液活着，人也从120斤一下子瘦到了90斤。

这期间我老公花1万块钱从广州的南方医院和中山医院给我请了3个有名的大夫专程来东莞会诊，结果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我又请东莞中医院的医生给我针灸，他是中医院的金字招牌，请他扎一次针就要800元。可是我请他扎了五六次后肚子反而更疼了，只好央求他不要再扎了。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月，我痛苦不堪，想死的心都有。幸亏一位朋友来看我，见我这个样子便劝我赶紧去香港看病，于是我就在心安医疗顾问的帮助下到香港，找到了潘冬松大夫。潘大夫检查后说我小肠坏死了，第二天就安排我上了手术台。

手术完后第二天，潘大夫问我想不想喝冰豆浆。我一个多月都没有吃东西了，当然想啊，可内地医院做完手术后一个月都不准吃冷的东西，所以我不敢相信他会让我喝冰豆浆。后来我家人真的给我买来一袋，我只敢喝了一半，喝完后感觉自己立刻就

左图：病愈的叶女士

右图：潘冬松教授



有了力气,能坐起来了。潘大夫又问我想不想吃牛排,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第二天我真的去吃了牛排,一点问题也没有。

手术几天后我就自己开车回来了,前后只在香港待了一个星期。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的体重已经恢复到了生病前的水平。前几天我去中医院找那个给我扎针的医生,他根本就认不出我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惊心动魄,几乎不像是真的。我专程去采访了潘冬松教授,想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潘冬松是潘冬平的弟弟,以前也是香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后来他和哥哥一起出来创业,目前在香港肝胆胰及结直肠微创外科中心工作,最擅长做结直肠微创手术。

潘冬松教授对我说:“其实叶女士的病就是腹部静脉阻塞,本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医生开一些保血药(抗凝药)让她回家去吃就行了。但医生很可能没有计算好用量,最后导致一段小肠坏死。我立即给她做了微创手术,在腹部开几个小孔,把坏死的小肠切除就没事了。”

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小毛病,怎么会闹成那个样子呢?潘冬松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做手术的时候我发现叶女士腹部有几个针眼,坏死的小肠就在针眼的下面,我猜是因为针灸刺穿了小肠,引发了炎症反应,导致了肠梗阻。”

“我相信内地能够解决肠梗阻的医生肯定有很多,如果是在香港的话,家庭医生会把叶女士介绍给像我这样的外科医生来处理,因为在香港,医生只能做自己专科的事情。”潘冬松对我说,“但是,我在内地看到的情况往往正相反,医生总喜欢把病人留在自己的科室,不考虑实际情况。比如恶性肿瘤,如果尚未扩散的话一般都应该先手术,扩散了才会去吃化疗药。可内地医院的肿瘤科经常会让病人留在自己这里吃化疗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转给外科。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各个科室的差别,只能听医生的安排,很多人就这样耽误了治疗的时机。我不敢说这些医生的出发点都是坏的,但很多医生年轻时就是这么一直做下来的,坏习惯一旦养成就改不掉了。”

潘医生提到的香港方式其实就是欧美国家的普遍模式。除了急诊外,欧美人生了病一般都会先去看家庭医生,再由家庭医生转诊给最适合的专科医院。接到转诊病人后,专科医院一般都会成立一个由不同科室的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共同商讨治疗方案,所有意见汇总到一名主治医生那里,由他最

终拍板。比如彭女士在香港肿瘤医院的主治医生就是张宽耀,因为彭女士的状况明显不适合手术,而张医生比较擅长化疗,最好由他来负责判断彭女士该吃什么药。假如张医生认为彭女士的病更适合采用其他方法,比如放疗,他就会去找放射科的杨国伟医生,由他来负责实施。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多学科会诊体系,内地的疑难杂症病人往往要先找关系挂号,挂到哪个科就会优先去做哪种治疗。”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全球副董事合伙人陈波博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再加上内地医院各个科室的创收压力都很大,每个科都不愿把病人轻易放走,这就导致一些病人被耽误了。”

陈波对跨境医疗领域的现状非常了解,也很熟悉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据他介绍,中国内地的三甲医院已经开始尝试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但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必须有一个强势的权威出来协调各方利益,否则行不通。

“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是给医生发固定工资的,用这个办法来鼓励医生之间的合作。”陈波说,“但那是在一个很高的学术水平上形成的机制,中国今天未必能够直接照搬。”

在陈波看来,内地医生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在治疗普通疾病方面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内地医生最大的问题是临床创新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们每天都被巨大的门诊量逼得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去学习充电。

潘冬平医生则认为,虽然内地医生看的病人多,他们也很喜欢拿这个说事儿,但数量并不等同于质量,经验多不等于水平高。“很多内地医生没有时间或者能力对那些病例做科学的分析和统计,这是无法提高医疗水平的。事实上,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只要一看到某个内地医生在自夸自己病例多,大家便会一笑了之,知道这个医生的发言不用听了。”

潘冬平还对内地中西医共存的现象表达了看法:“内地一直存在两套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但双方并没有真正融合在一起。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医借用一些西医的诊疗手段(比如X光)而已,双方的评判标准完全不同,这样的状况对于整个医疗系统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中医与西医

叶女士之所以仍然选择吃中药,主要原因就是



左图：尽量恢复生活能力，对病人来说意义重大

右图：沈阳药科大学亦弘商学院院长张象麟

她被西药伤了心，采访过程中她一直对我强调说这件事的起因就是东莞妇幼医院给她开的国产西药。

把医学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是中国医药界的一大特色。我们不但有中医这个“国粹”，还有国产药这个天下独有的概念。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只会按照专利的不同把药品分成原研药和仿制药两种，前者可以借助专利的保护而独占市场，从而合法地收取高昂的费用，后者则必须面对其他仿制药厂的竞争，因而不得不把价格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世界上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把药品分成了进口药和国产药，前者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即使过了专利保护期都很少降价。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则有“专利悬崖”这个概念，意思是说高价原研药一旦过了专利保护期，药价就会像跳崖一样直线下降。

外国药厂之所以敢在中国卖高价，原因就在于国产药的质量确实和进口药存在差距，老百姓和医院都不是傻瓜，当然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

绝大部分中国国产药都是仿制药，仿的是外国公司研发出来的原研药。我们说国产药比不过进口药，说的就是国产仿制药的质量不过关。但是，仿

制药在国际上有着严格的定义和标准，只有那些在活性成分、给药途径和生物等效性等方面都和原研药一致，疗效上可以相互替换的才能被称为仿制药。只有中国一直沿用自创的仿制药定义，即只要符合所谓的“国家标准”就可以被允许上市了，并不要求与原研药生物等效，而这个“国家标准”又制定得极不合理，有很多漏洞可钻，结果可想而知。

从表面上看，降低标准可以把仿制药的成本降下来，好让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民众也能买得起药。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有了钱又懂了事的中国人都会千方百计地去买高质量的进口药，导致一些进口药厂商即使过了专利期也不降价，反而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药品的价格，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所以说，中国之所以在仿制药的定义上另起炉灶，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体质特殊，而是因为一些人在“中国标准”的保护下，暗地里谋取个人私利。换句话说，一些中国人之所以总想甩掉世界另立山头，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是因为夜郎自大，但更多的人则是打算浑水摸鱼。

新药之所以难以进中国，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一些人同样打着支持“中国标准”的旗帜，拖延进

口新药的审批，希望能拖到专利保护到期，然后国产仿制药便能一哄而上，大赚其钱了。问题在于，如今信息发达，一定会有人明白过来，选择跨境医疗。

“对于这次改革的原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这是最近几年我国迅猛发展的医药行业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沈阳药科大学亦弘商学院院长张象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指出，“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老百姓对于健康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医药行业的属性使得它必须顺应这一发展。再加上早年出国留学人员纷纷回国创业，他们从国外带回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促使药物研发的理念和模式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对国内原有的相对滞后的监管理念和体制等提出了挑战。恰在此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开明的领导人，改革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张象麟曾经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下属的药品审评中心（CDE）做过8年的主任，对中国药品行业的发展历史颇为了解。他说：“这次CFDA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是以注册为切入点，带动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等环节的一系列改革，在效率和质量两方面同时发力。”

以前CFDA的新药注册程序非常烦琐，光是申请临床试验的资格有时候就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批下来。此次改革的目标是把注册制改为备案制，想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的药厂只要在CDE备过案就可以开始做了，这就大大缩短了新药研发的时间。

外国新药之所以必须通过国内的临床试验才能进中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欧美人种和中国人种不一样。其实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外国药企在研发新药的时候并不是只在欧美人身上做试验，海外华侨们生病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吃那些药的，医生们只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性别和体重）对剂量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而已。

因此，新药难进中国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经济层面的。一方面国家需要保护中国药企，给他们一个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考虑医疗保险的支付能力，因为绝大多数新药都非常贵。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药品政策和该国采用的药品支付体系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国家支付的话，那么新药的进口速度就会相对慢一些，管理也更严格，比如大多数欧盟国家就是如此。如果是市场为主，由保险公司支付医药费的话，新药的上市速度就会快一些，管理也会相对较松，美国就是如此。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的医保覆盖范围和全民健康

管理体系通常会更加健全一些，但后者对于医药产业的发展更有利，不差钱的病人往往会首先获益，之后普通老百姓也会跟着受益。

不管怎样，制药毕竟是一门科学。一个国家无论采取哪种药品政策，基本的科学原则还是要遵守的。中国这一轮医药改革的核心诉求就是和国际接轨，而在药品方面，世界各国公认的最高管理机构就是“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简称ICH）。这是1990年在布鲁塞尔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专门负责为药品的研发和审批上市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指导标准，以便更好地利用临床、药理学和药理数据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加快新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发使用。

全世界绝大部分现代化国家都加入了ICH，中国虽然借鉴了ICH的部分原则，但一直没有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使得中国的制药业可以一直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这个局面直到2017年才终于有了根本转变，6月1日儿童节这天，中国正式成为ICH的一员，我们终于在药物的科学标准方面和国际接轨了。

这件事意义重大，从此以后中国就不能随意制定所谓“中国特色”的医药原则了，而是必须和国际主流的做法保持一致，像新药的临床试验标准、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和药品的专利保护制度等等都必须和国际接轨。

当然了，中国才刚刚加入ICH，很多地方都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医学不应该分成中医和西医，或者外国医学和中国医学，而是应该只有一种医学——人类医学。■



（张象麟）

癌痛可以有效控制!

何为癌痛?

癌性疼痛是疼痛部位需要修复或调节的信息传到神经中枢后引起的感觉, 又称癌痛、晚期癌痛, 是造成癌晚期患者主要痛苦的原因之一。癌痛的原因可分三类: 肿瘤直接引起的疼痛, 约占 88%; 癌症治疗引起的疼痛, 约占 11%; 肿瘤间接引起的疼痛, 约占 1%。

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 全世界每年有 1000 万新发癌症患者, 600 万人死于癌症, 其中 50% 的患者有癌痛症状, 70% 的晚期癌症患者以疼痛为主要症状。在疼痛患者中, 因各种原因使 50%~80% 的疼痛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许多患者和家属认为癌痛无法避免, 是癌症治疗无效的特征, 加之此时患者由于癌痛而进食差、乏力、活动受限、难以入眠, 使患者和家属丧失了对抗癌症的信心, 放弃了积极的治疗。

实际上, 这是一个癌症观念的误区——大部分癌痛都可以通过治疗而得到控制。医学研究表明, 癌痛使机体免疫功能降低, 镇痛治疗可改善免疫功能, 而加强免疫功能则有助于控制癌痛。目前, 国内外治疗癌痛的方法有很多种, 包括药物治疗、激素治疗、物理治疗等等, 其目的都是为了解除患者痛苦、消除疼痛, 使用最佳方法, 提高生存质量。

医学界按照 0~10 分给疼痛程度定级: 0 为无痛; 0 到 3 分为轻度疼痛; 达到 4 分就会影响睡眠, 4 到 6 分为中度疼痛; 达到 7 分会无法入睡; 7 分以上为重度疼痛; 10 分为剧痛。

如果将癌痛程度对应现实中的疼痛, 以上几个等级大约分别是: 指尖刺手背、用力鼓掌, 约 1~3 级; 头发被拉扯、锥子刺大腿, 小于等于 4 级; 刀切到手, 软组织挫伤、扭伤等, 约 4~7 级; 生产时, 前期持续性的疼痛, 2~3 级, 宫缩最厉害时, 达到 7~8 级; 三度烧伤、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重度血管性头痛、偏头痛, 8~9 级; 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引发的神经痛、晚期肿瘤压迫神经引发的癌性疼痛等, 10 级。

患者应该如何面对癌痛?

第一步, 向癌症医疗团队描述你的疼痛, 告诉他们, 如果将疼痛分为 10 级, 你的疼痛大概是几级。试着用一些词语来描绘你的疼痛: 剧痛、钝痛、绞痛、压痛、刺痛……给医生一些具体信息, 比如疼痛的发生地点、开始时间、频率等。

第二步, 不要因为这些恐惧而处于疼痛当中。这些恐惧通常包括:

- ❶ 害怕你会用药上瘾。因癌痛而服药与吸毒并不是一回事。只要你以正确的方式服药, 几乎是不可能上瘾的。你应当与你的医生、护士或者药剂师交谈如何安全地用药。
- ❷ 害怕向别人倾诉。寻找缓解疼痛的办法并不是软弱的表现。
- ❸ 害怕失去控制。大多数人以正确的方式服药时, 并不会失去控制。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也可以被治疗, 有时它们在第一次发作时就可以被阻止。你可能会在服用新的药物后感到困倦, 但是这种症状会在几天后消失。

在这方面, 家属需要做的其实很多。比如鼓励患者主动描述疼痛的程度, 向患者传达止痛治疗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部分, 忍痛对患者有害无益的理念; 鼓励患者, 告诉他们多数癌痛可通过药物治疗有效控制, 患者应当在医师指导下进行止痛治疗, 规律服药, 不宜自行调整止痛药剂量和止痛方案; 为患者解除顾虑, 讲解吗啡及其同类药物是癌痛治疗的常用药物, 在癌痛治疗时应用吗啡类药物引起成瘾的现象极为罕见。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 家属应当确保药物安全放置, 避免误食或受环境影响而失效。在患者进行镇痛治疗时, 家属要密切观察疗效和药物的不良反应, 随时与医护人员沟通, 调整治疗目标及治疗措施。同时, 家属应当熟悉定期复诊或随访的日程安排和流程, 陪同患者进行复诊和随访。

癌痛信息咨询:

美国癌症协会网站 www.cancer.org, 电话: 1-800-227-2345;

中国抗癌协会网站 www.caca.org, 电话: 022-23359958; 中国癌症网网站 www.zgaz.org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 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病人自述：改变那些我能改变的事

文 / 圈圈

一直祈祷奇迹发生，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

距离自己癌症确诊的第465天，美国的主治医生宣布：你体内已检测不到癌细胞，不仅可以随时停药，连原定的手术都没有必要做了。

那天，我和家人包括医生全都喜极而泣，窗外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五月天，我们久久地被那重生的巨大喜悦包围着，欢喜到只想喊出四个字——活着万岁。

就在465天前，34岁的我被诊断为恶性黑色素瘤晚期，国内医生预估的存活时间为1年。这份“死亡通知书”让我和家人站在了绝望的边缘。

一年多时间里，奇迹一点点在我身上发生，我虽不幸患癌却又有幸重生，从“绝症”走到“治愈”，我始终心怀感恩，除了内心的坚持和勇气，我更庆幸当初做下的决定——赴美就医。生存，关键是有质量地生存，对我来说，希望已经照进了现实。

突如其来的噩耗

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2016年1月22日，意外来了，明天于我而言变得屈指可数。

那天，一周前原以为的普通囊肿手术出了病理报告，上海国妇婴的主刀医生用私人手机给我打了电话。

“你的家属在吗？”她在电话那头问。

虽然手术前有张告知书，上面列明了手术有可能带来的各种意外，其中有一条：不排除恶性肿瘤可能，需要进一步治疗，但我觉得那不过是各种最坏情况的罗列告知罢了。虽然各种电视剧桥段中，告知重大病情时都是那句“家属在吗”，但我觉得生活毕竟不是电视剧。

然而，属于我人生的剧情急转直下，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噩耗——“恶性黑色素瘤”。这六个字把我瞬间拉进了死亡阴影密布的黑暗里。

死亡的阴影迅速笼罩过来。“恶性程度极高，恐怕只有一年。”怎么会？怎么会！从来没有为健康问题忧心过的我怎么就命在旦夕了呢？5个月前刚刚诞下二宝，儿女双全的幸福人生刚刚开始，却瞬间从天堂掉入了地狱，人生啊，你太残酷！

那几天，正好是上海最冷最冷的几天，零下9摄氏度，寒风肆虐，而比天气更冷的是我和家人的心，绝望侵袭下的刺痛刺心。那几天我们把眼泪都哭尽了，要不就是假装在笑，却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泪流满面。浑浑噩噩如在梦里，却又一次次被恐惧和眼泪唤醒。对于叵测的未来我不敢想又忍不住想，我和先生在飘着冷雨的街头抱头痛哭，因为在家里，我们不敢哭出声。

寻找救命方案

当自己成为病患时，那些原本陌生的医学名词、病情描述都会成为一根根针，扎在原本就害怕到极点的心尖上，尤其在深夜，翻江倒海地在脑子里酝酿发酵，变成一种无边的恐惧。

为此，先生让我不要进行任何搜索，他一边伤心崩溃，一边重整旗鼓为我寻找救命方案。同时，我们动用了身边所有的资源和人脉。一周的时间里，做了所有该做的检查，见了所有该见的权威专家。

恶性黑色素瘤在亚洲地区本来就不多见，且大都见于皮肤表层，而我的原发部位在体内黏膜处。“极罕见、极凶险”是所有专家对我病情的总结。肿瘤医院给出的方案是，手术太过残酷且未必能够保命，建议先化疗再看，存活期难说。国妇婴的方案则是如需手术要尽快进行，手术后紧跟上化疗和放疗，而手术方案听下来基本是将盆腔内的器官清空。当时已临近春节，医院的住院病房开始陆续清散病人，但国妇婴方面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你的病情太凶险，只要你愿意，这个手术我们接。”

两个方案听下来，我的总结就是，一个希望渺茫，能活一天是一天；一个半身不遂生命基本没质量。我实在不敢想象那个奄奄一息瘫痪在床屎尿求人还要继续化疗放疗的我，也不敢想象掉着头发等待死



位于美国休斯敦的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患者和朋友在休息区聊天

亡最后降临的我，更不敢想象陪着我在无边黑暗中煎熬的家人。

“不治了！”我当时心里就这么想的，与其散尽千金奄奄而走，不如把最后的人生过得有质量一些。

那些日子真的是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痛苦时光，在各种检查、会诊、寻找生机、绝望痛苦中一分一秒地熬过来。我们在绝望时搜索到了一种美国 FDA 在 2014 年特批的新药 PD-1 抑制剂——一种化疗之外的新疗法，叫作“免疫疗法”。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圣诞节，用药 5 个月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宣布自己已经 Cancer Free，扩散至脑部的恶黑肿瘤消失；另外 20% 的临床试验显示肿瘤能够完全消退。那里是美国，我必须去！虽然面临的是巨额花费，但至少生存下去的希望。病魔尚在，心魔开始一点点退却。

目标明确，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找到最合适的医院。国内有专门做海外医疗的中介机构，我们觉得这笔钱花得没有性价比，毕竟治疗重病不比其

他，除非你完全不差钱，否则每一分钱都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经过辗转联系，在美国有着 23 年医疗服务行业经历的美籍华人陈立和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查尔斯·鲍尔奇 (Charles M. Balch) 伸出了援手，最终敲定了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SKCC) 的主治医生和会诊时间，一切进展得快速而顺利。

于是农历春节还未过完，我们便艰难地割舍下父母和孩子，登上了从上海飞往纽约的航班，那一头是全球最顶尖的癌症治疗医院，也是我生命最后的希望所在。

初来乍到 MSKCC

MSKCC 位于曼哈顿中城区的 53 街。这个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新发布的美国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中位居癌症专科第二名的治疗中心，门面却



瑞士日内瓦某医院的医生在为一名男子检查身上的黑痣

低调得很，不仔细看就是一幢极普通的商务楼，完全不似国内医院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走进 MSKCC，先到国际中心报到。说一个细节，电梯内摆着两座沙发，方便体力不支的病人在乘坐电梯时能够休息，考虑得实在细心周到。11 楼是国际中心，在前台报过名字后，我领到了一本厚厚的文件夹——中心介绍、写着我名字抬头的欢迎信、当日预约时间表、一本类似“玩转纽约”的行游指南，还有一堆 Paperwork 要完成。除了基本信息、以往健康情况，还有近期服用的药物表格，包括维生素、钙片都得写上去，如有服用中药，中心还有专门的医生会分析中药的成分。

这张表格我交了空白卷。其实一旦成为癌症病人，周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蜂拥而至，中药、营养品、补品，有号称获得诺贝尔奖的、有号称医好了各种癌的、有号称无须服药也能奇迹痊愈的，更有大仙神医、山野偏方。但此时最忌病急乱投医，信息可以多收集，但一定要理性判断，无法证实的治愈率等同于零治愈率，直接可以打入“不靠谱”冷宫。心存感念，相信科学才是最正确的心态和做法。

再回到 MSKCC，医院会给国际病人安排翻译和病人代表。所谓病人代表就是医院客服，负责接待病人，办理手续并详细介绍医院情况，而翻译则由医院免费提供，帮助医生和患者沟通。

办好了所有手续，便转到候诊区等待见医，除了有沙发软座，医院还提供免费的杂志、报纸、咖啡、茶饮及零食。不用担心过号的问题，轮到你时，就会有带领员领着进入诊区中属于病人自己的独立诊室。在美国，医院尤其注重保护病人的隐私，每个诊室都是一个被保护的独立空间。和国内闹哄哄的医生诊室不同，这里的单间干净明亮，还有独立的卫生间，而医生则是按照先后顺序，逐间“串门”见病人。

我先见的是手术医生 Mario M. Leitao，他擅长微创和机器人手术，算得上美国妇科肿瘤界的超级大牛。

在正式与医生见面前，护士会先量血压、测体温，医生助理则先进行病情咨询，了解家族病史及描述体感，这些记录都会让医生预知。

而在国内，即便像癌症这样的重大病情，首次

门诊一般也只有五分钟，从了解病情、看报告、出方案，一套流水线工作就完成了。我在国内时见过某医院一相关专家，当时的感觉就是想说的没说尽，想了解的也没了解透，进去时迷茫，出来时更多了重重焦虑。虽然我理解国内医生的忙碌程度，但作为病人，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及其效果与副作用、病情未来可能的走势真的太重要，因为癌症病人的恐惧大都来自于未知。

和我的救命“男神”们碰面

很快，Leitao 医生来了，他进来的时候，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走错了房间，帅且不说，西装革履，打着漂亮领带，没有想象中的白大褂。他很有礼貌地握手问好，自我介绍，然后向我了解病情，做了检查。他告诉我，原发部位的病灶较大，会是个大手术，他用了 Huge 一词形容手术的残酷程度，因此暂时不考虑手术。

这个说法和肿瘤医院的建议一样，只是我一直没有理解既然手术可以去除病灶，为何对于病情控制却没有作用。Leitao 解释说，我的病情已经转移到盆腔淋巴，表示癌细胞已经具备了远程转移的能力。手术只是摘除原有病灶，且手术后康复期很难用药治疗，这会导致在别的地方微小且目前无法检查到的癌细胞继续疯狂扩散。之前的疑问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为此，Leitao 建议，先用抗黑色素方面的药物进行控制，目前已有新药并且具有可喜的效果，用药之后再进行评估。

Leitao 是手术医生，也就是说我需要手术时将再回到他的手上，而之后最重要的用药方案将由黑色素瘤方面的专家负责。他就是 Alexander Shoushtari 医生，Alexander（亚历山大），后面就叫他“山大”医生吧。

我先普及一下何谓恶性黑色素瘤。这是一种从黑色素细胞发展而来的癌症，是皮肤癌中恶性程度极高的罕见癌症，甚至有“癌中之王”的称号。多见于皮肤，也可能出现在口腔、肠道、眼睛等黏膜处。大约有 25% 的黑色瘤是从痣发展而来，比如电影《非诚勿扰 2》中孙红雷饰演的铁汉商人李香山，虽有万贯家财却“折”在了脚底的一颗黑痣上，也给国人普及了这个“有痣抓紧除”的罕见癌症。对于肤色较浅的人而言，紫外线暴露是造成黑色素瘤的

主因，澳洲和新西兰的黑色瘤发生率为全球最高，欧洲和北美洲也有高发生率，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生率则较低。

恶性黑色素瘤在国内由于发病率少，因此肿瘤医院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更别提细分了。而 MSKCC 的黑色瘤专家则分类很细，有专攻皮肤恶黑专家，还有内科专家，以及专攻葡萄膜恶黑的专家。比如我的病情，皮肤类型的恶黑专家未必最适合。“山大”医生专攻的是新药运用，研究遗传基因在病发和治疗中的作用。他领衔的实验组就有 5 个，临床上更多处于配合其他科室共同解决恶黑肿瘤的角色。

同样西装革履的“山大”医生看起来比较敦实，他开门见山：“我和我的团队将为治好你的病做最大努力！”对于我病例的特殊性，他介绍说，欧美的恶黑多发于皮肤，而黏膜恶黑以亚洲人居多。相较于前者，后者的扩散速度更快，有他处转移，意味着癌细胞将向其他脏器、血液、骨头以及脑转移。而这正是我当时的情况。

由于我的病情不适宜手术，免疫疗法无疑是最优选择。和以往的抗癌手段相比，免疫疗法最本质的区别是：它针对免疫细胞，而不是癌细胞。它的目的是激活免疫系统，让它去杀死癌细胞。且这种药物相对于传统的化疗有巨大优势——不直接制造损伤，反而增强免疫系统，可以抑制癌细胞进化，减低复发率。因此，施贵宝的 Opdivo 和默沙东的 Keytruda（一般称为 O 药和 K 药）将成为我之后治疗方案里的主导药物。

免疫疗法的方案也有两种，A 方案是同时用 O 药和伊匹单抗，即双药联用；B 方案是只使用 O 药，加上放疗。

从目前已有的临床试验效果来看，A 方案对于癌细胞的控制降低率达到 30%~40%，而 B 方案为 20%~25%。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同，A 方案的花费更高，且伴随的副作用更大。“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可以参与我的临床试验项目。”“山大”医生说，加入临床试验意味着可以免费用药，但门槛就是转移处的肿瘤至少要达到 1.5 厘米大小。

整个问诊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医生耐心解答了各种问题，并且边解答边做了一份草稿，有文字有画图，清晰了然，临走时他将记录复印了一份特地交给我们。

“Please save me！”我对“山大”医生说。

他给了我一个无比坚定的眼神，说：“Trust

me！”并给我和老公两人大大的拥抱。

有的时候希望不是那数据上百分之多少的存活率，而是在治疗过程中的坚持、乐观和自信，远离恐惧痛苦，获得尊严、关爱和体谅，即便最坏的结果是抵抗不过死神，那也至少证明我们战斗过。

想到要花钱，没想到这么多

正当我信心满满地等待治疗正式开始，进展却没有想象中顺利。叫停 MSKCC 的治疗，转到休斯敦，重新就诊，再叫停，二度飞往纽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辗转寻找最佳方案，治疗上毫无进展，最关键的原因便是资金。

账单上庞大的数字远远超出开始时的估算，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治疗经费问题。

癌症治疗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好的治疗方法、时间和钱，可以说是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三要素，缺一不可。钱不够，就没法开始治疗，而要在短时间内凑足这么大笔资金，砸锅卖铁都很难赶上趟儿。

单从 MSKCC 来看，医院对于外国人的“强势条款”有三条：

1. 估算一笔半年或是一年的费用（算半年还是算一年以初步治疗方案而定），需要在开始治疗前一次性付清总额，你想要用一次药算一次钱或者一月一付，没门儿！

2. 所有的治疗费用还要再加收近 10% 的税，收款方——纽约州。

3. 报价基本就是一口价，之后再多退少补。

于是，时间和资金的博弈成为我寻找到治疗方案之后的新难题。

MSKCC 治疗方案：O 药治疗 + 放疗 + 手术

第一轮报价：20.6 万美元（此金额只是用药价格，不含放疗和手术）。

3月9日，原本要进行的第一次 O 药治疗被取消，因为在两天前 MSKCC 国际部发来账单邮件，要求我们预付 6 个月的费用，共计 20.6 万美元。

于是，我们遇到了第一轮资金难题：

第一，手头现金尚不足交付这一轮的费用。

第二，即便够了，钱全砸在用药环节，先把手术放一边不谈，紧接着的放疗花费巨大，这部分资金如何应对？

绝对不能孤注一掷，治疗的路还长着，一笔下去后续乏力更糟糕。

后来，“山大”医生帮我们做了个估算，手术至少要 50 万美元，上浮空间有可能到 80 万美元。

于是我们果断开始寻找美国的其他医院，尤其是临床试验项目，同时联系香港地区的诊所。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神奇的香港。第一个神奇之处：这里的药品管制极其松散，一个诊所除了看病还能兼当药商。没有什么处方药的说法，你想要什么药，只要他们有的，就能卖给你，至于之后怎么使用，效果如何，一经售出，概不负责。

反观美国，PD-1 抑制剂在当时只批准用于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目前使用范围已经扩大至多个瘤种），其他癌症根本不可能使用。而在中国，要等这药批准上市更是遥遥无期。

另一个神奇之处就是价格便宜。同样的药，美国研发美国生产，在本国价格非常高，香港地区的价格基本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神奇的香港”成了许多人的希望之地。不少人到香港买了药再回到内地找相熟的医院或是医生注射，还有人甚至通过上门服务 APP 找人注射，因为在香港注射一次诊所要收取服务费 5000 港元。

还有其他癌症的病患，化疗无效后，也会买 PD-1 抑制剂来用，死马当活马医。香港、澳门几位销售此药物的医生赫赫有名，拼价格博人气，服务还不断升级。

于是，我们也将香港列为了备选项，但这一选项最大的风险就是药品使用缺乏经验，对副作用无力控制。

此时，鲍尔奇教授又出马了，这位从事黑色素瘤研究 40 年的老专家用自己的人脉帮我们联系各家癌症中心，最后他告诉了我们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休斯敦的美国 MD Anderson 黑色素瘤中心认为我的情况基本符合入临床的要求，但需要进一步检查而定，机会很大。我可以即刻就诊，如果一切顺利，两周内开始治疗。

要知道，美国 MD Anderson 的初诊排队，说什么也得半个月到一个月，去试试看吧！3月12日我从纽约飞抵休斯敦。

MD Anderson 入临床失败，重新转回纽约

之前我提到 MSKCC 是全美排名第二的癌症中心，

那么排名第一的是哪家呢？

就是这儿了——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27年来稳居全美癌症中心的头把交椅。坐落在得州医疗中心最核心的位置，绝对是休斯敦的闪亮名片，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影子，甚至商场里的儿童乐园都赫然印着它赞助的大招牌。医院的招牌也非常抢眼，Cancer这个单词，中间一道飞血将之劈开，随处可见各种标语——“Making cancer history”(让癌症成为历史)，“Together, we can end cancer”(团结起来，我们可以终结癌症)，让人看着斗志满满。这个医院非常大，一般要按照电梯编号寻找定位，一座连接几个副楼的天桥，快步走一趟都得15分钟。

我们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医院里整整泡了一天，见了3位医生，做了各种检查，包括CT。MD Anderson治疗方案：0药+伊匹单抗双药联用4次，之后转0药单药治疗，视情况手术。第一轮报价：30.8万美元（仅开始4次的用药价格）。

对于临床试验，黑色素瘤中心的Amaria医生介绍说，这里有两组试验，一组是单用0药，另一组是两药联用，试验目的在于测试两种用药方式的效果差别，用药之后再行手术。至于我能加入哪个组别，只能交给电脑随机抽取。这里的入组门槛是——适合手术。遗憾的是，这条标准我又没有通过。对此，Amaria医生表示了抱歉，知道我是因为资金问题飞来休斯敦，她告诉我们两药联用价格更高，而且因为副作用问题急诊入院的比例高达50%，随之产生的住院费也相当昂贵。

更糟糕的是，我的病情开始有明显恶化的倾向。“情况非常凶险，必须在两周内开始治疗。”Amaria说。

好在，检测结果并没有影响脑子的运转。“如果扩散部位增大了，是否就符合纽约临床试验的标准了？”我问Amaria。她两眼迅速放光，说“我这就去打电话帮你问”。与此同时，她也让医院尽快将预算发给我们。

药费+服务费+诊费，一次的价格就是7.7612万美元，也就是说前面4次治疗就要花掉31万美元。别说缺口太大，就冲这笔钱只能治3个月就完全无法考虑。

此时，焦急、害怕、迷茫都无济于事。我对自己说，一定不能乱了分寸，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方案缓解的不过是阵痛问题。

于是，我们又启动了几种备选方案：1. 香港。2. 纽约。3. 费城。

我需要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多了个费城。因为那里有个科研项目组，和临床试验不同，药钱不能免，但比医院用药便宜很多。只是，我们看到费城的报价单还是打了退堂鼓，因为头4次治疗费用23万美元，比MD Anderson便宜了8万多，但还是太贵！

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得到了MSKCC的回复，大意是——看起来有戏。

一周后，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消息——Yes！于是我们又翻出了羽绒服，重返纽约。

虽然遭遇了不小的难题，但好在我们幸运地一关关攻克，尤其加入试验组，更免除了天价药费（约40万~45万美元）。请注意，不是完全免费哦，全年的医院服务费、医生费用、急诊住院的综合费用预支，必须一次性付清28.5万美元。

从飞抵美国算起，我为了选择最优且最实惠的治疗方案，耗时将近两个月，治疗正式开始前真有一种行将上战场的感觉。我在心里默念：请上帝赐给我祥和，让我欣然接受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请上帝赐给我勇气，让我改变那些我能改变的事。

6周后奇迹降临

说实话，开始治疗之后的日子过得有些忐忑，担心万一药没效果，担心副作用太大，担心……

这些焦虑都被医生的“化骨绵掌”给打消了。他们详细告知了药物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并交代我“遇到与之前不同的任何身体反应，不要自己判断自己扛，也不要考虑要不要打电话，甚至不用有任何思考，只要打电话就对了，剩下的交给我们来判断”。病人的恐慌，医生们都替你兜着了。

经常有国内的朋友问我，是否住在医院？其实，注射完药物就可以直接回家了，除非需要急诊，否则医院只需要每隔三周来报到一次就好。这在国内的病人看来也是不敢想象的，想来也是因为医患之间有畅通的沟通渠道。

用药两次后就要进行第一轮效果评测，因为PD-1抑制剂虽神，却并非药到病除。

一组来自美国癌症研究会年会的数据，两药联合治疗恶性黑色素瘤，随访一年半的数据显示：142例患者，2：1分配到双药治疗组和单药治疗组。结果，联合治疗组的有效率为61%，而单药治疗组

的有效率只有11%。生存方面，联合治疗组一年的无疾病进展生存率是55.1%，一年半为53.4%。也就是说使用联合疗法，过了一年，55.1%的病人病情稳定，一年半以后几乎全部继续稳定，再说得透彻点，就是这50%左右的患者，有可能病情一直稳定下去。

我至少希望自己能够挤进这50%的阵营中。对于药效，“山大”医生似乎显得很乐观：“只要肿瘤大小维持平稳，就说明药有效果，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肿瘤明显缩小，但这需要运气。”

第一次CT之后，等待的心情更是焦急，一天晚上梦到自己肿瘤缩小了，梦中狂喜，醒来又担心梦是反的。期待医院来电话，又害怕医院来电话。

最终，我等到了那个Great News——病灶和原始转移灶都已经明显缩小了一半，还有几个细微转移处已消失，原本出现的肺部阴影也消失了。这样的消息对我而言无疑是最最振奋人心的，瞬间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那天我和老公再一次相拥而泣，只是这次的眼泪终于是欢喜的泪花。

用药4次后，原始病灶已经缩至原大小的1/8，再往后的CT报告中一直显示肿瘤在持续缩小，原本面目狰狞的肿瘤君已逐渐败下阵去。

2017年5月2日，这天将是我未来人生的第二个生日。根据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医生宣布我体内已经检测不出任何癌细胞，不仅可以停药，连计划中的手术都不再有必要了。“我可以如正常人一般生活了吗？”“山大”医生的回答是：“Yes, better than normal life!”（是的，比正常人活得更好！）

临床试验未必是小白鼠

加入试验组免去了高达几十万美元的天价药费，一般会认为准入门槛很高手续复杂，实际上，整个过程简单得超乎想象。院方介绍完实验目的、流程、风险，病人只需签字认可就行。

临床试验=小白鼠？也不全然。比如我所在的这个试验组用的是已经上市的药，并严格按照FDA批准的剂量用药，其试验目的不在于探索药效，而在于获取治疗效果的真实数据。

如果你登录<http://clinicaltrials.gov>就会发现美国有太多的临床试验需要测试。前不久《纽约时报》有篇文章称，美国正遭遇医学研究中前所未有的难题——太多癌症药物亟待试验，却没有足够的病人。

我在美国最深刻的体验就是，这里进组的标准稳定，只要符合标准，无论你来自什么国家、什么种族、富裕与否，标准对于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且样本数据量很大。我所在的试验组可以接收200多位病人，还有些试验组接收上千名病人，只要“达标”即可入组，且病人可以自行决定何时退出。而国内的试验组一般只招20人，对于我国庞大人口产生的庞大病人基数来说，机会就变得极其渺茫。

当然，选择试验组一定要看方案是否适合自己。比如我的情况需要两药联用，只用单药的话，可能既无效果又浪费了时间。恐怕，只有到了走投无路才会选择特别有实验性质的试验组碰碰运气，比如那些最早开始进组的黑色素瘤晚期病人。这些患者大多是2008年入组，大都尝试了两种以上的治疗方案均以失败告终。对于他们而言，可谓是山穷水尽，甚至不少患者只有几个星期的存活时间。幸运的是，这些进组的病人中有人已经随访了7年。更重要的是，有些活过4年的患者，似乎已经被“临床治愈”了，因为从那以后，病情就一直稳定，不再变化。

战胜癌症，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如果你要问我，赴美就医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真的是因人而异。除了费用问题让人望而却步之外，海外就医意味着要签证、翻译病历、联系医院、寻觅医生、预约排期、长途飞行，还要安排在当地食宿以及克服语言障碍，对不少国人来说，这都是不可逾越的困难。

于我而言，最大的困难就是亲子分离，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尚且年幼，一个4岁，一个还不满半岁，那份牵挂甚至超过了我对自己病情的恐惧。在开始正式治疗之后，我和先生回国将孩子们一直带在身边，分离两个月，女儿在久别重逢时抱着我们大哭，那天我们流了好多眼泪，她抱着我说：“妈妈，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了好吗？”小儿子则依偎在奶奶怀里，努力在短暂的记忆里寻找属于这两个陌生人的印记。

不能让他们没有了妈妈！这也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我女儿经常问我：“妈妈，你身体里的坏精灵变小了吗？”“是的，它原来有拳头那么大，后来变成了大拇指大小，再后来变成了指甲盖大小，最后全都消失不见了。”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真心觉得自己拥有的是一个癌症病人最好的治疗和状态。不知道情况的人压根看不出我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我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运动、读书、写字、做饭、带娃，有时候还逛街、旅行；而所有知道我病情的人都会从一开始的震惊中缓过神来惊叹，你的状态和心态都太好了！

后来，我开了一个公众号“圈圈美医行记”，把我所知的赴美就医的见闻、经验总结成干货发布在上面，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要问我，赴美就医最大的决心来自哪里？

就是为了活着，而这需要有最好的药，最前沿的临床科研。医院环境、服务这些对于追求实惠的我来说并不重要，如果国内也有相应的药物和治疗方案，谁愿意抛家舍业、远渡重洋。其实国内并不乏好医生，比如国内的一位专家，在我去过的两家医院内都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他自己也对病人说，手上有的只是“小米加步枪”。

如果你要问我，赴美就医总结出的最宝贵经验

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放眼全球寻找医疗资源，寻找最匹配的医疗机构和医生，确定好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后再行动，毕竟有药可救才是真正的王道。不要为了和时间赛跑，贸然进行化疗或者手术，做第一步还得想好之后该怎么办。治疗大病难有回头路，否则耽误的是更多的时间。

战胜癌症，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放弃希望直到没有希望为止，珍惜当下，心怀感念，真心祈祷，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决定吧。

如果你要让我用一个词总结我的整个癌症旅程，我会选择“幸运”。按“山大”医生的话说，每个病人都希望如我一般幸运，最好的效果，最小的副作用。

赴美治疗癌症并不是一条必生之路，比如与我同期赴美的病人中，好几位在前不久都因治疗无效而过世了。因此，对于病人来说，赴美这条路只是一个新的选择，是在生命的重要关口上，多出来的那一条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有选择已经是最幸运的事情了。☑



位于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是全美顶级癌症治疗中心之一

“一代人一遇”的美国税改

主笔 / 谢九

特朗普税改方案如果获得通过，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将带来深远影响。

9月底，备受瞩目的特朗普税改方案框架终于公开亮相，被特朗普称为“一代人一遇”的美国大减税，正在一步步推进之中。

从税改框架来看，最值得关注的核心内容有四点：一是将美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从最高35%降至最高不超过20%；二是个人所得税税级由七档简化为三档，分别是12%、25%和35%，但是免税标准提高了一倍；三是取消遗产税；四是美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的税率从现有的35%大幅下调为10%。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美国企业的所得税问题。今年5月初，特朗普上任百日之后，首次抛出大规模减税计划，公司所得税的消减就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当时特朗普的计划是将美国企业的所得税从35%大幅降至15%，方案出台后迅速震撼了全球市场，特朗普的税改也因此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减税。

不过，或许是考虑到实际执行能力，从最新的税改方案来看，特朗普对于公司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有所调整，从计划15%的所得税率调整为20%。不过即使如此，20%的所得税率在全球范围内也还是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平均水平大概为25%，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如果降至20%，将对全球企业的投资方向带来重大影响。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高素质的人才等等，如果再加上极具竞争力的税率，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中国作为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头号大国，将在最大程度上承受特朗普税改的冲击。

从中美的税收体系来看，中国的税收对象主要以企业为主，我国的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大概40%，其次是企业所得税，贡献了超过20%的税收，仅仅这两大税种就已经在中国的税收体系里占据六成以上的比重。相比之下，美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个人，对于企业征收的比重不算太大。从企业的角

度来看，美国企业没有增值税，企业的主要税负是所得税，占联邦税收的比重大概只有10%，而个人所得税是美国联邦税收的主要来源，大概占比四成左右。

由于中美之间企业税收体系的差异，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赴美建厂投资，去年年底，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设厂，并且公开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宏观税负比美国高35%”，更是引发了中美企业税负的大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美国税改再度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于中国乃至全球企业的吸引力将是不言而喻。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投资增速放缓的压力，尤其是二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逐月下滑，从投资来源看，外商和民营资本投资都呈现下滑趋势，仅仅依靠国有资本独撑大局。如果未来特朗普税改方案能够正式实施，对于中国而言，国有资本的影响预计不会太大，但是外商和民营资本可能会受到明显冲击，中国经济的投资不可能仅仅依靠国有资本，外商和民营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从外商投资来看，虽然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资本短缺国家，外商投资规模在当前中国经济体量中占比也降到了较低的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商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已经可有可无。外商直接投资的含金量一直很高，在解决就业、创造税收、提升中方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4500万，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10%。

民营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更加不言而喻。2012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六成，大概80%的就业岗位和60%的税收由民营经济所创造。2016年，国内的民营投资一度呈现雪崩之势，2017年上半年稍有起色，如果特朗普税改最终成行，预计对于中国的民营资本将会产生难以忽视的影响力，如果大量民营资本转移至美国，这将对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冲击。

特朗普税改最终能否获得通过，最大的障碍在于如何解决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9月底公布的减税框架对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详细论述，这也使得财政赤字问题成为税改的最大悬念。

按照美国很多专业机构的测算，特朗普的税改方案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让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3万亿到5万亿美元。特朗普本人也承认减税会带来赤字问题，但他认为减税将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预计财政赤字问题一到两年后就会消失。特朗普认为税改是美国经济腾飞的火箭级燃料，将增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和对美国人的凝聚力。美国财长姆努钦认为，税改将在未来10年把美国经济增速提振到2.9%或更高，会产生2万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收入，这样能消除至少1万亿美元联邦赤字。不过，减税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特朗普税改想要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细节。

除了财政赤字问题之外，特朗普税改的另外一大争议在于，很多人认为税改是一场“劫富济贫”的运动，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取消遗产税，以及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富人都是税改的最大受益者。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分析，美国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将获得税改50%以上的收益，他们才是特朗普税改的最大赢家，而28%的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将会逐渐提高。

事实上，通过税改使富人受益，可能也正是特朗普税改所希望达到的效果。经济学上有一个说法叫作涓滴效应，大意就是说政府通过减轻富人的负担，

可以刺激富人更多地消费和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可以更大程度地惠及穷人，相比之下，这种办法比政府直接救助和补贴穷人的效果更好。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实施供给经济学，通过对富人减税来刺激经济，被视为涓滴经济学的代表。特朗普此次实施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减税，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里根政府的做法，在减税框架里更多向富人倾斜，希望通过刺激富人的消费和投资来增加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减税带来的赤字问题。

不过，所谓的涓滴效应更多只是一种理论，对富人减税来带动贫困人群的财富增长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操作不当可能反而会带来“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结果。另外，税改方案如果过于向富人倾斜，也容易引发民众的反对。在特朗普税改框架公布之后，因为总体上对富人过于友好，迅速引发了巨大的批评声浪，压力之下，特朗普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做出修改，使得税改方案“更强大和非常受欢迎”。

考虑到财政赤字的压力，以及民众对税改过多惠及富人的不满，预计特朗普的税改最终将是一个妥协的版本，总量上减税规模将会有所缩水，结构上更多兼顾中产阶级。但即使是一个多方妥协的减税方案，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都将带来不可忽略的冲击以及借鉴效应。■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年第十期要目

封面话题

涂鸦，足球，老建筑……
当我们谈论大提琴家穆勒—肖特，我们在谈论什么

热点·观察 贝多芬在哈瓦那
斑狐说乐 我的歌在家里，我的家在歌里——纪念宗教改革500年(中)
话题 布列兹谈《女武神》
吉尔·克莱默：谁让他是大师呢
略谈扎克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爱乐笔记 柴科夫斯基访谈
涂鸦马勒(下)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四)
20/21世纪音乐 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阿多诺—韦伯恩：
一个复杂的心理社群(上)

译文选萃 谱线上的风景
吾辈同瓦格纳今日之关系

浮生碎乐 离家五百里
戴鞋爱乐 游行图志
作曲家与作品 对勃拉姆斯《四首严肃的歌》
和理查·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的解读
波兰指挥家斯克洛瓦切夫斯基访谈录(下)

人物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一)
歌剧物语 维也纳歌剧院观剧记
音乐之旅 舒伯特与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九)
唱片说明书 勃罗丁四重奏在1961年萨尔茨堡音乐节
资料库 英式巴洛克和古典主义音乐(下篇)
听购收 真实的托斯卡尼尼(八)
专题 北大爱乐故事(六)
爱乐往事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
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
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视觉中国供图



2005年3月30日，工作人员在位于伊斯法罕市的核设施内等待伊朗总统哈塔米的视察。在伊朗的核能发展计划中，伊斯法罕核设施负责将铀浓缩物制备成六氟化物气体，随后在纳坦兹的工厂内利用离心机进行富集。根据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两处工厂目前均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之下

伊核事件，大国利益与中东格局

文 / 刘怡

拒绝承认伊朗遵守核协议，中东格局可能由此生变，当然，它改变的不止中东。

预热近一个月之后，特朗普的重拳终于砸到了德黑兰头上。而且是一整套“组合拳”。

10月13日，美国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鉴于伊朗的“流氓政权”长期在海外资助恐怖主义活

动，并继续通过试射弹道导弹等行为向国际社会进行挑衅，白宫认为德黑兰当局已经丧失了继续履行2015年核协议的诚意。特朗普宣布，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对其施加进一步的资金和技术制裁；同时不会在10月15日的例行评估报告提交日向国会确认伊朗仍在履行核协议。国会将有60天来决定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抑或修改核协议评估法案。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2

1. 2017年9月20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纽约结束和伊朗领导人的会谈后，对媒体发表讲话。他在此次讲话中重申了特朗普总统前一天的表态：2015年的核协议必须加以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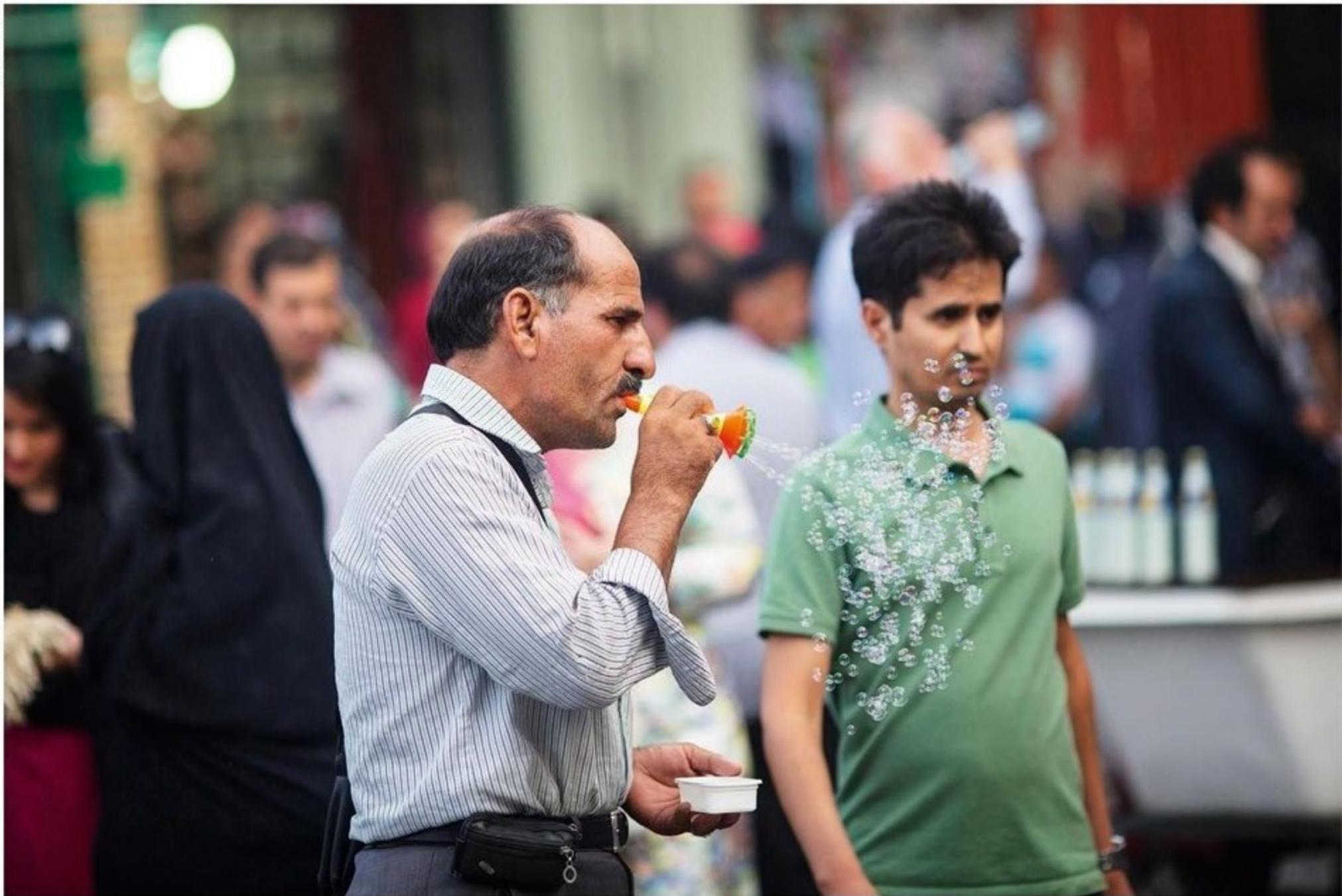
2. 2016年3月6日，装载有100万桶伊朗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托莱多山号”抵达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附近的炼油厂码头。这是自2012年欧盟对德黑兰实施石油禁运以来，第一批从伊朗运抵欧盟国家的原油，标志着核协议的实施已步入正轨

签订于2015年7月14日的伊朗核协议，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以伊朗为主要执行方，安理会“五常”、欧盟和德国为监督及配合方。依照该协议，伊朗在2025年之前须移除并封存其纳坦兹铀浓缩工厂内2/3的新型离心机，仅保留5060台较老的型号。德黑兰在2015年之前已经制备并储存的10000公斤浓缩铀中，仅有300公斤（浓度不超过3.67%）获准继续保存在国内，其余部分应和过剩的重水减速剂以及其他化学材料一起，在2025

年之前运往俄罗斯做再处理。在2030年之前，伊朗承诺不再兴建新的铀浓缩设施，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其核供应链建立严密的监控。作为交换，欧盟承诺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允许其重新动用1978年革命后被冻结的数百亿美元海外资产，并恢复伊朗原油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而美国虽然继续坚持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但也承诺在2025年之前不会追加新的制裁条款。

从2015年盛夏到2017年初秋，IAEA一直确认伊朗正在依照协议削减其核材料库存和铀浓缩能力，美国政府对此也大体持认可态度。然而自2017年1月下旬特朗普正式上任开始，风向逐渐生变。按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的说法，美方对两项问题始终存有疑虑：首先，伊朗在2017年1月29日试射了推定射程可达2000公里的“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型中程导弹，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2010年通过的1929号决议。美国据此宣称，即使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已经暂停，但德黑兰仍未放弃发展拥有核投射能力的中远程火箭载具的计划，并企图自朝鲜等同样遭受制裁的国家购买相关器材和技术，是对核协议的“藐视”。另外，特朗普政府对核协议包含的“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也极感不满——尽管伊朗在2025年之前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协议中已经获得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但在2025年协议到期(“日落”)之后，IAEA的监管是否将继续生效，德黑兰会如何与谈判各方续订新的条件，届时终止履约是否应被视为背信，目前均无一致的约束。美方认为，除非对这些盲点追加补充条款，否则仍不足以彻底冻结伊朗潜在的核能力。

以备受瞩目的核问题作为敲打德黑兰的突破口，用意当然绝不仅在核问题本身。从特朗普表态之后沙特和以色列政府的热烈回应看，此番白宫突然变卦，预示了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新思路：终结奥巴马时代“人不动我亦不动”的多边主义姿态，直接领导和策动在本地区的战略伙伴投入针对伊朗的遏制行动。其目标不仅要防范德黑兰因经济制裁解除而恢复元气，更要抵消后者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至于这种“急转弯”带来的接续影响，特别是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内部对其存在的疑虑，则尚未被顾及。而在政策倾向上与特朗普存在分歧的国务卿蒂勒森，目前已经处在了辞职边缘：在风波不断的本届政府中，他不会是最最后一个。



2015年8月31日，德黑兰的一名街头小贩在人群中吹出肥皂泡。一个半月以前，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欧盟达成核协议，以放弃铀浓缩活动为条件换取欧美国家解除经济制裁

被夸大的阴影

按照美国国会在2015年夏天通过的《核协议评估法案》(INARA)，在任总统须以90天为一个周期，持续向国会报告伊朗履行核协议的状况。若总统认定伊朗已经背约，参议院将在60天内进行表决，裁定究竟是继续在协议框架内继续推动各方联合对德黑兰采取行动，抑或退出协议、恢复和追加制裁措施。推翻协议须取得60%的赞成票。特朗普正是在10月15日的第三期审核报告（本届政府任期内）提交之前，做出了指责伊朗的表态。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已经陆续做出回应，称继续履行核协议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参与过前期对伊谈判的IAEA前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伊朗核

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从IAEA的核查结果看，德黑兰在铀浓缩活动的规模和水平上远不足以与平壤相提并论，其核活动带有更强的机会主义色彩：借助废核进程恢复并维持与欧美国家的正面接触，以之为契机、解除长久以来的经济封锁；实际“拥核”反而不是重点。与朝鲜相比，伊朗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远为稳定，执政者的危机感也相对较弱，无须核武器亦足以自保。核协议的达成，相当于用一个原本就不存在的“核武时间窗”——理论上德黑兰仍可随时恢复铀浓缩活动，并在12个月里制备出组装一枚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高浓缩铀，但巴拉迪认为其并不具备相应的后期技术——换取到上千亿美元的经济酬赏，足够划算。

不仅如此，即便伊朗突破了射程在2000公里

以上的中程导弹的技术门槛，并继续维持一年左右的“核武时间窗”，对中东的战略平衡起到的实际影响也较为有限。作为美国在本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沙特阿拉伯早在1987年就已经购入了搭载常规弹头、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DF-3型机动式中程导弹，并在2014年进行了公开展示。今年5月，特朗普又批准向利雅得出售一套“萨德”反导系统，使后者兼有“矛”与“盾”。而另一个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越过核门槛的盟国以色列，则在美国的直接技术和资金援助下，开发出了拦截成功率号称可达99%的“箭”3型反弹道导弹/反卫星武器系统，同样足够自保。除去这两个强国外，中东范围内至少还有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联酋等5个国家曾经购买或研制过弹道导弹，但实际部署的数量较为有限，从而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平衡。在预定打击目标上，这些导弹基本都指向本地区内部的假想敌，不具备跨地区效应，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反击能力，因此并不会被伊朗的动作所左右。

由此看来，指责伊朗“藐视”安理会决议也好，质疑其履约“诚意”不足也罢，都只是借题发挥。特朗普真正关心的问题，乃是他在10月13日的讲话和9月19日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不经意间提到的：伊朗在中东持续输出影响力的政策令美国感到担忧，且这一进程正随着经济制裁的解除而不断加速。在环绕阿拉伯半岛西北的“新月沃土”地带，德黑兰直接资助和指导着黎巴嫩真主党以及若干巴勒斯坦激进抵抗组织的活动，在叙利亚内战中为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提供武器装备、兵力补充和政治支持，在同样由什叶派掌权的邻国伊拉克影响力也不可小觑。而在半岛南部，由德黑兰扶植的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在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沙特双轴心外围，已然形成了一个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新月”，大有咄咄逼人之势。

在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中东的行程中，原本就有撮合沙特与以色列，并利用海湾合作组织的结构组建遏制伊朗的“中东北约”的安排。孰料短短一周之内，拒绝为华盛顿分担更多安全压力的卡塔尔率先“反水”，使海湾国家发生内部分裂，美国的大计也不得不暂时搁置。而叙利亚内战形势的逆转，还在使德黑兰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正面化——伊朗政府一贯对外宣称，支持巴沙尔政权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随着“伊斯兰国”的节节败退，

这种标榜的正当性和受认可程度一时急剧上升。逼得美国不得不直接出马，以虽无可靠证据但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核问题作为话柄，挑起针对伊朗的攻讦。无须赘言，对此反应最为积极的恰恰是沙特和以色列两国——沙特王国政府在10月13日发表声明称，欢迎特朗普“致力于与该地区的美国盟友合作共同直面挑战，特别是伊朗的侵略政策的挑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表示，此举构成对“世界第一恐怖主义政权”的沉重打击。而这两国恰恰也是5月初特朗普中东之行的前两站。

复杂的博弈

就在特朗普酝酿敲打伊朗之时，10月5日，沙特国王萨勒曼突然造访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此行的公开目的是商讨下一阶段稳定国际油价的对策，内里也不乏与叙利亚、伊朗问题的勾连：经过2017年前9个月的混战，受莫斯科和德黑兰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已经重夺全国主要城市的控制权，以沙特为奥援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则被压缩到了西北和南部的几个小块控制区之内，前途黯淡。在下一轮日内瓦和平谈判中，对这部分反政府武装应做何种安置，以伊朗和俄罗斯为靠山的阿拉维派又当如何与逊尼派在停战后的叙利亚共存，都需要普京的首肯。这恰恰显示了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局势的复杂性：敌中有友，友中有敌。

结交沙特和以色列、重点遏制伊朗，并非特朗普的发明创造，而是对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东政策的回归。但现实情形远比当初来得混乱：为了平衡俄伊联盟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在叙利亚北部的攻势，华盛顿在2017年开始大力扶植由库尔德人建立、处于准独立状态的“北叙利亚民主联邦”（Rojava）。目前正在对“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拉卡发动全面进攻的“叙利亚民主军”，即是一支获得美国军援的库尔德人武装。但库尔德人势力的坐大，首先威胁到了与叙利亚北部毗邻的土耳其的战略利益：该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多达10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接近1/4。倘若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建立准独立政权，并与已经举行过独立公投的伊拉克南库尔德斯坦地区连成一体，势必加剧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因而在2016年夏天，土耳其公开派兵进入“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建立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试图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控制区

与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隔离开来。此举显然干扰到了美国的战略安排，也使美土关系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整个“冷战”年代，土耳其始终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可靠的战略盟友，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一度超过了美国和沙特的友谊。然而就在最近几年，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谋求执政长期化和变更宪法的企图遭到美国和欧盟的排斥，特别是2016年7月安卡拉当局粉碎一场未遂政变（土国政府指控流亡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居伦为幕后黑手，但美方拒绝引渡居伦）之后，埃尔多安与昔日的宿敌普京迅速接近。就在今年10月4日，土耳其政府逮捕了美国驻君士坦丁堡临时馆的一名当地雇员，指控其犯有间谍罪和意图颠覆政府罪；作为报复，美土两国使领馆在10月8日暂停了在对方国家的大部分签证服务。换言之，特朗普仅能巩固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既存伙伴关系，伊朗—俄罗斯同盟的利益关联方却在持续增加，甚至连沙特也不能免俗。

相形之下，依靠以色列来遏制德黑兰影响力的增长，意味着美国将使自己被拉进一场以牙还牙、寸步不让的报复游戏。作为德黑兰核计划的突出反对者，以色列情报机关自2008年起至少在海外暗杀了4名伊朗核物理学家；而伊朗及其庇护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则以报复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作为回应。2012年2月，一枚安装在摩托车上的小型炸弹在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馆附近爆炸，造成4人受伤；5个月月后，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保加利亚的海滨度假区引爆了一枚自杀式炸弹，造成5名以色列游客身亡。类似的袭击—反袭击循环已经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一场无休止的游击战，而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突变，将使美国也被卷入这一旋涡。

某种意义上，奥巴马选择在2015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多少是出于明智的“止损”考虑：伊朗绝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还是穆斯林世界中什叶派的军事、经济和精神领袖，其影响从中亚的阿富汗一路绵延到地中海之滨的黎巴嫩。在国际组织的担保下冻结伊朗核计划，至少构成一种局部解决，使美国不必在相互勾连而又至为分散的问题上耗费资源。而特朗普选择重新将矛头指向伊朗，恰恰把华盛顿重新置于一场空前复杂的博弈中：美国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德黑兰和莫斯科，还有大马士革、巴格达、萨那、贝卡谷地……

蒂勒森的困境

在一系列纷纷扰扰的突变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角色尤其值得玩味：尽管他在9月20日以一番姿态强硬的表态呼应了特朗普的联大讲话，并率先抛出了要求伊朗修订核协议的言论，但国务院和白宫之间的分歧正暴露得愈发充分。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处理对卡塔尔的关系以及制订对朝鲜的新政策时，蒂勒森和特朗普的表态曾多次出现不一致，以至于NBC在10月初竟爆出一则流言：今年7月，蒂勒森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公开嘲讽特朗普是口不择言的“痴呆”（Moron），并随即向副总统彭斯递交了辞呈。尽管国务卿和总统随后都就这一流言做出了公开澄清，但在伊朗风波公开化之前，不止一位分析人士做出了蒂勒森可能被替换的估计。

65岁的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曾担任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长达11年之久。就职之初，他被认为具有三项优势突出的特质：作为超级企业领导者的大局观；在年复一年的商业谈判中锻炼出的灵活手腕和战略耐心；不被某种虚妄理念所左右的务实态度。但更多的人认为，是他和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关系成为入主国务院的最终筹码——从1998年起，蒂勒森就负责着埃克森—美孚在俄罗斯境内的业务，与普京的亲信、前俄联邦副总理伊戈尔·谢钦（现任俄罗斯石油公司CEO）私交甚笃，并曾在2013年被俄罗斯总统亲自授予友谊勋章。《纽约时报》危言耸听地表示：“蒂勒森在俄罗斯和伊拉克问题上曾多次无视美国的利益；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他一直竭力试图取消对俄方的国际制裁。”这种声名在外的“亲俄派”嫌疑，几乎使蒂勒森未能通过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审议听证会。

蒂勒森上任前夕，关于美俄关系重启的声音在舆论界已是甚嚣尘上。然而这种狂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个月：“通俄门”风波与特朗普政府的就职几乎同时发生，新内阁的每位成员几乎都陷入了“恐俄症”，对莫斯科唯恐避之而不及。当和俄罗斯大使扯上瓜葛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黯然辞职之后，饶是蒂勒森有再巧妙的手腕，也不可能公开重提对俄接近一事。这在无形中削弱了他的履历里最重要的部分。尽管蒂勒森的低调务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逐步博得了欧盟和主要大国领导人的好感，但他所

面临的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比起尊重行政惯例的过往建制派总统，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上的行事风格带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和随意性。他更倾向于把“灭火”工作交给自己更信任的私人亲信顾问或团队去进行：总统的大女儿伊万卡及其丈夫、白宫首席高级顾问贾雷德·库什纳频频以官方身份出访海外，在贸易政策和中东问题上发表意见。一般认为，特朗普在今年5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突然造访耶路撒冷，便是由出生于犹太裔家庭、和以色列政府关系密切的库什纳所安排。而涉及阿富汗局势以及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的安全事务，则被统统交给了以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中心的资深军人团队。当美国在朝核问题等国际性议题上需要寻求安理会内部的一致时，特朗普通常会直接联系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Nikki Haley）。《纽约客》杂志说，就连总统的前竞选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都比蒂勒森更有实权：前者经营的华盛顿政治游说公司“战略大道”承接了多个国家政府的游说和公关业务，并能立竿见影地对政策流程施加实际影响。

对外无法获得素无渊源的共和党建制派的支

持，对内不被视为总统真正信赖的“圈内人”，最具经验的对俄谈判短期内毫无展开的可能：勉强入局的蒂勒森在华盛顿的“纸牌屋”内变成了可有可无之人。从特朗普接连解雇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高级顾问兼首席策略长班农等阁僚的霹雳手段看，让蒂勒森也就此靠边站并不算是大问题。最有希望的两任继任者就在政府内部：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历来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姿态，与总统立场一致，并且极讨共和党内立场偏右的茶党分子的欢心。妮基·黑利大使则是建制派心仪的人选，还有印度移民后裔和女性政治家的额外加分。无论其中哪一人成为蒂勒森的继任者，无疑都会秉持尽可能强硬的对伊朗立场，从而和现阶段特朗普本人的政策偏好形成呼应。但特朗普的冒险仍须通过国会的考验——在共和党仅仅在参议院占据52席的情况下，倘若要全盘推翻核协议，至少还须争取8名民主党人的支持，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无论最终的表决是否获得通过——成功会使美国与欧洲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失败则将大大挫败共和党的声势——这都是一场代价足够巨大的冒险。■

新茶经

中国茶地理

茶叶起源于中国，它原生于澜沧江畔的原始森林中，亿万年间一路向东迁徙，覆盖南中国的大部分省份。

一杯好茶，离不开地理、风土、气候、技艺的共同作用。《新茶经》以地理考察的方式讲述中国茶的故事。

历时七年，写作者十数人，足迹深入皖、浙、川、闽、滇、鄂、桂七省市，倾尽心力，无一篇不是亲自考察所得。



《三联生活周刊》天猫旗舰店



收集种子的人

记者 / 王丹阳

9月25日，一位植物学家的车祸遇难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一颗植物的种子和一场科技革命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让钟扬这个名字定格在了寻找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无尽长路上。

猕猴桃的故事

如果不是当天凌晨赶赴银川机场的路上的意外，53岁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将很快回到西藏继续收集种子，而之前他已经在新疆待了20天。作为一个致力于青藏高原野生种质收集的学者，他的常规生活就是不断辗转在路上。这和他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的身份多少有些不符，因为后者

通常是实验室超人，也是科研成果的宠儿，但钟扬不满足于这些。

他本是中科大79届少年班的学生，学习无线电工程，后来在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在这个学科中的建模和计算能力多少得益于本科专业。你能在图书馆里搜到他90年代主笔过的著作，《分支分类的理论与方法》和《数量分类的方法与程序》，看似和他后来的兴趣并无关联。数量分类学在90年代的生物界风光过一时，这是用相当于计算与0和1的程序语言来描述植物的特性，为植物量身定做各自的矩阵，让计算机来跑，以证明种群遗传关系。但它的弊病是不可重复性，因为你无法完全把靠主观判断的“果实较大”“果实较小”扔进0或1的范畴。

“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颗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在很多科普现场中重复的箴言。他经常举一个例子，1984年，他被分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里的一个重头研究对象是猕猴桃，它是1904年由英国的传教士和那些专门来寻奇花异草的外国“植物猎人”在宜昌农村意外发现的，这种没有人吃的东西被英国人剪了20根枝条带了回去。

意想不到的，这些“植物猎人”在猕猴桃枝条上破天荒发现了雌雄异株的可能性（大多数植物是雌雄同株），并得天眷顾地在新西兰用三根枝条杂交成了今天占据全球的Kiwi Fruit，而宜昌农村的那些结着神秘奇果的树虽然是猕猴桃的母体，却失去了宣示主权的先机。尽管中国也能培育风味不错的猕猴桃，但世界只认新西兰Kiwi Fruit为其宗。猕猴桃在新西兰取得成功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植物基因，这个被带去的植物成了广义上的“种子”，就可被视作植物种质资源的一种。

这到底是“偷”还是“引进”？很难说。在100年前主权和国土双双旁落的时期，英联邦植物学家在中国的边远农村以及南亚的热带雨林与他们见所未见的珍奇物种初次会面，就顺便带了回去，他们毕竟反复筛选出了猕猴桃最优良的品种，并巧妙地将其英文名Chinese gooseberry改成了Kiwifruit。钟扬曾说，这种例子如果再在当代中国发生，那将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痛心疾首的事情。

遗传学与植物

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钟扬是辗转在三套体系下的重要学者：生态与进化生物系、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些都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如今的系主任卢宝荣回忆，他和钟扬相识时正好是复旦在生命遗传科学领域日臻成熟壮大的时期。2000年，院里的元老级人物陈家宽把卢宝荣、钟扬和李博共同引进，四个人在复旦的校园里西装笔挺地拍了一张意气风发的合照，自称“江南四才子”。当时的卢宝荣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继续追逐着一场亚洲水稻的绿色革命；李博在日本做博士后并正要前往美国；钟扬正任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副所长，是个副局级的干部。

“陈家宽那时在兰州大学的干旱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兼任所长，他们那里有‘西北三雄’，所以

我们叫自己‘江南四才子’。”卢宝荣说。当年的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有个前身叫环境资源系，但正处低潮，四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确定了将来要实现三个方向，其中一个就包括了种质资源的研究。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它可以被看作是物种遗传信息所在的一种载体，国际植物学界的一大热词“基因库”某种意义上也叫种质库，它除了保存宏观的实体种子，还有大到植株小到花粉，甚至微观到DNA的样本。当今的资源战一定意义上是基因战，由煤炭、矿产等可再生资源演进到以微米、毫米计的种质资源，是科技发展推动人们去重视的必然结果。

钟扬的特长是生物信息学计算，如果说进化是一个机遇，那么钟扬的研究范畴是遗传或者说基因突变的发生概率有几，最后都转化成0和1来表现。卢宝荣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怪才，兴趣足够广泛”，对于遗传学的统计兴趣足以让他想象一切生物的基因突变的原理，不单单是植物，他还曾经想研究大熊猫不断啃竹子是不是有家族抑郁症。“不过还暂时没有结论”，卢宝荣笑笑，这位同事的奇思怪想以及大胆假设时常让系里大开眼界。

2004年，钟扬作为参与者之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Molecular Evolution of the SARS Coronaviru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ARS Epidemic in China》，他基于结构信息的进化分析



左图：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右图：9月25日在车祸中遇难的植物学家钟扬



2011年6月8日，中国农科院国家种质库的工作人员在试管苗库察看植物生长情况

新方法，研究了SARS病毒致死的进化机制，得出两个作为罪魁祸首的突变基因。那年，他翻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巴里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的瘟疫史诗》正逢其时，他幽默地在科普演讲中形容：“和人类对峙的另一方叫自然，派出的‘生力军’叫作流感。”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和病毒赛跑，只是当时，他正开始一个毕生的情结，就是和野生种质资源的蔓延式灭绝赛跑。

“以前课题组说研究要聚焦研究材料，但是钟扬的特长在于计算方法学，是生物信息学方面的领军人物，把国外流行的phylogeny（系统发育学）的计算方法引入到国内物种的分类和系统学研究上。一种方法，越是能同时用于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有效计算，越能证明它有广谱的意义。”卢宝荣说。

半路出家的“种子猎人”

在钟扬所活跃的演讲舞台上，他经常向人们普及DNA和基因的知识，让门外汉对他的研究方法摸不到头脑：他到底是采集种子的，还是一个像达尔文的后继者那样思索着人类顶层进化奥秘的生物学家？

有一次他在复旦的一个EMBA班上做一个叫《基因·进化·哲学》的演讲，举了个在学界耳熟能详的例子：上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家都梦想着揭开DNA的神秘面纱，女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在实验室用X光晶体衍射拍到了DNA的照片，那是

双螺旋结构的一个X形的对称的断面，这位大方的女科学家毫无保留地将照片给后来的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看了一眼，他惊呼：“这就证明了我苦苦追求的双螺旋结构是正确的！”他以700多字在《自然》上发表了享誉世界的通讯，并换得诺奖，但这份荣誉里没有富兰克林。

“20世纪的科学如果有三大进步的话，我想排第一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排第二的就是双螺旋结构。富兰克林在诺奖颁发的5年前患乳腺癌去世，无论今天我们如何回忆历史，她都和这些荣誉无缘。”钟扬说。无论如何，诺奖是不会追授的，这个例子也恰好揭示一个无奈的现实，在刻着那些寥若晨星的大名的科学丰碑的背面，是多少无名的奠基者在做着搬运工的事，但历史只会筛选出一篇文章或一座奖杯作为铭记的参考，错过了就永远错过。

钟扬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于成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同事和学生都认为他是淡泊名利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选择去野外采集种子这种“70年代的老先生才会干的老掉牙的事”。“你知道现在的科学家都做些高精尖、高大上的研究，立即可以验证假设、发表成果的，所以做他的博士时甚至我们都觉得烦了，因为你去野外采种，采得再多那都不是你的成果，成不了论文毕不了业啊！”钟扬的藏族博士之一拉琼这么说。

正如他在《种子方舟》的演讲里这样描述收集种子的意义。“假设在100年后大家发现西藏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但由于气候变化已经没有了，

但是100年前一个姓钟的人采过，那时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反正终于发现了那个罐子，里面有5000粒，拿出来一种只有500粒能活，最后只有50粒能结种子，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但绝大多数可能是，这个植物还在，那么科学家就连这种尝试都不用做，收集种子纯粹就是为未来买一个保险，只是总得有人去做。

钟扬和西藏的结缘始于刚进入复旦的第一年，而使他成为青藏高原野生种子收集的代言人是缘于一个契机。2002年上海市农业投资的大手笔项目“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正式启动，亦被称作“杂交旱稻之父”的中心主任罗利军联合各个科研单位，想尽快把这个基因库填满，他知道西藏有一本叫《金珠本草》的藏药书，成于1840年，内载药物多于《本草纲目》。“当时我们就觉得不仅是农业资源，应该拓展到生命科学，正好钟扬的藏族博士扎西次仁从复旦毕业回藏，我手头有点经费就给了他这个项目，让他对照着书尽可能去收集资源，但是钟扬对此兴趣极大，自发在藏大组织团队去采样。”罗利军告诉本刊。

卢宝荣和罗利军都认为，钟扬并不是一个正统的种子采集者。在生物界有的人一辈子就采集种子、制作标本，钟扬并不是，但他最难得的贡献是在西藏培养了一批当地的采集生力军。虽然我国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在组织科考队考察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生物资源，但是西藏并无本土的科研力量做这些事。“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至今保存有100万份植物标本，那是解放前就开始做的，采集种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早意识到种质对改良品种的重要性，从国家级到省市级，已建立起一个种质资源系统。”卢宝荣说。

对于生物学家、植物学家来说，有两种途径可以通过种质资源来研究课题，一种是利用各地标本馆已有的标本和种质库储存的样本，回到实验室研究，这一方法本身就有一批强大的采集力量做野外奠基，服务于一些科研单位；另一种是亲自采集，因为对于有些科学家而言，他需要从全程上都自行把控，以充分验证自己的研究。罗利军认为钟扬是属于后者。“比如说拟南芥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模式植物（相当于果蝇、小白鼠），很多科学家想得到它以检测里面有别于低海拔拟南芥的特殊基因，这就相当于一个人每往一个高海拔去抽自己一管血，来研究人对极端环境的应激反应。钟扬就是要亲自去找那种东西，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

青藏高原：种子富矿

青藏高原有1000多种植物特有种，从来没有被彻底盘点过，就连世界首屈一指的种质库英国皇家邱园也找不到一颗西藏的种子。要盘点这些生物家底并不容易，仅收集种子样本一项，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物种，每一个物种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计算，钟扬一年至少行走3万公里。

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在全世界第一批确定的20多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我国就有3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横断山区为特征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植物数量按科的等级有212科，占我国的32.9%，在属的等级它占到38%，其中有6000例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占我国的18%，其中更有1000种是只有西藏才有的特有种。

10年来，钟扬和他的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存放在各地的种质库冰库中，可保存100年到400年不等。他们用3年时间，将全世界仅存的西藏的3万棵巨柏登记在册。前年，钟扬团队终于在反复考证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墨脱，一个离中印边境25公里的地区，50年来植物学家很少涉足。即使是在珠峰和日喀则之间，需用7天时间骑马进入的嘎玛沟，百年来都未有植物学家留下记录，所以藏区的物种量被认为是低估了的。

而在国外，野外训练几乎是植物学家的第一道门槛。曾经在澳洲有一位新西兰裔著名教授拒接了钟扬的一个学生的留学申请。“对方嫌我们底子太薄，说我们研究生去野外训练的时间太多。而他本人，高中的时候就把南极、北极都去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是新西兰古生物学会主席。”钟扬在一篇散文里这样写，其实，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很多仍未被发现的特有种都是在殖民时代的英联邦科学家的文献里看到的，这种差距让他更明白在藏区培养播种人才的重要性。

现西藏大学生物学系的副教授拉琼是钟扬第二个在复旦培养的藏族博士，他说起西藏曾经的生物学研究力量，寒碜得叫人咋舌。上世纪90年代初，拉琼作为西南师范大学的生物学本科生分配到藏大生物系做教师，“当时甚至还有很多老师是大专毕业的，在那里教本科生，教得很简单”。直到2003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拉琼得益于学校和挪威卑尔根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去那儿读了3年硕士，课题

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研究”，2006年回西藏，钟扬已经是那里的援藏教师，并帮助藏大获得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钟扬十分高兴能够遇见这么一个有着国际化视野的藏族青年教师，彼时的藏大生物学系甚至还没有硕士点，他将拉琼视作可在当地生根发芽的“种子”，连着好几年怂恿他报考复旦的博士。“2009年有一次，他在拉萨飞上海前在机场突然给我电话，又催我说，这个读博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他总觉得钟扬对培养藏族学生有着特殊的热情，2011年当他真的考上了复旦植物学博士，才真正领略到野外采集所费的苦功。

在无前人可循迹的西藏高海拔地区，这个三四个人的团队往往开车就走，大海捞针一般找植物。虽然每次出野外会列一份基本的工作清单，但往往被无规律可循的物种分布所打破，参照英国邱园所定的国际标准，每种样本的种子数量应在5000颗，但这在一个种群都分布稀广的西藏是成倍的难度系数，有时他们只能找到500颗。

就拿收集海拔4000米以上的香柏为例，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开到尽头，就走搓板路，睡连藏民都不住的牦牛皮搭建的帐篷。因为严重缺氧，帐内的煤油灯根本点不亮，加了更易燃的酒精，也勉强只燃了1分钟。盖着3床被子仍然冷得瑟瑟发抖，几乎不能合眼。长期在这种条件下，钟扬因为非土生土长，心跳降到每分钟44次，他曾在演讲里讲他总结过18种高原反应。“长期出野外，这都是有可能的。”拉琼说。

高原上的偶遇

2011年，他们拿到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课题名为“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植物基因组变异及适应性进化机制研究”，开始寻找一种叫鼠麴雪兔子的植物，被记载生长在海拔6000米以上，它是雪兔子（雪莲的学名）中长得最高的物种，他们的目的是找出这种植物之所以适应最高海拔的变异机制。其实他们在每个海拔点上采集同一个物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论证它们在不同生境里的遗传进化关系，这就要求精细的取样策略和足够丰富的样本以达到后期的准确度。

“我们从珠峰大本营周围没有找到，再往里走终于看见了武警岗，百般交涉后他们答应由一个武警带领我们进山，我当时觉得钟扬不是藏族不熟悉

山情，进去了也没多大意思，可能还会有危险，我建议他待在帐篷里我们进去，他就说了一句话：‘你能进我也能进，你能爬我也能爬。’当时还惹得我不高兴。”拉琼回忆。那些无人区的采集很可能无功而返，而生命的冒险不是开玩笑的。

最终他们在一处5400米海拔的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看到了这种高仅10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不起眼植物，花形和大小几乎如同拇指，那就是鼠麴雪兔子，这个发现把团队乐坏了。它应对着极端环境下的所有特征，低氧、强风、高海拔、强紫外线、昼夜温差大，所以对一个种群内遗传变异的表达会非常清晰和凸显。在生物学研究的应用阶段，获取好的资源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如果袁隆平没有发现海南的那株雄性不育的“野败”，杂交水稻也许不会在那一节点诞生。

野生种质的收集并不像粮食作物的野生近缘种的收集，后者更可能快速地运用于农业育种改良，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而在青藏高原上寻找种子是另一回事，它无法让你立即“变现”。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女博士德吉告诉本刊，在西藏高原，属种鉴定很困难，有些植物必须等待花期才能鉴别它的种属，“即使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海拔梯度上的生长周期不同，拉萨的开花了珠峰的还没开，那么就得分开采，今年没采到再等来年。距离太近的样本基本上在遗传关系上是一样的，那么你也不能采，只能往前走”。

所以针对一个物种的采样策略，越是得在多种生境里采多种族群，每个族群的种子采集得越多，就越是全面地表达它的遗传多样性。在高原上采种和在平原上有很大区别，上海辰山标本馆的研究员葛斌杰时常在华东地区采样，他这样形容道：“采样并不是把上千粒种子从一棵树上剪下来，采样的目的是保存遗传多样性，不然就好比人是一个种，你把所有中国人的DNA采完给火星人，说这就是人……全球有30万个植物物种，在不同的生境和环境因子下同种植物的表现形态不同，西藏的种群数量比较少，不知道下次碰到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在同种里多采会有难度。”

他是这样解释遗传学功底和采样策略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生长于舟山东极岛上的薜荔，一种无花果属的植物，它是靠一种共生的榕小蜂授粉来播种，每年花期时榕小蜂载着花粉向东海沿海扩散，“经过遗传学分析，可以得出东极岛是遗传多样性较高的源头，所以要保存这个种，当然应该往东极岛采种”。

而德吉觉得，收集种子的最终目的除了为科学

家自身的研究服务，更长远的价值在于保护濒危物种，也就是前面说的为未来买个保险。形象地说，就是“通过一种分析算法来评价一个种在遗传上的远近，如果是兄弟，那么在遗传信息上会有叠加，而有些物种隔了很远，无法交流就导致其遗传关系特别单一，而独立的种群就预示着可能濒危，所以我们就要保护了”。

没有硝烟的种质战

钟扬团队就是一边在研究自己的课题，一边在为国家的种质库提供资源，只是后者可能是为后人做嫁衣，耗时长，经费又少。“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首藏语诗经常在他们的团队里传诵。钟扬曾经在演讲里双眼发光地宣称，他们对青藏高原植物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达尔文的正确。“这是真实的科学，在青藏高原那种极端的地方，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种环境下中性选择的意义都被极大地降低，全部要靠优秀的基因在那里表达。”

七年前，钟扬团队参与了科技部的重点项目“青藏高原特殊生境下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项目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牵头，联合各科研单位收集青藏高原的野生种质，保存于所里的西南种质库。西南种质库从种属规模上来讲是亚洲第一的野生植物种质库，建成于2007年，其采集标准和软件系统建设一定程度上脱胎于英国皇家邱园的指导，是与国际接轨的。这个项目是国家首次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进行系统收集和标准化保存，5年后结项时共留存有近11万份包括了种子、标本和DNA材料的种质资源，种子的份数占青藏高原分布种子植物科种属的63%。

在英国皇家邱园受训过的西南种质库采集部主管蔡杰告诉本刊：“每种种子至少5000颗的标准是邱园的，但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些特有种群如果采不到5000颗，我们就要求500颗。采集信息是一张比较复杂的表，你要填写尽量完整的信息链，才是高效的样本。《欧洲植物志》做到第二版的时候，物种分布量直接打到版图的点上，他们能通过标本数量来推演分布集中的区域，甚至模拟气候变化。”

世界范围的种质资源赛在发达国家一直不见硝烟地进行着，耗资8000万英镑的英国邱园“千年种子库合作计划”(Millenium Seed Bank Partnership)就旨在以技术输出的方式纳入各国的

种质资源，并计划在2020年收集到全世界25%的植物物种。2008年挪威在北极圈斯瓦尔巴特群岛上的“世界末日种子库”又转移了同行的目光，该库按照美国国家黄金储存库诺克斯堡的安全模式建造，外面包围着一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墙，隧道里有数道安全性能极高的密封门。

这里是北极的永久冻土带，自动温控系统会使空气交换机和制冷设备交替工作，把温度常年控制在零下18℃，据说储存期限最久的应该是高粱，大约能存放1.95万年。2011年日本海啸后，冈山大学大麦胚质研究中心决定将575个样本送入到“末日种子库”中，然而其仅是纷纷登上这座“种子方舟”的110个国家之一。农业大国对于种子的情结可谓深入骨髓，谁知道这些沉睡的种子不会促发第二次绿色革命？60年代，仅仅由于墨西哥国际小麦发展中心的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发现了一颗小麦近缘种的“矮秆”基因，从此改变了它易受风倒的弊病，并掀起增产的大革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全世界有近1750座种质库。

有一个故事经常被中国致力于种质资源保护的学者提及，1974年9月，美国派出一个植物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有著名大豆遗传学家布尔纳德，当他从上海虹桥机场离开中国时，在候机楼边上采到一株野生大豆并带了回去，这株大豆就是现今转基因大豆的蓝本。30年后，我国放开了大豆进口限制，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市场。猕猴桃的故事总是不经意间就摆在了眼前，任意分布的种质资源本身没有专利，但被“高精尖”转化为成果后，就有了专利和定价权。

10月的一天，本刊记者在上海西南角的上海农业资源基因中心遇到在此做博士后的夏辉研究员，他在复旦读研时也曾受教于钟扬。这里小规模地保存着7种农作物的样本，可是光水稻就有22万份，和外头和煦的秋光相比，库内的空气干燥、黝黯又凛冽。“你看，我们收集到现在也只不过几个物种。”夏辉说。

在四五个不同的零下温度的库房里，所有样本被封存在小铝锡袋里，贴上序列号，档案般齐整地列在不锈钢货架上……夏辉感叹，有特色的种子有时可遇不可求，而青藏高原的种子会充满潜质，“应该说钟老师现在做的工作是个铺垫，等收集完了，就是他擅长的数理分析了，未来十年可能硕果累累”。他也补充了一句：“虽然他的团队会继续收集和研究，但在配套资金上，谁出面申请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保护藏羚羊，盗猎之外的威胁

记者 / 丘濂

10月4日，网友举报有游客开车在西藏色林错保护区内，离开公路驶入藏羚羊栖息地，对藏羚羊进行碾压。事后证明是游客为了拍照而驱车追赶，但也说明一个现象：当盗猎得到抑制，综合的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对藏羚羊生存的最大威胁。

藏羚羊保护20年：恢复性增长

开车在青藏高原行驶，时常能和藏羚羊相遇。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吴晓民研究员今年9月份4次从色林错旁经过，也就是“越

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发生的一带。他看到离开公路不远处，早晚都会有三五十只成群的藏羚羊聚集。“这样的现象过去很难看到。它说明藏羚羊的数量增多了，而且因为人类停止伤害，它们也不再惧怕人类。”吴晓民告诉本刊。

“野生动物的初始逃逸距离”是一种古典的观察视角。生物学家由此入手，就能做出当地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推测。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物种。雄性成年藏羚羊尤其漂亮，标志是长达50多厘米的黑色双角。最早对藏羚羊进行系统记录和研究的美籍生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博士描绘过他在1985年10月与藏羚羊的第一次相遇：“它们的毛色在交配季节



(十成里摄)

左图：交配季节的一雌一雄两头藏羚羊

右图：藏羚羊迁徙过程中的“挂网”死亡现象已引起关注，为此西藏那曲地区双湖县的群众在藏羚羊迁徙季打开部分围栏留作通道

里变成了黑白相间，一对纤长的角从头顶近乎笔直地伸出去，看上去威风凛凛。我仿佛置身梦境，恍若看到了独角兽、手持长矛的藏族骑士，还有塞伦盖蒂平原的羚羊出现在隆冬大地。这是一个任由想象力驰骋的地方。”不论在哪里做研究，夏勒博士倾向选择一种“美丽、有趣且急需保护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和心之所依”，由此便开始对藏羚羊长达20多年的追踪观察。

在当时，影响藏羚羊种群数量的最大问题是盗猎。夏勒发现，当地人除了捕藏羚羊吃肉外，还会将藏羚羊皮单独进行交易。经过多方信息搜集，西方奢侈品市场上的“沙图什”（shahtoosh，发音来自波斯语，意为羊绒之王）被与藏羚羊皮联系在一起。藏羚羊有一身细密柔软的毛，纤维直径仅10~12微米（开司米羊绒为12~21微米）。这些羊毛从西藏流传到达拉克和尼泊尔等地，中间商将它送给克什米尔的织工，只有他们有能力将它加工成“指环披肩”——它精细得可以从一枚指环中穿过。

在夏勒1993年前后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展示藏羚羊盗猎背后的贸易链条前，沙图什的购买者

错误地认为它由来自北山羊褪下的绒毛编织而成，每年会有勤劳的牧羊人将羊毛收集起来。事实的真相是，编织一块沙图什披肩大约需要3只藏羚羊的羊绒，唯一获得的方式就是杀死它们。夏勒粗略推断，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20万到30万只藏羚羊因此死亡。在沙图什交易最为猖獗的90年代中期，夏勒估计幸存藏羚羊的数量或许不足7.5万只，这一古老的物种处于灭绝的边缘。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藏羚羊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明确了藏羚羊的贸易链条后，从打击盗猎到严查走私便能有的放矢。在藏羚羊重要分布区，中国政府划建了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了打击盗猎的保护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定期巡山并对藏羚羊种群活动实时监测。与盗猎分子作斗争最广为人知的一位勇士是杰桑·索南达杰，他在1992年建立了进行可可西里生态保育工作的西部工作委员会，并组织了

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获一批盗猎分子后遭遇袭击，战斗到最后英勇牺牲。之后陆川执导的电影《可可西里》便是以索南达杰为原型创作的。

另外对藏羚羊的保护则来自消费市场的抵制。90年代末，随着一些纽约社会名流卷入沙图什的交易，《华尔街日报》《时代》《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名利场》这样的时尚杂志也劝诫消费者不要购买沙图什披肩。执法机构在各国突击检查高级精品店、豪华饭店里的交易商以及富人造访的其他场所。此时全世界允许合法销售沙图什的地方只剩下瑞士和克什米尔。1998年，瑞士终于加入了旨在管制相关交易的《濒危野生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而克什米尔当局仍旧顽固，甚至坚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沙图什非法贸易交易对藏羚羊的威胁是为了打击克什米尔羊绒业的市场。一直到2002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才颁布禁令，终止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合法销售沙图什的市场。

2004年，电影《可可西里》在国内上映；2005年，藏羚羊形象“迎迎”成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其中之一。这些事件都让整个社会对藏羚羊的境况倍加关

注。中国第一个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绿色江河促进会”的发起人杨欣告诉本刊，也就是在这个舆论声音最高的时候，他们把“索南达杰保护站”移交给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1997年，杨欣就是受到索南达杰精神的感召而组织起志愿者，为藏羚羊及其可可西里生态保护建立一个永久的阵地。“绿色江河”还组织过“藏羚羊红绿灯”的活动，在藏羚羊迁徙通过公路时进行交通疏导。“藏羚羊是个很成功的保护案例，从供给端到需求端，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做出了最大努力。这些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反过来公众的监督又将保护推向新的高度。”2004年开始，杨欣的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当时并不被人所关注的一些领域，像是雪豹保护、气候变化下的冰川消融，以及长江源头地区的垃圾处理。

2015年，中国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评估报告，将藏羚羊从受威胁物种名单中剔除。201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也以此为主要依据，在最新版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藏羚羊的濒危程度由“濒危”降为“近危”。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IUCN领导制定的一份衡量全球



迁徙季的雌性藏羚羊群

物种生存和受威胁状况的清单，将物种的濒危级别根据濒危程度划分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等七级。其中“极危”“濒危”和“易危”又统称为“受威胁”。

吴晓民告诉本刊，整个青藏高原藏羚羊的数量大概在30万只左右，“羌塘保护区大约20万只，青海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约6~7万只，新疆阿尔金2~3万只左右”。作为一种有蹄类食草动物，藏羚羊的繁殖能力较强，母羊在第三年就可以怀孕生小羊，种群的恢复能力也较快。

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恢复性增长？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西部项目的主任梁旭昶向本刊解释，要想实施针对藏羚羊数量的严谨科学统计，难度很大。目前主要有两种替代方法，一种是在藏羚羊的产仔地或者交配地进行计数，因为这两个时间藏羚羊会比较集中；另一种是样线法，先将不同的栖息地按照地理或者植被类型分类，每种类型的栖息地选择若干条线路通过，记下所看到的藏羚羊的数目，算出密度再乘以面积。就科学性而言，两者都有较大缺陷。“不过，虽然藏羚羊的数量统计会有偏差，但这种增长已经是专家的普遍共识。”

枪声之外：迁徙路上的障碍

在梁旭昶看来，盗猎得到抑制后，藏羚羊的保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听得到枪声是最直观的危险，现在藏羚羊所面临的威胁则是复杂且不易察觉的。这表现为两方面：气候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之上综合的人类活动。”

藏羚羊的保护难度和它的迁徙习性有关。藏羚羊迁徙从而完成繁殖，除了个别地区有小的不迁徙种群外，绝大多数雌性藏羚羊都有长途迁徙产仔、产仔后再回到原栖息地的习惯。每年的4、5月份是母羊的迁徙时间；6月到7月份母羊在产仔地进行分娩，返回栖息地后，从11月到翌年1月是求偶交配的时期。除了这段时间，雄性和雌性藏羚羊基本都是分开活动的。

雌性藏羚羊的迁徙活动令生物学家好奇，因为怀孕哺乳是高能耗活动，为什么偏偏雌性藏羚羊进行长距离迁徙？梁旭昶说，这其中有若干假说，但尚未找到完满的答案。比如为了寻找更好的食物——夏勒博士曾经追踪西羌塘的种群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昆仑山，进入西昆仑山地的产仔地，在那



(梁旭昶 摄)

里目睹了4000多只藏羚羊的分娩。“可是西昆仑产仔地并非‘桃源’，那里碎石遍地、植被贫瘠。在西昆仑的许多地方，只有垫状驼绒藜的新叶可供采食，植被生产力远较南部的栖息地差。即便驼绒藜粗蛋白含量更高，也似乎并不足以补充母藏羚羊长途跋涉的消耗。”

其他的解释还有躲避天敌说。“食肉动物无法长时间追踪迁徙的有蹄类。藏羚羊在偏远地区集群产仔，有可能降低被捕食的风险。较低的气温也能够帮助藏羚羊母子们躲避蝇虫干扰。”另一项研究推测产仔地选择可能与降水的时空分布有关。“藏羚羊的产仔期也是降水的高峰期。当地降水大多以冰雹和雪的形式。到降水少的地方产仔，也许小羊更容易成活，而且草也不至于被雪覆盖而易于发现。”

藏羚羊作为“伞物种”的地位也正是来源于它的迁徙活动。人类能够投入动物保护的资源是有限的。“伞物种”也就是一个合适的目标物种，它的生境需求能涵盖其他物种的生境需求，从而对该物种也对其他物种的保护提供了保护伞。“迁徙之路长达300多公里，到达产仔地之后，羊群又大规模汇集。这些藏羚羊沿途要采食饮水，也有捕食者在后面虎视眈眈。兽群上路，浩浩汤汤。除了审美意义，动物迁徙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能提升植被的生产力、促进营养物质循环。正像角马之于东非大草原，无数代藏羚羊的季节性大迁徙，勾勒出了今日羌塘生态系统的轮廓。”

梁旭昶告诉本刊，有蹄类动物迁徙，又是一种正在消逝的壮美景观：“全球至少有24个有蹄类物种和亚种，曾经或正在进行大迁徙。其中6种有蹄类的大迁徙已经消逝：南非小羚羊、黑角马、白脸牛羚、弯角大羚羊、斑驴，以及蒙古野驴。现存的有蹄类大迁徙，非洲有9个物种，北美洲4个，欧亚大陆6个（驯鹿在北美和欧亚大陆均有）。蒙古原羚仍在蒙古东部草原上大规模迁徙，而在中国境内几近灭绝。实际上，藏羚羊迁徙是我国境内仅存的野生有蹄类陆地大迁徙。”

由于人类的活动，藏羚羊在迁徙道路上会遇到障碍，主要有铁路和公路这样的路网设施，以及牧民草场的围栏。吴晓民和他的团队曾经在青藏铁路的建设期和运营期监测铁路对藏羚羊迁徙活动的影响，最早是人工观察、安装远红外摄像头等方式，2007年开始又得到日本酪农学园大学的资助，将对方提供的带有卫星发送跟踪装置的颈圈应用于研究，从2007年到2010年通过围网捕捉的方式先后

为10只雌性藏羚羊佩戴颈圈。它们全部都是青海可可三江源迁徙到可可西里产子的种群，青藏铁路仅对这个种群形成阻隔。青藏铁路一共为包括藏羚羊在内的野生动物留有33个通道。吴晓民发现，在通道使用的最初，藏羚羊会在通道前出现集群和徘徊的现象，甚至因为青藏铁路的野生动物通道桥梁很高，在大地上投下了阴影，羊群也不敢进入阴影区域，直到头羊率先跨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迟滞的时间都在减少。可以说藏羚羊已经逐步适应青藏铁路修建对该地区的环境所带来的新变化。”

另外像是青藏公路，吴晓民说，因为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存在，对于藏羚羊来讲不构成太大问题，其他一些等级不高的国道和县道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就不会对藏羚羊形成阻隔。随着这些年青藏高原旅游的升温，道路上的车流量逐渐增多，但吴晓民认为不文明的游客毕竟是少数，人们正在养成给动物让路的习惯。总体来讲，道路工程因为在施工前都会进行环境评估，要考虑到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让吴晓民颇为担心的是近十几年来在牧区建设的草场围栏，相比路网，它们的修建更加自发而随意，没有制度约束，但将藏羚羊的活动区域分裂成一个个孤岛，也带来了不少伤亡情况。

草场围栏同样也是梁旭昶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发来的照片里，草场围栏是一种孔洞较大的铁丝网，高度约在1.2米到1.5米之间。有时候藏羚羊被狼追逐，就会慌不择路撞在网上，绞在里面慢慢咽气。草场围栏是在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之后，牧民在农牧部门的鼓励下建起来的。它主要有几个作用：首先是标示自家草场的范围以及轮牧的区域，避免和其他牧民产生纠纷；另外也是防止草原上其他食草类野生动物和家畜争食草场。由于草场围栏是农牧部门支持的惠民举动，又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林业部门分属两个管理体系，所以围栏仍然处于不断建设之中。

在青海，比藏羚羊更加处于濒危状态的普氏原羚“挂网”死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关注，一些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合作，比如在不大范围拆除围栏的前提下，通过摘下围栏上的刺丝以及降低围栏高度来减低普氏原羚被挂住的风险。WCS在西藏羌塘也和政府共同修建了一些藏羚羊的通道。“说到底这种冲突是因为藏北牧区生态资源的时空局限性，人和野生动物的生态位高度重叠造成的，即所有相关方都对季节性的草场和水资源有高度依赖。十年来，

西藏自治区已针对食肉动物肇事开展经济赔偿，但食草动物争抢草场并没有很好的量化办法。帮助羌塘牧区群众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效益，并提升经济收入多元化水平，是未来缓解这一问题的方向。”梁旭昶这样说。

广袤羌塘：更多挑战与未知

羌塘在藏语中意思是“北方高地”，广义的羌塘覆盖了西藏自治区北部，还包括青海西部和新疆南部边缘，是冈底斯山以北、昆仑山以南的高海拔广袤地带。如今这片苦寒之地为若干自然保护区所分治。就藏羚羊分布而言，可可西里保护区的社会关注度最高，而羌塘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数目最多、研究和保护难度也最大。“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所发生的色林错保护区，属于广义羌塘的一部分。

吴晓民在2013年开始陆续将卫星定位跟踪装置应用到对羌塘藏羚羊的研究上。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位置选择不同种群的15只藏羚羊来佩戴设备。“选择3岁到5岁的壮年雌性，设备会每天5次、每次间隔3小时来发射位置信号，项圈将伴随每只藏羚羊两年。”吴晓民介绍。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种群藏羚羊的产仔地、迁徙路线以及迁徙时间，从而对路途当中的围栏设施能够更好地加以改善。对藏羚羊的追踪也会应用在对保护区功能区划的调整上，“现在保护区范围划定普遍偏大，功能区划不太合理”。

以项圈来追踪的好处是，调查人员不再需要用传统方式追踪藏羚羊的行踪——每年藏羚羊迁徙的季节正是夏天青藏高原上冻土融化的时候，在夏勒博士的年代里，他们整日要应付陷车的麻烦，广阔无人区里的后勤补给也是问题。2016年，根据跟踪项圈的信息，吴晓民的团队在色吾雪山脚下一片50~80平方公里的区域，发现了迄今为止一个藏羚羊最大的产仔地，估计数量超过10万只。它们属于羌塘北部的种群，从尼玛县和改则县交界的地方一直向北进入无人区。那是个非常难以到达的地方，吴晓民尝试过四次才得以进入。

梁旭昶所在的WCS已经在羌塘扎根20多年，当年夏勒博士就是作为WCS的科学家进入羌塘来首先对藏羚羊进行自然史描绘。在自治区林业部门支持下，WCS一直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对保护区管护员的培训。“政府这些年加大了对保护区的管理投入。现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73个专业管

护站，每个管护站配备有8~10名专业管护员，总共有780名。另外还有一部分协议管护员是在牧区家里定期巡视。”如果将这780名管护员对应到羌塘自然保护区29.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就会发现人的力量十分渺小。这次“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连带处罚了一位协议管护员，但是对于保护区里偶尔会发生的非法穿越，管护员确实很难及时制止。“人手本来就非常紧张，管护站里的这10个人也不能同时参与巡护，一部分要留下来设卡盘查，另外一拨人也不能分开走，因为会发生陷车危险。这就决定了每周管护员只能巡查两三条线路。车子能够走多远又和汽油及后勤配备有关系，保护站的汽油是定量的。”林业部门和WCS提供的培训在于提高管护员发现问题的能力，比如运用更有效的信息化工具、更好地使用GPS和望远镜，以及设计更优化的巡护路线。

关于藏羚羊的研究还有太多未知的空白。梁旭昶强调了气候变化对有蹄类长距离迁徙造成的影响，它是对藏羚羊所有研究中最不能被忽视的变量。“原先不迁徙的种群，会不会随着局部种群密度增加而开始‘部分迁徙’（Partial migration）或者‘巡游’（Nomadic）？这些都会干扰我们对藏羚羊数量的观察统计。”

气候变化最直观的结果之一就在藏羚羊出没频繁的色林错湖畔。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让色林错湖水的面积在近20年中扩大了至少200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这是否意味着高原的花花草草长势更好，藏羚羊会有更丰沛的食物呢？”梁旭昶说。这个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参考了中科院昆明所使用遥感技术分析1982年到1996年青藏高原上草甸带和草原带的生长季节变化情况。这一时期内，高原气温上升趋势显著，但植物的生长季节不但没有延长，反而缩短3~4周。原来，在冬季高原植物进入休眠期，需要一定数量的低温时数，才能打破休眠。随着高原冬季越来越暖和，植物休眠不断延长，于是第二年春季的萌芽期推迟。而在草原带，七八月份的高温让植物快速生长，于是生长季反而提前结束。另外高原植物生长是一系列温度和湿度作用的结果，它们可能让某种植物长势较好，而抑制另一种植物。“总体上说，气候变化对于藏羚羊来看影响都是偏向负面的。”梁旭昶说，“当湖水淹没了部分草场，牧民家畜和藏羚羊争食草场的现象也可能更加突出。”

（感谢曾岩、刘炎林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罗斯高：何为中国农村教育真问题

记者 / 刘周岩

《现实是有 63% 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的演讲意外走红之后，罗斯高很高兴有更多人开始关注农村儿童早期抚育问题。触目惊心的数字和“让妈妈回家”这一充满争议的说法也使得疑问纷至沓来，罗斯高一一做出了回应。

罗斯高认为，他在演讲中提出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而之所以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问题，并非他一人的灵感与思考，背后是一个跨国研究团队十余年实证研究的成果。

“老罗”的走红

因演讲而意外“走红”的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在美国的标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而现在，随着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高，人们更多叫他“老罗”。

“老罗”今年 62 岁，头发花白，精力充沛，笑容可掬，讲起话来充满幽默感和感染力。提到经济学里某一项数据的上升或下降，除了夸张的手势，他还要加上“嗖”和“唰”的配音。罗斯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次和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去乡村调研，黄季焜的福建口音太重，村民听不懂，最后还是罗斯高用普通话给村民做了翻译。每次到中国



左图：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他于2008年获颁中国政府表彰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右图：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团队成员2013年合影

农村调研，他总会成为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大爷大婶们的喜爱。

从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农业经济学研究，现在他每年大约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的日常生活几乎完全被工作占据，每天要回200多封邮件、打几十个电话。因为无论去哪儿都准备着充足的咖啡，同事们把他称作“老罗移动咖啡店”。同事回忆他以前随身带六七块笔记本电池，他笑着说：“我换了新电脑，现在不需要带那么多电池了，不过一会儿的航班上我还要改四五篇文章。”

9月15日，他在网络上发布了原题为《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的中文演讲，微信公众号发布时将题目改为《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类似的演讲他已经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公开场合做了五六十次。

罗斯高在这个演讲中指出，中国目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悬念。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只有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受过高中程度教育，这个国家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恰恰在这点上非常落后，中国劳动力人口

（20～60岁）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只占24%。这主要是因为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有94%的高中入学率，而当下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有63%的学生无缘高中阶段教育。罗斯高进一步指出，城乡儿童从0～3岁就已经出现显著差距，农村婴幼儿的营养与早期抚育状况相当堪忧，他于是提出了包括“让妈妈回家”的一系列建议。

现在看来，这个演讲在社交媒体时代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有其深刻原因。其中有对演讲中提出的数字之触目惊心及问题之严重的担忧，也有对罗斯高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农村进行研究的感动和城市中层父母对自己孩子早期抚育问题的焦虑。与所赢得的巨大关注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质疑，包括对具体数据、研究方法，尤其是充满争议的“让妈妈回家”的解决方案。罗斯高通过本刊回应了相关质疑并且详细讲述了研究的过程，他表示：“大家提出这些质疑，我很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去研究农村儿童早期抚育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关心教育的经济学家

虽然罗斯高近期因为教育议题引起广泛关注，

但他的身份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说：“我研究的根本性课题是如何使人们摆脱贫困。”中国农村就是罗斯高研究开展的场所和对象。

到今天，罗斯高学习中文已经有50年了。因为从小就读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和经济学家父亲的远见，罗斯高得以在12岁就开始学习中文，上世纪70年代还曾赴中国台湾交换学习了3年。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时，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几个发展经济学家会说中文”，加之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农村巨变的兴趣，他将一生的事业投入到中国农村研究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业经济学研究，包括灌溉投资、转基因棉花种植、小额信贷等。因为在这些领域的贡献，罗斯高被邀请担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的长期主席，林毅夫、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O. Mendelsohn）等知名经济学家均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

2008年，罗斯高获颁中国政府表彰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温家宝总理颁奖时认出了他，上世纪90年代罗斯高曾和时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温家宝就中国农业政策有过数次探讨。“90年代的时候，温家宝让我开始记自己去过中国多少个县，他那时是去过538个县。2008年再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去过了692个县，他说他已经是1020个了！”罗斯高回忆。直至今日，温家宝仍是他最尊敬的中国官员之一，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很多根本性改变都是在2003～2013年间发生的，而这源于温家宝等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罗斯高逐渐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解决之道在教育。罗斯高解释道，过去70年里，近100个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中只有15个成功跨入高等收入，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它们的共同点是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接受了高中阶段教育。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墨西哥，劳动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受过高中教育，人力资本的不足无法支撑国家的经济转型，同时这些低教育人群带来暴力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发展。罗斯高认为，中国要想在未来成为发达国家，“每个孩子都要上高中”。他同时强调自己所谓的“高中教育”指的是普通高中，不是职业高中，而目前职业高中招生比例占高中教育一半左右，“普职相当”也是教育部一贯的政策要求。罗斯高曾以《职业教育

目标错误》《改革中国式职业教育》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失败且缺少前瞻性，他总结道：“中国的职高只不过是照看成年人的幼儿园。”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上述逻辑。有论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学界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概念，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受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为教育水平高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无任何先例可循，其庞大体量和独特模式决定了无法与拉美国家类比。另一方面是对究竟何种教育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领域重要著作《中国乡村基础教育20年》（*Two Decades of Basic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一书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璐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思·勒温（Keith Lewin）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强调，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在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中国农村教育已经在过去20年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并且仍在迅速发展，进一步提高高中教育普及率也是国家发展规划的题中之义；同时，尽管存在一系列问题，职业教育仍有其必要性，而且应当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是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学术内容的”。

罗斯高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只有发展全民性的普通高中教育，中国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动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到时候没有那么多路可以修，没有那么多楼可以盖，劳动密集的工厂也都转移到其他工资更低的国家去了，这么多的中国劳动人口去做什么？所以现在必须每个孩子要上高中，而且不是学具体的技能，是要学数学、英语、计算机，为20、30年之后的经济做好准备。”罗斯高说。

针对有人质疑的数据，罗斯高也做出了回应。“中国劳动人口中只有24%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由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在不同种类的数据之中，人口普查是最确切、权威的，2010年是最近的一次普查。“当然这几年有很多进步，但是现在也有一半的人上高中。”罗斯高补充。“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这个被编辑过的标题并不准确，他在演讲中说的是“贫困农村”63%的孩子没上过高中。“贫困农村”指西部和大部分中部农村，其学生数约占全部农村三分之二，即全体人口（城市及农村）的约二分之一。不过教

教育部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7.5%，远高于他的数字。罗斯高表示其他顶级学者的研究支持与自己的数据相符的结论，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谢宇。罗斯高的一位中国合作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教育部的数据是通过行政系统层层上报的”，其可靠程度也需考核。

看见“看不见的问题”

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仅来自于作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也是罗斯高在农村的实际感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农民们真正地交谈，他们会说：你们来帮忙修路太好了，新的种子太好了，自来水也太好了，可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上学？”

在罗斯高看来，农村地区高中入学率低只是表象，是一系列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罗斯高认为是0~3岁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相较于城市大大落后，导致认知能力低下，后续学业无法顺利进行。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罗斯高之前，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所以他把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问题称作“中国最严重的看不见的问题”。而这个结论的背后是一个名为REAP的团队上千人近十年的工作，科学方法、资金、团队合作缺一不可，罗斯高扮演着这个科学研究大工程总指挥的角色。

2006年，随着对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罗斯高联合众多合作伙伴成立了REAP团队（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团队由三个核心机构构成：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该研究所供职的罗斯高任REAP美方主任及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张林秀任REAP中方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该所所长史耀疆任REAP教育事务主任。张林秀、史耀疆都是与罗斯高合作20余年的老朋友。

这样一个国际、北京、地方的三角结构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罗斯高带来国际学界最新的理论、方法和广泛的学术资源；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拥有中科院的政策建议渠道，可以将研究结果直接上报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并有机会将其转变为国家政策；以陕西师范大学为首的

“最重要的是取得信任，能开始工作，一旦开始，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的工作。中国农村学校很多老校长虽然观念不一定先进，但他们非常负责，真是为了孩子们好。”

地方院校则让团队在各个省份开展实地研究成为可能。核心机构之外还围绕着一系列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基金会、NGO（非政府组织）等，它们为研究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

起初，REAP团队进行的是农村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的研究，到2009年前后罗斯高开始关注农村儿童的营养与健康问题。一次罗斯高邀请了自己的朋友雷纳尔多·马托利尔（Reynaldo Martorell）一同前往中国农村，马托利尔是美国知名的儿童营养问题专家，为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担任顾问。在一所学校，马托利尔注意到孩子们吃完午饭后都不住地开始打瞌睡，他凭自己的经验察觉到了异常：“他们应该四处追跑打闹才对。”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验证对孩子们健康状况的怀疑，结果令人非常震惊。

对10个经济落后省份13万名小学生的检测中，27%患有贫血，33%有肠道寄生虫疾病，20%存在近视但未佩戴眼镜。罗斯高说：“只要你有其中任何一项，你都根本没法学习，因为你是个病人。”

与此同时，国家疾控中心、卢迈等团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获得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这一系列研究及政策建议最终促成中央政府出台了运行至今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此每年安排160亿元人民币专项预算，覆盖2600万学生。

结果令人欣喜，过程却实属不易。一个国际团队要在数千所乡村学校对学生进行检查，随后还要进行随机干预实验，让部分学生服用维生素药片、佩戴眼镜，部分不做干预，再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业表现，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和沟通成本可想而知。“最重要的是取得信任，能开始工作，一旦开始，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的工作。中国农村学校很多老校长虽然观念不一定先进，但他们非常负责，真是为了孩子们好，他们看到学生们吃了维生素片、戴了眼镜之后成绩真的提高了，就非常支持我们的



左图：9月21日，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一所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吃营养餐

右图：REAP 团队及合作者在试点养育中心工作，REAP 团队希望将养育中心推广至全国农村



（龙元彬 摄 / 视觉中国）

工作。老师们也很负责任，至少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学校，这在印度、非洲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罗斯高说。

和地方政府打交道这么多年，罗斯高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不同的课题要有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营养改善课题里互利机会很多，很多县非常想借我们研究的机会把自己打造成儿童营养改善的模范县。有些课题，比如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要敏感得多。”罗斯高也努力和中国合作者建立一种基于信任和互惠的关系，他不赞同很多欧美学者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时与本地合作者的雇佣式关系。“善解人意”的罗斯高在发表文章时会尽可能让中国学者和有贡献的研究生一起署名。“我已经62岁了，发表过400多篇论文，在斯坦福大学有终身教职，我的名字写在前面还是后面对我无所谓。可是当中国学生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美国经济评论》《自然》上时，他们兴奋地跳起来！”罗斯高这样概括他和中国合作者之间的“契约”：“他们好好利用我募集来的钱，我会让他们辛苦工作获得的数据为他们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对小学和初中学生的营养政策取得初步结果后，罗斯高决定再进一步，继续向前追溯，看看婴

幼儿时期农村孩子是否就已落后。“事实上，雷纳尔多提醒我说问题可能出在妈妈怀孕甚至妈妈怀孕之前！”罗斯高回忆这位营养学专家给自己提的建议。

罗斯高决定对农村婴幼儿进行贝利测试（the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国际通用的检验婴幼儿认知、语言和运动能力的测试。从2013年开始，REAP团队在陕西对348个村子的1800名6至12个月的婴儿进行了测试。这样规模的贝利测试以前还没有人在中国农村做过。“贝利测试很不好操作，因为很复杂，而且是和婴儿进行互动，测试开始不久这个小孩就困了、要大小便，很麻烦。一名大学研究生要培训十天之后才能学会，一天只能进行两三个测试。为了得到这1800个测试样本的数据，我们召集了上百名地方大学的研究生，花费了400万元人民币。”罗斯高解释道。

正是这次测试的结果和后续研究，让罗斯高认为他看见了“中国农村教育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结果显示，测试样本中29%的婴幼儿认知低下（IQ < 90，智力发展指数低于-1标准离差）。正常的认知低下比例应为15%，北京、上海和纽约、伦敦等地都是这个数据，这是因为天生就有一部分人智力



较低。更严重的是，当这批农村孩子到24至30月龄时再接受测试，认知低下比例增长到超过一半——他们越来越落后。团队成员扩大了测试范围，在河北、云南等地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针对有些人质疑贝利测试能否准确反映婴幼儿认知水平，罗斯高做出如此回应：“这个测试是有效的，我们使用的是适应中国情况的模板，过去30年里北京大学区慕洁教授等人为之做了大量的开发和检验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国城市儿童认知能力数据所采用的是同一套测试，我们揭示的重点在于城乡差距。其他测试方法进行检验的结果与贝利测试一致。”

罗斯高仍然使用随机干预的方式，对部分孩子进行营养补充。这部分孩子的贫血率显著下降，但令人意外的是，其认知能力仍随成长而下降。“孩子的认知能力被三个因素决定：基因、营养、抚育。基因没有变，营养在增长，认知能力还是下降，只能是抚育出了问题。”罗斯高解释。相比于中国城市里早教机构的火爆，农村家长普遍缺少给婴幼儿进行科学抚育的意识，很多人的养孩子观念还停留在“吃饱穿暖别捧着”就行的阶段。

“我问农村的妈妈，她们给不给孩子讲故事，

和孩子说话，她们都笑，因为她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们觉得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罗斯高认为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了农村儿童从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被越落越远。他提出“1000天假设”的观点：“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认知，我们的IQ，90%是0到3岁的发育决定的。”只有足够且适合的刺激，才能让孩子的大脑发挥出本来潜能。

罗斯高认为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过广泛重视，如果现在不解决，中国最终将丧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

让妈妈回家？

“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存在严重缺陷”，罗斯高的这一判断少有人质疑，因为国内并无同类相关研究可作反驳，而且这一结论符合人们的常识。不过，争论马上集中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让妈妈回家”的建议给罗斯高带来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将母亲放弃打工返乡陪读称作“丧偶式育儿”，认为这一建议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同时有悖于男女平等的理念。叶敬忠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如果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留在家中，“留守妇女”身份给她们自己、家人和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复杂和严重程度并不低于“留守儿童”。

罗斯高通过本刊回应了这一主要质疑，阐述了他对于解决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问题的详细意见和已经尝试的措施，这些观点在网络演讲中未能充分展开。

罗斯高说，农村孩子和父母团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孩子进入城市，一种是父母返回农村，他更希望是第一种，只不过这在当前无法实现。“如果能让我改变一项中国的社会政策，我第一个就要取消户籍制度。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中国城市的规模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效率越高。取消户口，让农民进入城市，从经济上是有利的。”罗斯高表示。不过他很清楚，政策取向与他的想法并不相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至于女权主义视角的批评，罗斯高说：“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批评，很希望听到大家的讨论。微信上的演讲只是一个简短的提法，背后其实还有一系列考虑。”他说重要的是让母亲明白：把孩子留给老

人，自己出去打工，虽然经济收入会增加，但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害的，母亲应当是在考虑清楚成本收益之后才出去的。在罗斯高看来，中国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实行的“有条件转移支付”政策，即由国家出资，一定程度上补贴在家照看孩子的母亲的收入损失，“因为这对社会也有好处”。至于“为什么不是爸爸”，他认为必须要考虑实际情况。“我们的样本中95%以上的父亲在外打工，贡献了家庭主要经济收入，让他们回来种地没有任何现实可操作性。让一部分母亲回来，对这部分家庭辅助以一定财政转移资助，我认为是可行的。”

此外，罗斯高表示自己现阶段的主要政策追求是建立广泛的养育中心，而非单纯让母亲返乡。“光是妈妈回家也没用，需要有人教她们怎么养孩子。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教给妈妈要比教给其他人，比如孩子的奶奶，有效果得多。”

他总结“让妈妈回家”背后真正的政策建议思路：第一，最好取消户口，让父母把孩子带去城里；第二，让母亲意识到离开孩子是有成本的；第三，可以考虑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补贴回家的妈妈；第四，建立养育中心。

养育中心的实验已经开始。2015年REAP在秦巴山区选取了100个村子，随机抽取其中50个村作为干预组，在村子中建立养育中心，另50个为对照组，不采取任何措施。养育中心的场地来源于各行政村中已撤并的小学校舍或闲置的文化室等，改装成能让全村家长带着0~3岁婴幼儿前来活动的幼儿早期发展中心，并派出养育师辅导家长科学育儿，包括如何陪孩子玩游戏、做美工、唱儿歌，与孩子一起完成专为婴幼儿设计的课程任务。与此同时，REAP团队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干部培训中心合作，编写了《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指南》，从语言能力、运动能力、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四个方面设计了6到36个月婴幼儿每一个月龄对应可以进行的活动，包括详尽的活动材料、方法、目标和难点提示，指导养育师和妈妈科学抚育。

罗斯高很高兴，养育中心已经有了初步的成绩。去实地调研的时候妈妈和奶奶们告诉他，带孩子来中心之后真的发现了孩子的反应与变化，自己也有了社交的场所，“孩子和我都爱来养育中心”。可另一方面罗斯高也遭遇了至今为止最失落的体验，发生在探访对照组村子的时候。“对照组的村子没有采

取任何措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研究的一部分，可我知道。我看到那些孩子被奶奶放在黑暗的房间里，一待一整天，目光呆滞、行动迟缓，我经常有冲动要抱起他们，送去就在旁边镇上的实验组的养育中心。”罗斯高说。不同于以往的贫血和近视眼的研究，罗斯高可以在实验结束后给对照组孩子也开始发放维生素片和眼镜，养育中心只适用于特定年龄，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放任错误抚育方式带来的“伤害”是永久的、无法挽回的。但是罗斯高必须要坚持这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对养育中心是否有效做真正科学的评估。严格的影响评估是REAP团队一直以来的研究特色和强项，在罗斯高和他的同伴们看来，仅仅“做好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找到真正有效的政策，否则可能造成前期投入极大的浪费。正是因为影响评估，REAP发现了前述“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执行中的问题，他们进而提出了改善措施。

每当试图把对农村问题的研究转化为现实政策时，罗斯高都强调中央政府的作用，他认为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世界通行的经验。“50年代美国的反贫困战争（War on Poverty）中主要一条就是强调由联邦政府负责贫困地区教育，因为地方政府不会从投资教育中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蔡建华是罗斯高在推动早期养育项目中的重要合作者，他们共同提出了“0.1%”的目标，即争取到GDP的0.1%约700亿元人民币，用于全国0~3岁婴幼儿发展项目。“0.1%GDP的投入，整个民族的前途都能够产生改变。”蔡建华说。罗斯高最终的目标是在全中国建30万个村级养育中心，以及更大规模、更低人均成本的乡镇级养育中心。

罗斯高转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en）的研究结论：在每个阶段对应投资1块钱，0~3岁是18块钱回报、3~4岁是7块钱回报、小学是3块钱回报、大学是1块钱回报、成人教育的回报是负的。2015年度，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2.9万亿元，占GDP的4.3%，其中用于投入0~3岁阶段的固定项目预算则几近于无。“中国浪费了太多钱在大学上，现在投资0~3岁才是效益最高的。”罗斯高希望，他的研究和呼吁能够改变目前中国教育经费投入上严重的“错配”问题。■

邹其芳：国内口腔医疗市场千亿规模，尚无绝对领先者。

ARRAIL 瑞尔
Fabulous Smile · Confident You

日前，由瑞尔集团主办的第一届瑞尔集团资深医生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瑞尔集团总裁邹其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瑞尔集团计划在未来 5-8 年间开设 1000 家口腔诊所，包括瑞尔齿科和瑞泰口腔两大品牌。他同时表示，目前国内口腔医疗市场规模近千亿元，但尚无绝对领先的医疗品牌。

据了解，瑞尔集团成立于 1999 年，目前在国内 14 个主要城市拥有近百家诊所，这意味着计划新开的诊所数量相当于当前数量的 10 倍。对于诊所数量增加，如何保持管理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一致性，邹其芳表示，一方面在于公司的合伙人制度，全员理念一致，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校园招聘从头培养属于自己的人才。邹其芳称，瑞尔集团的优势除了在于成立时间早，品牌认知度较高，此外便是拥有一批价值观相同的人，而人是瑞尔最大的竞争力。

对于当前中国口腔医疗市场的竞争情况，邹其芳分析称，目前中国的口腔医疗市场规模为 800-1000 亿元，现有的医疗品牌占比都不超过 5%，谁对谁都构不成威胁，市场竞争也就无从谈起。邹其芳表示，瑞尔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自己。

不过邹其芳也表示，在口腔医疗市场中，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疗机构发展还是比较超前的。他举例说，在欧美国家，优秀的医生大多集中在私人诊所而非院校，在中国则正相反，因此多数患者倾向于选择公立医疗机构。但在口腔医疗市场中，大约 50% 的口腔医疗服务是由民营机构提供，尤其对于 80 后、85 后这一代人，对民营机构的偏见较少，因此这部分人也将是瑞尔未



瑞尔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邹其芳

来重点争取的目标人群。

对于经历了多轮融资的瑞尔集团而言，如何看待与资本的关系也备受关注。对此邹其芳认为，资本和企业是“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并不是什么水都能喝。双方要相互尊重，有效沟通，不要试图去“忽悠”投资人，“这些管钱的人肯定要比你精明得多”，邹其芳说。

据会议组委会介绍，本次大会为期三天，会议议题涵盖牙齿正畸、

牙周种植和美学修复等技术领域，与会者包括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瑞典隆德大学、香港大学、台北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成都华西牙种植医院、山东省口腔医院的知名口腔医生以及瑞尔集团数百名资深医生。北大口腔医学院名誉院长张震康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口腔学院院长 Prof. Denis F. Kinane、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王兴教授等业内知名医生学者亦出席会议。





高莽：内心有光的人

记者 艾江涛

10月6日，91岁的高莽逝世，离开他已从事73年的翻译事业，留在身后的是包括普希金、冈察尔、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阿列克谢耶维奇等诸多名家的译作与选本。

10月8日，在下了一天的秋雨中，李明滨送别了比自己年长7岁的俄苏文学翻译家高莽。

李明滨真正和高莽熟悉起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北京大学俄文系的负责人，他经常和高莽一起开会，向他约稿，交往很多。一次，高莽译了一本俄国讽刺小说家阿尔卡季·阿威尔岑柯的《插向革命的十二把刀子》，问李明滨，这个你敢发表吗？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学术风气并未完全开放，李明滨最终未敢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国外文学》上发表这部作品，原因是尽管作者曾被列宁夸赞很有文采，却在

思想上“很反动”。

多年之后讲起这段往事，让李明滨感受最深的并非愧疚，而是高莽作为一个翻译家，对外国文学涉猎的广泛和对思想风气变化的敏锐。

高莽常说自己是非科班出身。他早年在日据时期的哈尔滨青年基督教会学习过10年，并自此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也学过俄罗斯绘画。哈尔滨当时有大量俄国侨民，受俄苏文化影响很深。1943年5月的一个晚上，高莽在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时激动难眠，当晚便译出了后来发表在《大北新报》上的《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17岁的高莽自此进入译林，一发不可收拾。2年后，高莽到成立不久的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之后又从哈尔滨到沈阳，并于1954年调到在北京的中苏友好协会总部。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后，高莽被调往《世界文学》杂志，在那儿一直工作到退休。



左图：苏俄文学翻译家、画家、散文家高莽（1926~2017）

右图：1953年，27岁的高莽（左侧伸手者）随中苏友协同事访苏时，在运河上接受苏联友人的鲜花

翻译家的敏感

用李明滨的话来说，“高莽有很高的思想高度，他的翻译一直能做到与时俱进”。早在1947年，高莽翻译了苏联作家邦达连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上演时曾引起轰动，随后更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

让李明滨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是高莽在1951年翻译的乌克兰小说家冈察尔的《永不掉队》。小说讲述两个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人，在战后回到学校，分别成为讲师和在读大学生。而在战时，两人的身份则是战士和连长。打仗时，连长对他说：你不许掉队，掉队即意味着死亡。可战后在学校里，已上了年纪的连长读不下去，讲师回过头来告诉他：你以为只有战争期间才永不掉队？现实生活中也要永不掉队。“这个太有现实意义了。”李明滨说。也正因此，这篇小说很快被选入中学课本。只是，早就读过这篇小说的李明滨，还一直没有把乌兰汗与高莽对应起来。

像李明滨一样，没有把笔名与高莽本人对应起来的，还有俄苏文学研究与翻译大家戈宝权。1949年初春的一天，戈宝权路过哈尔滨时，希望与当地的

俄苏文学译者和研究者见见面。等到了那里，高莽发现只有自己一人，已过了约定时间，戈宝权问高莽怎么其他几个被邀请的人都还没来。高莽问他还有哪个人，戈宝权拿出笔记本念出几个人名，他不禁傻眼了，过了半晌才带着惶恐回答：“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

正是经过这次只有两个人的座谈会，戈宝权成为高莽终生的恩师，也打消了他对口译的抵触心理。早年日伪统治时期，翻译在他眼里都是汉奸，戈宝权告诉他，关键在于翻译什么，为谁翻译。此后，在中苏友协工作期间，高莽随代表团访苏期间便承担起口译任务，并为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

1956年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演讲，后来因翻译莱蒙托夫诗歌成名的翻译家顾蕴璞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俄文系的“大一”新生，在台上为小说《真正的人》作者波列沃依担任口译的是高莽，顾蕴璞为他漂亮的俄语倾倒：“不但准确，反应很快，而且即兴的演说，能翻译得那么有文采，完全是书斋中出来的人比不了的。”

在顾蕴璞看来，中国对普希金诗歌的翻译，高莽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比较而言，戈宝权精准而流畅，高莽看准原文并多让口语入诗，查良铮译得精炼

并注重韵律，各有特色。

高莽的翻译从小说、戏剧到诗歌，涉猎极广。可不不论是顾蕴璞，还是高莽的家人，都认为他在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翻译上耗费心力最大。某种程度上，对阿赫玛托娃作品的翻译，正如高莽在《安魂曲》一书前言所写，暗含着心路历程的转变印痕，还有作为翻译家的那份自觉与敏感。

早在1947年，高莽刚到中苏友协工作就知道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名字，不过却是来自他翻译的当时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一篇长篇报告。在报告中，阿赫玛托娃被斥责为“奔跑在闺房和教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夫人”“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修女”。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领域的书籍逐渐解禁，高莽有次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俄文版阿赫玛托娃文集，借回家中，连夜阅读，早年的印象完全被颠覆，眼前的抒情女诗人完全是位炽热的爱国者，始终与多灾多难的人民在一起。高莽自此开始翻译她的作品，并陆续在1991年翻译出版《爱》，2011年翻译出版《安魂曲》。也因为对阿赫玛托娃叙事诗《安魂曲》的翻译，高莽在2013年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

1983年访问苏联时，高莽前往圣彼得堡喷泉楼访问了阿赫玛托娃纪念馆。2001年，高莽又在诗人于圣彼得堡郊外的故居与墓园长久徘徊，为诗人画下画像，并写下献诗：“俄罗斯可有比她 / 更不幸的妻子 / 更可怜的母亲 / 更多难的缪斯……”

《世界文学》编辑部

“高莽是一个有浓郁艺术家气息的人，特别可爱。我记得第一次到编辑部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画画用的类似于工作服的衣，上面油迹斑斑。第一次见到我，就说了一句话：如果要趁名趁利的话，就不要到编辑部来。”30年过去了，《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还记得刚到编辑部报到时的情景。

在很多了解高莽的人眼中，仅用翻译家难以概括他的身份，连接在他名字前的前缀至少还包括画家与散文家。刚到编辑部，高兴便被他身上随意流露出的艺术家气质所吸引：“他热爱艺术文学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比如说画画，他基本会逮着每个机会去画画。有时候在过道里碰到一个漂亮的女孩，他都会说：美丽的，你能不能停一下，让我帮你画张画？我们举办一些交流活动，他都会拿出本子来画。”

高兴记忆深刻的是，高莽那时带着他挨个拜访

冯至、卞之琳、戈宝权等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前辈名家。每次去之前，高莽都会在附近水果店买些东西带给老人。每个前辈留给高兴的印象都不同，冯至声音洪亮，特别沉稳，每句话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底气；卞之琳口音特别重，讲起话来语调很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尽管听不懂，却特别有韵味；戈宝权则热情得让人受不了，又是倒茶，又是拿点心水果。每次拜会，高莽都会详细问起老先生的生活情况，临走再约约稿子。

上世纪80年代，学术交流的气氛逐渐活跃。高莽每周为编辑部同事组织一个讲座，邀请文艺界各个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来演讲，其中不但有成名的作家、批评家，还有指挥家李德伦、画家丁聪等人。“讲座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一下子拓宽了视野，每个人为你提供了一种文艺的可能性。”高兴说。

在《世界文学》漫长的工作生涯里，高莽留给同事们的记忆，更多还是在日常工作中的点滴。编辑部在约稿翻译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捷克作家塞弗尔的回忆录时，给过来的稿子最初定的名字是《世界如此美好》，但高莽、杨乐云觉得太过普通，和大家一起琢磨，最后敲定为《世界美如斯》。巫宁坤最初在翻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最初来稿的书名是《伟大的盖茨比》。“实际上 great 有伟大、了不起、你真棒等意思，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个为了情感牺牲自己的暴发户，用伟大形容并不到位，后来经过大家反复推敲琢磨，最后才定为《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兴说。多年过去，这些书名的翻译都已成为后人无法绕过去的经典。

高兴回忆说，高莽的大量工作，都是在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中完成的。高莽的母亲活了102岁，妻子在60岁时双目失明，很多时候家里的两个女人都需要他来照顾。可在高兴看来，高莽是一个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热情和激情，心中有光的人。他曾经说，自己每天给妻子滴眼药水时，是最幸福的时刻。

对于最后的告别，高莽想得很清楚。据他的外孙回忆，早在20年前，高莽就经常对家人说三句话：“今年大概是我最后一年了；我怕工作做了一半；希望自己能送走妻子再走。”在他的内心，隐藏着强烈的情感，如他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 如果我的嘴一旦被堵上，/ 希望到了埋葬我的前一天，/ 她们也能把我这个人怀念。”

（本文写作参考《高莽》一书，高莽自述，果文川整理。感谢王晓宇对采访的帮助）



从学习艺术史开始
松果艺术史课堂 X 李建群



松果·课堂

扫码收听艺术史课堂





儿童创新教育：在山林和城市中

主笔 / 陈晓

教育是一个远超出课堂的广泛概念，是一种根植在社会方方面面的观念。好的儿童教育不是仅仅在课堂，整个城市，整个自然，无一不在对孩子进行着教育。

荒野中的首都

2017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是个阴天。沿着城边的海滨路散步，风像层层涌起的浪花，从太平洋上刮过来，刮上街道，刮进城市。公路的两侧，一边是大海，一边是山崖，低矮的独栋房屋分布在山崖上。但越往前走，房子越少，山还原成没有建筑的野山，大丛繁茂但种类杂乱的植物包裹着山体。植被没有经过人工的管理，像一丛丛蓬头乱发，剑麻的叶子像刀戟一样直插蓝天。除了偶尔呼啸而过

的汽车，还有在细窄自行车道上一掠而过的骑行者外，我几乎感受不到什么现代城市的气息，恍然来到了人迹罕至的荒凉郊野。

这是新西兰的独特之处。作为太平洋上一个人均年薪近6万纽币（约合28万元人民币）的岛国，在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中，新西兰和加拿大并列第九，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发达国家”。除了老牌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外，新西兰近年来在世界电影工业的生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维塔工作室就在惠灵顿，这个工作室因为曾参与《魔戒》《金刚》《阿凡达》等好莱坞大制作电影而声名鹊起。它的兴起带起了一个创新产业——电影制作，惠灵顿如今已经是电影后期制作的世界级基地。

几乎没有被刻意改造过的自然地貌和充满创意的社会内核，是新西兰给人最为特别和深刻的印象，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原始的自然环境吸引着世界各



2



3

地的创意先锋人士来到这里，比如在电影史上创造过多个票房纪录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从2012年开始就在新西兰多处屯田置地，作为自己在新西兰进行各种探险活动的基地：“来到新西兰，我就可以踏上徒步旅行，看看各种神奇的物种，唤起我儿时对大自然无限可能的遐想。”卡梅隆不仅在电影制作上有很多开创之举，还是个顶级的自然探险爱好者。他曾经驾驶单人深潜器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探索“地球最深处”，并为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来纪录世界最深的黑暗世界。这位执导过11部好莱坞卖座大片的加拿大导演表示：“我从自然环境中汲取灵感。与我们人类微不足道的想象力相比，大自然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这或许也能解释卡梅隆为什么在影像领域具备天才的创造性——在未被人类触及和改变的自然界内部，隐藏着某些最能刺激人思维潜力的元素。

新西兰在保持自然的原始风貌上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任何可能有损生态的东西都不被允许带入境内。机场入境时，就看到一条巨大的横幅横亘在海关入口，警示任何食品、植物种子都不能被携带入境，甚至随身携带的徒步手杖、徒步靴都要求必须申报。海关检

查人员对我携带的徒步靴鞋底翻来覆去审查一番，并提了好多问题：“最近什么时候使用过？”“在什么地方？”“城市还是乡村？”……政府管理部门悉心留存下来的原始自然，与社会个体的创造性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对自然的管理方式和因此留存下来的荒野，会影响甚至决定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包括教育。

Amesbury 小学

我们这趟旅程的目的是探访新西兰的中小学教育。西方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如今相当多中国家庭学习的“先进模板”，其核心概念是重新定位了孩子在教育中的位置。儿童是什么？他应该以什么方式接受教育？这是贯穿西方近现代教育史的两大问题。对西方现代教育影响最深刻的是由杜威、蒙台梭利等教育思想家在上世纪中期做出的探索和回答。虽然他们提出改革基础教育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观念都是一个——孩子是教学的中心，教育应该在尊重儿童的人格和天赋的基础上进行。这两次运动奠定了儿童在现代教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教育重心开始由传统的教师为中心向儿童转移，如何学比如何教更加重要。

我们在惠灵顿探访的第一站是 Amesbury 小学。小学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山谷中心，我们到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给我们一个毛利族的欢迎仪式。高年级的学生们排成一列，用毛利语唱了一首欢迎的歌曲。虽然听不懂歌词，但也能从曲调中感受到雄浑的气势。领头的一个孩子是一张亚洲脸孔，欢迎队伍里的小学生也是种族各异，既有肤色略黑的原住民，也有不少亚洲面孔，白人孩子在其中倒显得像少数派。

“好的儿童教育，是让他们从小能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对这个世界拥有更深刻的理解力和包容力。”学校校长对我说。她是一位教育家，除了繁忙的学校工作外，还坚持在自己的网站上更新有关儿童教育的心得，并勇于向当地的教育管理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在新西兰，校长在教育系统里拥有相当的权力，她可以决定学校的教学方向、理念、教学内容、管理方式。可以说，每所学校都带着校长个人的深刻烙印。Amesbury 小学的校长曾在一所毛利学校教学多年，她对儿童教育的最大感受就是包容——作为教育者，既要教会孩子包容和理解其他族群，也要理解和包容孩子的天性。

我们参观的第一堂课是语文课，老师的教学方式是让孩子们分组讨论不同的关键词，每个小组要用绘图和文字的方式，绘制出一张关于这个词的简报。比

1. 新西兰的儿童教育非常注重体育运动，橄榄球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运动

2.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

3. 惠灵顿，一个被原始自然环境包围的城市

如“国家”应该包括哪些机构，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教室里没有成排成列的桌椅板凳，一大张暖灰色的地毯上，沿窗摆放着几张圆桌和红色单人沙发，在房间的另一角是高矮不等的两张木质长桌，地上还随意摆放着三两个懒人沙发，落地门窗正对着户外的如茵草地。孩子们在这个空间里，或坐或卧，或者翘起脚趴在地毯上，在一张大白纸上写写画画表达着自己对于“国家”“社区”“议会”“学校”的理解，头碰头讨论着由词语衍生出来的假想国。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自由的轻快气氛。

“像居家一样的教室布局”，是以杜威为首的美国教育家发起的教育革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孩子进入的不是一个戒律森严的学校，而是像家庭的起居室那样让人放松的环境。比如在看似简单的课桌摆放方式上——杜威提出以做活动的方式，让孩子从亲历经验中学习。很多西方现代国家小学教室的课桌因此不再是单一面向教师，而多以围坐的方式摆放，以便于儿童在活动式教学中可以相互讨论，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孩子为教学中心的出发点甚至影响到了桌椅的高度、长宽比例，照明灯与桌面的距离……课堂内的种种细节都暗藏着对儿童的关注和尊重。但在这个新西兰的小学教室里，在这个“以儿童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上更进了一步。教室里有一些底座是圆锥形的凳子，学生坐上去之后会像不倒翁一样不停地摇来摆去。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这是为好动的学生专门设置的凳子，鼓励他们在听课时摇摆身体。这其中的原理就像一些成年人喜欢在思考的时候转笔一样，当你的手在转动时，实际上会加速头脑的运动，缓解思考的紧张。对一些天性好动的男孩子来说，他们在身体不停的运动时能更好地思考。在一个讲究纪律和规矩的环境里，这样的形式是遭到严格禁止的，但在这所小学里，这些好动学生的天性不但得到了尊重，还被用特制的教具加以支持。

我记得自己曾经历的小学教育，学习不仅是学知识，更多是学规矩。从入学开始要遵守相当多关于身体和言语的禁令，比如上课不许乱动，手要背好或者重叠放在书桌上……但这所学校的孩子们已经从这些身体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了。我们还在教学区的一隅看见一张懒人沙发，一个孩子在上课时间躺在上面悠闲地喝着牛奶。这是给上课孩子留出的休息区，如果有的孩子在上课过程中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一下，他可以申请离开教室，到这个休息区独自待一会儿。

到底是严格约束小孩，让他们直面自己性格中的惰性，并与之硬碰硬地战斗，还是顺从孩子身体中一

些对学习的紧张和疲惫感，给他们一些休息的空间？两种教育方式到底孰优孰劣，我无法做出判断。但只是从那个躺在沙发上喝牛奶的小孩惬意放松的表情上看到一种安全感——他现在在学习上有些困难，但他可以大方地承认这种困难的存在，并稍微放松一下。我从这个孩子脸上的表情里看到了校长讲到的宽容和理解，这种教育者的宽容和理解，让孩子得到了一种安全感和松弛感。

国家博物馆里的历史地理课

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是我在 Amesbury 小学里得到的最深印象。但当我离开学校，进入到城市中时，发现这是整个城市的一种基本态度。尤其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处处能看到从孩子视角出发的展览设计。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坐落在距离海滨不远的地方，外观非常普通，没有堂皇的装饰，也没有高大气派的门庭空间。我们到的那天正在展出的是新西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西兰历史上少有参加的战争。“一战”爆发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参战，组成澳新军团派到地中海战区，军团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1915年初，英国为配合俄国军队在高加索地区对土耳其的作战，决定以澳新军团兵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19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在土耳其爱琴海加里波利登岸，由于导航错误致使军团在预定地点一英里以北登陆。军队本来预期的海滩和小坡，意外地变成陡崖之底，结果使到数量甚少的土耳其防军处于有利位置。澳新军团在尝试立足之际，发现进攻无可能性，在经历8个月的僵持后最终撤退，8709名军人阵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10%的新西兰人（当时新西兰总人口约100万）在海外参与了战役，新西兰是参与该战争的所有国家中，按照人口计算最高伤亡和死亡率的地区。这次战争对新西兰影响至深。为了铭记战争之害，从2014年开始，新西兰计划用5年时间来纪念这场新西兰人丧生最多的战争。

在国家博物馆中看到的这场展览，是一堂非常高的历史课和反战价值观的教育。这些年，西方教育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如何让知识变得有趣，从死板抽象的数据、名词，转变为可触摸、可感受的具体形象和经验。我曾经以自己从小所受教育的经验和一位研究教育的专家争论：“学习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枯燥和艰苦不就是学习应该包含的特质吗？”我从自小得到的训诫出发提问。这位学者回答我：“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的传统观念，我们的教学者就更没有动力去研究，如何让教学更有趣，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我们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中看到的“一战”展览就是对澳新军团在爱琴海加里波利登陆战的模拟。除了用沙盘实景图模拟了登陆战的始末，展览还用了各种方式来体现杀伤性武器如何摧毁人体：以一张动图分别模拟子弹、炮弹、手榴弹、导弹等不同的现代火器在引爆后，弹片会以何种形式进入人的身体里，并如何切割人体血脉、骨骼、神经。用一架屈光望远镜，展示一枚炸弹击中壕沟掩体的始末。炸弹投掷前壕沟中冰冷肃静的气氛，炸弹突然爆炸后血肉横飞的残酷，在镜片中历历在目，犹如身临其境。这是我看过的对战争之害呈现得最为巨细无遗的展览，即便是一个孩子，也能从这些场景中体会到战争中个人之苦，战争之恶。

博物馆中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展览是地震。新西兰位于太平洋地震带上，太平洋板块与澳大利亚板块的交界处如一条巨大的伤痕，沿着北岛的边缘，从南岛横穿而过。地震是这个岛国里的常事，如何了解这个常存于身边的地质现象，了解它的自然性，警惕它的危害性并自我保护，是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和职责。博物馆像设计儿童绘本中的提拉书那样，设计了可以抽动的大陆板块地图，让人对板块的运动和地震带的分布一目了然，并设置了一个测量地震烈度的秤，利用人体跳跃产生的力量来标记不同级别的地震可能在瞬间达到的烈度，将一场大自然的地质活动和人体产生直观的联系。

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博物馆，倒不如说是一个儿童教育基地。不管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还是对自然现象的讲解，都以一种非常形象具体的方式来呈现。行走其中，即便是对新西兰历史和地理一无所知的人，也像孩子一样，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国家历史地理课。

维塔工作室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经提出，儿童教育应该以做活动的方式，让孩子从亲历经验中学习。对低龄教育来说，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某种具体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能力，一门专门的技术。在国家博物馆里体会到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教育方式，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维塔工作室来实现的。它承担设计了博物馆中“一战”展览的人物雕塑，制作了一系列在战争中被干渴、疲累和死亡的恐惧笼罩，挣扎求生的士兵模型。在战争里，人类可能拥有的各种情绪——沮丧，绝望，呆滞，顽强，都能在士兵模

型的脸上看到，甚至从皮肤毛孔里渗透出的汗珠，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维塔工作室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电影制作公司，为全世界电影制作道具、现场特效、特效化妆、微缩模型和武器装备。这个有着蓬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创业公司，名字灵感来自新西兰最大的直翅目昆虫——沙蚤（Vita）。这种昆虫在近两亿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点进化，其形体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是新西兰这个国家最早的生命体，也是整个自然界最大的昆虫。目前沙蚤在新西兰受到人工保护，维塔工作室的Logo上也加上了沙蚤的样貌。

在惠灵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维塔工作室的展厅——维塔之家。负责给我们讲解的是一位红发女孩，言谈举止间有一种莫名的活力和对所讲述事物的兴奋感，或许这代表着一个创意公司的生命力。她带领我们参观了《雷鸟特攻队》的展厅。《雷鸟特攻队》是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经典动画片，维塔工作室的创始人小时候是这部动画片的超级粉丝，当他长大后，决定自己再造一部《雷鸟特攻队》，用这个时代的元素和方式来重新讲述小时候的故事。在《雷鸟特攻队》的展室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各种材料的运用。所有场景——山洞、飞机、跑道、特工队基地，都是用回收的废弃材料做成的。用到的材料多种多样，大到洗衣机的转动电泵，小到一根空心意大利面食材，组装起了一个个电视屏幕上的恢弘场景。

跟随红发女孩的讲解，游览这个完全由童年兴趣生发出来的新版《雷鸟特攻队》基地，不由得惊叹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将如此多的废弃材料重新收集再利用，并由此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奇幻世界，既重建了自己的童年经典，又为新时代的孩子提供了新的童年梦境。这几年新西兰以创新产业和教育声名鹊起，但直到在维塔工作室的展厅里，才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创造力——不是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而是从旧世界平淡无奇的废弃物中，创造出一个美的世界。

这种创造力的来源或许就是那片没有被过多修剪的原野，和在最容易被限制的小学教育阶段就得到了充分尊重的孩子个性，包括那些不太被成人世界所容纳的特性。我脑海中不由得把这个展室和第一天参观Amesbury小学时，那些趴在地下的小孩形象联系起来，这是新西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教育——对荒野的尊重，对孩子天性的尊重，对所有自然事物的尊重，这些尊重保全了各种微小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最终变成了创造力的来源，就像这个从废弃材料中生长起来的维塔工作室一样。■



(OPEN 建筑事务所供图)

李虎作品：

上图：还处在设计阶段的“长城音乐厅”

右图：2017 德国 ICONIC 设计奖评选中获得“Best of best”最佳设计奖的作品“海边的对话”



建筑师李虎：激活城市

文 / 李翊

被工作折磨得很疲惫的时候，李虎像一个愤青，但是骨子里他热爱生活，喜欢植物和摄影，喜欢跟所有在骑车上班路上遇到的小商小贩、大爷大妈以及清洁工成为朋友，并把他们的生活状态用他的古董相机拍下来。

山谷里的音乐厅

在李虎堆满了建筑模型的事务所里，我们一眼就注意到了一个类似被掏空的巨石的建筑模型，这是还处在设计阶段的长城户外音乐厅，委托方没有任何框架设定，唯一的要求是即使音乐厅没有任何演出，也应该是个值得来的空间。这倒是和李虎注重建筑“实用性”和“精神性”的理念比较一致，所以他也做得尽兴。

“这个场地很特别，在河北承德的一个山谷里，

巨石耸立，地上也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你不知道这些石头从哪里来，有怎样的历史。”李虎说，“那里很偏僻，闭上眼睛，都是来自大自然的声音：风声，鸟鸣。除此之外，就是寂静。”从现场回来，他就在想，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建筑？他做了很多种可能性的设想，直到某一天，看着桌子上那块 2008 年从印度带回来的石头，突然找到了感觉，“就做块石头吧，大小、形状也都合适”。

最开始，音乐厅被设计成敞口，因为李虎潜意识里想起了古希腊露天剧场。委托方希望能温和一



点，即使下雨也不会受到影响，于是李虎做了一些修改，就有了现在这个样子：在顶部开了一个洞，洞口的大小经过精确的计算。“怎么能让这个空间既保留美好的设计细节又具有最佳的声音效果，我们专门请了声学顾问，什么样的容积，有什么样的混响，这些都需要科学的设计。”

在李虎看来，西方音乐厅的原型与教堂相关，他希望在没有任何演出时，这里也是一个精神空间，人们在这里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着，听大自然的声音。如果垂直看建筑的剖面图，这个户

外音乐厅就像一只朝向天空的耳朵，内部的各种结构像极了耳蜗。

李虎最近做得比较多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艺术和教育，这也是他认为社会最需要的两类项目。“这是我们设计的深圳坪山表演艺术中心。中国过去的十几年里，不管几线城市，都会搞一个非常昂贵的剧院建筑。”李虎指着会议室里一个灰白色的方形盒子样的建筑模型说，“在开始设计之前，我们的团队仔细研究了已经建造出的上百个不同城市的歌剧院、音乐厅，发现有一个通病，就是形式非常夸张，



建筑师李虎

（照片：陈诚）

这跟剧院内部的功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非常昂贵。这些剧院表现的姿态也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功能单一，只有高大上的剧院的演出，实际上很多剧院处于空闲状态，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多演出来填充这么多的剧院。所以，我希望回归到最纯粹的一种建筑形式，关注点是整个剧院本身 1200 座的空间，同时围绕它组织一个多功能复合的空间。”

最终，李虎说服了当地政府，把它从一个单一功能的剧院改成表演艺术中心，“在同样的预算下，场地空间里塞入了那么多功能，就像一个精密运转的瑞士钟表”。这里不光有大规模歌舞剧院，还加入了功能灵活的小剧场，加入了对全部市民开放的体验区，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戏剧方盒。与一般的剧院拒人千里之外的姿态不同，这个剧院被

丰富的市民生活包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如果我们没钱买票看昂贵的芭蕾舞剧，可以免费进入这些市民空间搞自己的演出，参加自己的文艺活动，欣赏这些花园。同时加入可以盈利的空间，让这些商业空间来支撑那些通常需要政府补贴的文艺活动。

在谈到自己关于建筑的创作理念时，李虎引用了里尔克的诗歌创作准则，在 1907 年里尔克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我尽可能直接地遵循艺术真实的道路，这就是我自己的道路。”“里尔克一生总在思索，总在用现代人的眼光观察和探究。对于纷纭复杂的万事万物，他分别用心灵的耳朵去听，用心灵的眼睛去看，然后用含蓄而严谨的艺术手法和形象化的凝练语言，将他深刻的、独到的感受抒写出来。”李虎说，这和他的创作状态是相通的。

做建筑和做人，在李虎看来是一件事，“都反映了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和李虎一起工作了六年之久的助手陈诚说，李虎是一个生活特别简单，珍惜自然资源，在物质上没有过多追求和欲望的人。这从他配合摄影师拍照时换上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可见一斑。一根最喜欢的炭笔，彩铅、橡皮，和用退役的苹果笔记本电池改装的铅笔盒是李虎简单的随身工具。

这反映到建筑中就是反对奢华的装饰，反对过度建设和浪费，一定要做可持续的设计，做“好用”的房子。李虎也是一个真诚、真实的人，所以他的每一个设计概念都是为了反思和解决实际的问题；被工作折磨得很疲惫的时候，李虎像一个愤青，但是骨子里他热爱生活，喜欢植物和摄影，喜欢跟所有在骑车上班路上遇到的小商小贩、大爷大妈以及清洁工成为朋友，并把他们的生活状态用他的古董相机拍下来。这种对自然，对生活，对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的人的热爱，还有对经典的追求，都直接反映在他的建筑作品里。

自由精神

李虎形容自己，“骨子里就反叛，很小就不随波逐流”。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的时候，因为在传统教学体系里画画得好的学生会更有希望，因此不会画画的李虎以“逃课自学”来对抗传统，也就是此时，通过一位师兄的介绍，李虎知道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柯布西耶认为创造是一个执意的探索，

这个观念深深影响了早年求学时期的李虎。

同样让李虎受益匪浅的，还有他在美国莱斯大学留学时期的师长：一位是他的电影老师，不满传统社会的英国人；一位是当时的院长，也是张永和老师。还有布鲁斯·莫（Bruce Mau），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平面设计师，库哈斯很多项目智囊团里的核心人物。他在建筑系开过一个讨论课，让李虎至今难忘。

2005年，在 Steven Holl 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五年后，李虎成为三个合伙人之一，同时负责领导 Steven Holl 建筑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以及位于亚洲的建筑项目设计工作。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李虎，记忆中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资源共享带来的余温，然而，回国后，他却发现中国社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社会共享资源极端匮乏，且不去说贫富分化，严重的私有化已经造成了公共资源严重的缺失”。李虎说，2006年，他带女儿去中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结果很沮丧，还不如70年代去的时候感觉好——里面没有电梯，没有卫生间，但门票却贵得难以想象。同样是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在纽约的时候带孩子去，那里非常吸引人，而且交多少钱门票是自愿的。在北京，整个城市里也没什么真正意义的公园，城市很不人性化，完全为利益所驱动。“我觉得国内这种社

会共享资源贫乏的状态已经迫在眉睫，要改变现状，政府需要作出相应的努力。但如果单纯依赖政府的职能，建筑师很难有所作为，所以必须尝试找到其他的途径，来进行一些实践。”

李虎找到的途径，就是在大型的私人开发项目上，通过和有共同理想的开发商合作，来做“城市”的课题。“在万科总部，我们把建筑支撑起来，在地面上拿出整块地方，做一个巨大的公园。在成都来福士广场，我们把巨大的商场空间巧妙地下沉，让它的屋面成为一个1.5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对开发商来说，这是双赢的，他们为市民提供广场，广场也把他们的客户吸引过来。”

然而，在感叹幸运之余，李虎也发现，在 Steven Holl 事务所这个平台能接触的都是高端商业项目，还有绝大多数建设和需求是没有机会得到这类事务所参与的。2010年底，李虎正式退出 Steven Holl 事务所，和妻子黄文菁在北京共同主持 OPEN 建筑事务所。OPEN 寓意开放、平等、自由。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李虎和黄文菁已经在纽约开展了一系列非营利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来探寻是否有可能在实践或者设计思路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他在城市里盖房子，但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老百姓，他希望为城市里的普通市民提供公共空

李虎建筑作品：

左图：北京四中房山校区

右图：清华大学海洋中心



(OPEN 建筑事务所供图)



(OPEN 建筑事务所供图)

间,并充分利用这些空间。”和李虎接触了七年的《建筑学报》杂志执行主编黄居正说,无论是北京四中房山校区,还是清华大学海洋楼,深圳坪山演艺中心,关于公共空间的设想一以贯之地存在于他设计完成的每一个建筑作品里,概念非常清晰。而即使抛开市民可以利用的公共空间,李虎给生活在楼内的老师学生也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开放性公共空间,也就是他所说的供人使用的空间。

重新定义城市

OPEN 建筑设计事务所隐藏在方家胡同一个类似微缩版“798”的艺术区里,这个长方形的由厂房改造而成的办公空间被经年累月生长的绿色爬藤植物包裹覆盖,以至于我们按照门牌号码转了一大圈,才有眼尖的同事发现那扇嵌着镂空 OPEN 标志的小木门。

奥运会前后,北京整体建设进入投资高峰期,中国建筑师实际上有着比国外建筑师更多的实践机会。李虎 2006 年回国的时候和 Steven Holl 做的北京当代 MOMA 项目,大到超过了 Steven Holl 之前 20 多年建筑实践里建成的所有项目,并获得了 2009 年世界高层建筑协会最佳高层建筑奖。

不过,中国私人建筑事务所生存艰难也是事实。李虎的 OPEN 事务所运营状况相对要好,一方面,李虎曾经在 Steven Holl 建筑师事务所作品的作品确实有不少人喜欢,为他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如何在建筑师个人价值观的实现和甲方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调动好中国良莠不齐的施工队,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完整体现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他也能应付自如。

阿那亚度假地产创始人马寅说,在和甲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李虎并不是个有技巧的人。“像同时也为阿那亚设计作品的另外一位建筑师,为了保持自己的设计原汁原味地体现,他有妥协,有技巧,有迂回,也有坚持。而李虎属于比较感性比较执着的人,如果甲方不认可,完全聊不到一起去,他宁可不做这个设计,好在他太太能在理性上互补。”马寅说,这也导致了一种极端的局面,那就是“喜欢李虎的会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就完全不认可”。

“建筑要超越一个精致美学,带来变化,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要推动这样的变化,阻力可以发

生在城市设计的各个层面,即使超越了甲方,也很难超越其他层面。”李虎说,“建造对中国是个新兴事情,缺乏专业性、技术性,一切都在混乱中奇迹地发生,面对混乱,真正在乎的人要从中找出秩序。所以不同阶段的策略很重要。”OPEN 成立至今,在每一个完成的作品(为数不多)里几乎没有折扣地实现了几乎所有主要的建筑想法。

因为绝不随波逐流,李虎也放弃了一些机会和诱惑。他有一个做了好几年的武汉地标性写字楼项目,基础已经开工,结果开发商换了,新开发商想把李虎设计中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空间改成纯功能性空间出售,这让李虎特别不能接受。“他找我,问我能不能说服开发商放弃这个想法。我建议他妥协,但是最后他放弃了这个项目。”马寅说。

李虎很较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发火往往都是因为对方做事不认真,凑合敷衍。“一般的事务所主要是做方案,因为没有施工图盖章权,基本都是找一家设计院画施工图,但是好的建筑师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因为有很多节点的问题需要处理。在李虎的带领下,OPEN 自己的图就画得非常细。”黄居正说,“在国外,其实还有个环节,要将施工图再翻成施工队自己的施工语言,但是在国内是拿着建筑师的施工图直接施工的,这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建筑师盯工地也是非常重要的。”黄居正说,在国外受过良好训练,做事认真,又有大量实践经验的李虎就很注重这些细节。

四五年前,黄居正去看过李虎在秦皇岛做的歌华青少年营地体验中心,某种程度上它和四中房山校区类似,有大量开放性公共空间,不同空间里的活动,学生们相互都可以看到,这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隔了几年黄居正又去看了一次,“和我们见过的很多过了一两年被大改或者废弃的建筑体不同,这个中心的设计基本没变,建筑质量和使用状况都非常好”。黄居正大为折服,“这体现了甲方有明确的目标,而建筑师与甲方有很好的沟通,提出了符合现实的方案,而不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概念或者理论去设计”。

李虎和他的团队还在做一些城市研究,像“红线公园”,关注城市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城市里的市民公园极少,一个是城里到处都是小区围墙。“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答案是围墙变成公园,那就到处是公园了。”2009 年,李虎带领 OPEN 做了

一个研究项目“二环2049”，设想将北京二环高速公路所占用的宝贵土地变成一个环状的“中央公园”，同时插入城市缺乏的各种公共文化设施。李虎说：“现代意义的都市公园从19世纪初在德国开始出现，起点往往都是因为拆除了城墙，创造了这些建设公园和公共设施的用地。二环本身就曾是北京的城墙，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提出过在城墙上建公园的想法。”喜欢骑自行车的李虎还会研究自行车跟街道的关系，跟建筑的关系，跟城市的关系，“把自行车带回生活中来，目的不在于提醒人们对自行车的重视，而是唤起对人性化生活的重视”。

放大到城市层面，李虎有更深远的期许。在他看来，中国城市的尺度虽然大了，但是包容、开放依然常常被忽略，其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文化里至今仍然缺少真正的对人性的关怀，对个体的尊重，对独立人格的培育和对自由的宽容。他至今难以忘怀在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看到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建筑给予他们尊严：图书馆入口处，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以三层高的水平向空间和七层高的竖向空间交织出“免费开放的城市客厅”，加之超过400台无偿开放的电脑，向每一个人

敞开怀抱。置身图书馆，他们的表情、举止都和街上流浪的时候不一样。抱着同样的情感，几年后，他回访来福士项目，看到一位清洁工坐在池塘边休息，于是把那个画面拍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设计它的目的，它对所有人平等开放”。

“我们急需更加开放和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城市，我们看到了对各种形式、各种尺度的公共空间的极大需求，它们开放、自由，服务于社会大众。如果重新规划一个城市或者修复一个城市很难，或者需要漫长的时间，那么积极的建筑可以比较直接地起到重新激活城市生活的作用。这些建筑，把人聚在一起，把新事物和老历史联系在一起，打开封闭的城市，联系起割裂的社区，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空间与事件的组合，让城市重新充满惊喜和活力。”李虎认为，当这样的建筑越来越多，其修复与重新激活的效应也会越来越有效，从而扭转自私短视的城市状况，重新定义城市——其核心精神为共享与包容，自由与平等。而这种源自于生活方式、社会需求、人文关怀的不断进步的无形的、人文的力量，将超越简单的技术层面，更有可能推动新的建筑革新。■

《读书》2017年第十期目录

冯 时 考古学中的“暗物质”
刘宗迪 《山海经》与怪物阐释学
夏继果 从全球互动到“人类世”
伍 斌 黄柳霜的夹缝人生

短长书

“空折梅花寄所思”（刘跃进）“五四”
纪念：被赋予的意义（凌云岚）“胎记”
与“烙印”（叶诚生）

罗岗等 基本收入·隐私权·主体性
张宝明 诗意的人文与人文学的
失意

王 璞 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
何 涛 加尔文：专注此世的神学
政治

石 芳 写作，斗争，还要创造财富
卜 键 盛世的漠视与疏失

张 晴 多重时间

品书录

年代记忆中的近代史（郑培凯）·反
“古典共和主义”的孟德斯鸠（童群
霖）·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
进程（王东）

苏 力 从历史到理论 著译者言

朱存明 图像汉学展新知

江弱水 微言一克的重量

桑 农 《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
密码

读书短札

漂亮文章 拾读抄（月庵）·《史记索
隐》“淖盖”是人名吗？（孙利政）·唐
宋“书学”北窗谈记（刘涛）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超级玛丽”为通用汽车定调

主笔 / 李三



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

通用汽车的员工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Mary Barra）称为“超级玛丽”。作为通用汽车的女掌门，她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总统专家委员会委员。玛丽·博拉上任至今已经三年多，在商业模式上，她执掌的通用汽车发生了很多改变，不再追求无谓的扩张，而是效益优先。身居高位的她有着怎样的愿景？又将把通用汽车带向何处？

三联生活周刊：通用汽车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全球业务战略调整，包括出售欧宝品牌、精简国际运营部等。这些举措背后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如何评价目前特斯拉市值超过通用的这一局面？

玛丽·博拉：通用汽车重视提升股东投资的价值与回报。我们不仅在各个市场专注传统汽车业务的继续发展，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加大对改变未来出行的创新汽车技术的投资，包括电气化、智能化等。去年，通用汽车在美国市场推出了首款具有超长行驶里程的雪佛兰 Bolt 纯电动汽车，既缓解了消费者对纯电行驶里程的焦虑，同时价格又十分亲民，吸引了很多普通消费者。我们将持续推动在电气化、网联化，还有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战略发展，相信也会逐渐受到股东和投资界的积极反馈。同时，我们也会坚持以严格的资本配置，进行适当的业务投资，通过资产优化，实现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

我们将重点投资具有长远发展潜力、更具盈利性的市场，并在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的战略。以我们与 PSA 集团的交易为例，双方有合作开发的产品，并且基于欧洲市场的产品特点及良好的合作基础，相信最终这项交易将有利于打造一个新的欧洲市场

领军企业。同时，我们也将通过持有 PSA 股份认股权证的方式参与合并后公司的未来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通用汽车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新能源车“双积分”政策？

玛丽·博拉：在 2016 到 2020 年期间，通用汽车会在中国推出至少 10 款新能源车型。我们在新能源车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并且将和合作伙伴一起不断推出更多电气化车型。目前，我们的新能源车产品包括上汽通用五菱推出的宝骏 E100 纯电动车，上汽通用汽车旗下的凯迪拉克 CT6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以及别克 Velite 5 增程型混合动力车。通用汽车在中国会继续加强在新能源车领域的布局，全力推动电气化战略的实施。

三联生活周刊：和德国车企相比，你如何看待通用汽车的优势和劣势？

玛丽·博拉：通用汽车在电气化、智能互联和自动驾驶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也将与合作伙伴——上汽集团一起努力，在这几个领域引领未来的发展。我们不是在讨论即将推出多少新能源汽车，而是我们已经向市场推出新能源解决方案。在互联方面，自 2009 年我们就已经通过安吉星在中国推出车载互联服务，并且通过不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价值。在美国，通用汽车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

发展遥遥领先。在共享出行方面，我们在美国成立了车辆共享服务品牌 Maven，并在中国开展车辆共享试点项目，以进一步了解和探索共享模式。汽车科技正驱动着未来出行方式的变革，通用汽车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规划。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本土车企在品牌和产品力方面提升迅速，你认为中国品牌是否会对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构成一定威胁？

玛丽·博拉：为应对本土品牌的快速发展，我们也将继续专注于市场，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如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五菱和宝骏等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理念。

钱惠康（Matt Tsien，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我们在中国拥有最丰富的产品阵容，涵盖从凯迪拉克到宝骏等产品。我们的优势在于将领先的全球资源和本土优势相结合。在中国的泛亚工程技术中心与我们的全球研发团队合力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最卓越的产品。关于智能互联，通用汽车旗下安吉星在中国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 100 万，他们每一天都在使用我们的交互服务。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目前中国并非美国进口车的主要来源，但考虑到未来贸易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市场的不同布局，未来通用汽车从中国出口的比例是否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玛丽·博拉：我们的原则是当地制造当地销售。通用汽车在中国制造的 97% 以上汽车在中国销售。从中国出口昂科威是因为出口目的地的需求较小，当地生产不具备规模经济效益。我们选择出口是为了向消费者提供更广泛的产品选择，今后我们会继续以此为考量，但当地制造当地销售的大方针不会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通用汽车在中国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玛丽·博拉：我们认为豪华车领域非常具有进

一步拓展的机会，凯迪拉克品牌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而且这个势头还将持续。在智能互联方面，我们会进一步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电气化在政府政策支持和多方努力下也存在巨大的发展机会，我们将力争成为业内第一家提供全系电动车并实现盈利的企业。目前，通用汽车已经推出了不少电动车型，在电气化领域具备了诸多优势，这为我们在该市场取得成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即将搭载在凯迪拉克 CT6 上的超级巡航驾驶辅助系统会成为重要卖点吗？作为车企，通用汽车如何教育消费者安全合理地使用驾驶辅助系统？

玛丽·博拉：通用汽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技术和安全理念相结合，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最安全的驾驶体验，安全一直是我们的重中之重。通用汽车始终将安全置于首位，并帮助消费者明白，在创新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也需要为自身安全负责。在开发自动驾驶技术时，我们同样将安全放到首位，确保新技术能够与车辆顺畅集成。

超级巡航（Super Cruise）是一项非常令人振奋的技术。通用汽车在超级巡航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入，使其可以与我们现有的产品系统很好地整合，同时确保其安全性。超级巡航技术依然需要车辆驾驶员保持专注，即便可以解放双手，不踩踏板，驾驶员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我本人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体验了超级巡航技术，这是你一旦使用了就会觉得离不开的技术。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燃油车停售的话题非常热，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玛丽·博拉：通用汽车一直在大力推进电气化技术的开发。我们已经推出了凯迪拉克 CT6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并且正在大力降低电池成本。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有效拓展新能源汽车产品线，给予客户高效且多样化的选择。当然，我们也正在关注政府的相关事项时间表。■



1



2

性、谎言与好莱坞的男性权力

文 / 何潇

现实中的“大亨丑闻录”像一个过时剧本，充满陈旧夸张的情节——人们谴责影视作品中的不合理，却容忍现实中的不合理。因为权力加身，哈维·韦恩斯坦的老剧本里，出现了连电影都无法匹及的豪华卡司。



3



4



5

大亨丑闻

2016年有一部华伦·比提导演的喜剧电影，名为《打破陈规》(*Rules Don't Apply*)，是以好莱坞大亨霍华德·休斯为原型创作的。上世纪50年代晚期，霍华德·休斯在洛杉矶有一栋宅子，安置那些前来向他寻找机会的年轻漂亮女演员。27岁的莉莉·柯林斯饰演的女主角便是这栋“藏娇宅”里的一个。好莱坞老牌巨星、79岁的华伦·比提饰演这位人生开始向下坡陡转的好莱坞大佬。

故事非常老套：年轻女演员接受了好莱坞大佬制定的潜规则，却放弃光明前景追逐内心，最终与司机心上人终成眷属——带着与这位好莱坞大亨生下的孩子。电影充满了插科打诨的老段子和轶闻梗，情节荒诞不经，然而好莱坞的陈规并没有打破——即使在一部喜剧电影里。

当我看到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骚扰新闻时，想到了这部几个月前看过的电影。与电影相比，哈维·韦恩斯坦的“现实剧本”甚至更为陈旧和狗血：在某个特殊场合(电影节、派对、会议等)，业内大亨叫年轻女性(通常为女演员或模特)到房间谈工作(暗示给予重要角色或者谈剧本)，在隐秘空间里，让对方提供服务(按摩或者更难以启齿的工作)。

在《纽约客》的长篇报道里，数名女演员(包括Mira Sorvino、Rose McGowan、Asia Argento、Jessica Barth、Rosanna Arquette等)告诉作者罗南·法罗(Ronan Farrow)，哈维·韦恩斯坦曾对她们进行过性骚扰。女演员罗珊娜·阿奎特(Rosanna Arquette)向罗南·法罗讲了这样一件事。那是90年代早期，此时她已经成名，主演了包括吕克·贝松《碧海蓝天》(1988)和马丁·斯科塞斯《下班后》(1985)等多部作品。一个晚上，韦恩斯坦约她到贝弗利山庄酒店谈剧本。当她走进房间，看见韦恩斯坦身着浴袍站在那里。韦恩斯坦说脖子有些酸，让她给做按摩，并抓住她的手放到自己的脖子上。罗珊娜·阿奎特大叫着跑开了。这次拒绝令她失去了一个角色。此后韦恩斯坦持续为难她。在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哈维·韦恩斯坦制片)中，她也只得到了一个小角色。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女演员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代表作《双面玛丽莲》《双重阴

1~3. 站出来指证哈维·韦恩斯坦的女演员们：格温妮丝·帕特洛、艾什莉·贾德、罗珊娜·阿奎特

4. 电影《打破陈规》剧照

5. 格温妮丝·帕特洛与哈维·韦恩斯坦(右)在电影《莎翁情史》首映式上

谋》《桃色逮捕令》等)讲了几乎同样的故事。地点依然是贝弗利山庄酒店。受到哈维·韦恩斯坦邀请时,她以为将要参加的是一场商务早餐会议。然而当她到达房间,也看见了穿着浴袍的韦恩斯坦,让她提供按摩,并问她要不要看他洗澡。“我当时想的是,怎样才能尽快离开房间,又不会惹怒哈维·韦恩斯坦。”艾什莉·贾德说。

韦恩斯坦的丑闻被陆续曝光之后,越来越多女性站出来指证这位好莱坞大佬。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主演《莎翁情史》《天才雷普利》《钢铁侠》等)回忆说,在她还是个22岁小演员的时候,韦恩斯坦曾经叫她“去他的房间开会”,然后开始对她毛手毛脚,这场骚扰最终因为布拉德·皮特德(格温妮丝·帕特洛当时的男友)阻止而没能得逞,但事后韦恩斯坦警告她保持沉默。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也向媒体表示,曾被哈维·韦恩斯坦骚扰,在拒绝之后,中止了与他的合作。

现实中的“大亨丑闻录”像一个过时的剧本,充满各种夸张情节——人们谴责影视作品中的不合理,却总容忍现实中的不合理。因为权力加身,哈维·韦恩斯坦毫无新意的老剧本,搭配了电影里难以出现的豪华卡司。

谁是哈维·韦恩斯坦?好莱坞王牌制作人,传说中“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赢得的感谢次数比上帝还多的人”。1979年,哈维·韦恩斯坦和弟弟共同创办了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Miramax)。公司被迪士尼收购后,兄弟俩又于2005年创办了韦恩斯坦电影公司(Weinstein Company)。其旗下两家公司制作的电影,获得了超过300个提名,赢得了5次“最佳影片”。在过去几十年里,哈维·韦恩斯坦或许是奥斯卡颁奖礼被感谢次数最多的人。

1998年,韦恩斯坦作为制片人的《莎翁情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2002年,又因为《纽约黑帮》获得了奥斯卡提名。许多影史经典,如《低俗小说》《性、谎言和录像带》《国王的演讲》《艺术家》《英国病人》《铁娘子》《乌云背后的幸福线》,背后都有哈维·韦恩斯坦的名字。他还与民主党精英交往甚密,包括希拉里和奥巴马(奥巴马女儿曾经在他的公司实习)。“在公开场合里,他是一只自由的狮子、女性的拥护者,同时获得了艺术和人道主义的奖项。”

业内人士称,过去30年里,哈维·韦恩斯坦的丑闻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为

何被保存了这么多年?因为权力。哈维·韦恩斯坦的电影王国,建立在一种“看破不说破”的妥协文化上。在“哈维事件”之后,女演员艾玛·汤普森对BBC说,“权力男性侮辱女性”是好莱坞特色的“体系地方病”。这是因为性别的不平等。

好莱坞是“一块被时间和平等所遗忘的土地”。过去10年,在这个电影制造工厂里,排名前百位最赚钱的电影,96%由男性导演,这些电影通常都是男性主导的超级英雄片。参与“最挣钱”电影的摄影师,97%是男性。即使是编剧,这个看来十分合适女性的职业,也仅有11%的比例为女性。演员薪酬也存在难以逾越的性别鸿沟。顶级男演员拿到的薪酬,是同级别女性演员的3倍。在这样的规则下,电影海报上仅出现男性主演的面孔,就不足为奇了。

“在其他行业里,这样的不平等都是令人羞耻的。然而在‘爱乐之城’(指好莱坞)里,简单规则行不通。”《金融时报》一篇《欢迎来到好莱坞》的文章这样写道。作者分析说,好莱坞在这方面“沉痾难治”的一个原因,与电影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兴趣偏好有关。“贡献70%票房的国际市场,偏好《变形金刚》这样的动作大片或超级英雄片系列。这些电影依靠爆炸类特效——这可比对白简单多了,它们完全不需要翻译。”在过去一年,好莱坞票房最高的10部电影中,有8部属于这种类型。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贡献电影票房的人群中,52%是女性。这说明,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具有潜在的市场和观众基础。实际上,在好莱坞黄金时代,女性题材确实有过荣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成功电影都以女性为中心,如琼·克劳馥的《欲海情魔》、凯瑟琳·赫本的《费城故事》等等。好莱坞的模式被复制到亚洲市场后,同样被证明是有效的,占据市场主流的50年代香港电影,大多以女性为主题,不论是古装戏曲题材,还是现代时装剧。此时女明星的地位和薪酬,也普遍高于男明星。直到功夫电影兴起,才终结了“大女主”时代。

“床第选角”

“床第选角”(casting couch,指演员通过权色交易获取角色的潜规则)的历史,在好莱坞“源远流长”。《打破陈规》里面有一句台词说这些大牌制片人:“他有一点儿老,然而人们总是因为各种原因,为他着迷。”——这些原因,多数是权力和金钱。

在《时代周刊》一篇名为《哈维·韦恩斯坦与好莱坞丑陋的“床第选角”历史》的文章里，作者称，在好莱坞的早期历史上，“床第选角”不像后来一样数见不鲜。女性在整个体系里曾经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著名编剧弗兰西斯·玛丽恩）。这或许与行业形成之初有关，一个高度混乱散漫的行业，大小公司涌现，需要新人才，也给不具有传统行业竞争优势的人——比如女性，提供了其他行业没有的空间。

进入二三十年代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此时发生了两件大事，改变了整个行业。其一是“有声电影”的出现，另一个则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开始。电影变得比以前更需要资本了。在确保资金到位方面，女性制片人遇到了麻烦——资本的提供者，通常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这是一个由男性操作的传统行业。新环境下，小电影公司慢慢退出了电影市场，留下来的则继续壮大。资本与电影的结合，导致了大制片厂的出现，并滋生了大制片厂制度。

大制片厂制度对好莱坞影响深远。它有一些显著特点，比如流水线生产、实行明星制、拍摄类型电影，以及非常关键的一点——实行制片人中心制，这导致了制片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凌驾于导演之上。大制片厂制度下，收益成为核心，票房不仅成为衡量一部电影的标准，也是明星“咖位”的决定因素。这种制度带来了商业电影的繁荣，使得电影变成了一个利益极为丰厚的行业。在金钱和地位的诱引下，越来越多男性加入到这个行业，并成为其幕后主宰。

“在20年代，制片厂的头儿专注于建立自己的公司；而到了30年代，他们建造了自己的王国。他们就是这些城堡里的国王，自以为是一个无冕之王。”卡利·波尚普（Cari Beauchamp）说。她是一个专注于好莱坞历史的作家，代表作包括《无须躺下：弗兰西斯·玛丽恩及好莱坞早期强大女性》。这些“城堡里的无冕之王”就是制片人——多数情况下，都是男性。这种情况之下，“床第选角”的潜规则诞生了。

当一个男性手握如此多权力，制定几乎幕后一切规则的时候，他便有了牟取私利的空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色交易不过是一种常见形式。在权色交易里，女性的身体是作为商品来使用的，是一种降格与物化。当桃色交易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行业潜规则，直接影响是女性地位的下降——在这样的语境下，女性逐渐从导演、编剧和其他重要职位上消失了，而成为银幕上的一个符号。

当整个产业都处于男性话语之下时，银幕上的女性成为物化对象，亦不足为奇。

即使是那些已经青史留名的女明星，也有着被凌辱被骚扰的过往。在秀兰·邓波儿还是个童星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大佬级制片人在她面前露出暴露狂的本色；“性感女神”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的丈夫，曾经答应一位有权有势的好莱坞大佬，出卖自己妻子，供他淫乐。在丽塔·海华丝拒绝与大制片人哈里·科恩（Harry Cohn）发生性关系之后，她受到了报复与敌对。

在上世纪70年代，情势一度好转，女性开始在电影产业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局面的打开因为很多因素。此时正是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女性开始争取更多机会。大制片厂制度也在此时开始衰落——一方面因为电视的出现，对电影业造成了冲击；也因为外国电影的传播和《海斯法典》（发布于1915年的一部关于电影限制的法典，后被电影分级制度取代）的取缔。尽管大制片厂依然手握金钱和主流话语，但已经不再是唯一声音，独立电影出现——这也意味着，女性开始获得发声的机会。1980年，雪莉·兰辛（Sherry Lansing）出任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总裁，这是好莱坞大制片厂第一次出现女性掌门人。

然而，女性在这片男性主宰的土地上依旧步履缓慢。2016年的年度《赛璐珞天花板》报告显示，在排名前250位的美国电影中，女性仅承担了17%的幕后工作。乐观地说，尽管发展缓慢，但事情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哈维·韦恩斯坦的事件，或许就是一个例子。在丑闻被曝光后，这名好莱坞大佬丢掉了他的饭碗。韦恩斯坦公司的全男性董事会也因此而受到波及，在事发48小时内，就有4名成员宣布辞职。

上周六，奥斯卡组委会在贝弗利山庄召开紧急会议，就哈维·韦恩斯坦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员投了赞同票，同意将韦恩斯坦从组委会中除名。因为“性骚扰”丑闻而面临除名的处罚，这在奥斯卡历史上史无前例。韦恩斯坦之前，在奥斯卡90年的历史中，只有一位成员被组委会开除：卡迈尼·卡里迪（Carmine Caridi），他的罪名是出售内部资料。

哈维·韦恩斯坦事件会成为一个好转信号吗？抑或仅仅只是一个“墙倒众人推”的个人案例？唯有时间知道一切。■



1



2



3



4



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蓬皮杜里的中国新收藏

记者 张星云（发自巴黎）

近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不断将中国藏家捐赠的现当代作品纳入馆藏，其背后既有增补馆藏“全球化”的策略调整，也有西方博物馆资金不足的现实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收藏家与西方公共艺术机构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9月底，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40周年之际，博物馆四层展厅完成了每两年一次的常设展品更换。

向观众展示的新藏品中，中国艺术家郝量的作品《由仙通鬼》被放置在了一个单独空间。这组作品由绘画、历史档案及装置组成，挂设在三面墙上——穿着道袍的宋徽宗画像，绘成工匠形象的王世贞画像和书信复印件，表现中国传统建筑卯榫结构的木器，以及一幅山水绢本重彩轴画。郝量说，这组作品是他创作过程中极其特殊的一个时期，在其中他试图讨论古代文人的两种极端，即文人仙、工匠鬼。“我在《由仙通鬼》中以工匠绘制肖像画的技法与文人对物的思辨，来讲述‘仕’的状态与特征。”郝量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这组作品被纳入蓬皮杜艺术中心馆藏，总共经历了将近三年的商谈。2014年，蓬皮杜艺术中心副馆长凯瑟琳·戴维（Catherine David）在法国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FIAC）上看到了这组作品。她对本刊谈到了当时的观感：相比于艺博会上通常的展出形式，这组作品呈现方式很特别，效果也很好。之后她因工作原因去过几次中国，也去过郝量的工作室，她开始觉得这组作品不仅她自己感兴趣，蓬

皮杜也会感兴趣。“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这组作品。”

拥有这组作品的藏家是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创办人王兵。几经联系，他有意将这件收藏捐赠给蓬皮杜。双方最终达成了这次捐赠，并在这组作品展出期间举行了研讨会。这已经不是中国或华裔藏家第一次将中国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捐赠给蓬皮杜艺术中心了。两年前，余德耀、郑志刚、赵令勇、周大为、薛冰等也曾将一批作品捐赠出来，自此，蓬皮杜艺术中心便拥有了包括赵无极、黄永砵、陈箴、严培明、蔡国强、艾未未、张恩利、徐震、丁乙、赵阳等中国艺术家的上百件作品。

西方馆藏策略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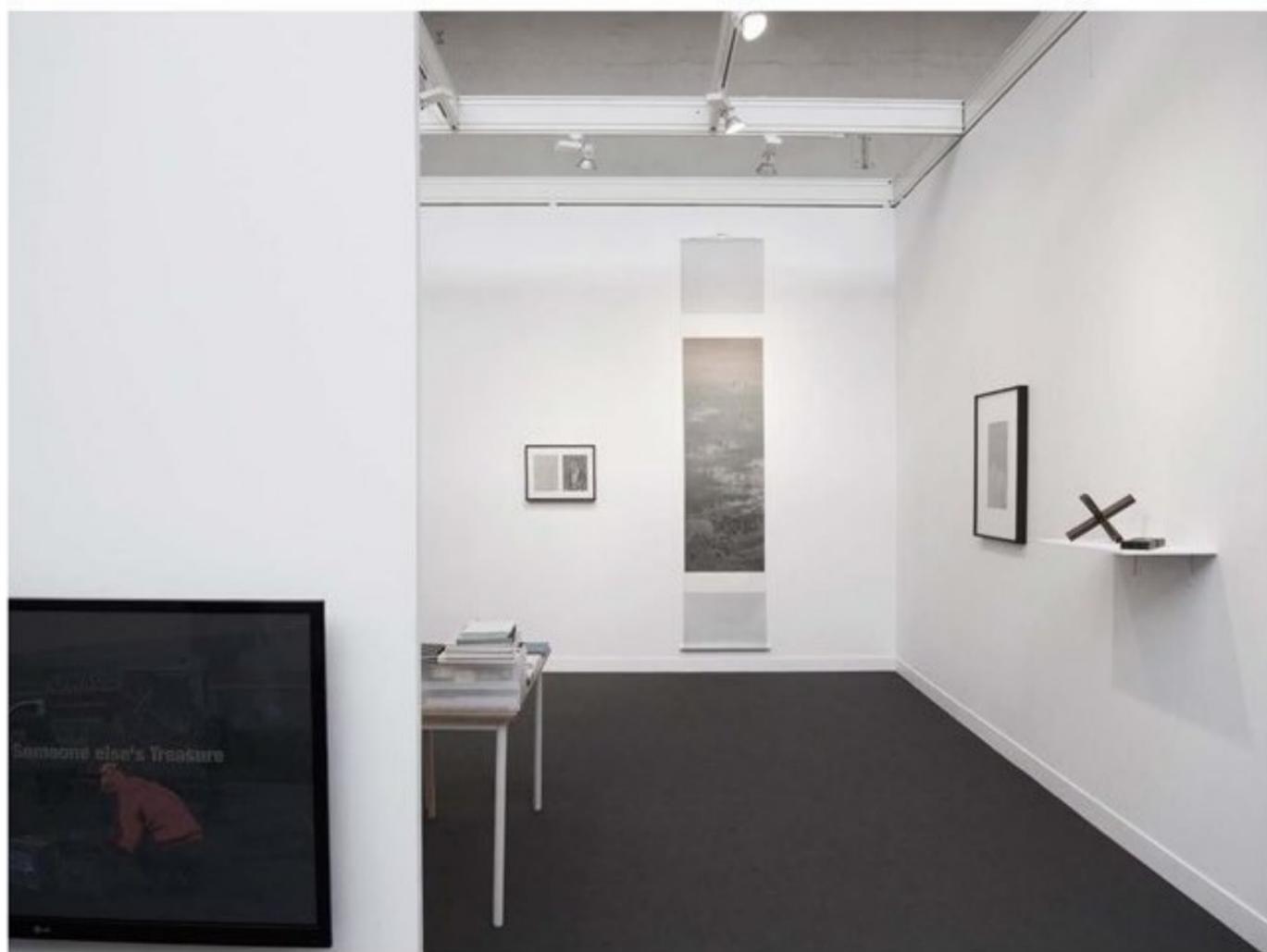
自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历史，可以看到他们不同时期的馆藏策略，以及蓬皮杜艺术中心对现代及当代艺术的定义和理解。在1947年法国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于东京宫建立之初，首任馆长让·卡苏（Jean Cassou）以收藏存世法国艺术家作品为目标不断扩充馆藏，那一时期收藏的马蒂斯、博纳尔、德劳内、布拉克、毕加索等人的作品成为其馆藏基石。

蓬皮杜新收藏、中国艺术家郝量《由仙通鬼》系列作品：

- 1.《由仙通鬼·蓬莱》绢本重彩
- 2.《由仙通鬼·王世贞信札致衍大人》纸本影印
- 3.《由仙通鬼·王世贞像》绢本重彩
- 4.《由仙通鬼·道君像》绢本重彩

上图：《由仙通鬼》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现场

下图：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创办人、作品《由仙通鬼》捐赠人王兵



1977年，前总统蓬皮杜力主立项，由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两位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化新馆在巴黎市中心建成，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迁至新馆址，从此“蓬皮杜艺术中心”成为法国人对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口语称呼。蓬皮杜艺术中心在馆藏政策上进行了一次转向，开始吸纳当代艺术作品并将收藏扩展到国际范围，从基里科、马格利特、蒙德里安、波洛克，到博伊斯、沃霍尔、封塔纳和克莱因等，他们的作品陆续进入馆藏。随后蓬皮杜艺术中心继续拓展领域，开始收藏摄影、影像、实验电影和视频等品类，并于1993年创立工业创作中心，开始收藏建筑和设计作品。

不仅馆藏方向几次转向，他们的收藏方式也经历转变。最初，在博物馆馆藏收购委员会主导下，一批艺术品以国家财产的身份进入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购资金由国库经法国博物馆管理局分配给蓬皮杜。此外，艺术赞助成为他们扩充馆藏的主要方式，根据法国艺术赞助法，赞助个人或企业可以获得税务上的部分减

免。布朗库西、马蒂斯、杜尚、考尔德、培根、罗斯科、米罗等人的作品，以及摄影家布拉塞、布列松和马克·吕布等人的作品合集，都是以艺术赞助的方式进入蓬皮杜馆藏。

而今，在欧洲经济不振、公共艺术机构削减经费以及当代艺术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捐赠正在成为博物馆扩充馆藏的主要方式。2015年上任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主席塞尔日·拉斯维涅斯（Serge Lasvignes）在蓬皮杜40周年之际就表示，如今蓬皮杜的馆藏收集政策，以捐赠、艺术赞助和博物馆之友协会运作为主要形式。“2017年蓬皮杜艺术中心拥有的馆藏收购预算为180万欧元，相比于15年前的400万欧元预算下降了不少，而当代艺术作品价格则比15年前上涨不少。因此我们不会追逐艺术品价格，而是将目标放在建立完整馆藏。我们还有一些艺术史时期存在空缺，就像德国战后绘画，而巴塞利兹和里希特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太贵了。”今年一对美国夫妇藏家向蓬皮杜捐赠了400件作品，一位俄罗斯藏家捐了250件；2015年马蒂斯的后人将他两幅油画赠送；2012年则是著名收藏家娇兰夫妇将1200幅绘画捐赠。

而所有要进入蓬皮杜的作品，无论购买、捐赠还是艺术赞助，都需要经过蓬皮杜中心馆藏委员会的许可。首先馆长召集全馆所有藏品研究员召开研究会，会上每位研究员可以提出自己扩充馆藏的计划，并经所有研究员充分讨论。由于蓬皮杜收购经费有限，馆长会将有意义并具有可行性的馆藏提议收集并提供给蓬皮杜中心馆藏委员会。馆藏委员会以国家名义举行研讨，每年三次，九名委员会成员中有一名法国博物馆部门主任、一名视觉艺术部门主任，其余成员则由收藏家、艺术史学者等社会人士组成。馆藏委员会或拒绝提议，或确认提议，最终蓬皮杜完成接纳新作品进入馆藏。由于在法国，国立美术馆均以国家名义进行运作，因此卢浮宫、奥赛美术馆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馆藏均属于法国国家馆藏，也就意味着馆藏作品可以在国立美术馆之间流动。

相比于法国博物馆，美国博物馆更具有依靠捐赠的传统。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90%的收藏都来自于私人捐赠，因此收藏家的品位在过去对博物馆馆藏的影响很大。其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也曾在去年表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亚洲

“中国有那么多美术馆，但馆藏内容很少，更没有对中国当代艺术系统地进行展示。”

都在全球版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对西方世界而言，了解亚洲的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他同样希望更多的中国藏家将自己的藏品放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中国藏家的新面目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藏家意识到了将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捐赠予西方艺术机构收藏与研究的重要性，也看到这是一个从学术上梳理自己收藏的时机。

作为藏家，王兵说他几乎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的每个阶段。他2005年从刘小东的新写实主义绘画开始，一路收藏到影像、装置、雕塑等作品。他经历了2008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价格的最高点，也见证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暴跌。“我们得思考，为什么毕加索、巴斯奎特、爱德华·霍普、杰夫·昆斯作品的价格涨得那么厉害，而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作品的价格跌得那么厉害。”王兵后来觉得，原因是中国当代艺术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

2014年，王兵创办了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中国有那么多美术馆，但馆藏内容很少，更没有对中国当代艺术系统地进行展示。”他希望通过成立的非公募艺术基金会，以公共平台的方式支持学术研究，在关注新兴年轻艺术家的同时，也梳理中国当代艺术体系，进而推动大众对艺术的关注。“由于当代艺术一些部分是舶来品，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大众的参与程度并不高，而曾经参与其中的主流人群有很多以投机或资产配置为目的，更加让当代艺术研究严重缺失。”王兵说。他认为，如今的中国藏家已经过了盲目跟风的时代，应该开始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收藏系统。这次捐赠之后，蓬皮杜艺术中心还会和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展开研究合作，王兵希望自己可以带动其他藏家，使更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进入世界重要博物馆的馆藏体系中，扩大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异国情调”是复杂的定义

——专访蓬皮杜艺术中心副馆长凯瑟琳·戴维

“像蓬皮杜馆藏本不该空缺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作品，但实际上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品早就分散到了其他博物馆和中外藏家手中，收购价格也非常昂贵。”



凯瑟琳·戴维

作为此次郝量作品捐赠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主导人，策展人和艺术史学家凯瑟琳·戴维曾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巴黎网球场美术馆担任藏品研究员，并策划了包括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在内的多个重要展览，2014年她被任命为蓬皮杜艺术中心副馆长及“研究与全球化负责人”。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她谈到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如今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馆藏策略及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主导了收藏并展示郝量这组作品，是你作为“全球战略负责人”工作的一部分？

凯瑟琳·戴维：我2014年被任命为蓬皮杜艺术中心副馆长，负责的部门全名叫“研究与全球化”，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个称谓很贴切，因为全球化并不是当下的产物，早在殖民时期全球化就开始了。我的工作是把关注的焦点范围扩大，将原先不在馆藏体系范围内的作品吸收进来，通过增补馆藏，调整馆藏的展示，组织策划展览及讲座、研讨会及研究等活动，更完整地表现现代艺术的复杂性。

无论在阿拉伯世界国家、拉丁美洲还是亚洲，很多国家的现代艺术相对来说以更独立的方式进行发展，国家内部各地区间的交流很多，但在欧美国家很少展示。当然，由于地理上靠近拉丁美洲，美国更早开始关注这一地区的现代艺术，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很早就展出了墨西哥艺术家的作品。但总体来说欧美对这些国家现代艺术的讨论依然停留在类型学和对现代艺术历史分期的研究范畴内。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艺术家个体创作进行研究，向法国观众呈现并解释，建立对话，最终不断完善现代艺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蓬皮杜艺术中心来说，“全球化”馆藏是否可以理解为“去欧美中心论”？

凯瑟琳·戴维：蓬皮杜艺术中心分有“现代艺术馆藏”和“当代艺术馆藏”两个部分，馆藏数量庞大，因其历史特点，馆藏艺术品主要来源于欧美各国。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对此提出疑问：为什么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馆藏特点是这样的？当然这个疑问不是为了否定或者完全改变蓬皮杜之前的馆藏政策，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被纳入馆藏肯定有其原因。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思索怎样去丰富蓬皮杜的馆藏。

但同时，我们又不会刻意有“中国艺术馆藏”“拉美艺术馆藏”的概念。尽管馆藏一直在不断扩充，但蓬皮杜艺术中心没有按国家划分馆藏的标准。这很重要，否则蓬皮杜的馆藏永远不足，由十几名艺术家来展现一个国家的艺术，这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需要很小心地对待所有20世纪至今有关跨国家、跨文化的现当代艺术。

以前一些记者总会问为什么蓬皮杜没做过美国

波普艺术的大展？我觉得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表现。我更希望记者问我为什么没做过伊朗现代艺术展览，它们同样很重要。上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之后的两伊战争，伊朗产生出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品。所以2014年我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联合策划了一次伊朗现代艺术的大展，叫作“未经编辑的历史：伊朗1960至2014”。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阿拉伯世界国家和拉丁美洲艺术史研究学者，你策展的主题也曾涉及不同的国家与文化。在对蓬皮杜艺术中心馆藏进行“全球化”的过程中，怎么理解“刻板印象”（cliché）和“异国情调”（exotique）这两个概念？

凯瑟琳·戴维：作为一名藏品研究员，在对新作品和新艺术家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摆脱“刻板印象”（cliché）的影响。所有人都有“刻板印象”，藏品研究员甚至要比一般人更严重，消除“刻板印象”很重要。

如今，“异国艺术”（art exotique）这个词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在口语中更接近“怪异”的意思，指外表、造型很复杂而又无法让人理解的艺术。而“异国情调”（exotisme）则不同，谢阁兰（Victor Segalen）去过很多次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他写过一本书《异国情调论》，提出的“多元美学”理论令人印象深刻。从19世纪起，欧洲开始传播、理解、误解，乃至借鉴“异国情调”，这些都对欧洲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异国情调”的最初定义已经被消解掉了，即便在法国，对“异国情调”的定义也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文化构建，需要在一个历史背景下解释。

而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当代艺术作品，是一种故意做出来的“异国情调”，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此外很多当代艺术作品的政治性也同样停留在喊口号形式上，这样做太简单了，失去了作品与时间、空间的关联。

三联生活周刊：像这次蓬皮杜收藏郝量的作品，你最初是在法国当代艺术博览会上看到这组作品，然后通过画廊再与艺术家和藏家联系。你怎么看待如今公共艺术机构、艺博会、艺术家、藏家之间的关系？

凯瑟琳·戴维：专门研究艺术品的藏品研究员在公共艺术机构中，而在艺术市场中存在着一小部分有意思的画廊，这些画廊与艺术家的关系更密切，可以更好地在初期解释和传播艺术家。

现在的情况是，艺术市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翻转，

公共艺术机构越来越没钱，远远不及佳士得股东皮诺（Francois Pinot）等很多个人藏家的资金雄厚。这就导致了我们在选择艺术品纳入国家美术馆馆藏的时候，会自觉地比以往更谨慎，做更多研究和功课。像蓬皮杜馆藏本不该空缺上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艺术作品，但实际上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品早就分散到了其他博物馆和中外藏家手中，收购价格也非常昂贵。

艺术市场的翻转和资金上的差距继续产生了进一步的差距。好比现在我打开邮箱确定每周的工作日程，能收到起码三封发自不同艺博会的邀请邮件，甚至很多艺博会的举办城市我都没听说过，这些艺博会的数量远远大于公共艺术机构举办的展览数量。当公共艺术机构没钱之后，其权威性就下降了。艺术评论的权威性也下降了，记者的工作代替了进行研究工作的艺术评论，因为艺术市场基本不需要艺术评论，这是令人担心的地方。现在展览的评论往往是积极的，但实际作品往往没那么好。人们应该保持警惕，并且意识到现在的状况对文化来说是危险的。

三联生活周刊：蓬皮杜艺术中心将会怎样选择中国当代艺术品进入馆藏？

凯瑟琳·戴维：现在的中国，在国家政策和人们注重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下，艺术作品鱼龙混杂，海外艺术市场的品位更加助长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些不好现象。我们现在很难看到独特又复杂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市场更喜欢富有戏剧性的强烈风格的作品。

同时，中国缺少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给我很深印象，青铜器、卷轴字画、瓷器的布展呈现方式都非常出色。但很遗憾，中国没有多少可以呈现当下文化的公共艺术机构，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建立起来的当代艺术完整馆藏。

中国公共当代艺术机构数量很少，也就意味着权威的缺失，这个层面上对艺术家的鼓励也就很少。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很难，如果他不进入艺术市场，他就没法生存。不过目前在中国确实有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既身处于艺术市场内，又有着独立的文化和美学思考，同时他的工作节奏还能被尊重。因此蓬皮杜艺术中心想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选择中国艺术家，解释他们的艺术语言，将他们的作品纳入蓬皮杜艺术中心馆藏，并推广艺术、文化项目，就像我们在其他国家做的一样。■

“王牌特工”与平民英雄

记者 / 宋诗婷

“王牌特工”系列的企图心很明显，它要成为新一代的“007”，让平民特工艾格西成为年轻人心中的詹姆斯·邦德。正统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平民英雄的时代来了吗？

当威士忌遇上波旁酒

“有次，一个英国节目请来了一位美国喜剧演员，大家问他，英国和美国的幽默有什么差别？美国演员拿出一把剪刀，把主持人的领带剪掉了一小截，他说，这是英国幽默。紧接着，他又把主持人的领带整个剪短，说这是美式幽默。采访中，科林·菲尔兹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用来解释英美两国文化的区别。这个比喻很贴切，《王牌特工2：黄金圈》里处处都是这种英美文化的差异与碰撞。

3年前，《王牌特工：特工学院》上映，平民特工艾格西让逐渐套路化的特工片有了新方向。“拍第一部时，我就在构思续集了。”导演马修·沃恩说，在创作《王牌特工2：黄金圈》的过程中，他参考了很多续集故事超越首集的电影，比如《教父2》《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并从中得到了灵感和经验。“我不喜欢写另一个詹姆斯·邦德的故事，《王牌特工》需要扩展它的外延，所以，我们把艾格西和哈利带到了美国。”

在第一部《王牌特工》里，马修·沃恩用圆桌骑士的传说、萨维尔街的裁缝店、款式考究的西服、威士忌酒和优雅又火力十足的武器为电影定调——这是一部处处透着英国文化的特工片，英伦风将是“王牌特工”系列最重要的卖点。

到了《王牌特工2》，电影的英伦基调依然明显，在第一部时还一身运动装的小痞子艾格西，如今也被哈利训练成了西装笔挺的绅士特工。不同的是，马修·沃恩为《王牌特工2》引入了一个新组织“联邦特工”，这群新角色的加入不仅带来了新剧情，也为电影带来了英美文化的碰撞。

想要构建新世界，必须摧毁旧世界。电影开场



没多久，王牌特工总部就被秘密组织炸毁，艾格西和梅林是组织内的幸存者。他们从一个威士忌酒瓶上得到信息，起身前往美国，寻求支援。那是一个与古老的萨维尔街完全不同的世界。开阔的平原上，一座生意兴隆的波旁酒厂，率先出场的联邦特工“龙舌兰”一身牛仔打扮，性情奔放，他瞧不上艾格西和梅林的假正经，还用可乐嘲讽威士忌酒。和王牌特工优雅、严谨的做派相比，联邦特工集结的是一群不拘小节的美国西部牛仔。两个风格迥异的组织



电影《王牌特工2：黄金圈》剧照

将展开一场对抗秘密组织的合作，对电影中的人物来说，这是个整脚的挑战，但对于导演和编剧来说，这正是戏剧张力所在。

用英美文化差异制造笑料的过程，也是消解刻板印象的过程。饰演联邦特工头目“香槟”的美国演员杰夫·布里吉斯说：“我的祖父是个英国人，来自利物浦。他不是个轻浮傲慢的人，是劳动阶级，也是个开心果。《王牌特工2》里有对英国人的刻板印象，也有对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我们把两者放在

一起，去发现这些刻板成见，然后戳破彼此的泡泡，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成长于伦敦的导演马修·沃恩是个典型的英国人，他喜欢英式西服、威士忌和英伦音乐，也曾和最擅长塑造英国小痞子的导演盖·里奇合作，担任他的《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等电影的制片人。尽管在英国文化中长大，马修·沃恩却深受美国上世纪50年代文化的影响。在他的想象中，那个年代的美国是自由奔放的，“垮掉的一代”所代表的年轻

人文化以浪迹天涯为乐，热爱奇装异服，蔑视一切社会规则和正统价值。那不一定是最好的时代，但却是马修·沃恩眼中最具想象力的时代。

或许是出于私心，马修·沃恩用作为导演和编剧的特权在《王牌特工2》里复制了他热爱的那个时代。除了当下的美国和英国，他还在遥远的柬埔寨打造了另一个空间——致幻乐园，那是电影中的朱丽安·摩尔饰演的大反派波比的老巢。毒品生意让波比富可敌国，同时也让她远离故乡，只得在位于柬埔寨丛林中的秘密基地生活。波比记忆中的美国或许还是上世纪50年代时的美国，于是，她在那片丛林废墟中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按她记忆中的样子打造了一个华丽又虚幻的世界。

整个“致幻乐园”的场景都是搭建而成的。“马修想要介于拉斯维加斯与迪士尼乐园之间的感觉，而且是建造在一块老旧的废墟上。波比会想要什么？于是我们建了一个保龄球馆，一间沙龙，一间热狗店。全都是些奇怪有趣的东西。她想要在她的监狱中，建造一小片美国，所以我们带入了玛莎史都华的感觉。”美术设计戴伦·吉佛说。

马修·沃恩把生活在乐园中的波比称为“崩坏的美国甜心”，他把这个概念抛给朱丽安·摩尔，任她自由发挥。在朱丽安·摩尔的演绎下，波比身上兼具美丽有趣和心狠手辣，是个极富漫画感的人物。“她是个有趣的角色，但显然是个极端反社会的人。要能同时展现出这两种特质，她不是那种单纯的坏蛋，她有自己的魅力，这是最让人感到有趣的地方。”朱丽安·摩尔分析自己的人物。

英国、美国、柬埔寨，三个空间，三种人物气质，《王牌特工2》更开放了，但这是一把双刃剑，风格多样化的同时，原本的英伦风也在消减。马修·沃恩当然权衡过利弊，显然，为了更大的市场，他收敛了英国绅士的骄傲。

两代特工

在《王牌特工1》里，科林·菲尔斯饰演的哈利·哈特是老派的詹姆斯·邦德式的特工，在为组织寻找新成员时，他独具慧眼地选中了街头混混艾格西。和特工片惯常的男主角哈利相比，艾格西出身草根，个性叛逆，没有半点绅士派头。

艾格西与哈利是徒弟与师父的关系，也是新老两代特工的对比。《王牌特工1》的成功之处就在于，

在这个反英雄的时代，马修·沃恩让艾格西取代了哈利，传承了加拉哈德的特工代号。这感觉就像平民从贵族手中得到了权利，符合当下观众对于平民英雄期待。

对于《王牌特工1》的粉丝来说，《王牌特工2》最大的看点是，在上一部中中枪身亡的哈利如何在第二部中复活。复活后的哈利一度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科林·菲尔斯说，对于自己的角色，他在拍摄第一部电影时也知之甚少，直到拿到第二部电影的剧本，他才对哈利有了更深的了解。上部电影中铺垫的很多细节都在第二部中找到了答案，比如，哈利的浴室中有很多蝴蝶标本，那是因为，少年哈利曾希望成为一名昆虫学家。

和私生活神秘的老一辈特工不同，艾格西的生活更实在，他与在第一部结尾偶遇的瑞典公主提尔蒂感情稳定，两人的生活像所有普通年轻人一样，有快乐，也有考验。这也是“王牌特工”系列在处理男主角感情戏时与“007”系列最大的区别。

随着哈利的“死而复生”，艾格西的生活、工作步入正轨，新旧两代特工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第一部中，哈利是强势的，是引路人，也是艾格西的保护者。但在第二部中，两人的角色大有对调的意思。经过几年的历练，艾格西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特工，而回归的哈利一度失忆，变得柔弱而自我封闭。这时，艾格西成了哈利的拯救者。他帮哈利找回记忆，重拾特工精英的自信。

电影中哈利与艾格西的关系也是现实生活中科林·菲尔斯与塔伦·埃格顿的关系。菲尔斯是实力与名气兼备的大明星，埃格顿是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王牌特工1》甚至是他的处女作。导演马修·沃恩对台前幕后的这种对应关系很感兴趣，在他看来，这样的关系，无论对于初次尝试动作戏的菲尔斯，还是刚刚接触电影的埃格顿来说，都有积极的影响。

在《王牌特工2》饰演联邦女特工“干姜水”的哈利·贝瑞也曾是《007之择日而亡》中的“邦女郎”，对于两代特工片，以及哈利与艾格西之间的关系，她有着更客观的解读：“我两部都有演出，科林的角色哈利感觉非常像是詹姆斯·邦德的角色。电影的基调像是在向邦德电影开个玩笑，但也有紧张的部分。”

就像哈利·贝瑞感受到的，“王牌特工”系列试图用解构的方式向詹姆斯·邦德时代的特工片告别，而艾格西的时代，属于平民英雄。■

“艾格西是新一代的选择”

——专访导演马修·沃恩

三联生活周刊：三年前的《王牌特工：特工学院》里的英国文化符号给这部电影定了基调，在第二部里，这些符号依然存在，但同时也多了很多美国文化的部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

马修·沃恩：我是英国人，我喜欢考究的西装、威士忌、英伦音乐，这些当然是“王牌特工”系列的招牌，但与此同时，我希望让第二部电影有更多的冲突，所以，美国文化加入进来了，二者之间产生碰撞，除了剧情上的推进，我还能从文化冲突中创作出很多幽默桥段。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英式幽默和美式幽默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马修·沃恩：幽默是很主观的东西，有些桥段我会笑，可能你不会，不管是英式幽默还是美式幽默，可能中国观众都不会笑。但在我看来，英式幽默是含蓄的，有点挖苦、讽刺，还有点谦逊，是更微妙的一种表达方式。美式幽默就外化很多，甚至是滑稽的，对于像我这样的英国人来说，美式幽默太难了，或许，在英国的语境里我算是个幽默的人，但在美国，我一定不是。

三联生活周刊：《王牌特工》是新一代的特工电影，和经典的“007”系列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马修·沃恩：我的父母喜欢看詹姆斯·邦德，祖父也喜欢看詹姆斯·邦德，他是传统的绅士间谍，是老派的英国人。我的孩子和他的朋友们会不会喜欢詹姆斯·邦德呢？我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喜欢艾格西。艾格西是出身于街头的间谍，他是绅士，但身上也有街头痞子的特性。他没有詹姆斯·邦德的好出身和好学历，所以，他是个普通人。这更符合年轻一代对于“英雄”的想象。穿上西装他是绅士间谍，穿上运动装，他就是个街头男孩，他是个更真实更生动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尤其是在第一部里，艾格西总会让我想到盖·里奇电影里那些英国小痞子，你和他他是好朋友，还有过密切合作，艾格西的灵感会不会和盖·里奇有关系？

马修·沃恩：由始至终我都把盖·里奇视作自己的电影学校，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关于电影制作的一切。当我和盖·里奇筹备《两杆大烟枪》时，我只有26岁。因为我们要拍关于伦敦东区的黑帮电影，我才开始了解那个世界，也尝试去吉卜赛营地闲



导演马修·沃恩

逛。从我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我来自哈利的世界，是盖·里奇帮我打开了通向艾格西世界的大门。

三联生活周刊：哈利和艾格西是两代特工，你创作了两代特工的合作和传承，是有企图心要把《王牌特工》做成新一代人的“007”系列吗？

马修·沃恩：哈利是詹姆斯·邦德式的特工，理论上讲，每一位演过“邦先生”的演员，都可以成为哈利的扮演者。而艾格西是新一代的选择，这里有传承，但也有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我当然希望《王牌特工》可以一直拍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成功的商业片，《007》里除了詹姆斯·邦德，还有个重要的卖点，那就是“邦女郎”，但《王牌特工》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似乎完全不同于《007》，在第二部里，你甚至给艾格西设置了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在这个环节上，是怎么考虑的？

马修·沃恩：“007”系列里女人其实是附属品，但我的观念可能不太一样。在第一部里，我让最终胜出成为特工的人是个女人，在第二部里，挑战全世界的大魔头也是一个女人。你知道，我有一个强大的母亲，还娶了一个强大的老婆，在我看来，女性就是比男性强大的。☑

《罗丹》：俄罗斯人最擅于制造戏剧性

文 / 王菲宇

“我对故事本身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故事背后的人类情感。”



舞剧《罗丹》剧照

一群身穿白色衬裙、头戴白色软帽的女舞者冲上台，她们手拉着手，以街头小丑的浮夸方式舞动着四肢。对于并不熟悉罗丹和卡米尔故事的观众来说，艾夫曼芭蕾舞团的《罗丹》开场也许显得有些费解。然而当舞剧向前推进，躁动的白色幽灵们不断出现，倒错重置的叙事线索中，卡米尔内心的疯狂终于变得逐渐清晰。

舞剧《罗丹》作为2017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

开幕之作登场。2017年是罗丹逝世百年，而在六年前，鲍里斯·艾夫曼和他身处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团，就是凭借这部作品，打开了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演出市场。虽然以“罗丹”为名，然而和之前的无数次演绎一样，《罗丹》的叙事核心落在了集才华、传奇和悲剧为一生的女性角色卡米尔·克洛岱尔身上。伦敦的媒体简明扼要地给这出舞剧一句评价：“俄罗斯人最擅于制造戏剧性。”

罗丹的伟大和传奇早已无需韵事助力，然而世人对于爱情与八卦，却保持着持久的兴趣。今年法国巴黎大皇宫与罗丹美术馆联手举办罗丹百年纪念大展，作为展览海报在巴黎地铁中露面的作品，不是《加莱义民》也不是《地狱之门》，而是《卡米尔·克洛岱尔的面具与皮埃尔·德维桑的左手》。罗丹和卡米尔间关于才华与权力、欲望与控制的纠缠撕扯早已在文字和影像中反复上演。包括伊莎贝尔·阿佳妮、朱丽叶·比诺什在内的几代法国女神，都曾经短暂化身为这一反叛又分裂的女人。卡米尔以情妇的名义煎熬一生，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人生最后三十年。在她过世后，有人翻阅其医生的笔记，指出卡米尔也许并不疯癫，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才华横溢的女人，她不是被自己的疯狂吞噬，而是被时代、偏见和信仰摧毁。

艾夫曼的作品中，从来不缺少这类走向深渊的女人。2015年艾夫曼芭蕾舞团首次造访中国，带来的是俄罗斯文学名著改编的《安娜·卡列尼娜》。凭借一个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艾夫曼向中国观众展现了其与俄罗斯芭蕾传统差别巨大的舞台表现方式。没有蓬松的Tutu裙，没有炫技的挥鞭转，安娜换上了一又一条贴身的丝绸长裙，用强劲的腿部和地板动作强调挣扎的内心。艾夫曼用几乎让人屏息的编排展现主人公的幻觉：身着肉色连体服的舞者在台上站成两个圆圈，以相反的方向高速转动；被舞台左侧圆圈牵引做逆时针离心运动的安娜转到圆圈交接处，转而跟随右侧圆圈以顺时针快速转动。

虽然被媒体和评论以“心理芭蕾”命名，但在观看艾夫曼舞作的过程中，最先留下印象的，恐怕是艾夫曼对于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这一点从挑选舞者起就开始贯彻。男舞者平均身高超过1.9米，女舞者

平均身高超 1.75 米，站在一众“大长腿”中，个头并不高的艾夫曼却是绝对的权力掌控者。

艾夫曼在上世纪 60 年代先后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和瓦岗诺娃芭蕾舞学院求学，年纪轻轻就崭露锋芒。他视格里戈罗维奇和列昂尼德·雅各布森为自己的老师，后者编排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之时，艾夫曼为他担任助手。这位编舞大师在当时就预言了艾夫曼的成功。

然而在创立自己的舞团之后，艾夫曼首先遭遇的是长达十年的打击。他的编舞方式被认为是对俄罗斯芭蕾传统的挑战——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古典规范的严格性，但在戏剧表现上与传统大相径庭。评论界和观众将他强调人体线条的编舞视为赤裸裸的色情。在那段时间，他国外巡演受阻、寻找资金无门。同时期的很多俄罗斯编舞家选择了远走他乡，艾夫曼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条出路。“我问我自己，像我这样一个在俄罗斯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其他地方难道不能成功吗？走当然吸引人，但是我知道，留下更为重要。”

转机出现在 1987 年。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一度被认为不入流、离经叛道的艾夫曼作品，成为“对陈旧舞蹈语言的完美替代”，他开始获得评论的褒奖、社会的支持。2013 年，艾夫曼甚至拥有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也许正是因为那段被否定、被质疑的岁月，让他对承受着自我拷问和外界舆论双重压力的心灵拥有了感同身受的能力。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菲茨杰拉德笔下的迪克·戴弗，莫不属于此列。

罗丹与卡米尔的故事显然完美符合艾夫曼对于一出舞剧故事的要求。呈现在舞台之上的依然是一个芭蕾舞剧惯常的三角恋。罗丹穿梭在卡米尔与伴侣罗丝·伯雷之间，前一秒他与罗丝在舞台前区共舞，后一秒就于舞台后区与卡米尔沉醉在雕塑之中。伴随罗丝·伯雷迟疑的舞步，埃里克·萨蒂的《玄秘曲第一号》(Gymnopédies No. 1) 响起，不断重复的旋律仿佛女人猜疑的内心。

音乐在这部舞剧中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从拉威尔、萨蒂到德彪西，艾夫曼选择了一批与罗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法国作曲家，用他们的旋律为三人间的情感纠葛填写注脚。整部作品以卡米尔的癫狂开场，闪回至 19 岁的卡米尔与 43 岁的罗丹初见。到第一幕结束之时，罗丹和卡米尔的关系进入了最和谐也最融洽的时刻。男女舞者们次第登场，翩翩起舞，然而响起来的音乐却是圣-桑的《骷髅之舞》。乐音似

乎为两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不安的伏笔。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怀疑，又承受了评论界的贬低，在第二幕中，卡米尔终于爆发，将自己创作的雕塑《克洛索》砸碎。伴随其毁灭的，是拉威尔《达芙妮与克洛埃》第二组曲最末篇章的狂躁音符。

虽然艾夫曼讲述了一个完全的悲剧故事，然而他却并不想完全示人以黑暗。“我并非刻意收集关于破碎生命和痛苦灵魂的故事，相反，我竭力使得我们的表演带给观众情感的共鸣，给予他们明亮、喜悦和希望。然而，对我而言，如果没有激情，真正的艺术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艺术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展现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奥秘。”

对于 1900 年的罗丹来说，他赋予了雕塑新的生命。在作品《青铜时代》中，少年身上慵懒柔美的线条太过逼真，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指控他在模特的身体上直接倒模。今天的策展人回顾这位艺术巨匠百年前的作品，称赞他的形象塑造“来源于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和对‘人性内在’强烈的表现力”。无独有偶，艾夫曼也曾经在多个场合不断表示：“我对故事本身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故事背后的人类情感。”这种说辞大概一方面是因为舞蹈本身在叙事上确实存在先天的短板，而另一方面大概在于，艾夫曼大开大阖的舞蹈语汇，在表达情感的波澜方面更有优势。

比起俄罗斯故事《安娜·卡列尼娜》，在《罗丹》中，想要找到法国精神的艾夫曼显然有点乱了阵脚。他将踩葡萄的法国女郎、红磨坊的康康舞通通搬上舞台。在这些肤浅而具象的法国元素旁，用肉身重现的罗丹雕塑意外地有一种抽象的美感。包括《蜷曲的女人》《大教堂》《永恒的偶像》《地狱之门》在内的诸多经典作品一一在舞台上重现。第一幕中，在一段炙热的双人舞后，卡米尔化作一团顺从的黏土，被罗丹的手不断塑形。仿佛魔术师变魔术一般，揭开覆盖在身体上的白布，她变成了《蜷曲的女人》。而在第二幕的开头，借由一个顶天立地的钢架，艾夫曼用舞者的肉身将《地狱之门》的局部在舞台上重现。在《罗丹》舞剧诞生后的几年时间里，这幅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几乎成为艾夫曼芭蕾舞团在欧洲的代名词。

舞剧的帷幕落在《永恒的偶像》上。一个男人屈膝跪在女人的身前，在失去缪斯、助手卡米尔之后，罗丹不断雕琢着这尊雕塑，直到最后，他变成了雕塑的一部分。“我们展示了一个艺术家如何经过疲惫和不断自我牺牲的创作过程。”艾夫曼说，“最终他获得永恒的生命。”



1

荣宅百年，一座楼与一座城

记者 / 何潇 图片提供 / Agostino Osio/Prada

百年风雨之后，钢筋水泥亦被人格化，凝结为一段私人史。或许，建筑才是城市的主人，人只是其间的寄居客。

木头护墙框住了几面墙，朱红浅碧，深黄暗青，明暗交叠。走近了看，墙面是晕晕旧旧的——100年的沪上烟雨，仿佛都被锁在了墙里。

荣公馆

我在一个阴天到了这里，陕西北路186号。这里位于上海的中部，路口转角，是上海著名的奢侈品购物中心：恒隆广场。与交叉相邻的南京西路相比，这条路显得清幽，路两旁栽着悬铃木，一径排开的老式建筑，掩映于树荫之下。

白色墙面上，贴着一个四四方方金属牌，黑字刻着门牌号码，其下一行小字书：荣宗敬故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上海滩最显赫的私人宅邸之一——西摩路上的荣公馆，以一个庞大的家族企



2



3



4

业为基石，书写了一段传奇。

宅子的主人荣宗敬，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实业家，被称作“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在“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与弟弟荣德生一起，荣宗敬缔造了荣氏实业帝国，开启了荣氏家族延绵四代的财富史。毛泽东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上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只有他们一家。”

荣公馆的显赫，因其财富，也因其神秘。这栋私宅是其主人的精神造像，在多年风雨之后，钢筋水泥亦被人格化，凝结为一段私人史：它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总结，也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象征。

在过去一个世纪，这栋百年老宅接受着天然与人工的损耗。某一段时间里，它像一个疲惫的老人，露出困顿衰微的表情，令经过它的人感到哀伤。六

年前，意大利 PRADA 集团开始对其进行修葺，老宅闭门谢客，休养生息。今年 10 月，荣宅再度以青春面目示人，令人得见其昔日荣光。

推开门，来到迎宾的小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浅青色墙面，镶嵌着珐琅砖，其上覆盖棕青两色组成的抽象花卉，很是淡雅。客厅于 1918 年建造，一开始被当作饭厅使用。荣宅扩建之后，这个房间便成为进入北翼附楼的门厅。这里是这座大宅的精致头盘。

你的目光可能会被地上漂亮的地砖吸引。它由六种不同釉面砖组成，整体是棕色，嵌着黄色星星图案，这是来自犹太教的符号。不要感到稀奇，在上世纪初，这条路上曾经居住着不少犹太人。在传统的西式门厅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地砖，它经久耐用、易于打理。修复起来，却并非易事。工作

上海滩最显赫的私人宅邸——西摩路上的荣公馆：

1. 外观（后部）
2. 宴会大厅
3. 台球室
4. 宅子主人荣宗敬卧室的白色壁炉

人员告诉我，为了烧制与原来地砖相同的砖面，意大利工匠将百年前的古砖做成模型，重新调色、手工浇筑成镶嵌图案，再将制好的瓷砖块块回填、层层压紧，煅烧融合，才令古老的地板获得新生。

顺着木制楼梯往上走，我们去到二楼。不用理会楼梯发出的吱咯声，也别被扶手上雕刻的精致花纹锁住了眼睛，往上走，将看到更多美丽的细节。现在，我们到了一间浅朱红色房间，深木色雕花护墙板，很是华贵。这是二楼会议室，宅邸建造之初，被当作卧室使用。1918年，荣宗敬为其增加了一个凸形结构，并配上了一个壁炉。在这个壁炉上，可以看到上海的显著特征：东西融合。壁炉本身是新古典主义式样的，加上了各种中国形象，如老翁与古兽。在18世纪，航海贸易的兴盛使得中国风在欧洲盛极一时，再返回到此时的上海，就是别样的摩登了。

穿过一间草绿色房间，继续往前，是荣家的饭厅。这间深薄荷色的房间曾经名噪上海滩，荣氏兄弟在这里大宴宾客，倡导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这里是正式晚宴的场所，窗外可见后花园的景色。房间设计并不高调，四壁呈暗色调，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它的华丽与高雅，从一些细部体现。沿天花板的吊顶檐口上，有灰泥做成的装饰板条，既掩盖了天花板与墙壁的接缝，又增加了美感。檐口装饰性图案是古典主义装饰中常见的“卵与箭”，源自古希腊罗马，在西方宗教建筑和珠宝设计中，可以看到相似图纹。

我感到最为美丽的，是这几间屋子层层递进的颜色。透过一扇扇敞开的门看过去，木头护墙框住了几面墙，朱红浅碧，深黄暗青，明暗交叠。走近了看，墙面是晕晕的，旧旧的，仿佛一百年的沪上烟雨都被压在墙内，一点点渗出水样光泽，要借天光才看得分明。房主人显然懂得天光之美，于楼层尽头，设置了一间日光室。在维多利亚风格的英国宅邸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房间设置，用以摆弄花草，修养身心。

荣宗敬的日光室与英国人不同。外部格局仍然

穿过一间草绿色房间，继续往前，是荣家的饭厅。这间深薄荷色的房间曾经名噪上海滩，荣氏兄弟在这里大宴宾客，倡导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是经典西式的，内部包裹的却是一颗传统的中国心。日光室的墙面为鹅黄色，设有多面窗户，以吸收阳光。玄月窗上的彩绘玻璃是这间屋子的点睛之笔。彩绘玻璃在荣宅随处可见，带有具象场景的，却只此一处。

抬头看，可以看到一面窗上绘着小船，一面窗上绘着宝塔，合在一处，是“轻舟过高塔”的江南图景。1930年，荣宗敬在故乡无锡的太湖梅园上，修建了一座高塔，以纪念其母。与舟塔相对的另一面窗，是别样景象：西式城堡与风车伫立于河水之畔，宛若工业革命的权力象征。这条河，或许正是从无锡流向上海的苏州河。上世纪初，荣氏兄弟的棉纱厂与面粉厂，便建立于苏州河两岸，这些林立的工厂，令他们“为半个中国提供衣食”。

我走进的第一间私人房间，是荣夫人的闺房。这间卧室是在1918年左右增建的。初入其间，我误以为这是男主人的房间。从室内装饰上看，这确实是一间男子寝室，风格极其冷静庄严。荣宗敬之妻王氏，是一位传统中国妇女，也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她曾经在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之时，只身拜会沪上“教父”杜月笙，寻求帮助，最终令杜老板伸以援手。

房间里的四面墙，均装有柚木护墙板，雕工繁复。这些厚重的护墙增加了空间维度，也给予了房间沉郁的历史感。方入其间，其厚重感或许会让你想起中式老宅，仔细看来，护墙装饰花纹却是世界性的：缠绕的藤蔓取自阿拉伯花纹；垂坠花环与扁豆图案起源于希腊罗马。雕刻均极其精细，应该是刻好各个部件之后，再拼合于一处，形成了而今样貌。

荣先生的卧室在三楼。有意思的是，相比夫人卧室，这间男主人卧室反倒不那么具有男性气息。粉彩色墙壁和白色壁炉给这间房间平添了一股娇媚与清新，显得时髦。我的目光为屋顶的吊顶攫住：这些吊灯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之上，灯罩由半透明的雪花石制成。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富裕家庭已经用电灯取代了汽灯。尽管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基础设施，给租界电压系统带来了压力，也不能妨碍这种新型照明系统在上海滩的应用。

与荣先生卧室同在三楼的还有两间卧室。一间属于荣家长子，建于1930年左右，是作为婚房而建的。房间里有一个嵌入式橱柜，还有一面神秘的砖墙。砖墙原本是在宅邸修复过程中，无意中被发现的。墙的形状像一扇门，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通往别处的入口。然而，在扩建的过程中，它被移除了，

它的故事也被封存在水泥砖墙之中。

另一间是“莲花卧室”。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过去被用作女眷卧室。卧室罕见地使用了墙砖作为装饰——这种釉面墙砖通常被用于浴室和厨房。墙砖的制作采用了景泰蓝工艺，颜色鲜艳。“莲花卧室”因珐琅墙面的装饰图纹为抽象莲花而得名。莲花象征着重生，别具诗意；花朵朝开暮合，一如主人作息。1929年，荣宗敬在太湖之畔建造了锦园，园中有一个荷花池，因花开绮丽，远近闻名。

走廊是建筑中特别的所在，承载着起承转合。这个只有15平方米的空间，连接了荣宅老楼和附楼，将两个高低不同的建筑合为一体。走廊天窗采用彩绘玻璃，装饰着卷曲葡萄藤的图案，这是一种没有地域感的图案，在古埃及、罗马、凯尔特和中国均可见到。过去，此处玻璃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毁损，给工匠修复带来了麻烦。最后，天窗中央椭圆形的部分和21块面板被完全卸下，重新进行修复处理。葡萄藤缺失的部分，则被替换为40年代德国生产的彩窗玻璃。

这个空间给访客提供的选择是：严肃地谈论生意经，还是消遣时光？若是前者，请右转，走进会议室；若是后者，请左转上楼，走进宴会大厅。

你或许会从这个宽敞的大厅里，感受到荣公馆的气度——其豪华气派，不输于此时著名饭店的跳舞厅。宴会大厅由三间卧室改建而成，足以承担一场毕业舞会。大厅上方，有一块面积45平方米的彩绘玻璃天窗，由69块玻璃组成。天窗以玫瑰花结为中心，向四周发射水晶状射线，构成了旭日纹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装饰艺术运动中，时常可见类似的图纹。独特之处在于，现代化图案之外，包围着传统古典花纹：螺旋绶带和月桂花。

休闲之所是西方绅士家宅中的必备设施。旧时上海摩登一些的大户人家，亦少不了。荣公馆堪为代表：除了气派的宴会大厅，同时配备了台球室和吸烟室，供绅士消遣娱乐。两个房间是套间设计，均建于1918年前后。

“华丽”是我走进台球室的第一印象。面积不大，却让我想起了进入英国公爵城堡之时，感到的老式贵族气派。房间天花板以金箔为装饰，在灯光映射下，镀金天花角线给房间增加了立体感。金箔是由工人层层刷上去的，覆盖在细致的苔叶雕花上。

这是一种古老的镀金技艺。西方工匠将黄金敲打至几近透明，切割成块，再将“金叶子”用软

刷辅以溶液，敷在装饰表面。修复起来十分复杂，PRADA请来的意大利工匠小组，颇费了一些心思：在处理完缺失部分之后，将天花板表面整体刷白，重新手工镀金，添加保护层，再对其进行做旧处理，恢复了百年前样貌。

城与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荣宅，始建于1899至1910年之间。购买之后，荣宗敬委任上海滩著名建筑设计师陈椿江为之修缮，给这座西式豪宅加入了中式色彩。整修之后，宅邸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融合了当时颇为前卫的空间设计。现存最早的荣宅建筑方案，来自于1910年。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10年，是上海近代建筑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901年，英国人在上海投资的一亿美元中，百分之六十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上海公共租界的建造量，从1000余栋增加到了9000余栋。此时建造的房屋在设计和建造质量上，都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居民建筑主要发展为两种：里弄和私人花园住宅。20世纪最初的10年，里弄住宅主要是石库门式的，前前后后住着许多人家，是上海最有生命力的尘世烟火。与其相对的，是被称作花园洋房的独立私人住宅，所有者通常是如荣家这样的富庶人家。

荣公馆所在的陕西北路，过去叫作西摩路，是一条充满文化底蕴的街道，密集分布了20多处名人故居和历史遗迹。与荣宗敬在同一条街上做邻居的，还有“宋家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婚前在这里居住了近10年。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457号，是英国商贾何东的故居，他是香港曾经的首富，也是著名的何氏家族的创始人。这些私人住宅，均是经典的花园洋房。

1900年之前，花园洋房在上海滩还颇为鲜见。上世纪前20年，是此类住宅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此时特点是“大”，讲究华丽与气派。在建筑形式上，以古典复兴式为主，多为对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花园大宅的模仿。其最初主人也多为外国富商。后来，不少中国大买办、大官僚和大实业家，也开始建造，或是从外商手中购得此类住宅。西摩路上的荣公馆，就是荣宗敬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下的。

开埠半个多世纪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初步展现出近代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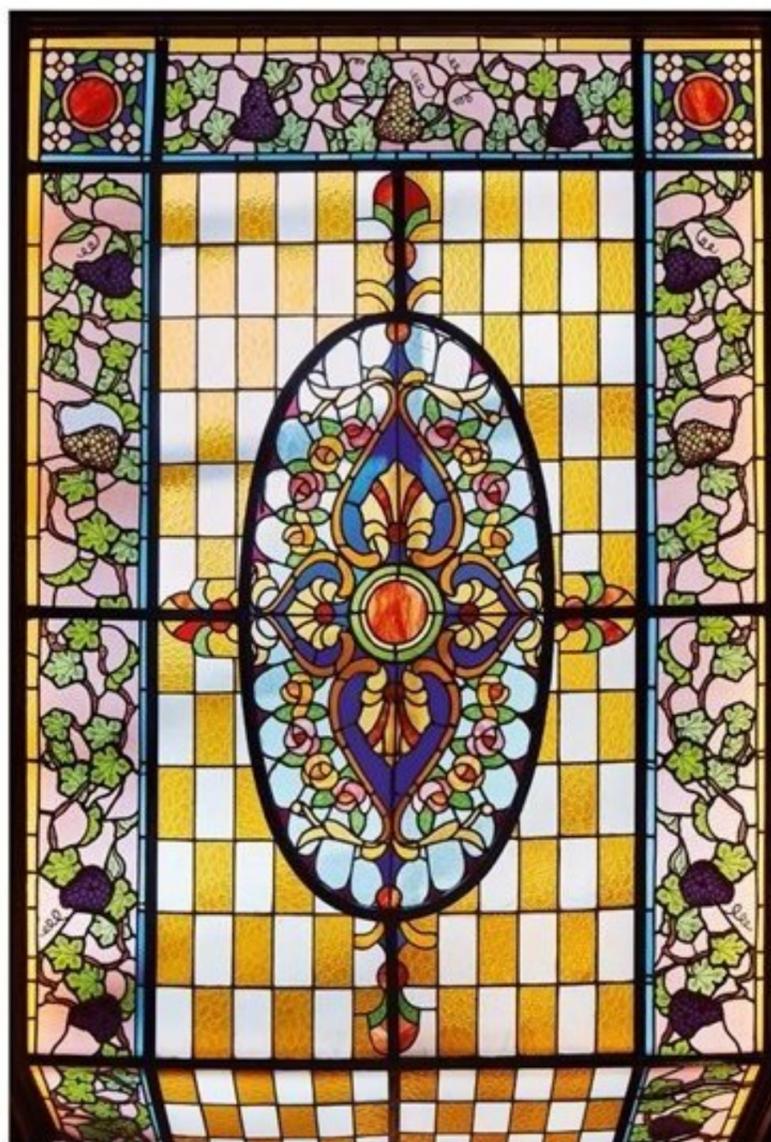
- 1. 莲花卧室
- 2. 会议室
- 3. 荣夫人盥洗室护墙板上精美的雕花
- 4. 走廊天窗的彩绘玻璃



2



3



4

都市的面貌。城市进入除旧立新阶段：传统建筑被拆除，新式建筑建立起来。许多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西方建筑新材料、新结构和新设备，也在此时传入上海。建筑新技术的广泛使用，缩短了上海与西方的距离。

上海滩许多知名建筑均在此时兴建。总巡捕房建造于1892至1894年，由金斯米尔设计事务所设计；虹口大剧院兴建于1908年，是上海也是全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银行和公司建筑：任记洋行大楼建于1908年；永年人寿保险大楼同样建造于1908年，由通和洋行设计；东方汇理银行建于1911至1914年，亦由通和洋行设计。

几个沪上闻名的传奇饭店，与荣宅建造于同一时期。如果你碰巧去过这些地方，会在发现其与荣宅的相似之处，譬如宴会大厅。经常出现在民国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的礼查饭店，重建于1907年至1910年间，由新瑞和洋行设计。大华饭店修建于1910年，是近代上海最豪华的饭店之一。距离荣公馆不远，荣宗敬一度走投无路之时，曾被朋友安置在大华饭店避难。

这些华丽考究的花园洋房、高级饭店、跳舞场与电影院，是老上海生活的最好注脚，也是最能展现上海独特气质的城市空间。亨利·列斐伏尔说：“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租界”是上海近代空间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所在。上海的“租界”，英文对应词是“settlement”，指的是“居留地”，其意是为该区域的外国人提供安居之所。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有着差别。上海的租界（settlement）与天津、汉口等地的租界（concession）不尽相同。后者（concession）是由中国政府将地区内的土地整个租给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租给侨商。前者（“settlement”），则是由各地侨商向中国本地业主直接租借。只是在习惯上，人们将两者统一称之为“租界”。

上海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使之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现代化样板。“然而，上海不管怎么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是中国人填满了前租界的空间，没有他们的认同与合作，任何规划都不可能实现。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成中国式的现代特色。”《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的作者，法国人白吉尔这样写道。

李香兰在《十里洋场》里唱：“把苏杭比天堂，

苏杭现在也平常，上海更在天堂之上，洋场十里好风光。”近代上海的“爆发式发展”，不仅因为“开埠”，还因为“江南因素”。所谓“江南地区”，相当于而今的上海市、江苏省南部、浙江省东部、北部一带。有些研究者认为，在近代上海的成长中，“外国力量”固然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其在短时间内的崛起，则因为自古富庶的周边地区。“换言之，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调集了全国，主要是江南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和人文资源。”

出生于江苏无锡的荣氏兄弟，就是从围绕上海的“江南地区”里，走出来的代表人物。

在上世纪的上海滩，市井里弄里流传着一句时髦话，用以取笑那些爱吹牛皮却缺乏本事的人：“依以为依是荣宗敬？”人们路过荣公馆，希望探究荣氏家族的命运之谜：一个从无锡荣巷里走出来的“乡巴佬”学徒，如何成为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成为敢于对抗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和列强的上海滩风云人物？

1887年，14岁的荣宗敬坐上一条信船，从无锡荣巷出发，沿着苏州河来到上海，踏上锡金码头。少年的初次花花世界闯荡之旅却铩羽而归。不到半年，疾病缠身的荣宗敬就被上海滩赶了出来。回到老家后，他在一家钱庄当学徒，几年的学习生涯，令他积累了创业经验，也积蓄了力量，再度回到上海。

1896年3月21日，23岁的荣宗敬与其胞弟，21岁的荣德生一道，在上海鸿升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兄弟俩分任钱庄一、二把手，荣宗敬任经理，负责全盘运营，荣德生管账房，管理日常业务。

荣宗敬与荣德生，像一枚铜钱的两面，相似无多，又不可分离。哥哥荣宗敬方脸，眉眼犀利，英气逼人，喜欢穿西装，热爱各种新鲜玩意。他为人敢想敢干，胆色过人，是一个激进派。弟弟荣德生圆脸，长耳，面目敦厚，喜欢着长衫，经常在手里把弄一把茶壶。他为人踏实沉稳，行事保守周全。这一正一反，相辅相成。荣德生说过一句话，用以形容两人之间的兄弟情，以手中的茶壶为比喻：兄弟俩就像茶壶的两边，若分作两半，茶壶就不再能用了。

尽管钱庄生意尚可，但荣氏兄弟认为，应该走向更大的市场。1898年，荣德生从香港乘船回上海，看到码头一片雪白，原来是英国轮船运载的面粉飘落的粉屑。他的实业理想被再度激活，决定筹办面粉厂。1900年10月，荣氏兄弟以6000元钱庄盈利作为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保兴面粉厂（后改称茂新面粉厂）。三年后，兄弟俩又出资4万元，创办福

新面粉厂。此后，荣家面粉厂如滚雪球一般，越开越多。至1921年，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已多达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其“兵船”牌面粉，不仅畅销全国，更出口到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驰名海外。

1912年新年，荣宗敬在西摩路荣公馆的书房里，写下了《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即以纺织一业而论，吾国人口四万万，只有纱锭两百余万枚，较诸欧美各国人口与纱锭的比例，实不能供国民之需。是以他国在吾国设厂，以逐其经济侵略之野心，而使我国纺织业受重大之打击。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仰及他人。痛心之事，无逾于此。”

荣氏兄弟决定进军纺织业。1915年，他们创办了申新纺织公司，并复制了面粉厂的“滚雪球”模式。到1922年，申新公司已拥有4个工厂，产纱锭达13万余枚，其“人钟”牌棉纱成为驰名品牌，畅销全国。申新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也超过了在华的日商纱厂。1917年，兄弟俩买下了原本属于日本人的恒昌源纱厂，迅速占领了1919年日纱消退后的市场。华商收购日资建造的纱厂，成为狙击日纱的主角，是近代中国商业史上罕见的一笔。

1921年，江西路耸立起一栋英式建筑，名为“三新大厦”。这是荣氏兄弟的“大本营”，“三新财团”（茂新、福新、申新的统称）的总部。三新总公司采用总经理负责制，规模和作风都具有现代企业的风范。在积弱的中国，三新总公司代表着民族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西方媒体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拿破仑”；荣氏兄弟的创业故事，被写入日本的小学课本。荣宗敬曾经难掩意气地对弟弟说：“从衣、食上讲，我们拥有半个中国。”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影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国民党建都南京之后，外交上采取亲美政策。棉纱业在外国洋行的操纵下，形成了“棉贵纱贱”的局面，生产越多，亏本越大。拥有多家工厂的荣氏企业，难逃其困，“亏损雪球”越滚越大。“三新总公司”盛极而衰。

时局动荡，更是雪上加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们失去了东北市场；1932年淞沪之战爆发，上海工商业遭受重创，申新有7家工厂被炸停产。运输不畅又导致了面粉和棉纱无法交货。焦头烂额的荣宗敬，依然支持着抗日救亡。他安排无锡申新三厂向前线捐赠慰劳品；招收被日商纱厂辞退的职工进申新工作；他与黄炎培、史量才、沈钧

儒等人一道，联名发表《国是主张》，要求抗战到底。

1934年春天，危险降临了。是年，银行和钱庄纷纷拒绝继续给申新放贷。荣宗敬面对的申新债务高达6375.9万元，而申新资产全部不过6898万元，勉强“以资抵债”。一夜之间，荣氏风光散尽。报纸打出这样的头条：“申新”搁浅。

荣宗敬同时需要面对的，是国民党试图“国有化”申新的图谋。宋子文在与荣宗敬的面谈中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所幸，在陈光甫等金融界朋友的帮助下，荣宗敬挺到了最后。1936年秋天，局势扭转，各地棉花丰收，市场亦开始活跃，持续四年的“棉贵纱贱”困境消散。到1937年，申新各厂开始盈利，福新、茂新面粉厂产销两旺，三新财团一洗阴霾，呈现久违的兴旺之象。

荣氏企业短暂的“小阳春”，被同年爆发的日军侵华终结了。淞沪之战打响后，申新三厂被日军洗劫一空，五、六、七厂受到不同程度的轰炸损毁。装备最为精良的申新八厂，被炮火炸为废墟。茂新、福新所受到的打击亦不弱于申新。茂新一厂被日军焚毁，二厂为日军占用，其余各厂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2/3的荣氏企业毁于战火。

此时荣宗敬已年过六十，看到自己一生创立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精神受到重创。不仅如此，日本人还试图通过汉奸胁迫其出任伪职，荣公馆附近，经常有神秘分子出没，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38年1月4日深夜，荣宗敬从荣宅后门出走，悄然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加拿大轮船。这一去，本是暂时避难，未料成为他与这里的天人永诀。到达香港的荣宗敬突患肺炎，加上忧思难遣，2月，在香港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句话：“申新复业。”一个月后，荣宗敬灵柩随加拿大“皇后号”返沪，回到了西摩路上的老宅。

1949年，上海解放。荣孝范代表荣家，将西摩路荣公馆出租给中国经济研究所使用。此后，老宅几易其主，做过办公楼和业余文化学校，也充当过电影取景地。1987年到1996年间，宅子为棠柏饭店使用；2002至2008年，又被用作星空传媒集团驻上海的代表处。

出门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百年老宅，修缮一新后，它看起来依旧迷人。或许，建筑才是城市的主人，人只是其间的寄居客。人来人往，而建筑无言；人去楼空，而城市不老。■

“它关于如何真实地生活在上海”

——专访 2×4 工作室创始人麦克·洛克 (Michael Rock)

荣宅修缮工程，由意大利时尚品牌 Prada 发起并出资，开始于 2011 年，历经六年完工。今年 10 月 12 日，整修一新的“西摩路荣公馆”首度开门迎客，为庆祝老宅重生，17 日起，宅邸正式对外开放一个月左右。

在过去，Prada 做过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为著名的是对米兰的地标性建筑，建于 19 世纪的伊曼纽尔二世长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的修葺。被改造为艺术空间的威尼斯王后宫 (Palazzo Ca' Corner della Regina)，亦是其广为人知的项目之一。参与这些项目建设的团队，将其丰富经验运用到了荣宅的修缮之中。

2×4 工作室是参与荣宅修葺项目的重要团队之一。这个全球当红的设计工作室，由麦克·洛克 (Michael Rock) 创立于纽约，客户包括 PRADA、CCTV、MOMA、NIKE、Sony 等。2×4 与 Prada 的合作开始于 90 年代末，并持续至今。采访中，创始人麦克·洛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荣宅修葺项目背后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听闻此次荣宅的 LOGO 是全新设计的，不知设计出发点是什么，希望呈现怎样的效果？

麦克·洛克：我们希望荣宅项目能获得一个半独立的身份，与 PRADA 的商业方向有所区分。这一点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比如在宅子的使用上，部分与 PRADA 的时尚生意相关，部分则全无关联。这个宅子不是一个奢侈购物地标，而是一个开放平台，这里将承载各种活动，包括时尚的和文化的。所以我们希望，能给它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至少部分意义上。LOGO 的理念由我们北京办公室的同事辛静和傅熙林来创作。它从 PRADA 原有的 LOGO 解析而来，重新整合成了现有模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 2×4 工作室在荣宅项目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具体有哪些工作，能否请你介绍一下？

麦克·洛克：在过去的几年的荣宅项目修复工

作中，我们与缪西娅·普拉达 (Miuccia Prada) 女士和她的团队紧密合作，概念化了整个策略，包括旧址如何使用，宅子过去的故事如何整合起来，以及不同的文化项目如何开展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开幕展的策展人，你希望表达怎样的理念？你曾经将平面设计称为“印刷的建筑学”，此次的荣宅项目是一个建筑项目，怎样体现你这个理念？

麦克·洛克：开幕展是为了烘托荣宅重新开幕的主事件而举办的，它本身应该是谦虚、微妙的，内容则是关于拜访这座老宅的体验。与许多类似的项目不同，在荣宅的重新修葺上，没有刻意凸显其“豪宅”的身份，给予它过多的点缀，而是尽可能地留出空间，让参观者可以真正欣赏到建筑本身的美。在主要房间里，都有信息板，介绍宅子如何修葺，有哪些细节。扫描信息板上的二维码，参观者可以在微信上得到更多信息。在桌子上，参观者可以看到 PRADA 其他几个项目的信息，比如米兰的伊曼纽尔二世长廊和威尼斯王后宫等。从这些项目的建设上，也可以了解到荣宅修葺项目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2×4 与 PRADA 合作了许多项目，从纽约旗舰店修建，到书籍出版，到“普拉达星球”策展，再到普拉达基金会，与你们之前的合作项目相比，荣宅项目的特别之处和难处在什么地方？

麦克·洛克：荣宅修葺确实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体验。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对于建筑本身的爱。从一些细节的维护上，你可以看到宅子过去的荣光，它很引人注目。最有意思的一点或许是，这个项目本身是十分开放的。在未来，这里可能会在上海时装周期间举办一些特别活动，也可能会有其他展览、会议、派对和事件。这里将成为 PRADA 的“中国之家”，也会发挥它的全部功能。对于设计师而言，这就是难点：要发挥建筑的全部功能性。这不是关于一个西方品牌陡然出现，制造一个事件便离开。这是关于如何真实地生活在上海，是创造一些东西，然后让生活来填满它。■



“丢了”名字的设计师

超模辛迪·克劳馥 (Cindy Crawford) 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张早前身穿红色紧身连衣裙的合影，写道“纪念绷带裙之父，它让你在任何场合都是焦点”。照片中，那位金红色头发的男人就是刚刚过世的法国设计师赫尔维·珀涅 (Herve Peugnet)。

赫尔维·珀涅的全盛时期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他发明的“绷带裙”被称为“第二层肌肤”，这种通

过将单独裁剪的布料拼接到一起，犹如绷带相互缠绕般形成的连衣裙不仅贴合身体，更突出了女性的曲线美，几乎成了那些“野心勃勃”的模特们的制服。有评论者认为绷带裙具有雕塑感，这也许和赫尔维的“半吊子”专业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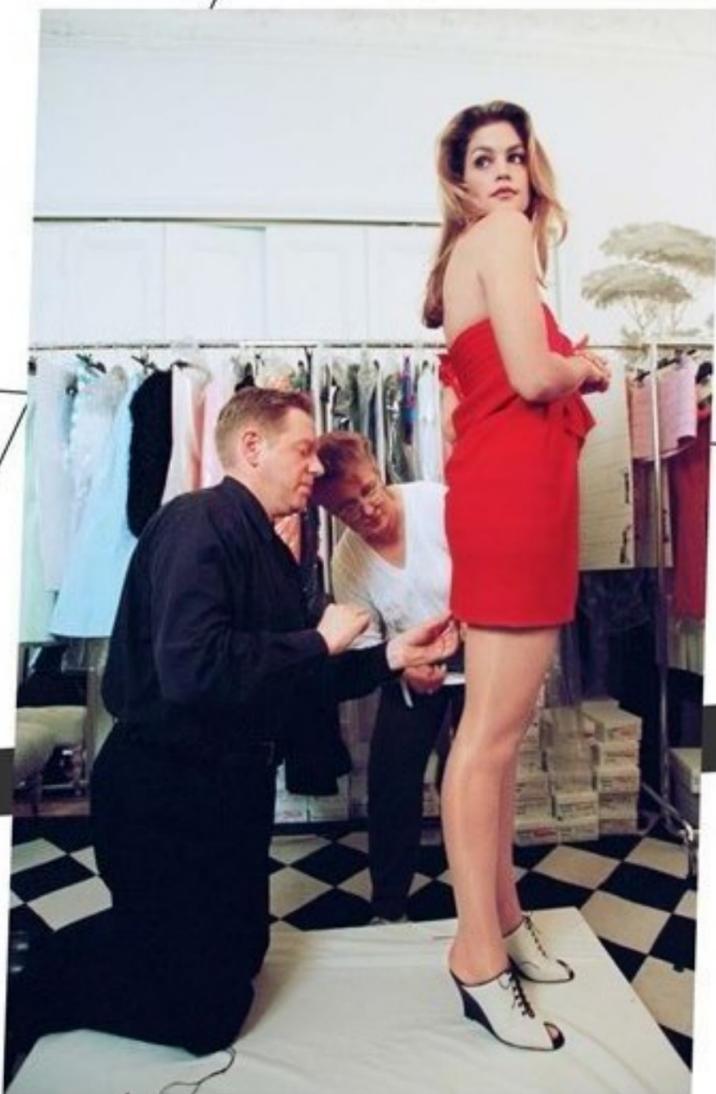
1957 年出生于法国北部巴波姆的赫尔维曾经在大学中学习雕塑与艺术历史，中途辍学当了一段时间的发型师，并“自学成才”兼职做起了帽子。借着帮模特打理发型的机会，他间接接触到了高

“绷带裙”

好品位, 坏品位

记者 / 杨聃

“一个喜欢自己身体轮廓的女人, 并不希望它被过多的布料或者装饰物包裹, 而是希望它如雕塑般直白地呈现其美感。”



设计师赫尔维·珀涅为超模辛迪·克劳馥量尺寸

级定制。在为法国时装设计师唐·朱迪塞利 (Tan Giudicelli) 的秀场模特制作了几次帽子后, 他受邀参与了几件衣服的制作过程, 朱迪塞利给了他一个建议, 为什么不放弃发型设计, 而专注于服装呢?

赫尔维在克洛伊的活动上认识了时任品牌设计总监的卡尔·拉格斐, 当时卡尔并没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设计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至少他看到的图样并没有太多说服力。但因为赫尔维的设计很实用, 后来卡尔还是把他收为助理, 跟着在芬迪和香奈儿工

作了一段时间。

1985年, 在卡尔的建议下, 赫尔维在巴黎开了他的第一家精品店, 并将品牌命名为赫尔维·莱格 (Hervé Léger), 改名也是卡尔的主意, 毕竟珀涅的发音对主要目标客户群美国人来说太难念了, 同时也取了法语 Léger 的轻盈之意。与此同时, 赫尔维也在朗文等品牌兼任设计工作。

偶然地, 一堆在工厂被废弃的绷带让赫尔维灵光一现, 由此而来的绷带裙让他的名字街知巷闻, 时尚评论家苏西·门克斯 (Suzy Menkes) 将他早期的设计称为“90年代的秘诀”。1991年, 赫尔维首次个人秀展出了54件作品。“他恰好证明了巴黎是时尚的创作中心”, 《纽约时报》在对展览的评价中写道。1993年, 赫尔维·莱格每季的销售额只有160件, 到1995年就直线增长至了8000件, 迎来了国际扩张的好时机。

随后, 加拿大施格兰集团注资了赫尔维的品牌, 然而, 却逐渐把他创始人的股票份额稀释到了5%。1998年, 赫尔维·莱格品牌被施格兰卖给了总部位

于洛杉矶的美国集团 BCBG Max Azria, 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被美国的公司收购的法国设计师品牌。可 BCBG 创始人夫妇只想要赫尔维·莱格的品牌影响力, 并不想要赫尔维这位“正主”, 不到一年, 赫尔维就被解雇了, 并失去了该品牌名的使用权。

如愿以偿的阿兹里亚夫妇花了 5 年多的时间从收藏家的手中采购 90 年代的赫尔维·莱格设计来制作研究档案, 把品牌 DNA 延续了下来——非织成, 而只用同一尺寸的绷带在针织机上编结而成。终于在 2007 年推出了 BCBG 版本的赫尔维·莱格系列, 并将其命名为“麦克斯·阿兹里亚的赫尔维·莱格”(Hervé Léger by Max Azria)。

而“丢了”名字的设计师在其老客户的支持下, 以赫尔维·勒鲁(Hervé L. Leroux)之名重新在巴黎开了一家精品店, 设计和制作高级定制服装, 包括凯特·布兰切特、杰西卡·查斯坦、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在内的众多明星都继续光顾他。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 赫尔维很少出现在公众的眼中。但其突出女性气质的针织裙和当代鸡尾酒装束风格仍然被效仿着。作为巴黎品牌纪·拉罗什(Guy LaRoche)的创意总监, 赫尔维为希拉里·斯万克(Hilary Swank)出席 2005 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置装。当她大步上台为在电影《百万美元宝贝》中的表现接受最佳女演员奖时, 那件露背午夜蓝针织礼服前后的反差成了全场的焦点。

经过了 12 年的沉寂, 当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巴黎高定时装周的日历上时, 已经不复赫尔维·莱格时期的荣光了。这让人不由得感叹, 当设计师的名字不再属于设计师本人时, 所触发的创意和商业之间的巨大矛盾。对于外界摸不着头脑的关心, 赫尔维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我一直在从事服装设计, 只不过没有举办时装秀而已。”不知道对于他说, 看到今年 3 月 BCBG 宣告破产的消息, 是宽慰多些还是遗憾多些。

紧身衣与性感

“我简直想拿着支票等在赫尔维公司附近, 偷偷接近那些在店里工作的姑娘, 让她们把所有新的颜色都买给我。”卡戴珊曾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不只是卡戴珊,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泰拉·班克斯都曾是绷带裙的“粉丝”。因为这种由莱卡或氨纶纤维制作的裙子包覆感极强, 对身材有收紧和塑形的效果,



不仅有助于凸显“沙漏形”身材, 还可以让女明星们在镜头前不受限地摆姿势, 难怪《纽约时报》诙谐地将它称为“王牌大绷带”。

被称为“紧身之王”的设计师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ïa)同样在探索既具曲线性感, 又毫无矫饰的女性形象, 从 80 年代起, 尝试过弹力针织面料、实验性的蕾丝与皮革混合物, 引发了紧身衣的潮流, 这为随即成名的赫尔维奠定了基础。要知道, 在他们之前, 这种弹性织物只是被用于内衣、运动和舞蹈装备上, 因为太过廉价并不用于时尚。

绷带裙颠覆了当时卖弄性感时只能露出胸部或



- 1~2. 活跃在T台上的绷带裙
 3. 巴西超模吉赛尔·邦辰身穿绷带裙
 4. 美国流行歌手、演员黛米·洛瓦托身穿绷带裙
 5. 美国女演员希拉里·斯万克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身穿露背午夜蓝针织礼服

大腿的“定式”，证明即便包裹起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尽管一片小小的薄布要价近千美元，但女孩们仍然趋之若鹜。它甚至一度被冠上“女性自我解放的象征”的名头。在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所出的《50件改变世界的裙装》一书中，它跟迪奥新风貌、香奈儿小黑裙以及戴安娜王妃的结婚礼服一样榜上有名。

但类似赫尔维绷带裙的样式迅速出现在了竞争对手的T台上和大众市场零售商的衣架上。开始让它恶名远播的是，这种服装开始成为“真人秀”的标配——急于捕获大众眼球的女孩们常常把自己挤进小两号的“绷带裙”里，让身体呈现出爆裂的样子。

尽管以“不辩解的性感”(Unapologetic Sexy)

著称的麦克斯·阿兹里亚的赫尔维·莱格系列甚至融入了朋克的魅惑元素，诸如克里斯托弗·凯恩(Christopher Kane)、普罗恩萨·施罗(Proenza Schouler)、范思哲和罗伯特·罗德里格兹(Robert Rodriguez)等品牌的设计师还在孜孜不倦地从赫尔维的原创设计中汲取灵感，仍无法阻止人们将绷带裙归于“恶品味”之列。

2009年，《Vogue》杂志这样写道：“女孩们把80年代的时尚重新穿上身，试图回到她们不曾经历过的往昔，消耗她们蓬勃欲出的激情。”绷带裙成了20岁小女孩的玩物，难登大雅之堂。一度被誉为现代裙装设计经典的连衣裙，开始经受恶毒的批评，一些评论家甚至把它归咎于“让服装从优雅到整脚的元凶”。

近年来，以绷带裙为代表的紧身裙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英国时尚专栏作家艾琳看来，人们甚至无须为它的退场而惋惜：“女孩们花1000美元购买一片小小的薄布，却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交际花，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就连靠着它“发家”的金·卡戴珊也放弃了对它的“执念”。据说，她的新造型顾问莫妮卡·露丝(Monica Rose)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她的衣橱里扔了30多件绷带裙。

时尚的风向标变了。这从今年美国版《Vogue》6月刊的封面人物就能看出来，安娜·温图尔选择了有点微胖的艾丽·范宁(Elle Fanning)。范宁不同于以往占据时尚圈半边天的“比弗利山庄颜”，就像卡戴珊一家那样，喜欢360度阴影高光，双唇丰厚，轮廓深邃。相比之下，她脸型有点偏圆润，不太爱打高光阴影强调脸部轮廓，而且从头身比例来看，头略大。笑起来憨憨的，简直要把20颗牙都露在外面。这和网红模特贝拉·哈迪德所谓的丧脸才时髦也是相背而驰。启用这张代表时尚的新面孔表达了很多，比如不完美的美、清新、不太酷等等。

同时，性感的概念也在变化着。看看Calvin Klein的大片中的纳塔利·沃佳诺娃(Natalia Vodianova)，没有生硬的裸露，无关妆容和服饰，她演绎的性感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气质，而不再是强烈的视觉刺激。如此说来，代表旧时刻板印象的绷带裙的确过时了，但赫尔维·珀涅的设计之道仍然受用：“一个喜欢自己身体轮廓的女人，并不希望它被过多的布料或者装饰物包裹，而是希望它如雕塑般直白地呈现其美感。”



(成都商报/视觉中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

抗击慢阻肺：陌生的全球第四大死因

主笔 / 曹玲

慢阻肺仅次于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急性肺部感染，与艾滋病一起并列世界第四大致死原因，2020年有可能上升至第三位。这样一种高致死率、高致残率的疾病，在人群中的知晓率却只有25%。

慢阻肺是什么？

天气渐冷，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日益增加。很多人得了慢阻肺却不自知，甚至连医生也很少提到这个名词。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说：“很多人不知道慢阻肺是什么，但是说起咳嗽、咳痰、气短这些慢阻肺的症状，以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大家都有所耳闻。”

慢阻肺全称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在呼吸过程中气体通过气道进出，如果因吸烟、感染、空气污染等因素损伤气道，气道就会出现慢性炎症，时间长了会造成气道管腔狭窄，使呼吸时气流受阻，导致肺功能障碍。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呈进行性发展，最后会导致慢性呼吸衰竭。我们熟悉的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都属于此病范畴。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冉丕鑫教授在基层做宣传时发现，老百姓对慢阻肺的知晓率只有25%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慢阻肺是什么。钟南山认为，除了对疾病的认识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名词不统一。“慢阻肺是个新名词，基层医生往往把它称之为肺气肿。我国需要把名词统一化、标准化，先让基层医生知道，然后老百姓才能知道。”钟南山说。

慢阻肺的病名中有一个“慢”字，很多人觉得个病是慢慢发展的，无关紧要。其实不然，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6亿人患有慢阻肺，预计患病率还会继续上升，到2020年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致死疾病。在中国约有超过4300万患者，多为吸烟男性，平均每分钟就有2.5人死于慢阻肺。我国每年死于慢阻肺的患者有128万，致死率达17.6%，已超过冠心病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如果不及早干预，未来30年中国将有6500余万人死于慢阻肺。

为什么慢阻肺致死率如此之高？慢阻肺就像一把藏在身体里的“慢刀子”，它的症状是不断递进的，从咳嗽、咳痰到气短或呼吸困难，再到憋气和胸闷，最后引起全身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骨骼肌功能障碍、代谢综合征、骨质疏松症、肺癌等等。晚期慢阻肺患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喘不上气，即使坐着或躺着不动也不行，有患者描述“憋气的感觉就像被土埋了半截”。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此高的致死率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该病的重视。2007年，钟南山团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研究表明中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发病率高达8.2%。“患病人群里1/3没有任何呼吸系统症状，64.7%左右的人有轻微症状，只有25%左右的人主动去看过病，大部分患者并没有就医，直到出现气促、呼吸困难等明显的症状时才去看医生，但此时患者的肺功能往往已经明显受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而中晚期阶段的慢阻肺治疗效果通常很差。”冉丕鑫说。最近几年国内又做了很多研究，发现慢阻肺的患病率一直在增加，但是具体增加了多少尚未可知。

早期干预

对于慢阻肺早期治疗率低的现状，世界各国均一筹莫展。

2009年，钟南山院士在罗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他提出一个想法：慢阻肺能不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进行早期干预？比如人们发现早期高血压并非是靠出现的症状，而是依靠检查。能否像测量血压诊断高血压一样，通过肺功能检测来干预慢阻肺呢？

他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成，包括大会主席，但是当钟南山问“有没有人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却没有人举手，因为这个工作太难了。

早期患者是否愿意用药是最大的困难。“国外谈到这个问题也觉得很难，这样做需要挨家挨户去劝他们用药，而病人则会觉得自己没有病凭什么要用药。”钟南山说。

在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并不推荐对慢阻肺患者进行早期筛查。美国国立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起成立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中，只是推荐有症状的病人进行防治，并不推荐在基层进行筛查和干预。

2016年5月，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更新慢阻肺疾病筛查，与2008年的结论相似，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未能证实对无症状成人进行慢阻肺筛查，能够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降低患病率、病死率。但同时，研究也发现，无充分证据表明筛查的不利影响。

钟南山和他所在的团队从罗马会议之后，就设想能否通过实验证实早期干预对慢阻肺有效。研究于2011年10月启动，2015年9月结束，算上前后筹备和总结耗时近8年，研究结果于今年9月7日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研究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广东、北京、河北、重庆等多个地区的24家基层医院参与，患者以广东人为主。

这项大型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显示，如果对确诊的早期慢阻肺患者进行持续性的药物干预，患者的肺功能将被挽救。研究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噻托溴铵的药物，该药物已经上市十余年，此前被用于治疗中度或重度的慢阻肺患者，却从未被用于其早期患者。

据钟南山介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要么是有关新药物或新治疗技术的研究，要么是新战略。“研究团队的这一最新发现，将改变全世

界防治慢阻肺病的战略，将慢阻肺治疗的重心从中度或重度患者，转为重点关注此前一直忽略的早期患者。这一战略性的改变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中国医学专家为世界做出的贡献。”钟南山说，“全世界对慢阻肺的认知都不够，我们现在把基层都动员起来了。”他坚信，中国在慢阻肺的早期干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他多次提到人们对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认识历史，往往如今看似理所当然的医学常识，都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探索和研究。比如“高血压要降压”在今天常识，可在上世纪中叶，人们包括医学界在内的普遍观点却还是：“动脉硬化后，需要更高的血压让血液通过狭窄的血管，所以高血压是人的重要代偿，不应该干预。”

人们对高血压的认识经历了上百年时间，用了20年时间才真正证明干预高血压可以减少脑卒中。“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的继续努力，比较快地改变人们对慢阻肺的看法，希望不要再用那么长的时间。”钟南山说。

我国近年来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的预防与治疗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在疾病管理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慢阻肺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病死率和疾病负担率这五大指标却始终处于高水平上升趋势。

慢阻肺的诊断主要是基于肺功能检查结果。“但我们慢阻肺筛查的患者里面，做过肺功能检查的只有2.5%。”冉丕鑫说。

钟南山介绍，改善肺功能国外最常见的做法是步行。走路能锻炼大腿肌肉，对慢阻肺肺功能的延缓改善很有好处。此外，在使用一定支气管舒张剂的基础上，坚持做半年以上的太极拳，肺功能的改善也比单用支气管舒张剂效果更好。

如何在早期发现自己得了慢阻肺？钟南山院士介绍：只要像测血压一样对肺功能进行测试就可以了，如果做不到那就需要在每年的体检中增加肺功能检测这个项目。肺功能检测目前在我国尚未普及，体检中及日常住院中经常忽略检测肺功能。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郑劲平表示，2017年1月份，国家“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到，要把肺功能检测纳入国家的常规体检项目。按照国家的计划，到2025年希望肺功能检查的普及率能够达到20%，对于慢阻肺的诊断率应该到40%。但距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雾霾的危害

慢阻肺的致病因素有很多，现在全球公认吸烟是最重要的因素，吸烟时间越长、吸烟量越大，发病概率也就越高。吸烟者的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比非吸烟者高出10倍；15%的长期吸烟者最终会患上慢阻肺，而90%以上的慢阻肺患者都是烟龄在20年以上的老烟民。

烟雾中含有焦油、一氧化碳、一氧化氮、氰氢酸、丙烯醛和尼古丁等多种有害物质，它们会使支气管上皮纤毛变短并发生运动障碍，降低局部抵抗力，削弱肺泡的吞噬细胞和灭菌作用，从而导致病菌侵入引起感染。

除了吸烟之外，生物燃料和大气污染也是导致慢阻肺发生的危险因素。女性慢阻肺患者除长期接触二手烟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和生物燃料污染有关。很多农村女性患者经常烧柴，或燃烧牛粪、马粪。另外，雾霾等重污染天气，也会导致慢阻肺患病率危险性增加。

以前大家可能关注“PM2.5和肺病之间的关系”时，只有一些笼统的数据，比如我国2007年的数据表明：PM2.5每提高10微克/立方米，医院的住院率会上升3.1%；PM10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住院率会增加2.5%。

“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数据表明，PM2.5上升到什么程度时，肺功能下降多少。”冉丕鑫表示。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在广东湛江、韶关，广州等地区通过系统的调查，发现PM2.5浓度上升直接导致人们肺功能下降。PM2.5的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空气污染地区居民的肺功能会下降大约26毫升；PM2.5从35微克/立方米增加到75微克/立方米时，慢阻肺的患病率危险性增加2.4倍；如果PM2.5的浓度超过75微克/立方米，那么当地居民患慢阻肺的危险性是35微克/立方米以下地区居民的2.53倍。

钟南山说：“以前的看法是，慢阻肺只不过是天气不好加重慢阻肺发作。但冉教授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与慢阻肺和患病率有很大关系。从预防角度来看，除了戒烟，加强、加快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对降低慢阻肺的患病率也非常重要。”

“对于高危人群，比如长期抽烟的烟民，农村厨房里经常接触烟雾、粉尘的人群，还有重度空气污染地区的人群，40岁之后应该主动做肺功能检查。”冉丕鑫说。■

中读专栏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古典 音乐

说明书
Classical Music

不高冷有温度的古典音乐

主讲人：段召旭

钢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者、知名乐评人

加入他的朋友圈，古典音乐随身听



音频

图文

私享会

每周二、周五更新



苏格兰足球要向冰岛学些什么？

文 张斌



(视觉中国供图)

10月9日，2018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上，冰岛队2:0战胜科索沃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

他山之石，其实是最麻烦的。看着人家兴旺蓬勃，我们热闹一番，抒发一下也就是了，就等着下一次受刺激。两年前，闻听维京战吼，我们对33万人口足球强国心驰神往。如今，似乎也无新意，有心人多些韧性罢了。说到自家国情，多数人不禁气短，倒不如借助人家视角研判一下，同样是接连折戟预选赛的苏格兰人这一次也盯上了冰岛，显然也是受了强刺激。

苏格兰的足球底蕴理论上不逊于任何人，在他们眼中，冰岛足球之强，得益于教育理念先进。冰岛教育部要求所有孩子们在校园里，每周必须至少从事三项体育活动，游泳是必修课。在冰岛人的意识中，青少年过早地专业化训练弊端很大，在其成长期首先推崇的应该是运动多样性。因此，在这个岛国并没有所谓的“校园足球”。

尽管如此，冰岛足协对于教育系统中的需求开展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任命专员埃约尔松统领体系建设，而这一任职从2002年至2013年，保持一个稳定的发展周期。埃约尔松全面引进了欧足联的训练体系，结合冰岛教育实际，不断提升优化，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过价值引领，鼓励冰岛人成为职业教练员。如今，33万冰岛人中有800多人持有欧足联A级和B级教练员证书，超越任何足球国度中的人口与持证教练员的比列，保证4岁孩子初试足球时都能找到持证教练引路。

这是足球强盛的铁律，做不到，虽然热闹，但注定低效。

虽然，冰岛足球因为去年“欧洲杯”成名天下，其实早在2015年，他们就开始在欧洲四处介绍成功经验。其中关键点仍然是教育理念先进，在冰岛青少年足球成长历程中，往往会打破年龄段设置，以能力来进行划分，年纪小但能力出众者破格晋级更高年龄组，最出众的女孩子会与男孩子一起训练到16岁。因此，在冰岛青少年球员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大阵营，同样能力的球员在一起竞争成长，给每个人以成为球队中最优秀者的机会。目标只有一个，不会丢下任何一个爱踢球的孩子。

人，自然是一切运动的核心，好球员加上好教练。剩下要解决的必然是运动场地问题，冰岛人不惜加大投入，让一个冰雪飘飞、暗夜悠长的国度同样拥有最好的踢球条件。始于15年前的一轮场地投入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一度受阻，但已足以让足球在冰岛成为365天的运动，33万人的国度拥有23个室外标准比赛场、7个室内场，还有超过200个人造球场，几乎是千人一块场地，这也叫核心竞争力的。

除了加强足球场建设，冰岛人还奉行一个至高原则，无论是生活在首都的孩子还是偏远村镇的孩子都要享受同样的运动条件，因此冰岛任何一个数千人的小城中也会拥有完备的运动设施，让每个孩子享受平等，先天的运动环境没有缺憾。

在冰岛人的意识中，运动伴随一生，但并不能完全成就一生，需要在任何职业的成长历程中都进行完备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这也就让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上一代球员和教练员中会有那么多的兼职行为，毕竟国家队主帅同时身为牙医也太罕见。那些持证的教练员平日里大多也有各自职业，足球收入源自家长们给出的培训费用，最低一年250英镑，随着年龄增长逐年提高，直至19岁。当然，未来冰岛一定会诞生更多的职业足球人，至少这一代已经没问题了。

本世纪初是个有意思的时间点，包括冰岛、德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发起了足球振兴计划，冰岛足足走了15年才有成效，耐心规划长久未来才是正途。苏格兰人很清醒，复制冰岛几无可能，唯有借鉴和激励作用。苏格兰人高度认可冰岛足球的文化和教育理念，取其精髓，埋头经营自己的“勇敢计划”吧。■

伊核风波

文 / 宋晓军

北京时间14日凌晨，特朗普针对“伊核协议”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将对伊朗是否遵守“协议”和确定是否制裁伊朗革命卫队的“球”踢给了国会。事后有媒体朋友问我怎么看特朗普这一事先就已被猜到了的决定，我的回答是：特朗普至少为他的“将军们”争取了60天的时间。在这60天里，要看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场上会不会发生“剧情反转”。

这个话题还要从特朗普政府对“伊核协议”审议的周期说起。简单说，在2015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由六国推动的“伊核协议”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核协议审议法》(INARA)。根据INARA的规定，政府必须每隔90天就要认证一次伊朗是否遵守了“协议”的相关条款，若拿出伊朗违反“协议”的证据，国会将恢复“协议”生效前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之前，特朗普已于4月和7月两次“忍气吞声”地给予了伊朗遵守“协议”的认证。按规定，10月15日前特朗普应提交第三次认证。而恰恰就是到了距第三次认证还有两天时，特朗普突然不认证了。那么这270天里发生了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一组有关叙利亚战场的数字。2017年3月，叙政府军控制的地域约为4万平方公里，以叙库尔德武装为主的叙民主军所控制的

地域约为3.9万平方公里，叙反对派武装所控制的地域约为2.7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域约为8万平方公里。2017年6月，叙政府军控制的地域约为5.2万平方公里，以叙库尔德武装为主的叙民主军所控制的地域约为4.3万平方公里，叙反对派武装所控制的地域约为3.9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域约为5.2万平方公里。到了2017年10月，叙政府军控制的地域约为9.3万平方公里，以叙库尔德武装为主的叙民主军所控制的地域约为4.6万平方公里，叙反对派武装所控制的地域约为2.6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域约为2万平方公里。

从这组数字里不难看出，在270天里，伊朗革命卫队给予了巨大支持的叙政府军所控制的地域扩大是惊人的，而美军支持的叙民主军所控制的地域扩大却很有限。也就是说，自特朗普5月20日将首访选在沙特并开始与他身边的将军们（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白宫办公室主任）策划中东战略的170天里，叙利亚战场发生了“剧变”。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剧变”，特朗普身边的那些曾在中东征战了多年的将军们才会说服他不仅在伊朗东边的阿富汗增兵，而且还采取对“伊核协议”不予认证的方式将“球”踢给国会，迫使国会在INARA里加上针对伊朗的制裁条款。这样即便不能修改或退出“伊核协议”，也会让伊朗捍卫“协议”的文官与革命卫队的将领之间产生“内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要在INARA里加上新的制裁协议，也需得到当初支持“协议”的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而获得60票。虽然没有很大的把握，但至少为“将军们”对叙利亚战场的“剧变”止损提供了60天的时间。当然，在这60天里美国支持的叙民主军能抢占多少“伊斯兰国”的剩余地盘，美国联合沙特等海湾国家能“赎买”多少反对派武装，俄罗斯、土耳其及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与“伊核协议”相关五国的反应等这些“变量”，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杜克大学教授菲弗（Peter Feaver）随后在为《外交政策》撰写的文章里写道：特朗普的计划有一定逻辑，但也许这是他的团队迄今为止尝试的最艰难的外交策略。■



10月14日，伊朗德黑兰民众通过报纸了解到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撕毁”伊核协议的相关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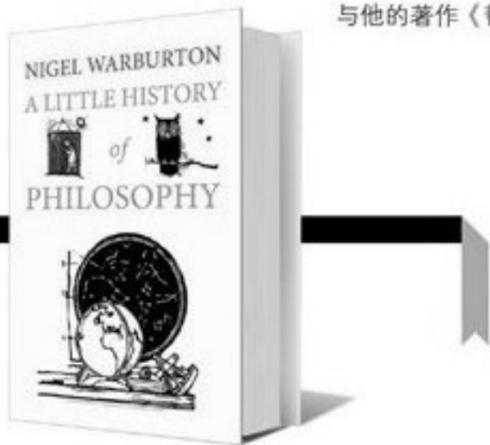
耶鲁哲学小历史

主笔 / 薛巍

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起推出“小历史”系列，相继出版了文学小历史、科学小历史等，其中的哲学小历史也是一部简明、有趣的读物。



英国哲学家奈杰尔·沃伯顿与他的著作《哲学小史》



从爱提问的苏格拉底到“当代牛虻”彼得·辛格

在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看来，有些哲学普及读物给哲学这个苦药丸包了太多糖衣，以致药丸的味道和营养都消失在了糖衣里。英国哲学家奈杰

尔·沃伯顿的哲学读物则不使用任何花招，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简洁、精练和准确。沃伯顿是耶鲁大学“小历史”系列哲学分册的作者，这个系列以贡布里希1935年出版的《世界小史》为范本，全都是用40章的篇幅把某一学科从古写到今。沃伯顿从苏格拉底写到了彼得·辛格，大部分哲学家各占一章，有的两人共享一章（如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唯有康德占了两章。每一章都相当于一篇名词解释，介绍了一位哲学家的核心概念或核心论断，然后提供了哲学家的一些传记或历史背景。

在写到卢梭时，沃伯顿重点介绍了卢梭提出的公意的概念，这一章的开头则是一段“糖衣”：“1766年，一个矮个子、黑眼睛、穿着皮外套的人前往伦敦特鲁里街剧院观看戏剧。大部分观众，包括国王乔治三世，更感兴趣的是这位外国访客而非台上表演的戏剧。他看上去不太舒服，担心着他的阿尔萨斯狗，他不得不把狗锁在了他的房间里。这名男子并不喜欢他在剧院里获得的关注，在乡下独自寻找野花会让他更开心。他是谁？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他是伟大的瑞士思想家和作家让-雅克·卢梭。他是文学和哲学界引起了轰动的人物，受休谟的邀请来到伦敦，像今天的娱乐明星一样引发了骚动和众人的围观。”有一本书叫《卢梭的狗》，说卢梭有两条狗，一条是他的宠物狗，一只很小的、棕色的卷尾狗。另一条则是一直尾随着他的“疑心”，比如本来休谟出于好心邀请他去英国，还给他安排了住宿，他后来却怀疑休谟要陷害他。

作为英国人，沃伯顿比较偏重于分析哲学，罗素、艾耶尔各占一章，有一章写阿伦特，海德格尔却没有被单独列出来，他对德国的思辨哲学没有好感。比如他写道：“黑格尔到底是明智还是愚蠢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他确实很有影响。他惹怒了许多哲学家。有的认为他的著作证明了术语运用不精确的危险。罗素鄙视他，艾耶尔宣称黑格尔大部分句子什么也没说。但彼得·辛格等人认为他的思想很有深度，他的著作之所以难懂是因为他与之斗争的想法非常有原创性、非常难以把握。”

柏拉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很深远，但沃伯顿只讲了他书中比较生动的“洞穴比喻”。对亚里士多德

的论述一开始就很吸引人，他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孩子不可能是快乐的。这听起来很荒唐。如果（整日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快乐，还有谁是快乐的？”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跟现在的幸福观有很大的差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不是短期快乐的问题，一些快乐的时刻加在一起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幸福。孩子刚开始他们的人生，所以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真正的幸福需要更长的人生。

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又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他们三个的思想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学生没有简单地模仿自己被传授的东西。每个都有一个原创性的进路。“简单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谈话者，柏拉图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而亚里士多德对一切都感兴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世界只是比较苍白地反映了真正的现实，后者只有通过抽象的哲学思考才能被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则着迷于周围世界的细节。”

古代的怀疑论和美德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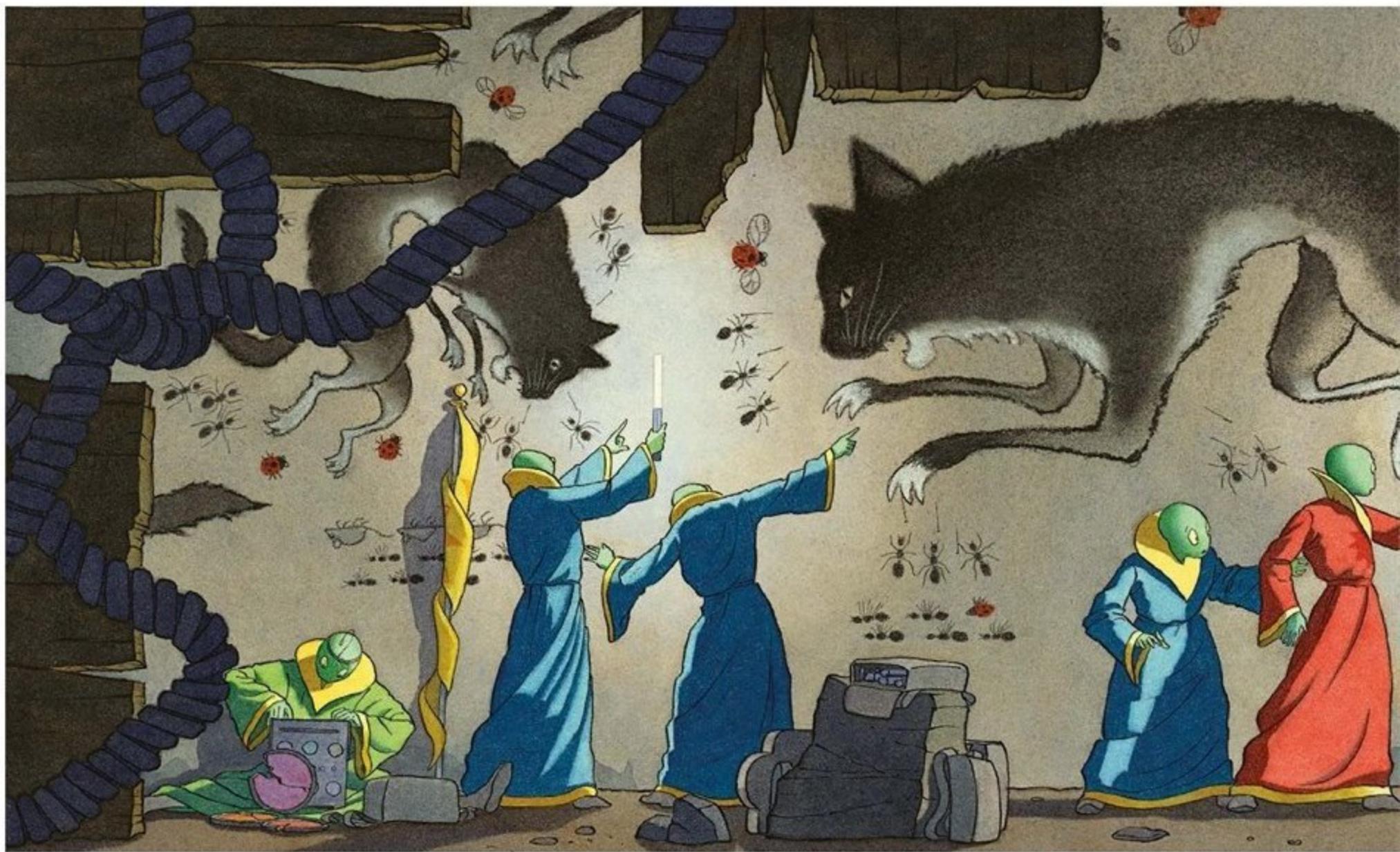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他的回答的一个简单的版本是：追寻幸福。但追寻幸福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说到幸福，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各种享乐方式。对你来说，也许幸福是去国外度假，参加音乐节或派对，或者跟朋友待在一起。幸福也可以是看你最爱的书，或者去画廊参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也许是良好生活的组成部分，但他认为最佳的生活方式不是去追寻快感，而是追求幸福，幸福不是转瞬即逝的狂喜或我们的感受，它更加客观，幸福是人一生的总体成就。”

怎样才能增加幸福的概率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培养恰当的品格。你需要在恰当的时刻感受到恰当的情绪，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行动。这部分取决于你是怎样长大的，因为培养好习惯的最佳方式是从小就练习。好的行为模式就是美德；坏的行为模式就是恶习。比如战场上的美德，一个士兵可能需要冒着危险去救助一些平民。一个莽撞的人可能会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冲进危险的境况。一个怯懦的士兵则会被吓

得惊慌失措。一个勇敢的人仍然会感到害怕，但他能够征服恐惧感而采取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美德都是两种极端的中道。“许多当代哲学家认为，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了培养美德的重要性。他的幸福观也是准确的、给人以启迪的。不应该指望着增加快感，而是要努力变得更有美德。”

古代哲学中比较有趣的一个流派叫怀疑论，其代表人物是皮浪。沃伯顿说，皮浪以一些非常特别的方式实践他的怀疑主义。“如果没有朋友的保护，他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会非常短。任何极端的怀疑论者都需要不那么怀疑的人的支持，或者需要好运，才能存活很长时间。”因为皮浪是这样应对人生的：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感官。有时感官会误导我们。比如，在黑暗中，感官很容易弄错你看到的東西。看上去像是狐狸，也许只是一只猫。或者你会以为你听到有人喊你，实际上只是树木间的风声。因为感官经常误导我们，皮浪就决定永远都不信任它们。所以，当大部分人看到陡峭的悬崖时，会觉得再往前走很愚蠢，皮浪则不然。他的感官会欺骗他，所以他不信任它们。甚至脚趾抓住悬崖边缘的感觉，或者往前倾斜的感觉，都不能让他相信他即将要掉下去。掉到石头上会摔伤他都不信。他的朋友们要防止他发生意外，不然他时不时就会陷入麻烦。

对于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他根本就不会开口说话，因为什么都不信，不知道可以说什么。“如果所有人都听从皮浪的建议，就没人来保护他们了，整个怀疑论学派很快就会灭绝，因为他们会跌落悬崖、被车撞死或者被狗咬死。”沃伯顿指出，皮浪的理论的基本弱点在于，他从“你无法知道任何东西”迈向了“因此你应该忽略你的本能和对危险的感知”这一结论。但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不是都像皮浪那样极端。西方哲学有一个温和怀疑论的伟大传统，质疑假设、仔细检查我们的信念的证据。这种怀疑论的质疑是哲学的核心。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怀疑论者。它是教条主义的反面。教条主义者对他们的观点非常自信。哲学家则挑战教条。他们要问，人们为什么相信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有什么证据支持自己的结论？他们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或至少揭示我们所知、能知的非常少。■



想象的力量

大卫·威斯纳的异想世界

主笔 / 陈赛

把一个奇妙的故事盛放在一个美丽的容器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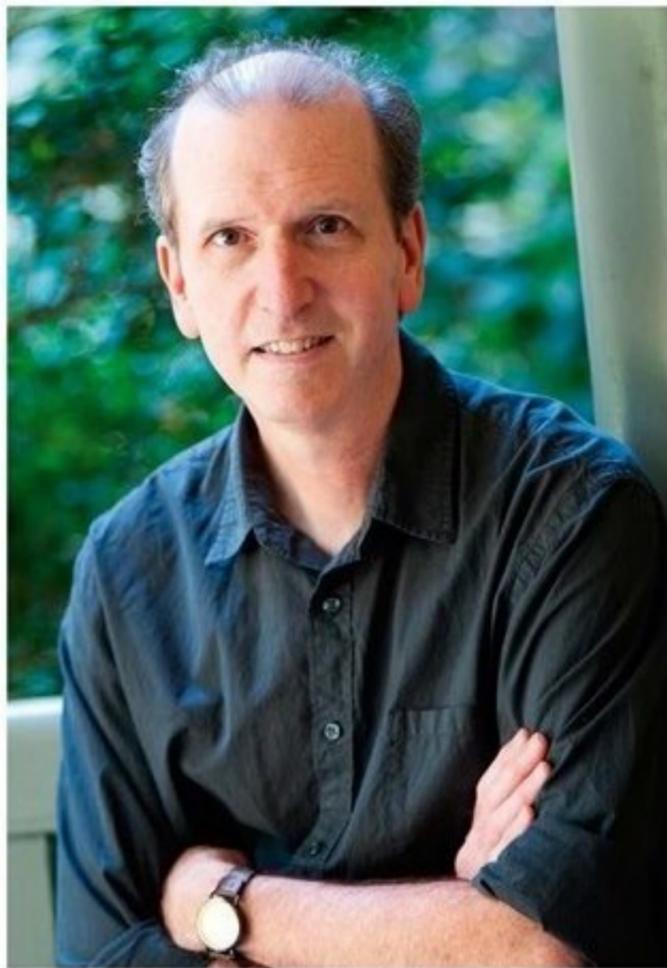
在美国，大卫·威斯纳被尊称为“无字书大师”。他的图画书常常没有文字，或者只有极少的一点文字，但图画的叙事性极强，随便挑一张出来，都是对一个人观察力与想象力的极大锻炼。

比如他的处女作《梦幻大飞行》，是关于一个男孩的梦。其中一幅画中，小男孩侧躺在一个宫殿里，宛如巨人，正俯视一群穿着古装华服的小人。宫殿极为宏伟，让人想起18世纪意大利画家乔瓦尼·皮

拉内西笔下巍峨夸张的古罗马城。左侧高高的石柱、宽阔整齐的石阶，显得十分庄严优雅，但随着视线向右，建筑渐渐变回粗粝的岩石。从男孩折叠的双腿之间可以感觉到整个建筑的纵深，仿佛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宏大。

男孩的右肩膀上站着三个小人，最大的那个披着灰色长袍，戴着帽子，似乎在演讲。左边地下，我们看到一本合上的书，露出一条绿色的尾巴。右侧是五只小猪，探头探脑，似乎在寻找什么。男孩脸上呈现一副迷惘的神情，似乎正神游于两个世界之间，让你忍不住想赶紧翻页，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大卫·威斯纳来说，图像是一生激情所在，而他对图像的兴趣，从一开始就是故事，而不是绘



左图：威斯纳作品《华夫先生》内文插画

右图：美国插画家大卫·威斯纳

画本身。他少年时代迷恋漫画，尤其是《花生》、《Mad Magazine》(以嘲讽流行文化为主旨)，以及漫威的《神盾特工》等。年纪稍大，则喜欢躲在图书馆一角翻看艺术家的画册，但他说自己看任何一幅名画，都像是看故事里的一个场景，或者电影里的一个镜头，好奇这一幅画面在被捕捉下来之前和之后都发生了什么。即使《蒙娜丽莎的微笑》，最让他着迷的不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而是她身后的风景，更像是火星，而不是意大利，仿佛正在上演一场科幻剧。

后来，他在罗德岛设计学院读书，曾经尝试过许多视觉叙事的媒介，比如漫画、动画、电影，但最后认定图画书才是最合乎他理想的媒介。在他看来，图画书的视觉语言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表现手法十分精致而复杂。结构上看似有诸多限制，但于限制之中却又包含叙述方式的无限可能。它还独具一种超越其他任何媒介的幽默潜能，“也许只有卓别林和巴斯·基顿才能将如此全面的幽默元素集于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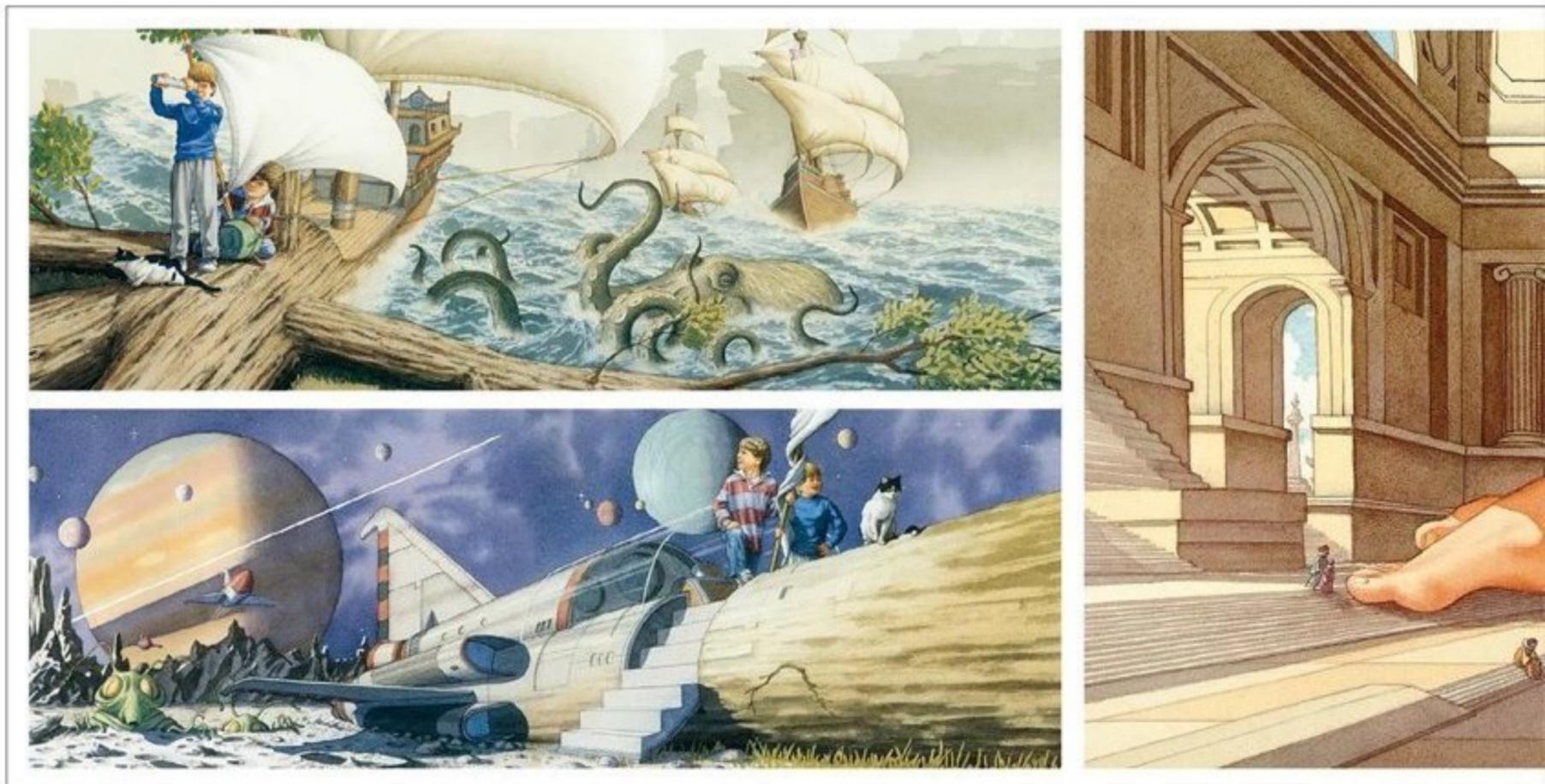
《疯狂星期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他第一部获得凯迪克金奖的作品。在某个不知名的乡村，

星期二晚上8点左右，池塘里昏昏欲睡的青蛙突然被惊醒了。接下来，没有文字的描述，只有在荷叶上尽情飞翔的青蛙带你穿越城镇的每个角落……

在这本书中，他大量借鉴了漫画和电影的叙事技巧，以漫画的画格扩展或压缩故事的时间线，画面中还有大量的特写、中景和长镜头的转换。作者以一种极为精确的手法描绘一种梦幻的氛围。青蛙和村庄的风景都描画得极为真实与细致，读者几乎能闻到乡村新鲜的空气。一次次具体到分钟的报时，烘托得魔幻时刻更加真实，读者的心情也越来越像书中那位深夜吃夜宵的男士，被迫相信一件无比荒唐的事情。仿佛一抬头，就能看到自己的窗外也有群蛙飞过。画中这位男士据称是作者本人。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就是觉得自己必须在这个故事里面。”

一个老太太在电视机前睡着了，“我并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为她构建了一整个世界。画面中的每一个视觉元素，都是在讲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终于，夜色褪去，清晰、明亮的晨光映照着远



威斯纳作品《飓风》内文插画（上、下）

山淡淡的暗影。绿野寂寂，近景中的青蛙们在田间跳跃，看着有点迟缓、疲倦、意兴阑珊。三张小图分别切出魔法耗尽前的三个瞬间，掉落、入水、停驻在荷叶上。最后一张小图上，一只青蛙支颐不语，看着不太高兴，另外一只则仰望天空，大概想着，能否再飞一次？

经常有人问他，《疯狂星期二》的灵感来自哪里？你是对青蛙有什么情结吗？你是不是有一只青蛙宠物？你是不是住在沼泽地附近？

他的回答是：“事实是，想象力不需要外部刺激。看一个孩子玩耍，就是看想象力无远弗届的荣光。”

大卫·威斯纳出生于1956年，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们家住在泽西的郊区，周围是一片小树林和几英亩未开发的空地。但在他和他的小伙伴眼中却是史前丛林、茫茫宇宙，只要一点点信仰，就能看到翼手龙在头顶盘旋，外星人登陆地球。他曾经说：“我所有作品都不过是一个美国男孩郊区童年生活的产物。欧洲、亚洲、南美的孩子竟然都能欣赏，这个事实至今让我惊叹不已。”

这种童年生活在《飓风》中得到了最完整、生动的记录。这也是一个很简单故事，某个飓风来临的夜晚，大卫与乔治兄弟俩在家中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飓风过去，发现一棵大树倒在邻居家的草

坪上。这棵倒下的大树于是成了他们假装游戏的道具——“第一天上午，他们玩了丛林探险游戏；下午，他们周游了七大洋，乔治掌舵，大卫眺望地平线，谨防海盗船的袭击；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穿越星际，还去过更远的地方”。

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大卫·威斯纳的童年回忆录，兄弟俩的房间基本上就是从他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间里复制过来的，床、被子、灯、玩具，还有墙纸上的火箭、热气球、放大镜、大象、瓶中船、书以及奖牌，都是他小时候画在自己房间墙纸上的。很可惜，在书中只能看到一小部分的墙纸，但我们可以想象剩余的部分。他曾经说过，小时候最喜欢画恐龙，在自己的卧室里画了满满一墙的恐龙，那些都是他想象中从后院丛林里捕获的猎物，就像法国拉斯科洞穴里刻满了史前人类的猎物。

成年后，他在书中挖掘的很多创意其实都来自童年的幻想，比如飞行（尤其是让那些不能飞的东西飞起来）、平行世界、海底生物、变大变小等等。

上世纪50年代流行巨型蜘蛛、巨型蚂蚁之类的电影，小小昆虫变成巨型怪兽，或者人被缩成昆虫大小，尺寸一变，日常生活就成了异想世界。《华夫先生》就是这种幻想的杰作，讲一只猫与一群外星人之间的战争。多年前，他曾为一本儿童杂志画



《梦幻大飞行》内文插画

一幅封面插画，一群外星人的飞碟坠毁在茫茫大漠之中，翻开封底才发现，那个沙漠其实是一个孩子的沙盒游戏。他一直想把这个想法画成一本书，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情节。直到20年后，他无意中在纸上画一个飞碟，画着画着突然觉得很像一个猫的工具，由此才想到了一个黑猫大战外星人的故事。

9岁那年，他曾与朋友从一条小溪中挖出一个黑色的机械公牛模型。那显然不是一个小孩子的玩具，而是一个成年人的东西。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它的主人是谁？它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这只神秘的公牛在他的画桌上待了很多年，直到1983年他的公寓着火，一切都被烧毁，公牛也消失无踪。他觉得自己丢失了一小片的童年。这一段记忆在他的脑海里酝酿了多年，最后成就了《海底的秘密》——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少年在海边捡到了一架古老的水下照相机，他将胶卷冲印出来之后发现，照片中记录的，是一个个奇幻的异类世界。而且，他还发现，这架相机已经借助大海的潮汐漂流，辗转流传于许多不同的少男少女之手……

他最著名的作品《三只小猪》，则是他小时候看动画片得来的灵感。在那个动画片里有一个角色在跑，急转弯时拐得太急，拐到影片之外去了。当它停下来时，发现自己站在胶片边缘，赶紧又跑回去。

“在现实之外还有另一个空间，一个无边无际的空的的世界，这个空间的概念让我很着迷。”

一个角色离开故事，进入故事背后的巨大空白——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酝酿了15年，最后以三只小猪的故事表现出来——因为《三只小猪》可能是整个地球上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所有人都知道它们的故事和结局，不至于对它们原本的命运感到困惑。而且，如他所说：“如果你是那个故事里的那两只小猪，每次都是被狼吃掉，难道你不会有一点动机，想要逃离那个故事吗？”所以，在他的《三只小猪》里，大灰狼一出场就吹气过猛，把小猪吹到了故事之外。小猪们逃走了，悠然穿梭于不同的故事之中，狼却被禁锢在原来的故事里。

在一次采访中，他曾提到对他一生创作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叫《疯子的鼓》，没有任何文字，完全凭借图像传递极为复杂的信息——无论从叙事还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每一幅画都把我的心智打开得更宽一点”。

“那本书真是一件美丽的东西。羽毛的装订，纸张的感觉，墨水在纸上铺陈开的感觉，连气味也令人迷醉。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想做书，把一个奇妙的故事盛放在一个美丽的容器里。”

其实，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如此形容。■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1）

文 / 朱伟

莫言是笔名，真名管谟业。谟是谋略，也是谋国事的一种文体。莫言21岁离开高密，到烟台黄县当兵；24岁调到保定，任政治文化教员；保定成了他创作的摇篮，他最早的小说都发表在保定市的《莲池》上。上世纪80年代，千千万万青年都拥挤在文学的小道上，通过文学改变命运。那时省、地市的文学刊物都办得风生水起，保定有孙犁、梁斌、徐光耀这样的大作家坐镇，《莲池》当时的影响不低于河北省刊《长城》。莫言一开始写作就用了这个笔名，莫是否定，但莫不仅通谟，还通寂寞的寞、广漠的漠，所以，不管有意无意，这个笔名其实包含着很多内涵。莫言告诉我，他1988年专门打报告申请，这已是他的正式名字了。

我因为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认识的莫言，那已经是1985年了。他最早于1981年发表在《莲池》上的第一篇小说叫《春夜雨霏霏》，第一人称，以一个农村新媳妇的身份，在春雨缠绵之夜，向守岛部队的丈夫表达思念之情。1982年发表的第二篇小说《丑兵》，接近一点他自己了。他曾说，因从小就有人说他长得丑，他曾为此自卑过。这篇小说仍以第一人称，选了一个“我”自责于丑兵的回忆角度。小说里有一点细节可能是他自己的经历，但这两篇习作其实都没找到一个能很好表达他自身的方法，却已实在令部队看到了他的才华。他因此提了干，正排职教员，行政23级，不用转业了，在当时极属不易。

紧接着，1983年在《莲池》上发表的第四篇小说《民间音乐》，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篇小说的结构很像美国作家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小镇，晚上突然来了个驼子，自称是爱密利亚小姐的亲戚，进了爱密利亚小姐的铺子，挑逗了全镇人的好奇心，于是爱密利亚的咖啡馆就迎合大家的好奇，热闹地开张了。莫言改变这个结构，加上和突出了音乐：晚上来到小镇的是求留宿的流浪瞎子，开茉莉花酒店的离婚、单身的

花茉莉收留了他，引发了人们的窥视欲。瞎子以他的箫和二胡，给花茉莉带来了生意。情节发展，没有《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爱密利亚小姐的前夫马文·马西出狱后对驼子的蛊惑。花茉莉的前夫是县政府里一个小白脸科长，他没来搅乱花茉莉与瞎子的生活，瞎子最后是在花茉莉主动表达衷情后，默默离开走了，留下了失落与惆怅。

这篇小说帮助莫言离开了保定。他先得到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老先生的赞赏，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与孙犁的评论，到北京报名。但已经过了报名期限，这就有了徐怀中慧眼识良马的故事。徐怀中心应该是原50年代西南军区，公刘、白桦那一拨作家中的一员，他最早在50年代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叫《我们播种爱情》，改革开放后写的影响最大的一个短篇，是描写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西线轶事》。徐怀中对于莫言的重要性，不仅是赏识，更重要的是保护。因为莫言在军旅文学中的出现，具有很强烈的颠覆性，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与军旅本应有的色调是那样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徐怀中以他当时的身份力挺（先是军艺文学系主任，后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部长），莫言顶起巨石的成长几无可能。因此，莫言获诺奖后，我曾写文章说，莫言的幸运是遇到了徐怀中，徐怀

中无疑是莫言背后，庇护他的一棵大树——若没有这棵大树，就不会有莫言无须恐惧禁区，可以放肆地越写越自信的宽广的文学之路。

军艺这个班当时有35人，4人一个寝室，往往用蚊帐隔出一个个自在的空间，走进每一个寝室，都像进了迷宫。莫言是与东海舰队的崔京生、成都军区的施放在一个寝室。崔京生是我的老相识，他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逼出来的。他们这个班，当时名气最响的是济南军区的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开学不久，李存葆又在《昆仑》杂志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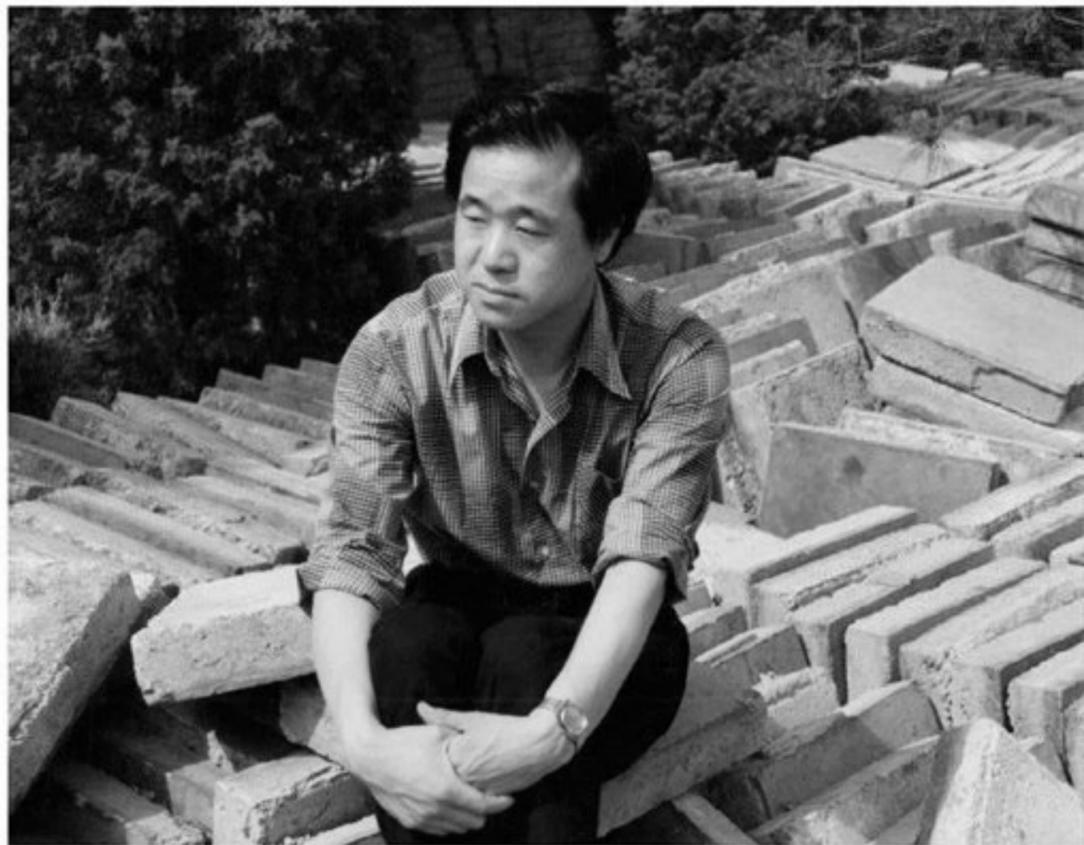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莫言第一本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收录了他1985年上半年之前的小说，包括在《莲池》发表的早期作品

座坟茔》，当时要在班上开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一片赞扬声中，独莫言坦率、尖刻地唱了反调。他说，在这部作品中，他闻到了“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这当然引来了众多反驳声，亦令徐怀中意外。崔京生说，李存葆当时脸上都挂不住了，他自嘲说：“看来，我还真要从ABC开始学起了。”

轻视人家，你又能写出什么呢？《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写出来的。崔京生说，因为“那时候莫言什么都没有”，他要一部作品来“争一种东西”。这小说，莫言说，草稿只写了三天，誊清用了四天。

《透明的红萝卜》的篇名是徐怀中改的，原来叫《金色的红萝卜》。徐怀中将小说推荐给冯牧，冯牧在西南军区当过文化部长，是他的老上级。冯牧读后也推崇，这小说就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发表后专门开了座谈会，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的感觉。我后来才知道，创作冲动其实源于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铁匠打铁、偷萝卜、小小年纪就被侮辱的悲凉烙印。它当时在文坛形成的轰动效应，是因太强烈的表意能力：那个长长脖子上挑着一个大脑袋，从头到尾都不说一句话，全身都像煤块一样泛出黑亮光泽的黑娃，以及被铁匠房的炉火映成青蓝色的铁砧上，被火光舔熟的那个晶莹透明，泛出金色光芒的萝卜，感觉太强烈了。那萝卜飞出去，就划出一道漂亮的金色的弧线。在那个前卫作家刚开始意识到意象对于艺术之作用的年代里，它真构成了一种炫目的，甚至令人震惊的效果——在1985年，还没人能将意象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张的油画般的感觉。

这小说其实只写了黑娃一个人物，那个怜悯他、爱护他，嘴上有“金黄色茸毛”的菊子，那对因都爱恋菊子而决斗的猥琐的小石匠与小铁匠，还有也不言语，被火光耀亮的老铁匠和那个监工头般絮叨的刘副主任，都是黑娃的衬托。我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它好在炉火与红萝卜强烈的意象背后，这样一个孩子身上那种刻骨的孤独。他孑然独行，摇摇晃晃地担水，鼓着瘦弱的胸脯拉风箱，手掌冒烟捡起刚淬火的铁钻，以一种倔强孤



莫言（摄于1986年）

傲默默迎向被践踏。我觉得这小说的强悍，是莫言将自己的孤傲赋予了黑娃，或者说，黑娃就曾是他自己。这个黑娃，似乎压根儿就是与田野里蚂蚱、秋虫、栖居鸣唱的鸟与河滩里的鸭子相伴为生的。最后他钻进了那片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那里才是残酷的人类世界之外，他的避身之地。这种悲凉牵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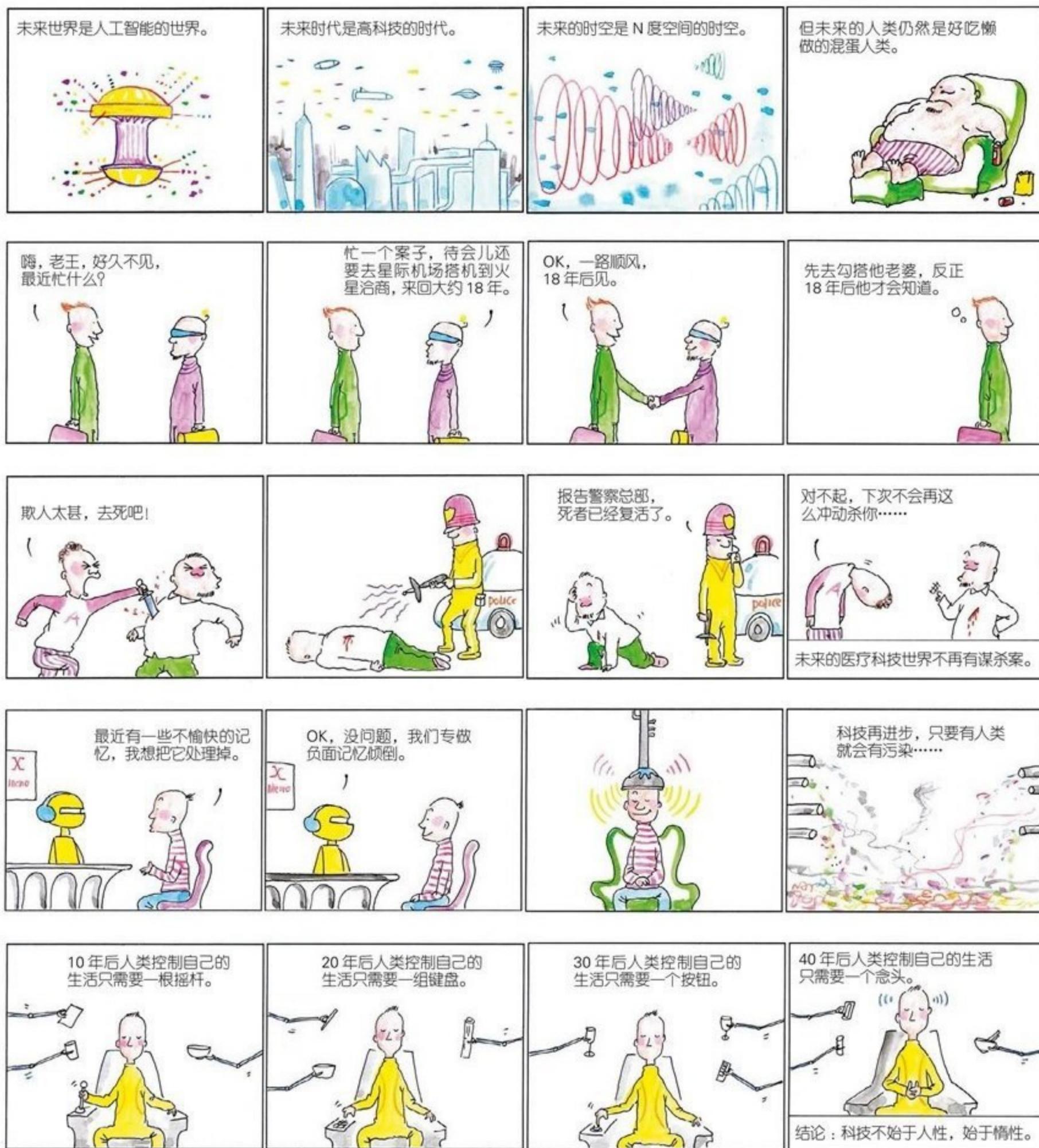
这是莫言第一次真正用文字回到他的高密故乡，回到紫穗槐环抱的河滩地，回到密簇簇黄麻地里蚂蚱扇动翅膀的声音。小说中写黑娃蹚在温柔的河水里，两腿间像有无数鱼嘴在吻他，故乡的风似乎一下就把他的才华激发出来，给他的写作构成了可徜徉的无限可能性。从这篇小说始，莫言真正找到了可用文字表达他傲骨的足够自信，它确实通向一条令人刮目相看之路。其实，它不构成对李存葆式道路的挑战，却构成了实质的分道扬镳。这其实是一条叛逆之路，尽管背后有徐怀中、冯牧、王蒙的支持，但莫言顺这条路走下去，势必就走向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离群索居。

这条路，我们自称为“纯文学”。☞（待续）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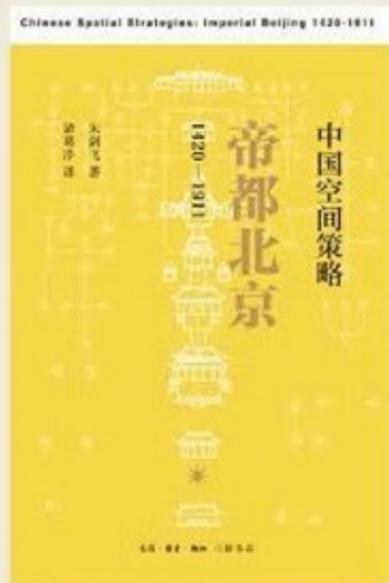
季剑青 著 定价: 56.00元

如何看待、处理和安置北京的“历史与记忆”，相关讨论、争议贯穿了整个民国乃至共和国初建时期。在大量典籍、诗文、建筑、城市规划、民族国家等问题的“书写”互动下，作者既结构化地呈现了古都北京逐渐消逝的气息，又在现代性理论上做出推进的尝试。

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

朱剑飞 著 诸葛净 译 定价: 53.00元

在明清北京，城市建筑与朝廷政治是如何联系在一起？长城、大运河、帝国京城及紫禁城宫殿的建造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它揭示了权力的运行、美的形式，还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世界观？本书以考察明清北京的建筑为基础，并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空间布局方法。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增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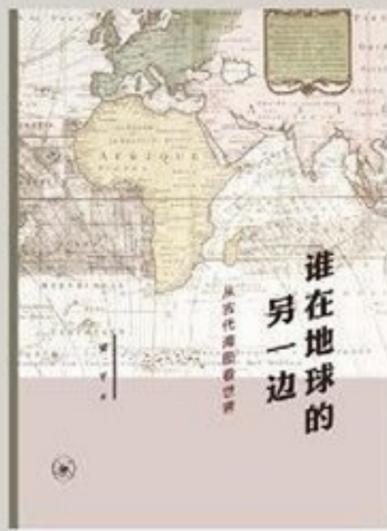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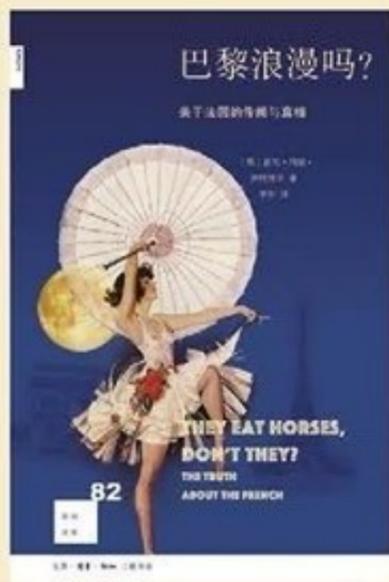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译 定价: 50.00元

茨威格回顾了人类历史上若干个群星闪耀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对世代代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三联增订版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版本，将历史时刻特写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14个，增补了西塞罗和“一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巴黎浪漫吗? 关于法国的传闻与真相

[英]皮乌·玛丽·伊特维尔 著 李阳 译 定价: 48.00元

我们经常对法兰西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好憧憬，然而真相又如何呢？伊特维尔以其幽默晓畅的文笔为我们带来了一次从地下铁到婚外情的无所不包的法国奇妙之旅，探索了45个贴在法国人身上的“刻板印象”，以“正史”不载的种种细节还原出一个活色生香的法兰西。



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

梁二平 著 定价: 100.00元

通过150多幅经典古代海图，描述了人类海上交往的历史进程，以及由大航海所带来的大发现；同时，也可以看到由黄金、白银、香料、瓷器、黑奴贸易等引发的大侵略、大移民、大变革。这些记录历史、创造历史的古代海图，构成了一部色彩迷人的另类世界史。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李大兴 著 定价: 38.00元

作者说：“历史应该是个人书写”，这是因为个人的微观史是时代宏观史的真实映照。他的书多为阅世、阅人与阅读的人生自述，视野广阔，思虑深远，涵盖文学、史学、美学、诗学与音乐；时而平实晓畅，时而诗意充盈，新奇驳杂、舒展有致。



最后一课

文 / 冯大路 图 / 陈曦



所在单位已经和这所中学为邻一年多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挨着学校还不错，青春做伴，气味清新。时日一长，方知现实残酷。

楼一侧对着学校的操场，体育老师特别爱带着学生跑步、喊号。别看这学校不大，但是传统项目竟是足球，那些熊孩子时不时地就把足球踢向我们楼的墙面，发出“砰砰”的响声。关键是“砰砰”的来临还不太确定，像一枚不知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以至于有位心脏不大好的同事找来了他们的体育课表提前做好思想准备。由于太吵，楼内已经换了好几个公司，我们算是最长的。

前一阵子，学校竟然在离我们窗口不远处挖了一个沙坑。我们本以为在沙坑里跳跳远也就是了，顶多是投投实心球。没想到，有一天他们开始投铅球，而且是斜对着我们的窗户。空气中飘来老师的话更让我们坐立不安：“看到没有，就往他们窗户那边投，投到下面就是校纪录，有奖品！”天啊，如果碰到个体育特长生，后果不太好想。不能由着他们来，就在我们决定跟领导反映时，一个实心球就把隔壁窗台的花盆给砸了，而屋里还有个怀孕的同事。

懦弱的领导在我们法律部同仁的陪伴和胁迫下，来到了他们的校长办。校长对师生的莽撞除了送水果鲜花表示安抚外，为融洽关系，还提出了个双赢举措——想聘请我们一员当他们的法律副校长。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好几个法学专业毕业的同事纷纷表示很有兴趣。领导见我更加显得踊跃的样子，就推荐了我。

没过多久，学校就派了个学生会副主席来请我进行法律讲座。为了不出现《围城》里方鸿渐演讲时不知所云的窘境，我还真花费了几个晚上来准备。学校本来要我讲讲预防青少年犯罪避免成为古惑仔的问题，还给我准备了讲座提纲和案例。但是一到讲堂上没讲几句，我发现这些脸上闪着青春痘的孩子目光漠然根本听不下去。我心想自己又不是什么模范人物，还是讲点刺激的吧，讲讲预防早恋问题吧。于是乎，我从自身初中时装病逃课和一个漂亮女孩在北海公园划船，以及高中时为了给另一个文艺女孩买丝巾而抢小孩早点钱的经历谈起，加上点儿在法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

时遇到的各种案例，大谈早恋的危害，特别是耽误了考上北大法律系，没法泡更高端的女孩的遗憾。最后，我却不知为何还说了句：年轻好好，真羡慕你们。

看着台下同学们逐渐发亮的眼神和不时表示同感的应和，间或还能看见有两个隔着三排座位的男女学生还互相会意微笑，此时，我突然感到在单位难得的成就感。讲座结束后，我看到了学生眷恋的眼神，有同学甚至还隐晦地说下次能否讲得再具体些。校长却沮丧着脸对我说：“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种事正反都不要提，这帮孩子也许脑子里还没走那根弦，怕都让您给拨弄响了。我校本来升学率就不高，再把早恋问题弄上议事日程，我这校长还怎么当啊？”我嘴上连说抱歉，心里说，这春天要来了，谁也挡不住啊。

一回去，我就感到自己确实有点儿不识时务，就期待着赶紧给我来个解聘通知书。否则，我没事还得老想着备课，起码还得来个“最后一课”吧。一天下班，我看到那个学生会副主席在车站抽烟。他也看到了我，不好意思回避，就说：“校长，您也来一根？”我心想：既然还没被正式罢免，我还得履行好我的职责。我心下一动，想起包里有盒朋友刚送我把玩的雪茄，便拿了出来：“看见没有，我抽这个。”他说：“这是雪茄吧，好像挺贵。来，我帮您点上。”说罢从烟盒里抽出一个塑料打火机。“Out了吧你。点雪茄哪能用打火机，油料味会掩盖住雪茄的芳香，起码得用根长支的火柴。知道为什么用长火柴吗？那是为了等到硫磺味儿散尽，纯粹燃烧木材。好歹咱俩也算是师生一场，告诉你吧，是男人都得抽雪茄，以后再在我面前抽这几块钱一包的破卷烟，小心我抽你。”说完，从他嘴里夺下正叼着的烟，扔在旁边的树坑里。看着他发愣的样子，我心下暗笑，头也不回地走了。

现在，我已很久没有得到学校的邀请了，看来事实上已经被罢免。我下班经过车站，偶尔还能看到那个副主席学生，再没见他嘴里叼着根烟的衰样，只是旁边多了个女同学。■



制茶大师的私房茶

茉莉花茶·夏花II



美好的中国味道不会消失

3小时5000份售罄

补货5000份一周售罄

75%的回头客

大家都爱这美好的中国味道

扫码购买



传奇，系出经典



——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型号5033：
葡萄牙系列腕表与航海先锋们的光辉传奇和非凡勇气遥相呼应，这款典雅的时计即是出色的例证之一：将万年历与月相显示的复杂功能成功精缩于一枚机芯，配备7天动力储备，双向上链的比勒顿系统确保高效能，腕表可运行至公元2499年。

一枚时计，方寸间尽显未来。

IWC. 专为男士而设。

机械机芯，比勒顿自动上链系统，52610型自制机芯系列，上满链可提供7天动力储备。具有日期、星期、月份、四位数字年份及万年历月相显示。双面防反光凸状蓝宝石玻璃表镜，透明蓝宝石玻璃表底，防水达3巴，表壳厚度15.3毫米，直径44.2毫米，Santoni鳄鱼皮表带。



微信扫描二维码
即刻访问IWC万国表
微信专卖店

IWC万国表专卖店：北京芳草地 北京SKP 北京东方新天地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IFC 上海东方商厦 上海尚嘉中心 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

如需更多表款详情或索取限量精致目录，敬请联系 400 0642 999 infochina@iwc.com

www.iwc.com

IWC
SCHAFFHAUSEN